黑色文库 第九集



叶少华 著

红尘白浪

黑色文库 人 劳改基金会出版

红尘白浪

叶少华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4

红尘滚滚去,世事殊难尽人意, 白浪滔滔意,大江毕竟东流去。

目 录

	下马威	118
	饥肠辘辘学耕田	123
	再次调动	130
	重回老虎队	139
	"干事"素描	146
	劳改队轶闻	149
	穷困的内陆百姓	156
第五篇 炼狱炽火		
	第一次越狱	166
	铁窗里的友谊	169
	刑讯逼供	. 178
	高墙里的文革	. 193
	监所见闻录	. 219
	第二次越狱	. 242
	第三次越狱	. 258
	大难不死	. 264
后证		275



作者摄于澳洲悉尼海边



作者父母和叔父(右一)合影。叔父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县贸易公司主管。土改时遭残酷殴打。新婚三月后被逼上吊自杀。



作者摄于澳洲南天寺



作者父亲为国民党少将,曾任广东某市警备司令。



作者父母(1945)



作者幼时全家福。右一 为作者,是家中的长子。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不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多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

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在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 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 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 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 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 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 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 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也是对公正及自 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 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 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 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

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4年10月于华盛顿

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序)

杨莉藜

在澄澈的阳光下编校《黑色文库》的又一部书稿——叶少华先生的《红尘白浪》,心头挥之不去的是一句朴实而又隽永的碑铭——"自由不会从天而降"(Freedom Is Not Free),镌刻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军人纪念园那面花岗岩石壁上,映衬着刻满了死伤者人数的黑色大理石碑,闪着熠熠的银光。

的确,自由不会从天而降。美国著名政治领袖帕特里克·亨利誓言以生命来反抗不自由的制度,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甘愿为自由付出生命和爱情的双重代价,而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则认为,自由既需要我们付出生命和鲜血,也需要我们付出智慧和思辨……

如果说历史的风尘模糊了这些闪光的睿言智语,让我们无法 去感知那原有的切肤之痛,叶少华的亲身经历则会满含着伤痛和 悲愁,淋漓着鲜血和泪水,告诉你一个并不遥远的追求自由的故 事——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大陆。镇反的枪声、大跃进的喧噪和 反右的血腥接踵而来,中国人的自由梦在现时的铁蹄下践踏得粉碎。叶少华的童年虽然是随着父亲在戎马倥偬的抗日战场上度过 的,但依然充满了天真的童趣和人间的温情。然而随着共产极权 在中国大陆的确立,有着他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自然成了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的对象。他在歧视、饥饿、苦闷、彷徨中长大,耳濡目 染的一切使他渐渐认识到这个自诩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其实 是一个以外来新宗教来控制人们思想,剥夺人们的思想、信仰、 言论、迁徙、生存自由的专制地狱。 1961年9月,叶少华终于迈出了用脚投票的一步。他和一位 朋友一起跟美国的亲属联系,询问去美国与亲人团聚的可能性。 没想到这封信被秘密警察拆看,成了他锒铛入狱的唯一"罪状"。 中共政权仅仅凭着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书,加上东拼西凑的其 它"罪行"就判了叶少华整整十五年的徒刑。

高墙里的严刑拷打,非人待遇和种种超乎常人想象的疯狂和血腥,反倒更擦亮了叶少华的眼睛,更坚定了他投奔自由的信念。当文化革命的腥风血雨席卷大陆,残酷斗争成为正常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时,囚犯们的遭际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叶少华决定越狱出逃。自1969年开始,他和狱友一次又一次越狱逃跑。每次被抓回来都遭受了更为严酷的拷打,更为触及灵魂的批斗。但恶毒的报复之火,从来没有浇熄他心中向往自由的火焰。因为他先后三次越狱逃跑,"没有悔改表现",最后又被加刑14年。

就这样,为了追求自由,叶少华总共付出了二十九年的青春时光。入狱时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经过无休无止的严刑拷打,当 牛做马的强迫劳动,扭曲人性的灵魂革命,出狱时满身伤痛,心 力交瘁,早早踏上了迟暮之年的边缘。

像很多写实作品那样,叶少华的故事很平常。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结局,只是在那个"极权之下,莫非囹圄;率土之滨,莫非囚徒"的国度里,被膨胀的权力和野心残酷吞噬的无数青春和生命里的一个例证。然而,这样平常的故事却引起了我们很多不平常的思考。

编校之余,萦绕脑际的第一个疑问是,在自由是天赋还是皇恩这个问题上,叶少华的故事会不会给人误导?因为单单从叶少华的故事来看,自由似乎更像出自皇恩。叶少华虽然在牢笼里左冲右突,终于没有能够靠一己之力,逃离苦海。最后还是趁着毛时代结束之后中共极权统治的稍许松动,而挣脱了冤死囹圄的厄

运。叶少华本人仿佛也同意这种观点,所以他在原书稿的结尾处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明君何日下凡?"也就是说,历经了半生磨难的叶少华也和很多人一样,最终把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明君,而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或国民对于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难道说自由真的是来自于统治者的恩赐,而不是我们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并忠贞不渝地为之守候的天赋价值?

这个问题表面上有一定的迷惑性,事实上并不复杂。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生而平等自由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共识。自由不是某个人、某个党派、某个政府的恩赐,而是上天赋与人类的基本权利。一个专制的政府为了统治阶层的利益总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剥夺人们这种天赋权力。所谓集权,除了是指把各阶层的权力集中到少数统治者手里之外,也是指把具体个人的基本人权剥夺、占有到少数人那里。因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大多数人只是尘世马牛,樊笼鸡鹜。他们四处碰壁,动辄得咎,因为自由的空间已经被统治者掠夺殆尽。然而,如果被统治者的自由空间过于狭小,无法创造出足以维持社会运作的财富,且滋生出威胁统治者利益的对抗情绪时,统治者自然会考虑调整自由空间,以利于统治阶层的长治久安。这时,从表面上看来,统治者似乎是在赐予我们自由,事实上那只不过是我们被剥夺了的许多自由中的一点可怜的返还。因此,我们丝毫没有理由为此感激涕零,更没有理由放松我们对自由的执著追求。

作为一部纪实作品,我们无权去改动原作的情节,也无权替 代作者向读者说话。但似乎有必要在这里把其中的奥秘告诉读者, 特别是青年一代读者,以免他们误入歧途。

编校《红尘白浪》,我还时时想到长期生活在共产极权之下的 人们耳濡目染而形成的思考方式。读了这本书,他们中的不少人 可能会说,书中的主人公原本是咎由自取——如果他没有试图逃 均贫富、等贵贱,无徭役、不纳粮的下层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和这种充满幻惑的海妖之歌暗暗合拍,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像奥德修斯的船员们那样投入了无边苦海。诗人泰戈尔说: "只要我们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我们就能得到自由。"反过来,我们失去了自由,是因为我们曾经想低价换取,甚至毫无付出地得到自由。我们为自由所付出的,无论是生命、鲜血,或是智慧、思辨都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被人牵制了感官,而非思想,从而风风火火地闯入欲哭无泪的绝境。

走出监狱的叶少华终于没有留在大陆,他移民澳洲,成了自由世界的居民。从八十年代国门开启以来,这股离别故土,投奔自由的浪潮至今没有停息。这里有太多的辛酸和苦闷,太多的失望和无奈。只要中国的专制制度一天不改变,只要诺大的中国一天不能容忍一颗颗平等、公义的心自由跳动,人民的逃难潮就一天不会停止,中国人的当代吉普赛形象就一天不会改变。

转眼间,我们失去自由,被囚禁在这口活棺材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奋斗至今收效甚微,苦难的人民只能满世界流浪去寻找自由的乐土?这也是编校这本书时,常常困扰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说得明白,但简略论之,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自由需要启蒙。有一个著名的试验,用玻璃把鱼缸隔成两半。开始,习惯于满缸游弋的鱼常常会撞在玻璃片上,等过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之后,鱼儿开始习惯被剥夺得只剩下一半的自由天地,不再去盲目碰壁。这之后,再把玻璃片取出,这时那些已经习惯了很少自由的鱼儿依然保持原来的习性,不愿冒碰壁的危险去探寻新的天地。这个试验告诉我们,生物的行为方式,包括高级动物的思维方式,有一种常见的惰性。就这群鱼儿来说,只要不成为涸辙之鲋,他们就宁肯在这狭小的天地里生存,不会去翻腾跳跃着追寻自由的海洋。而且

这种惰性的增长与被剥夺自由的时间长度成正比,失去自由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同化,想当然地以为周围那狭小的空间就是自由的全部。虽然,人类的思维比鱼儿不知要高级多少倍,但是这种惰性显然也是存在的。五十多年过去了,全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已经成了祖父辈。他们及其后的几代人在这半自由或不自由的空间里长大,如井蛙拘于虚,夏虫笃于时,无从知道超越他们知识范围的广阔大海和四季流转。因此,当代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和义务进行自由启蒙,让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已经用血肉和智慧换来的人类普世自由的海潮,解救在半个鱼缸里团团打转的鱼儿。

二、自由需要战斗。由于自由不是天上掉馅饼那样的乐事,我们依然需要忘我的战士——不一定要真刀真枪去冲锋陷阵,但是与专制制度和它的维护者的思想交锋依然会艰苦卓绝。自由的看客、自由的仰慕者在中国历来不乏其人,当今依然蔚为大观,其中有风闻自由的可爱而为之梦牵魂绕者,有深知自由的可贵却只愿临渊羡鱼,而无意退而结网者,有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高处,享有一定的物质和权利自由,而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者……相对于那些懵懵然不知天下有自由的人们来说,这些人当然在思想上又进一步。然而现今的中国并不需要太多自由的看客和自由的仰慕者,中国急需的是自由的战士——不计个人得失和一己沉浮,为自由光复中华大地而奋然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色文库》的作者都是自由的战士。 历经半生的非人折磨,依然对自由的追求夙夜匪懈,因此,冒着 种种危险,把自己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了解极权制度的邪恶本性,为彷徨里的中国亮起一盏歧路红灯。 中国在回归自由的路上,不会忘了他们的振聋发聩之功。

三、自由需要勇气。追求自由就意味着与试图独霸自由的独

裁者的一场恶战。不管是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或是付出思辨和智慧的代价,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拿出争取自由、守候自由的勇气。唯其如此,才能从自由的看客或仰慕者变成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才能保持一个自由战士应有的昂扬斗志。

我们常常深感不安地看到一些往日斗志顽强,气势凌厉的战士,随着环境的改变,从争取自由的主战场上黯然退却,去守候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渐渐沦为自由的看客或仰慕者。这本书的作者不曾被黑牢和酷刑吓倒,血淋淋的殴打和执行死刑的恫吓都不曾让他低下认罪的头,那种"粉身碎骨浑不怕"的气概让人顿生景仰。出狱后定居到自由国家的他依然魂牵故土,关注着中国的民主自由,并毅然为《黑色文库》撰稿,见证、反思那个极端独裁的年代。但是,有必要说明,享受着自由空气的叶少华,内心里似乎多了一份怯懦。在书稿编校过程中,为了核准细节,收集图片资料,我们多次和他联系,但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很显然,叶少华虽然和中国有半个地球之隔,心中的恐惧却依然没有消退。我们常常暗自思忖,那个面对强暴,勇敢抗争的叶少华哪里去了?这种意志的萎缩和勇气的衰减,难道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哀?对于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大业来说不是一种可叹的损失?

美国总统杰佛逊曾经说过:"当政府畏惧人民,你得到自由。当人民畏惧政府,你得到暴政。"面对一个极端独裁的专制政府,我们需要拿出非比寻常的勇气,懦弱和畏惧是对独裁者侵害自由的默许、纵容、甚至鼓励。

前 言

数十载铁幕,二十秋炼狱。我曾经在外来新宗教那扭曲人性 的专制阴影下沉浮。

苏武牧羊中唱道:"雪地又冰山,苦忍十九年"。我却在隆冬零下三十度风霜,盛夏四十五度酷热的北国,熬了二十个春夏秋冬。

有多少人知道:那里的盛夏,早上三点就"一轮红日滚金球",晚上八点才盼到"白日依山尽"。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者,意味着每天要不停地苦干十七个小时。晚餐后,再"加班压场",休息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镇反、土改、肃反、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人为灾难,十年武斗……已是罄竹难书了;加上新老虎凳、新庞贝城、三十斤铁镣、棺材车间、尸肥池、死里逃生……则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追求自由,我遭到长达二十九年的折磨。七次黑牢,三年半与蚊蝇、虫蚁、蟑螂为伍,二十载光阴和手铐、脚镣、绳索相伴。午夜梦回,不堪回首,"只恐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幼年算命曰: "马鞍型",不甚解。我有过幸福的童年,忽然 打入十八层地狱,忽然又浮出水面,最后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历 尽人生苦乐,方始明白签意: "中间低,两头高"的运程也。

正所谓:红尘滚滚去,世事殊难尽人意,白浪滔滔意,大江毕竟东流去。

在时间的河流里,个人的人生周折也许是无关紧要的小小浪花,然而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多舛的命运和艰辛的历程。 愿自由之神的火炬,早日照亮大地。

第一篇 童年生涯

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

我的老家——福建省东华山下的宁化县,在遍地翠竹成林, 蔗甜瓜大的川江河畔。江西的大米瓷器,潮汕的芋头柑桔,信丰 的咸鱼豆豉,本地的鱼虾果菜,应有尽有。特别是土制豆腐、家 酿老酒,更是驰名四乡。将近半个甲子之前,一个秋天的深夜, 我就出生在这素有"小南京"之称的山城里。

我们家乡,一个姓就是个大村,几百户人家住在一起,一式的多层半圆形结构,中有祖宗祠和大门,左右各有一小门。屋前有晒谷场和"门口塘",屋后是松林竹园。遇有紧急事情,大小门一关闭,俨然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先祖也许官拜县令,故屋侧竖有座牌坊,上书三个大字——"循良第"。祖父曾是清末举子,但只享了半年举人老爷的清福,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我们都未见过祖父母的面,只是从后祖母保留的瓷像上,看见他们穿长衫马褂的仪容。祖父母的墓就在屋后,按节令我们随着大人常常去"铲坟",以示后辈的悼念。平时就唱着"年三十晚摘槟榔,槟榔香,摘子羌……",在林下嬉戏。

家父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成为老先生的学生。曾留学日本,后在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军校出来后参加抗日,转战南北,由东海到西北,由江北到江南,一直到韶、昌、穗、湛。后任某市司令官。他遵循孙国父的教诲,一生廉洁奉公,忠于职守。

外祖父是新加坡华侨,经营锡矿开采业。外祖母因连生四个 女儿,自思欠德而欲出家落发为尼,外祖父只好在后花园筑一美 丽庵堂,成其修道之愿,直至她鹤驾升天。

母亲怀我时,适遇日机轰炸广州市,全城戒严。她躲进先施公司大厦,幸遇堂叔阿伦持特别通行证,把她带到郊区,才避免一场灾难。敌机轰炸了那座大厦,几位在大厦躲难的孕妇不幸全部身亡。

从我记事起,就是多事之秋,日军逼近,困难重重。我们全家大小跟随父亲的队伍辗转南北。驻军在韶关时,遇发大水,洪水围困,母亲就卷高裤脚,下厨炒菜煮饭给大家吃。父亲就坐在厅中给我们讲故事。

到乐昌后,常遭日机侵扰。父亲与勤务兵便带我们到半山的防空洞里去,从洞口可以看见日机在盘旋扫射。我有一架小秋千,士兵老爱与我争着玩,我便写了"大人不准打(玩)"的字样贴在柱上。唱着:"团团转,菊花园,妈妈叫我看龙船"的儿歌。

不久,合家回到家乡,父亲"标"了一块地,建了一座两层 大楼。我们家乡的糯米甜酒香醇可口。每次放学回来口渴,我就 爬到阁楼上掏酒解渴。我从小酒量大,一直到成年,从未被灌醉 过。

父亲那时好像喜欢骑马,他有一匹高头大马,非常烈性,除他和马夫外,无人敢近它,骑的时候要先抚摸一阵,轻拍几下才能上去。那马夫很和气、忠厚,热天他袒怀在松林下乘凉时,常抱着我,让我随着他一起一伏的肚皮,香甜甜地睡去。

驻当地美军,常来用卡宾枪射鹤当作实弹射击,几乎每射必中。这时候就是我们小孩捡弹壳的快乐时刻了。

逢年过节,除了舞龙舞狮,表演武术、放孔明灯、请竹蓝神、 簸箕神等外,必在祠堂内举行大宴。我是长子长孙,逢宴必赴。 过去封建的意识很浓,妇女是不能入席的。有一次我母亲发了很 大脾气,据理力争,此后才男女平了等,大家都可以去参加。有 一次抽签,我中了头奖,捧着一大盆插着金旗的塔形红包子,兴 高采烈地回家报捷,谁知中奖者就是此届宴会的东主,要出钱的, 于是合家大笑。

抗战爆发,全家跟着父亲随军北上。有一次在阴雨中坐了很久的汽车,公路泥泞不堪。突然汽车失去了控制,幸亏司机灵活,才免得全家葬身深崖下。还有一次,在泥泞陡坡上刹不住车,直往下溜,我们赶紧从后面跳了出来。天黑到山脚过渡口时,赫然见一辆黑色轿车,四轮朝天地半浸在那里。沿途水鸟怪叫阵阵,疑为鬼嚎,吓得卷缩一角直冒汗。

大概到了大坑口,改乘火车北上,全车是部队和随军家属。 经长沙到汉口,住在北岸临江的旅店里。父亲叫勤务兵带我们去 飞机场看飞机,我第一次看见那些庞然大物在旋风中腾空而起。 那时地面上铺着的是钻了无数小圆孔的铁板,而非现今的水泥跑 道。

离开汉口,坐长江大轮沿江东驰,到处是滔滔的水浪。一些载着土特产的小船,时时过来勾住轮船,兜售生意,看他们勾放自如,在大风浪中颠簸,真是险象环生。改乘木帆船后,几次险被风浪打翻。一次三妹尾随母亲过跳板上岸如厕时,跌下长江,眼看就被卷进船底,幸好当值的金叔眼明手快,连人带枪跳下去,在滚滚洪流中救她一命,真算奇迹。

此期间随军到过苏州、镇江、无锡、上海、杭州、金华、上 饶等地。

在无锡时,驻军在一间被日机炸坏了的大纱厂内。我在一间小学读书,因语言不通,算术不合格而尝了一次北方特有的"打手心"滋味。记得有一次参加双十节国庆灯火游行,大家扎了各式灯笼——有双十、鱼、虾、蝴蝶、宫灯等样式。我扎的什么记不起了,但那首带着无锡腔唱过的歌曲,我却至今未忘——"十

月十日真高兴,晚上我们来点灯,排着队伍进行,处处都欢迎, 红色绿色各式灯,来来往往亮晶晶,亮晶晶,亮晶晶,大家欢喜 过国庆!"

有一次,我们几姐妹与隔壁黄太太的两个儿子,把书包藏在 竹织的鸡笼里而去看《出水芙蓉》。碰巧对面阿婆丢了母鸡到处寻 找,发现了我们逃学的秘密。当然事后责骂是免不了的。

还有一次,全家几乎葬身砖石之下。房子倒塌之前,幸母亲梦见观音娘娘以拂尘敲其头曰:"大难临头,还不起来!"一惊而醒,把大家赶出屋外,塌下的砖石足有一公尺厚。奇怪的是,厅中所供观音神像前,恰好有块木板斜挡住而无损。

在金华时,适值端阳龙舟竞渡,父亲带我们全家租了一条有布篷的游艇,靠近观看。此地的龙船雕刻都很精致:龙头、龙身、龙尾。不像我们南边,长舢板前装个龙头就算龙船了。比赛时,只听他们合拍地齐声唱道:"哎……吓嗨!呵嗨!爬啦爬啦爬!吓嗨!呵嗨……"胜利忘形者往往连人带锣掉下河里去。

父亲平日爱听京戏,时常便服带着马弁去看 "打渔杀家"、 "玉堂春"、"苏三起解"等,常让勤务兵担心不已。

在南京,父亲带我们坐马车,住旅店,并到中山陵去瞻仰。 坐吉普车经过一城门时,有宪兵询问,然后敬礼送行。中山陵很雄伟,据说地理上是双龙吐珠之处。拾阶而上,是几座牌楼。母亲上到第一座牌楼时,已累得坐下喘息了。父亲则与我们奋力攀登,一边上一边数石级,结果不知谁的准,大概有三百多级吧。

来到陵堂前,见上书"天下为公",为国父遗笔,记得两旁各立一只三脚铜鼎,鼎中都有炮弹贯穿之洞口,大概是纪念品吧。 内堂有国父座像,大人都脱帽唱歌,地下铺着红地毯,有宪兵维持秩序。我绕到左后角,见国父石棺安放在一地室上,盖着国旗,半圆的天花板顶,有很大的国徽。 杭州西子湖也像西子那样秀丽,姑娘们坐着木盆,唱着歌, 在荷花丛中采莲子、菱角,湖中到处是水鸟、野鸭。游岳王庙时, 我们用石头、桔皮掷在铁笼中长跪着的秦桧夫妇身上,表示对残 害忠良的国贼之痛恨。父亲还抱我坐上两旁的石马上。

家父殉国

回到惠州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有一队缴了械的日军汽车连官兵,被看守在体育场内。早晚路过我们那条街,到惠州河去洗濯,我们便用小石头、香蕉皮打他们,一面唱道:"日本矮子萝卜头!"、"萝卜头,点酱油!"但他们的武士道绝对服从精神很好,绝不理会,只是整齐地 "沙沙沙"前进着。后来他们被遣返回了日本。在我念书的学校里,几位高年班的同学把捡到的"菠萝手榴弹"当球玩,结果几人炸得血肉模糊。后来又挖出两箩筐多的"菠萝弹"来。

到了广州市,我家住在豪贤路 50 号(电话我还记得是:公馆一五〇三五)。舅父一家就在不远(现在华侨新村附近)买了一块地,盖起了一座船形的楼房,与我家为邻,父亲常带我们去拜访,他家喜欢养白兔。

后来父亲因职务调升,要监管走私事务,我时常要跟着坐吉普车,到沙河镇火车站看"缉私"。缴回的走私物资很多,父亲全数上交,点物不留。

有一次因家中收音机陈旧,母亲想留下一部新的,我听见父亲说:"唔?!不成,那是公家的,一律上交。"母亲折中地商量说:"调换一部总得吧?"父亲则说:"公家的东西不准动,要新的,买一部就是了。"

他除上班穿军装外,在家则喜欢穿胸口绣有龙形图案的睡衣。

上街时便穿西装,带一便衣卫兵各骑一辆"三枝枪"而去。他饭前爱喝啤酒,希望胖点吧,但总是胖不起来。他喜欢古董名画和盆栽,厅中很多是大理石、酸枝木的台凳。墙上挂着很多长条形的山水画,和根本看不懂的大草诗词,据说,都是一些价值千金的古传真迹。

1. T. P. 28 C. a. T. L. T.

父亲管教我们很严,年三十晚了,外面鞭炮震天,我们还要温习功课。直到母亲再三求情,才准我们下楼去玩。有一晚未得同意,我们跑到"东方戏院"去看"钟无艳",回来挨了一顿藤条。我最怕他兴趣来了,按着我的头替我理发,每次都是"夹毛",扯得我哇哇大叫。他也知其手艺不精,便笑着哄我。这位司令理发师的技术有点不敢恭维。

但父亲是很爱我们的。有一次表哥在楼下,用"弹弓"把我的右眼角打了一大疙瘩(只差一分,险些盲眼),父亲怕我破相,下班回家,一定到床前为我按摩消肿,一边讲笑话、故事、对联等给我听。记得他说过:"童子打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乐。"和"山狗上山,山石砍上山狗脚,汪!水牛下水,水浪涌过水牛头,呼!"每当我叫痛时,他便反复用"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说服我。

半年后,即 1949年,赤旗逼近,风声日紧。父亲要转移到湛江市去。父亲让我们搬到香港,初住元朗。与同乡的阿川大伯一家住在一起。

那里的水田里水蛇特多,有一次竟见到一百多条,有的还会"弓跳"追人。那位曾掉下长江的三妹,一日与我们在桥下玩后回去,喉痛得奄奄一息。留医玛丽医院时,幸得一位印度医生开刀又救了她一命。奇怪的是从她喉中竟然抽出一条三寸多长,脓中带血的"麻骨"(黄麻之内干)。后来听说,那桥下沙滩是日本人枪毙人的地方,一次就杀过一百多人。但始终难明:如何刺入?

为何不痛不知?

后来搬到九龙,住在深水涉。我进入崇真学校读书,那是一 间很好的教会学校。父亲购置了一块地,准备建房。

不幸的是,不久恶耗传来,父亲在湛江市以身殉国。母亲极度悲伤下,带着大姐坐飞机到湛江市参加安葬大会,照了很多相片,场面很隆重。父亲棺上盖有一面旗,即举行国葬也。他一生忠诚清廉,是孙国父的好学生。父亲的牌位现列位"忠烈祠",我及家母和两位弟弟曾去瞻拜过。

重归故里

父亲去世后,母亲已是六神无主了。我的一个叔父阿城和堂 兄阿田,却几次三番到香港劝说我母亲回乡居住。他们提出的理 由是香港花费大,不如回乡省吃俭用,把孩子拉扯大。回去分田 分屋,云云。

当时我们年纪小,不知天高地厚,一听说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居,就想到捉鱼虾、掏鸟窝,还感到很高兴呢,故天天催问母亲何时动身。

母亲也认为:父亲已过世,幼孩无知,隐居山城去生活,总不会有多大的麻烦吧?加上经不住他们来回的纠缠,只好决定举家回乡。

我们是分开回去的。汉光舅舅和我坐巴士到文锦渡,走了一段"单车小路"才到深圳关口,检查后就步行过一座铁桥,来到五星红旗飘着的地方。一过铁桥,就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街灯幽暗,垃圾堆积,过关后的人群,呼娘唤儿形同逃难,小偷很多。有一位年青姑娘,刚放下皮箱转身去望娘,一个年青人马上提了她的皮箱,消失在茫茫人群和夜色中。那姑娘丢了东西又找

不到娘, 哭得泪人儿一样。

住的旅店是用木板和草临时搭起来的,睡的"辘架床"低矮、潮湿,散发着浓浓的烟草味。半夜里来了几个帽上有红星的检查员,看到我们皮箱里尽是女人的衣服和父亲留下的一架军用望远镜,便反复追问舅舅:我父亲叫什么名?做过什么官?舅舅随便说了一个名字,说只当过文职。我不会撒谎,当问我时,我只好说"记不清楚了"。事后舅舅责怪我这话说错了:"应该点头称'是',哪有不知道自己爸爸做过什么和叫什么名字的呢?"

看来他们对我们的怀疑很大,又过来几个有红星的人。正在僵持之下,隔壁忽然传来呼唤声,"发现了军用物资——飞机上的防弹玻璃,请你们过来!"待他们离开的时候,舅舅机灵地拖着我立即离开那家旅店,走了很远的路后,才住进另一间旅店。幸好那晚未再遇到麻烦。

坐了几个钟头的火车,经石龙到了广州市。给我第一个印象 是:街灯暗、巴士烂、人多痰多。在战争中炸毁的海珠大桥,仍 沉卧水中,有两个乞儿揪着垂下的电线,当秋千荡着玩耍。

我们住在惠福东路,大佛寺附近的惠新西街。原来的厨师周华兴和勤什工阿光,都很有心地来探望我们。他们处境都相当困难,阿光给人打杂工,周兴年过五十,与人拉"猪笼车"为生,朝不保夕。我只能用"形容枯槁"来描绘他们。听他们说才知道,与我们在无锡的黄太,得了肺病,每天靠收卖烂铜烂铁杂物过日子。

那时,入夜后飞机常常飞临上空,有一次我看到五架涂有型号的轰炸机飞得很低,擦着楼顶飞过。有人在地下用枪射击时,可见到红、蓝、白等线条升空。那时内陆还没有空军,只好望空兴叹而已。

母亲每当听到警报后,便拉我们蹲在室内,头上盖着两床棉

被,据说可防碎玻璃、砖石等。其实轰炸不会波及平民的,这点母亲是有点过虑了。但作为运输军用物资的黄沙火车站,却是袭击的目标,被炸得轨翻墙倒。

我们后来又坐了三天汽车才回到故乡——久别的宁化山城。

第二篇 风雨十年

土改遭遇

回乡不久,锣鼓声中"翻身做主人"、"分田分地"、"推翻三座大山"的土地改革来了。"土改"其实是借用"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而已。

我家长期在外,只有祖上遗下几分薄地,但也被扣上"官僚地主"的帽子。天天有人把母亲押去斗争,逼她交出钱财来。

起先,土改队颁布的政策是——"只挖底财,不拿浮财"(底财指金银珠宝,浮财指生活用品)。但宣布政策的余声尚在耳边,又开来了第二批拿浮财的队伍。我家居住的房屋里的床、凳、衣服、鞋子、蚊帐、衣柜、书桌、留声机、藤席、棉被、枕头……凡是用得上的,一律扫光。其实也没个标准,一进屋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好像东西都是他们的,只是来搬家而已。连我唯一的一件御寒小"飞机恤"(夹克)放学回来后,也被当作"胜利果实",从身上剥去了。

在那艰难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一直生活在歧视与赤贫中。几个小弟弟到河、塘、溪中摸些鱼虾蟹,捡些野薯、菜叶回来充饥,母亲抽空与人做些针线活,换得一条旧马裤给我穿,这条充满母爱的裤子,我一直穿了六年,从山城穿到大埠。

叔父阿城,被扣上"包庇地主家庭"(其实我们"解放前"早已分了家)的罪名,从县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的前身)押回乡下斗争,迫他跪尖石,跪竹簕(一种异常坚硬的竹剌),拳脚交加,打得他鼻青脸肿。白天黑夜轮番殴斗,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他才新婚三个月,因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与酷刑,便含恨上吊身亡。

他毕业于中山大学,学生时代,是闹学潮的积极分子,入了 党,今天却悲绝在曾经向往过的理想之中。他是后祖母的独生子, 有个妹妹是抱养的。从此,他那房的香火算是熄灭了。

他死后,留有一封遗书,但给土改队长没收了,不知内容何言。为了推卸责任,他们硬说叔父是"特务分子",唯一的"证据"是搜出了一些过去学生时代的证章,上面有国民党的旗、徽等等。其实,解放前的证书上,一般都有此旗徽的。

他们分化瓦解的工作也做得很细致。除了划分"穷"与"富"的对立外,在家庭成员内,也实行"拉拢"与"打击"的两种类型,打击的对象当然是我母亲,因为子女属于"可争取"对象。我们几姐妹之中,大的四个属"中立"对象,三个小弟妹却是重点"教育争取"的对象,让他们参加"小儿童团":种菜、拔草、开会、唱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叫他们监视我们,揭发收藏钱财的秘密等。小弟妹很懂事,常把一些消息告诉我们,让我们避过麻烦。

母亲很惨,虽然脚上的风湿关节炎时时发作,痛得流泪哭喊,但常常要应派公差——修水塘、挖水沟。挖了东沟挖西沟,整天泡在冷泥里。还要给村上抬木、抬竹、挖臭水渠、扫地、开会等,晚上还要拉去斗争。同时又要种田种菜,养活我们七姐妹,供我们上学读书。可怜她被环境折磨得皮包骨头,胖型身躯"缩水"成了又瘦又小的骨架子。

在那恐怖的年月里,戴上地主、恶霸、资本家、高利贷、反革命、坏分子、旧官吏等帽子的人,犹如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生活难过极了。村人多藐以白眼还以冷语,更如躲麻疯病人似地远避,生怕沾上"同情阶级敌人"的嫌疑。一旦碰上麻烦,少则挨斗、丢官,重则管制、坐牢。

不过勇敢的好心人,世上总不会绝迹。有一次我和母亲到屋

后菜园浇水,一位乡亲走过来对我母亲说: "不要难过,好好带大孩子。这班家伙不得人心,长不了的。" 然后做了个手掌下切的动作: "老天会惩罚他们的!"

사이 지수 생생님, 사이에 보고 지수를 내려왔다. 사이에 가지 지수 있는 200 없다.

还有一次,我从县上的小学回家,听到吵闹声,原来土改工作队叫我家的一个俾女,起来清算斗争我母亲。有几位乡亲含蓄地替我母亲解围说:"俗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随了狐狸满山走嘛,她老公已死,关她什么事呢?"

这个叫金玉的俾女,是母亲在无锡时收养的流浪女——她父亲曾是国军残退的小排长——如今倒成了斗争大会"控诉"、"揭发"、打骂的积极分子,通宵达旦地叫喊,结果染上肺病。由"破金"(嗓子)到死去,大概才十八岁。

村中有几家人对我们特别好:有的暗中叫我去吃一顿香甜的"大麦饭",还可拌上一些黄糖;有的叫我和弟弟去吃几块年糕;有的叫小孩偷偷送来一筐熟番薯;有的路过时悄悄在门口留一把青菜;还有的教母亲种菜种禾。更有勇者,帮助母亲和三妹出逃到福州。

镇反枪声

内陆解放初期,他们采用欲擒故纵的伎俩——有一个时期香港与内地来去还比较自由。由香港回来固然很容易;由内地申请去香港,拿张路条,手续也不太严。并放出"既往不究"、"爱国一家"、"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分田分地"等等空气,致使不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仁人君子,从海外归来。

但好景只是昙花一现。时机成熟后,政策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掀起了空前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宣称"爱国一家"的对象,统统成了罪孽深重的反革命。

很多稍有积蓄者,钱财没收后,再冠以"地主"、"恶霸"、 "反革命"等罪名,监管起来。起初不太理会你,似乎不过划分 一下阶级成份而已。一旦某夜有人拍门叫你去县里学习班开会或 学习,那就意味着锒铛入狱了。

当然,押送者会交代政策说: "开完会,就会回来的"。但尽管望穿秋水,日复日,月复月,这个会老是开不完,亲人终如黄鹤一去不复返,甚至从此泥牛入海般地失了踪。当时,谁又知道生离之时竟是死别之日呢?

在我念书的小乡墟,是个逢农历三、六、九日为墟日的小镇。那时正值制造舆论"镇压反革命"之际,小乡墟买卖场所辟出了一块地,挂满了宣传漫画和图片——如:一个代表"人民"的大铁拳,狠狠地打在一群身上写着"反革命"字样的小人头上,他们手上拿着刀、枪、毒药、地雷之类。又如:工农兵三个人,拿着大扫帚,把"反革命"翻滚着扫出了地球。再有就是连环漫画,画些"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头子、地主、恶霸,如何强好、杀人、放火、剥削之类,尽量制造阶级仇恨。还动员一些学生、干部作宣传员,拿着铁皮卷成漏斗状的"话筒",千篇一律地、激昂地在叫喊着。

有一座平时卖猪、鸡的通风平房(只用柱子支撑,四周无墙), 挂满了镇反取得的"伟大成果"的照片。有的作枪毙状,有的是 杀死后的血照。有个别枪杀的,有集体枪杀的,还有很多"公判 公审大会"的场面。

由于权力下放到了"土改队",一个土改队长其实就是一个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土皇帝,他们可以随意草菅人命,就连一个普通民兵,也可以随便把一个得罪过他的地主,拉到后山岗去枪杀掉。

那时杀人很多,成批成批地枪毙,叫人胆战心惊。我念中学

的小乡墟,就是个经常枪毙人的地方。上学或回家的时候,沿着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经常可以看到一批批由县监狱押来原藉枪毙的烈士们,虽然手、头、脸部被绑得紫黑(大兵怕他们在临刑前高呼口号,脖子上都紧紧地绑着一条麻绳,仅可喘气而已),但脚步依然铿锵,神情视死如归。行刑的时候,学校还停课强迫学生去观看"受教育"。每次回来,一想到那血腥的场面,我恶心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们行刑,起先是用枪射击受刑人的后脑,使用开花子弹(达姆弹)。往后运动中,要行刑的人多了,一个个枪毙已来不及,便排成队用轻重机枪扫射。

小县城坝尾桥河边的上坝体育场,一次就杀了一百多人,我看见一位死者,身上打穿了七八个血洞,穿戴像学生,年纪最多才十五岁,插的标签上写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有一次,我们在分校上课,从窗户可以看到远处山岗上在开公审大会,约有五人跪在地上。不一会,见五人先后倒了下去,过一会才传来枪声。

另一次,学校叫大家排队步行五里多路,到一个村边的草场 那里,去看已经被枪毙的七、八个死者,然后又回来上课。

我回家一定要经过公路边墟场那儿的一块山岗墓地,总看到 有几具未领的尸体,摆在那里示众。

有个周末,我步行沿公路回家,经过下莹李屋,从路边的山岗墓地忽然传来阵阵令人心酸的呜咽声。抬头见不远处,有一少妇携着两个小孩对着一口棺材在哭泣。那口棺材,其实是用几条木片随便打成的长方形的笼子,从外面清楚地看见死者,穿着黑胶绸衣衫,白丝袜,胸口和脸部满是凝血。

从那少妇匀称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清秀的面容和那一 头披肩的烫发可以看出来她是富家闺秀。我曾走近去,想说一些 安慰的话,但伫立片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默默地低头走开。

我的一个亲舅舅杰华,陷进所设圈套,由香港回广州探母,被捉住冠以历史反革命罪名,拉去枪毙。他死得很坚强,临刑前一晚,对着铁窗高声呼喊:"自由万岁!自由万岁!公理必胜!让自由火炬燃遍!"他死后,舅娘带着几个幼小的儿女再次逃到了香港。

那个在广州救我母子于日机底下的堂叔阿伦,被残酷斗争后 捉去劳改,死于狱中。叔娘受不了日夜折磨、殴打与侮辱,跳进 屋前水塘自尽了。堂叔子荆批斗后被枪毙,叔娘秀芳被饿死。

有一晚,大家都已吃过了晚饭,除了长短玻璃罩的煤油灯在 闪着豆大的亮光之外,周围一片农村固有的漆黑,这是农夫操劳 一天正应好好休息的时候。我摸黑穿过几条小巷,来到祠堂旁边 的天井,忽然看见一群人打着火把,在吵吵嚷嚷,便好奇地走近 看个究竟。

一座牛棚被打开了,里面黑暗、潮湿、齐膝深的稻草、谷壳掺杂的牛粪上,满是苍蝇、咀虫。只听得嗡嗡营营声中,还有强抑着的,但显然很痛苦的呻吟声。原来墙角有一对年过六十的老夫妇,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一起,站在牛粪里,中间打横连着一根扁担绑在一起。衣服已撕得不成样子,脸部青红蓝紫地布满瘀痕,鼻口依然流着血,大概是斗争大会上被打成这样的。听说是望江楼屋的一对老人,与我们本屋还是宗亲呢。

几个积极分子,吼声如雷地叫喊:"地主鬼!地主婆!快出来!","死地主,装死呀?还不快点走出来!"那二老不敢违抗,极力挣扎着想快点走出来,少受一点皮肉之苦。然而,伤痛、年老、加上横插扁担的五花大绑,使他们行动很困难,跌倒好几次才来到门口。如果不是脚下的牛粪构成一道"防线",也许那些"积极分子"早已涌到屋里连推带踢地把他们赶出来了。果然,刚出

门外,二老的花白头发,就被人当作牵牛绳子,拖扯着拉走了。

那些上来吐苦水的贫、雇、佃农代表,讲什么和不讲什么, 事先都受了土改队的指示。

被拉去斗争的罪人,一般是站或跪在临时用竹木搭成的会场主席台前,也有拉上台去打的。到处贴满标语,插满红旗。就像打西洋拳那样,台下站满了群众。不过不是一对一的竞技,而是十对一地殴打。他们一边拳打脚踢、恶语咒骂,一边控诉着"旧社会"、"死地主"的罪恶。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年青少妇,痛哭着在批斗大会上说:她可怜的八十二岁的老祖母,在解放前不慎跌跤死去。足以证明是"给旧社会害死的",结论是"新社会好"。另一次,又听见一位老兄在斗争会上控诉说:他的一位亲戚中年病死,婶娘又小产,足以说明"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总之,内陆变色前,全中国有人死过,通通都是"罪恶的旧社会"造成的。

那些地主恶霸们,五花大绑地跪在碎玻璃、仙人掌或小尖石上(只是两个特意挑选的锋利的三角形尖石,每个膝盖底下顶一个)承受痛苦的折磨。还有倒吊、灌屎尿、乱棍打、踢胸、掴脸、揪头发、扯耳朵等。听其哀嚎之声,撕人心肺。

有一回,邻村陈屋的门口塘前,召开斗地主大会。我看见几个民兵,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她父母的面,把一位约十八岁的姑娘——"地主妹"捉住,将事先准备好的两只大老鼠,塞进她的裤筒内,然后用小绳扎紧裤脚,任由老鼠们在裤内钻爬撕咬。看着这弱女子哭嚎呼救,惊跳挣扎,他们却拍手大笑。

我原以为这样的事,只发生在我乡下,但若干年后,我失去了自由,充军到了沙洋集中营时,有一回面谈中,一位合浦人氏黄君听后对我说: "真有此事的,我们乡下斗地主时,我亲眼看见一班人,把抓来的一条草花蛇,塞进"地主妹"的裤筒里去。

未放之前,可怜此女子见毒蛇已惊恐得半死,待冰凉的软体在裤内盘爬钻动时,她便猛嚎昏死过去了。"

血腥的镇压使万马齐喑, 但也有人们武装抵抗的例子。

战争期间,保卫小山城一带的,是一支叫"胡 X"的部队,据说是某位胡姓长官的部下。任团长(兼县长)的谢某,是本地罗镇人氏。他率领士官们与共军周旋,六出六进县城,形成一红一白的激烈拉锯战,打得非常顽强,令共军束手无策。最后因势孤力单,战斗到一兵一卒,便只身深入山区打游击。他来去无踪,神出鬼没,共军甚为头痛,虽然费尽心机搜捕亦无济于事。

他自己也很艰苦,长发被肩,一脸胡须,衣衫褴褛,但血战 到底的决心始终不变。多少次被人发现,他都机智脱身,化险为 夷。

有一次,由于连日阴雨,他到一间破屋避雨时被包围。他的 枪法很精,本可杀出重围,不幸的是子弹全部湿透,不能使用。 但他坚决拒绝投降,搏斗中用驳壳枪击伤数人,宁死不屈,最后 杀身成仁。

后来,他们把谢某的遗体,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样,钉在一块床板上,用绳子吊在支架上(7字形的支架,使我想起纳粹的绞刑架),竖在县城大坝里的体育场中。暴尸约十天后,好像是由潮汕人募捐经营的一间专做慈善事业的"潮存善社"出面收殓。

事有凑巧,若干年后,谢某的一位侄孙与我在集中营相识, 他当过师长的父亲给杀害了,自己因涉嫌组织反共集团,判刑十 五年入狱劳改。刑满释放后,娶了一位本乡女子为妻,又被干部 强迫离婚,双双赶回乡下,男的被管制起来。当时由于我和他同 队、同乡,又是官僚子弟、反革命儿子,都有"反改造"纪录等, 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尽折磨,被冤枉成"暴动集团"的司令头子, 吃了不少皮肉之苦,几乎被杀掉。

和镇反同时进行的是所谓抗美援朝。记得那时候学校里除了 经常作反美亲苏的宣传外,还教唱抗美援朝歌曲:如"雄纠纠,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之类。同时, 在学生中动员大家参加志愿军,投考军校,到朝鲜去打仗。

毛泽东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下来,学校便逼迫着大家出钱。我那时已是朝愁夕粮,哪里有余钱去捐献呢?所以轮到我表态时,我干脆说: "没有!"这可惊动了班主任和校座,他们到班上轮番追问: "为什么不热心支援志愿军保家卫国?是什么政治态度!?"等等。最后,我无可奈何地交出作为一周菜金的三角钱(还要向母亲想办法去借来)。郑校座咕哝着说: "哼!这里面有问题!"这才愤愤离去。

亡命他乡

大姐受不了繁重的"义务劳动"和歧视,到大埠投靠姨母。 考入银行学校,毕业后在工厂当出纳,时常寄点钱接济我们。

母亲和大妹也实在熬不下去了,在亲朋的帮助下,几经风险,终于逃离本乡,到了大埠。本来母亲出走的决心并不大,怕捉回来后受更多的苦,更放心不下我们。

据说已去世的外祖母有晚托梦叫她"赶快走,否则期限一到,就永远出不去了……",她才下决心逃亡。事也凑巧,她们到了大埠后,碰上"重新调查登记户口"的机会,领到了居民证(离"期限"只三天)。由于父母平生为人宽厚,乡中也无人追查。

1954年,我毕业后,也迁到了大埠。一家八口,只靠我大姐一人月薪四十多元人民币过活。生活非常艰苦,经常无钱买米买菜,一点面酱加葱姜,就是一餐的菜了。当然比起笑话中"望盐、

生津、下饭"里的小孩要稍好一点。

那时候粮食是严格配给的,小弟妹每月十二、三市斤,大姐是职工,月粮十九斤,我算学生,有二十四市斤。本来不够吃的,由于无钱买米,粮本上反而常有余额。布票连年积存,多到成叠,几年来没有人做过一件新衣服,所以布票对我们来说,是多余的东西。送与旁人,也没人要,大概对很大部分挣扎在赤贫生活中的人群来说,同样是多余的东西。

有一次对面的一位罗先生,给我一对旧皮鞋,(我已多年未穿过鞋子了)我高兴地试穿,脚都弄痛了,却始终穿不进去。我望着鞋子,苦笑地自嘲:要是脚小些,不就有双皮鞋穿了么?最后怀着"穿之不适,弃之可惜"的心情,送回给好心的罗氏夫妇。

大埠和内地各处一样,实行严格的管制。每条路都有公安局或派出所,每条街则设有街坊办事处,街坊主任多数由中年以上,思想左倾,爱搬弄是非的妇人、老头担任。人们给她们的雅号叫"街八"(街坊八婆之意)实际上是最基层的小土皇帝,很多事情,他们不点头就通不过;一摇头,则意味着麻烦来了。

因为父亲的关系,她们对我家监督得特别严。比如:家里实在困难,母亲凑合点旧物变卖,一张"与'收买佬'经常有来往,形迹可疑"的报告,就打到大姐工厂的人事保卫科去了。又如:两位小弟弟和一群小孩嘻戏,别的小孩不慎弄倒了一个灭火筒,街坊积极分子便带来一个上年纪的主任上门责骂,硬说是我弟弟故意破坏。幸亏他们年纪小,要是换上我,恐怕要给我加上政治上的罪名。

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让小弟妹们能继续升学,表哥介绍我到欧阳先生办的新生画报社送画报。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梭于大埠的大街小巷、郊区、乡里等地,赚取每天八角钱人民币的生活费用。

好在我七岁已会骑单车,从小在大埠长大,街道很熟,故也 不大困难,但因生意不佳,我很快便失业了。

1 2 14 2 4 1

CA VISTA 1

* ** ** ** ** **

表哥二兄弟流落大埠,生活更苦(他们的父亲被枪毙了,母亲病死在乡下)。一个卖菜,一个卖面包。大街小巷地叫卖,声音由高变低,由嘶哑直至无声。对我谈起时,泣然泪下。

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到海运某局大埠船厂做临时工。这是由 包工头组织的,收支账目任由他们开列,贪污很利害。算来每人 每天约有三、四元钱,领钱的时候才七、八角钱。群情激愤,几 成骚乱。由于担心失业,很多人只敢怒而不敢言。

出入船厂厂门,要由两个哨兵全身彻底搜查,严如对待囚犯。 我们是拷锈组,专门用一把小锤和钢刮,清理船内外的旧油漆, 有的一刮一大片,有的全身压下去还刮不掉,非常辛苦。每人都 戴着厚厚的口罩和防护眼镜,但鼻涕、口水、全是黑色的,眼也 常被锈沙射伤。有时还要拿着灯,钻进底舱去清理废油和积水。 如找不到出口,我相信很快会闷死在里面。爬出来时,大家全身 污黑,诚如非洲黑人一般,只有眼底是白色的。

每天回家,七弟就笑着说我身上有股铁锈味。母亲也担心我铁锈入肺,尽量买些"猪红"(猪血)给我吃,据说可清肺。

又一次失业后,与几位同乡、朋友,相约到广东韶关附近的 翁源县牛屎坜钨矿场去采矿。坐火车到大坑口,再步行经铁场墟、 新江墟,再行百多里的崎岖深山小路才到达目的地。几间砖瓦房 子,是国营办公室,其余全是用茅草、杉树皮乱七八糟搭成的房 子,非常荒凉。

这里分合作社(国营)、互助组(集体制)、单干(私人)三种形式。合作社和互助组采取分红制,但一些满腹牢骚的老矿工告诉我:几年了,从未分过一角钱,老是说亏本;不过面条粥却是有吃的,来了亲戚朋友也可一起上饭堂吃。二位大埠朋友说了

声: "简直是乞丐住的,"就走了。

开采工具是十字镐和铁钎、炸药。奇怪的是有矿的山头必无大树,草也少,光秃秃的。找到一条矿苗,便用十字镐挖成小门般大小的洞口,沿矿脉慢慢挖进去。然后用粪筐爬着把泥石拖出来倒掉。收集到带黑色的小石,下工后锤碎再置于水槽冲洗,得到一点黑中带蓝的碎粒,便是可以换钱的钨矿了。这东西很重,排球般大小两袋,就已百多斤了。

收购时,管理员还要用磁铁吸出锰来(其实应是铁),时价是 一元八角一斤。集五人之收获,每天只能换到几块钱,生活很困 苦,时时无米作炊。

开矿是非常危险的工作,经常会被活埋,不知天上何时塌下来。一些挖穿的老矿井里,时常见到当年被闷死者的枯骨。有一位老矿工告诉我们: "有一次连日阴雨,一个互助组四十多人,戴着竹笠冒雨入洞开矿。进去后不久就遇到洞口塌方,再也没出来,要不是洞前叠着四十多顶竹笠,后来者还不知道有四十多条生命被活埋在洞里。"

"为什么没有人去救他们?"我问。

"没有用,发生事故时没人知道,十多天后见竹笠未动,才知道有事,也没人去理它。政府不管,私人更不管,唉!我们也是听天由命呀,小兄弟!"他答。

最后的结局是:实在捱不下去,大家只好各奔前程。母亲变卖了旧电风扇,才寄了点盘缠给我。报纸上刊出汽车票减价的大好消息,计算后,在我紧缩的预算中便有了五角钱的餐费,我准备到大坑口上火车,吃一碗面条再回家的。谁知深夜到了火车站一看,火车票却贵了一元二角。把饭钱加上去还欠七角不够买票。求助于站上同志,不予理睬,而火车很快就会到达,急得我团团转。

后来,急中生智,求助于说闽南腔的一位旅客,言明原衷,他乐意代垫,上车后又请我吃了碗肉丝面。我准备到家后,马上把钱还他,但他只要我写封表扬信到他公司——翁源县百货公司。我是乐意这样做的,也值得表扬一下,尽管自己感到有点奇怪,但毕竟他是我的恩人哪!

回到家,又是一次长时间的失业。对面的一位大姐同情我的处境,告诉我:何不去劳动局登记失业?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作了个知识青年失业登记。

三个月后的一天,终于盼来了通知,叫我到某某号某办事处 报到安排就业。

楼上已聚集了几十个饱受失业之苦的学生,大家似乎为有了一个吃饭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奇怪的是男生有四十个,女生也是四十位。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当局早已给大家作了在边疆成家立业,开花结果的安排了。这何异于卖身?会上,指导员介绍,我们的工作性质是一支到海南岛去开发的基建大队,配有多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三天之后即离家赴任,每人发了三十六元七角五分的预支月薪。

母亲和大姐不肯让我留下钱,反而给了我十多元,并特地买了碗久违了的净云吞给我吃,看到小弟妹羡慕的眼光,我便让大家分享了这难得的美餐。穷困中有了工作,本是大喜事。但求的签中曰"君执金丸打水禽,沧江未识几何深,纵然打得水禽倒,落水金丸何处寻?"初未解,现已明:从此踏上一条"得不偿失"的艰辛旅途了。

晚上我们在海堤下船,乘坐叫"竹叶仔"的拖轮到了江镇,再转车经侨乡四邑到达湛江。父亲就是在这里牺牲的,但我不知是何地点,在那种处境下,也无从找到,实一憾事。

湛江天气很好,最好的是夏天没有蚊子,旅店不设蚊帐。本

地风水先生说它属蝙蝠,专食蚊子,所以蚊子绝了迹。第二天来到海边那鲤鱼形的尾巴上——内陆行程最后一个镇——海镇,远远地就可望见浮在大海上的一串串珍珠般的海岛。海镇约十万人,最高的建筑物是"五层楼"(现叫人民大厦)。虽靠近海边却异常闷热,吃饭时摇着大蒲扇还是汗流夹背。

乘船到达海南岛,上岸之后,沿东线经陵镇、黄镇等地,最后来到某渔港附近的红沙市。我们所属的红沙市基建队就驻在由田镇铁矿至安港口中点的小火车站里。这个矿山据说当年是由宋子文先生经营的,铁质纯到 98%。很多外轮在港口等着装铁矿沙。港口上设有西人水手俱乐部,门口有武装警卫守着,华人一律不准问津。奇怪的是,这里的水上人家都讲地道的大埠闽南话。

工程队设有正副队长、指导员、工程师、多名技术员及一般 工作人员。二百多名工人分两个中队,有中队长、小队长。干部 则分技术组、政工组、民工组、行政组等。

这些工人本是周围城镇的小市民,运动中,私人的土地被政府没收,又被集体赶到这异乡的荒野来挑泥巴,他们不满的情绪,随着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作而日益高涨,终于触发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暴乱。

两个中队互相传递行动计划,交换对策,串联一气,集体罢工,围攻工程队部,要揪斗队领导和两名带他们来此地的干部。

- "你们说一套,做一套,没收了我们的财产,又骗我们来这 里受罪,太可恶了!"
- "如今,我们工不成工,农不成农,离乡背井,无家可归,都是你们这班坏家伙造成的!"
 - "还我田地来!我们要回老家去!"
- "打!打死他们!上!弟兄们!"气势很汹。他们专门对付队领导和本地干部,对我们这些由大埠来的学生哥似无恶意,只是

把我们推向一旁说: "不关你们的事,走开吧!"

县里派了一个公安股长来,晚上在工棚里召开全体大会。他 之乎者也地说了一通后,被工人代表质问得哑口无言。他看软的 不成,便想来硬的,宣称"凡闹事者将绳之以法"。这一下像捅了 马蜂窝,人们一下子全站起来,指着他鼻子要揍他,秩序顿时大 乱。这个股长在一片喊打声中抱头窜出了大门。

最后,谈判的结果是:一,提高基本工资和津贴;二,转变为正式工场职工;三,改善伙食等。

这场持续月余的暴乱逐渐平息下去。一位能言善辩, 地主出身的青年人被诬为事件的主谋。但事后指导员说: 没有处理他, 只是让他回家去了。我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 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欲擒故纵或已抓进监狱去了才是真。

据说当年苏东坡把王安石的诗句——"黄狗卧花心"改为"黄狗卧花影",被王贬至海南岛的崖县,让他去见识一种叫"黄狗"的黄蜂。他来到海角觉得到了天边,挥笔在一块大石上写了"天涯海角"四个大字。后人凿刻后填上红漆,保留至今成了古迹。

1957年初,我们为购药材,沿小岛航行一百多里,上岸从三亚至乐东时,就经过这闻名中外的地方。它寄在公路旁的一堆海石上,字体豪放有力。苏东坡以为到了天尽处的地方,我们还要背着行李,再走两天才能到达目的地。有位体弱的女同志走到吐血,便请了部牛车慢慢地拖着走。

沿途见到的村民,都衣衫褴褛。由于风沙大,卫生条件差, 害眼病的人很多。我看到许多身材苗条,相貌娇好的小姑娘和活 泼的小男孩,不断用脏手去擦那流着脓水的泪眼,眼睛红肿溃烂。 很多小小年纪已成了瞎子,实在可怜。

他们的风俗,男的不习劳动,在家烧饭,看小孩。平时蹲成 一圈,在路边、村旁、树下,轮流抽着竹筒烟。女的种田种菜, 做零工,赚钱养活家小,最重要的是带点烟酒回来。男女都嗜烟酒如命,他们是真正的"食烟"而非抽烟——把烟丝放在口里咀嚼吃掉,据说可杀蛀牙虫和蛔虫。

生产很落后,粮食以蕃薯为主。运输靠一种像战国时代的战 车似的牛车。虽一年稻谷熟"三造",却得不到温饱。

据说经人口统计,女的比男的多七倍。有一次我搭乘单车去佛罗镇公办,骑车的本地人告诉我:"白沙村内,十八岁至二十二岁(十七以下,二十三岁以上者不算)未嫁少女竟有二百五十多个。她们作风都很开放、大胆,常常围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叫找爱)她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家里有何人,问你要不要跟她结婚等,不胜其烦。吓得我只好谎称:已结了婚,并有两岁的小孩了,才免得干扰。

由于要寄一半的钱回家,支持小弟妹上学,三年多来,我没能力购买一双鞋子来穿,赤着脚在灼热的沙地走,常常被烫得"跳起舞"来。小岛那沙地是很热的,把鸡蛋浅埋在沙里,几分钟就熟了。所以很多海鸟、海龟都会利用沙滩,作天然孵蛋温床。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我们都还要去野外工作。九级的台风,经常把人吹得飞了起来。粮断、屋漏时,生活更艰苦。有几位同事宣称:"我不愿意在这沙漠中浪费我们的青春!"就退职回家了。

县局后来在大埠招了一批"基建学校"的学生来此,大部分是华侨子弟。他们来后,根本没有课堂、校舍,临时才叫学生用稻草、椰菜搭成简陋的草房作学校。也没有真正的教师,只是从工程队里临时抽些技术员去上课。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挖地、织扫把、织粪筐等。伙食差,环境差,领导态度更差。不是把他们当作"未来的主人翁"看待,而是当作童工来使用。学生非常不满,有的偷偷逃跑,但由于过海搭车、坐船都要拿"证明",开

路条才能买得到船票,所以很多给截住抓了回来。那结局就苦了: 五花大绑,形同逃犯,晚上开大会斗争、殴打,白天则罚做苦工。

但也有几个聪明的学生,利用退票的机会,顺利地逃回家, 到教育局控告"工业厅"欺骗他们到天涯海角去做苦工。官官相 护,能告出什么结果来呢?

后来,在"双反运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学生们利用贴"大字报"的机会进行反击,在饭堂里贴了很多大字报和漫画。其中有一张是送给校长马峰久的:上面画着一匹"马"、一只露蝥的毒"蜂"、一条癞皮"狗"。另一张干脆画一只马头狗身的动物,上书"马疯狗"三个大字。

当然,运动中,校方会稍作检讨,运动一过,又是他们的天下,受报复打击的又还是学生。

反右血雨

1957年夏天,有一次队部通知:全体干部、职工等,到附近的小山市(镇)去参加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大会"。我虽然知道,这种人打人场面无非是"杀鸡儆猴"的老把戏,但命令之下,也只好去受"教育",因为那时候"反右运动"已掀起,人人自危。

来到镇旁沙地上临时搭起的竹棚内,就看见十多个彪形大汉,连拖带踢地推出一位高大黑粗的中年渔妇来。一个瘦瘦的小男人,大概是镇上的党支部书记之类,站在中间,提高嗓门宣布她的十大罪状。下面一些预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们在配合着喊口号、挥拳、起哄。那位支书也真能讲,滔滔如长江水,一泻难收,但除了报纸上见得到的政治词句外,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

腿站得发麻,听了半天,才弄出一些名堂来:原来,因政府没收了她家赖以为生的财产和船只,又枪毙了她的丈夫,在什么

时候,什么地点,给什么人听到她说过什么不满现状的言论,证明她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现实不满"、妄图"反攻倒算"等大逆不道的罪行。

只见支书一声令下,十多名大汉便扑向那可怜的寡妇,拳脚交加,大打出手。你一拳,他一脚,这个扯头发,那个掴巴掌。好像面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排球、足球似的,"蓬!蓬!"作响处,似乎触着的不是人的肉体。斗争会开了半天,就不断地殴打推搡了她半天。

但那渔妇也真坚强,五六个魁梧男子汉都无法让她低下头来。 她被打倒在地,一定会挣扎着爬起来站稳,把嘴角的血一抹,把 散乱的头发一甩,昂然高视。不过,我看见她那满脸血渍,鼻青 脸肿的形象时,只好掉头他望。

大会后回来,我的心情是沉重的。那时正值掀起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高潮,说话做事得特别小心,否则,文字狱、言论罪、思想罪,就会从天而降。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被整得不亦乐乎的大右派——文化部长周杨说过的一句话,颇能说明一些当时的实情——"……整天像小媳妇一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说话被录音机录下来。国人现在是:三个人在一起,没有一句真话。两个人在一起,半真半假。只有自己跟自己说话时,才是真心话。"

当时第一基建队内,有一位制图技术相当高超的技术员,叫苏明。看了斗争大会后,只说了一句:"我看后心里很难受,人与人之间,怎能如此呢?"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到了支部书记那里,加上他出身地主家庭,当晚便成了基建队阶级斗争的对象。

苏某的罪名是——"同情阶级敌人"、"散播反动人性论"、 "攻击反右运动"、"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伟 大领袖"等十多条罪状。三天三夜的殴斗污辱、人格摧残后,被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撤职押回原藉(像是江浙人氏)农村劳动管制起来,加入黑五类行列。

과 마음을 하는 사람들이 하는 것들은 사람들이 하는 것이 되지 않는 바람들이 하는 것.

场部设计室有一位方工程师,是个博学多才的技术人材,只 因过去的历史,加上说错了一些话,就被一群激进分子在讲台上 残酷地殴打、污辱、拳来脚往,从台上踢落台下。结果把一双曾 经为民谋过利益的慧眼踢瞎,成了终身废人。

有一位技术员(后任工程师,叫吴天),无缘无故地被扣上"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其友被诬为"首犯",莫明其妙地被拉去枪毙了。他自己幸好只是"主犯"(二号人物),被撤职押回原藉农村加入黑五类队伍,受了十多年的苦。

场里一些王老五,则看上他年青的妻子,千方百计迫她离婚,企图染指,不惜假公图私,采用批斗、污辱、戴粪筐、戴高帽、挂"反革命家属"牌子游街,下放做苦工等手段来逼其就范。有位干部对她说:"只要你与他划清敌我界线,脱离夫妻关系,我可以把你变成'干部家属'"。言外之意是明显的——只有嫁给他,才可改变厄运。当然,他们都未达到目的。不过这对坚贞夫妻却吃了不少苦头。

场里还有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名叫华生,很有才华,但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一直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与他同期毕业,出身一般的人,早已是六级主任工程师了,他仍然是个三级技术员。

他们夫妻原在大埠工作,"三反"、"五反"时,被冤为"大老虎"(大贪污犯)遭到连续七天七夜的逼供和围斗,一旦眼皮下垂,便有重拳落下,不断有人推你、摇你、打你,逼你说出贪污数目等等。苦不堪言,几次欲自尽未成。

吃尽了"疲劳战术"的苦楚,幸未"屈打成招",于是夫妻被下放到边远的小外岛来工作。

他从"基建大队"调到细毛山林场后,遭到另一场劫难:在一次运动中,他又成了挨打的对象。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他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了,但一些积极分子硬说他"不老实交代"、"坚持反动立场"、"要狠狠地整他"等,叫人抬来了一段百多斤重,粗及合抱,中间挖了个洞的大树干来,像古时候"戴枷锁"一样,把他的头对着洞口,硬压下去。由于洞口小,又粗糙不堪,头进不去,于是台上的积极分子们分成了两边,手抱树端脚离地,把他的头硬压下去……一时间血流如注,呼痛之声,惨不忍闻。待他昏死过去,弄出树洞时,已是一具脱皮露骨、面目全非的血人儿了。

同年夏天,我还见识了另外一场更残酷的打斗。一次,我到小北岛的新城去办理一批水泥回场搞基建。午饭后经过旁边广场时,忽然听到一间礼堂内传来喊打喊杀的起哄声。我好奇地走近窗口观看,想不到毛泽东 "帮助党整风······言者无罪"的号召,落实在现实中却是触目惊心,置人死地的殴打大会。

台下坐着约有一百多个职工,看来他们大多数还是同情受害者的。因为托腮垂目者、紧锁眉头者、频频如厕者、甚至梦见周 公者也不乏其人。

台上的情景就截然不同了。那里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围殴。 只见十多名粗壮大汉,正在凶狠地殴打着中间的一位高瘦青年。 这些年轻力壮的积极分子轮番出拳踢脚,照着他的要害部位—— 胸口、腋下、小肚、眼耳口鼻——狠狠地击打。

一个块头很高大的人,咬着牙,拼老命似的当胸击了这青年一拳,当他狼狈后退时,后面一个粗矮但手臂肌肉发达的人,又一脚,把他踢到旁边去,旁边的人,随即抓住他的头发,当脸对他鼻子猛力一掌,打得他血流满脸。那件早已撕得不成样子的白衫上,又增加了几滩红色的血迹。

当他跌倒在地时,只见一个方形面孔的人,上前弯腰揪住他的头发,拖了起来,并振臂高呼: "这个家伙在装死! 同志们! 该不该狠狠地斗?"于是台上台下,便演戏般地有一批积极分子在举手呼应着: "应该!打!"台下几个职工,从睡意朦胧中猛抬头,并未弄清是什么情况,也随大溜地举手喊: "应该!"

忽然,一个黑脸的高个子,又大声喊了起来: "同志们!不能让他睡在地上舒服,要他站起来,接受批斗!"当这位青年再一次被打得爬在地上时,我看见他的脸、鼻、口都是血,地上的一滩血渍中,有两片指甲大小的白色东西,估计是打断了的门牙。

这青年不间断地挨了一个小时的打。浑身上下,不知挨了多少拳脚,但从未听到他哼过一声。从受击的部位,力度来看,他肯定已是骨折内伤了。这些人,似乎是想当场把他置于死地。斗争大会被大家打死的,历来无从追究,在宁左勿右思想指导下,常常是不了了之。

究竟那位青年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要受如此折磨呢?归纳有两大"罪状":大陆赤化前,在中学读书时,参加过"学生会";有一次对妻子说:"我感到很痛苦(经常无故挨打受辱),如果能到深山老林安静地生活多好。"结果,隔墙有耳,给哪一个顺风耳朵听到后,小报告就递到书记手里。

按第一条,当然可以是"阶级敌人"、"反动骨干"了。第二条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对反右运动不满"、"对现实不满"。有一位仁兄,又颇能发挥他的马列分析才干,无中生有地给他加了一条罪状——"同志们!他准备到深山老林去,去干什么?还不是想组织反革命集团么?还不是企图变天复辟么?这是当前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类"牛鬼蛇神"受伤后的处境将是很悲惨的——不准别人同情他、帮助他,不会给他治疗。他们面临的是开除、下放管制、

罚做超体力的苦役,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大会。致于那位青年, 我相信,他已受了致命伤,不会久留人间了。

大跃进纪事

由于内陆工业极端落后,钢铁年产量很低,但又要"十五年超英赶美",于是毛泽东想出了个打肿脸充胖子的方法——"全民总动员,全家大炼钢铁",别出心裁又劳民伤财地胡闹起来。

1958年,各部门都在强迫大家去完成这项倒霉的政治任务。 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到处开会作报告,到处 参观取经,到处搜寻矿石,到处树立小高炉。

矿石找不够,便挨家挨户去搜查:铁棍、秤砣、铁锅、烂菜刀、生锈铲……只要是铁质的,除留下一般必需炊具外,统统上缴,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去了。

大多数耗尽人力物力,匆忙砌起来的小高炉,铁水流不出来, 少数流出铁水来的,也是废铁一块。

我们的海岛在荒僻处的沙滩上、坟墓旁也建了十多座小塔般的小高炉,日夜派人轮流加焦炭添火,鼓风机吹得呜呜响。大吹大擂地写好的红"喜报",准备向场党委报喜,可是铁水却始终流不出来。由于高炉上面的火星顺风吹去,燎着南面的一排草房,搞得全镇出动去救火。那些建在沙滩上的小高炉,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后,在风吹雨打下,慢慢地"不倒倒之"了。

场里虽然未能向场党委报喜,但场党委的报喜书,却早报到小山县去了。因为只要有"坚决响应号召"、"完成小高炉 XX 座"就够了,实效如何是不管的。那时的作风是一味地"紧跟"和"盲从"。

基建总队所属的海合工程分队(原来的"海测队"),还发明

了"超声波煮饭。"据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科学,连英美都未曾有的,足见"大跃进"和"解放思想"的成功。支部书记老李还特地宣称: "我国已进入超声波时代。"

我去看了一下,原来一个废电油桶,上部穿出一条旧胶管,管的末端,装有半片剃须刀薄片,桶下加煤燃烧,当水蒸气从胶管末端喷出时,微闻丝丝之音,这就是世界水平"超声波发生器"了。

经过试用,不仅费煤、费水,又费人力。自从有了这个大跃进的怪物后,我们几乎顿顿吃有异味的夹生饭。不过,如此失败的东西,却被队里和场里的干部作为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报了上去。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只苦了平民百姓。

那时候,农村的动作也很大。上头号召,下面响应,吵吵嚷嚷地成立起 "人民公社"来了。小山县的新海、马村、黄村、赤围等村镇,都在路口搭有写着豪言壮语的竹牌坊:左书"人民公社万年长",右书"三餐干饭甜又香",上书"人民公社好"。

敲锣打鼓之余,还特地恩准:连续三天"放卫星上天",放开 肚皮尽量吃饭。

我看见队上许多工人,拼老命似的把饭往嘴里塞,鼓得两眼发直泪水流,两手还是忙不停地往嘴里送。很多人胀得腹如满月腰似弓,既不能坐也不能睡,弯不下腰,也不能笑,非常难受。 我本人也领略了长饥骤饱,啼笑皆非的滋味。这才知道过饱甚至比过饥更痛苦。

因长期饥饿怕了,一旦有天赐良机,不求一饱,尚待何时?况且,谁不知道"政策"这东西是可圆可方,朝令夕改呢?正所谓:过了此村无此店,再想买酒就找不到"杏花村"了。老百姓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教导,真是学到家了。

果然,只三天功夫,"杏花村"的良辰美景就过去了。亩产

万斤,甚至亩产十四万斤,根本吃不完的统计与宣传,彻底破产了——原来上报的产量全是假的。

由于谁报的产量少,谁就要挨批评、挨整、降职;谁报的数量多,谁就会升官晋职,青云直上。于是一级骗一级,直骗得毛大爷盈盈满志。

有的隐瞒面积"打埋伏",有的干脆胡乱报个"竞赛数目"上去应付,更有的聪明人,把邻田已扬花之谷穗,连根带泥一起挖过来,植得一亩地密不透风。结实之时,大造声势来宣传,请上级、专家、记者之类参观拍照。然后证明:亩产万斤粮食的真实性和亩产十四万斤粮的可能性。

据说,亦有人满之患的印度,闻说亩产万斤的消息后,也派专家赶来"取经",期望能借此"东风",救救饥饿的人们。结果,当然是触了他们虚假的霉头而失败了,诚实的佛门信徒根本不知道有"移穗合植"的新方法。

人们一下子由"放卫星上天",又掉到饥饿的深谷中去。每人每天只分得一、二两米过日子,有的队根本拿不出粮食来(报大数,则要按大数上缴粮食,因而缴空了存粮,只好克扣百姓口粮),只能让老百姓去啃草皮。

饥饿岁月

一般认为解放后的饥饿岁月是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事实上远比这个要早。就我们家来说,从一解放就经常有上顿不接下顿的日子。

1951年至1953年,我在小乡墟的县立第四中学念书。那时,家中时时断炊,我经常"扎炮"、"吊煲"(饿肚、停餐)或在同学资助下渡日。因为我是长子,又读寄宿中学,母亲千方为我蓄

借些米粮、菜金,好让我读下去。家中小弟妹就随便多了,经常野菜杂粮地捱日子。我见到最小的七弟,饿得像枯枝上挂着个肚皮,实在可怜,便带他到学校里与我同住,来个"二一添作五",分一半饭给他吃。虽然自己也饿得头昏眼花,甚至间歇性地昏迷,然而见到他高兴的样子,内心也就欣然了。

1954年,内陆实行垄断粮、棉、油等物资的统购统销政策后, 老百姓配给的粮食极少,每天才几两米,煮粥都不饱,只好大量 掺杂菜蔬、薯叶之类,求其量多,灌充一胀饱。所以薯根、树叶、 香蕉头、野菜、木瓜树心,大自然中只要能吃的东西,都被饥民 们扫荡一空。我真正体会到"饥不择食"的含意。

我们家乡县城里,有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叫古祝仿。小时候得病去就诊,每次都一剂药痊愈。竹林下,古色古香的小屋里,求医者待满其间。

到古大医生诊所排队看病的人群中骨瘦如柴的特别多。有一次我也因腹泻去该处看病。古医生对着众多面黄肌瘦的求医者,看了又看,然后不无感触地说: "你们都没有什么病,回去想办法弄点饭吃就会好的。"饭能医病是也。

我有一位朋友是五华水乡人,有一次在小山县城的城门街碰到他,感触于荒凉景象,他告诉我,他家乡发生的一件趣闻:有一位从美国回来观光的老华侨,看见到处都是瘦骨嶙峋的人群,便奇怪地向陪同的干部说:"老百姓为何个个都那么瘦?怎么就见不到一个胖点的人呢?"这位曾称"人民翻身作主人后已丰衣足食"的干部,当时尴尬之极。但他忽然又转忧为喜,兴高采烈地指着不远处说:"来了,来了!那边过来的两位,不是很胖么?"面露沾沾自喜之神情。谁知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步履艰难,满身浮肿、腹胀便便的"发黄肿"病人,正互相携扶着去求医。

1959年至1961年,是令人思之心寒的三年大饥荒时期。

由于和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对方撤走专家,断了一切支援并逼讨欠债(好像 80 吨猪肉换一辆车),加上极端冒进的公社化和大跃进政策带来的反面效应,中共政府此时更是一筹莫展,吃尽了谎言的苦头。

当时官方文章与领导报告中,一律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提及"中苏分裂"和"三面红旗彻底失败"的事情。事实上,那时候既无大旱大涝,也未见蝗虫危害、火山爆发,又何来自然灾害呢?其实是"人为的灾害造成的浩劫"。那时候,真是到了饿殍遍野的程度。天上地下,山里水里,只要能吃下肚的,都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那样扫个精光。我们所在的新海、黄村、赤图、马村、上溏、水园、佛山等村镇,天天有"发黄肿"的病人死去,老者居多。他们全身浮肿,腹部隆突,头大如斗,肤色呈黄,死状惨不忍睹。据说腹胀者一拉水就完了。

我们每餐只有二两米,还要劳累一天,饿得大家头昏眼花。 我的眼皮和小腿已开始浮肿,晚上九点一过,胃就痛得我睡不着, 要爬起来拚命喝凉开水,冲淡胃酸才能捱到第二天早上。

平日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吃。想的、梦的、谈的尽是关于吃喝的浮想。树皮、树叶、芭蕉头、小青蛙、老鼠、野菜……等等,再一次成了大自然济世的恩物。

九队有一个广西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捡起马村边的排洪 沟上一只浮起的死老鼠煮来吃,结果一命呜呼。有一个人,在上 流附近的银鸡岭公路上,杀死了一名老妇人,想从她的小包袱里 得到一点救命的食物。打开后,除了几件破旧衣服外,只有半斤 粮票和伍角人民币。半斤粮票与伍角钱(约值港币一元二角)就 这样要了两条人命。

很多人吃荔枝核、龙眼核——水泡数日后去壳,用小石磨磨成浆状,掺些小菜叶、糠皮之类煮来吃。据说,吃下去后,有点

胀饱的感觉,那味道当然不敢恭维了;但上厕所时就痛苦了,解不出来,其痛苦甚于难产妇。有两夫妇吃了后,也是无法"解脱",最后只好互相帮助,用手指抠出来。

ting to the transfer of the state of the sta

有些人以为蟾蜍(癞蛤蟆)与青蛙差不多,只要把他的毒皮 去掉,就一样可以吃,据说味道鲜美胜于青蛙。其实还有百分之 五十的氰化物剧毒仍含在肉内,很多人因此而中毒身亡。

有很多工人带着十字镐,到二十多里外的细毛岭上去挖山薯。 一天的繁重劳动,只换得拳头般大小的一点薯茎回来。那山薯苗 小,茎长,弯弯曲曲,深深地埋藏在石隙中。大多数人则是空手 而归。

有一个星期天,几位朋友约我一起外出,碰碰运气,希望能 买到点食物。我们走了半天,转到一个叫水园的小村庄旁边,见 一老妇和一个"大木屐"(女孩子)各轮着一根中间小、两头大 的长木棒在石臼里掏草药。此地将谷粒做成米,或将米变白面等, 都沿用这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最原始方法。突然间似乎时光倒流, 洪荒再现,我们走进了时光遂道里。

我向前用闽南话搭讪:"大妈,这草药治什么病?风湿?跌打?无名肿毒?"

那位大娘苦笑了一下说: "不,是治肚痛的!" 我有点奇怪地又问: "治肚痛!是否贴在肚子上?" 大娘又苦笑了一下说: "不,是吃下肚子里的——"

我更不解此是何药了。还是小女孩心直嘴快地抢着回答说: "这不是草药,是当饭吃的!叫鸡仔草。"

我细看后,觉得它与一般的青草没有多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到处见得到的一种野草。除了牛羊马等牲畜能以草为生外、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实在不知道草捣烂后,竟能当饭吃的。不过,大娘也未骗我,她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的胃痛;她"吃草药治肚痛",

与我的"饮开水治胃痛",不是彼此彼此么? 我对那几位同伴说: "我们回去吧。老百姓都已吃草渡日了,哪里还有吃的东西卖给 我们呢?"

各个基建分队,大部分是福建转业来的军队。尽管绝大多数 都是党团员,但为了争饭吃却经常大打出手,围着饭桶,以扁担、 铁铲为武器冲锋陷阵,拼得头破血流。

后来搞了个"生产自救运动"—— 半天上班半天生产,种粮食自救,"谁种谁收,收成分给大家"。等于额外补贴,大家起初很高兴。

我们于是天天带着水肿之躯,迈着艰辛的步履,到附近的银鸡岭种蕃薯。土硬、锄重,腰酸、肚饿,还要干重体力劳动。

等到我们累死累活收了红薯后,领导的"灵活性政策"又来了——立即宣布:"全部归公,折粮食分配。"这一下真倒霉透了:二两米还有碗粥吃,折算成红薯,就只有拳头大小的一个薯茎。偏偏又是高产量的马来西亚良种,红皮红心,蒸熟后,里面尽是糖浆,用嘴一吸,就只剩下皮袋一个,每餐就几大口糖水。

收成不归已,出尔反尔。收薯的时候,我们都故意不收干净,好留给后面饿得面黄饥瘦的捡薯小孩。收多少也是"充公",倒不如帮帮百姓,何乐不为呢?

市面上,物资奇缺,特别是食品更是难觅芳迹。百货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除了几件不能买的"样板"外,日用品也几乎绝迹。人民币几乎失去了作用,大家拿着它,却买不到食物。小山县黄村镇上,出售一种叫"仙人果露"的糖精水,既贵又不卫生,金头苍蝇鏖集其上,其味酸而带苦,还是供不应求,一抢而空。

镇边有一间几近断炊的熟食小店,围了一大群人在等着捡旅 客的剩菜剩饭吃。他们不是乞丐,是附近饥饿的村民,是人民公

社里的"贫下中农同志"。但是,旅客们经过诸多"证明"(当时要有出差证、钞票、粮票、乘车票、旅店入住证等五种证明)才弄到的一份客餐,早已扫荡无余了,哪里还有剩的呢?即使这样,大家还是抱着一点希望在耐心地观察着,等待着。

我看见一位老头,捡起地下一块咸鱼骨,如获至宝地赶紧放进口里品味,啧啧有声。有一位穿着斯文的中年汉子,看来是位读书人,眼疾手快地抢到一个小盘子,上面除了点汁之外,什么也未留下。他发现我看着他,有点尴尬,苦笑一下,转过脸去,毫不客气地伸出舌头,拼命地舔个彻底。

基建总队的工人很多是福州人,回去探亲归来带回来的烟叶,卖到 16 元人民币一片。约值港币 50 多元(当时工人约三十元一月)。还有带了成批的"老婆"回场"推销"的。皆因内地农村生活更苦,为求一条生路,只好外逃。通过找对象远走高飞,也是逃脱的一种办法。有的通过几封信,有的见过照片,有的只凭朋友口头介绍,但大部分是来到后,再自由结合的。有时只要一顿热饭,就立即合拍成交。由于没有感情基础,打架、吵架、移情别恋、离婚的,到处都有。

有一次,我从福州市经某县回场,在公共汽车上,就见到一名"军工"(军队转业到场的工人),带着十多个年青的女孩子回总场。前呼后拥,颐指气使,那派头真有点不可一世,俨然是个女儿国国王了。另外一次,我在福州市"泰益隆旅店"住宿,附近出售稀饭,长龙阵竟然弯弯曲曲排到得胜下路的五层楼处。不等十分之一的人买到,粥已快没有了。排前的,因为他人插队,粥未倒干净等争闹不已;后面的,则伸长脖子,相互打听,议论纷纷。

海南岛首府,还发生过用小孩的肉冒充"牛肉粥"来卖的事件。只因有一次顾客吃出一个小孩的指甲,事情才揭露出来。

1959 年三月份,我由场派去南昌市参观"南山基建工程",准备回来推广技术革新。在南昌赤镇的一间商店,我想买一瓶"竹叶青"酒。女售货员说: "不是不卖,但要一种'特别购物证'",叫我到市商业局要。当我跑到该处,得到的答复是: "证票"由该店发。气喘之余,我只好赶回商店里。那年青女孩不慌不忙地重复: "要到局里领"。最后,除了跑得一身臭汗外,酒味都未闻到过。后来,遭遇多了,才明白那是不卖的"样板"。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王君到小山的黄村(镇)上一行。见到 市面萧条,百行凋敝,百货商店变成无货商店。倘有几件准买的 东西,无非是筷子、瓦罐之类。吃的东西不用说,连日常生活必 需品,如牙膏、肥皂、火柴、香烟、汤匙、搪瓷碗之类,也早已 绝了迹。货架上摆着一两件时新之物,亦是看得见、买不到,装 装门面的展览陈列品而已。

后来,我转到近门口右手边,发现柜架上,竟有十多块早已绝了芳踪的香皂。

我问: "同志,请问那香皂卖不卖?"

女答: "卖的……。" (没有抬头,在看一本小说。)

"多少钱一块?"

"两个半钱一块(两元五角)。"(仍在看她的小说。)

我说:"请给我四块香皂。"

女说:"什么?几块?"(这次不但抬起她的头,而且杏眼圆睁。)

我说: "我买四块香皂。"

女问: "那你是代别人买的了。"

我答: "不!我自己买的。"

女: "那你有'证'没有?"

我忙答:"有的。"(赶快掏出在公司做工的带相片"工作证"

递了过去。)

女的看了一眼: "不是这种证,要结婚证。"

"结婚?结什么婚?"那时我还是光棍。

女的说:"同志,要有最近成亲的'结婚证书'才准买一块。" 她看了我片刻。她的意思是:"你有四张'结婚证书'么?"

"我的天!洞房花烛夜要洗得香喷喷,未结婚的人就不洗澡了?"

女的说: "澡还是要洗的,只是不能用香皂。"她的耐心,在内陆"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风气下,"服务态度"算是好的了。

我的同伴一边拉着我走,一边和那女售货员做了个鬼脸说: "对!澡还是要洗的,井水可以不要'证'嘛!"他小声在我耳边说:"天天'形势大好',偏偏买不到牙膏肥皂。尽是骗人的鬼话!"

那时候,流传着一句: "男人无精,女人无经"的顺口溜, 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写照。长期严重缺乏营养,造成生理失调,心 理变态,人人朝不保夕,谁还有闲情逸致去结婚呢?已婚的无可 奈何,欲新婚者,能养得起人家吗?

还有一次听一位朋友说:不远的"铺仔墟"有狗肉卖。我们便乘公共汽车去,希望能一偿"不食狗肉,不知天下之大味"的心愿。半途上来了一位青年人,提着一篮子东西。"哗!这么多蕃薯!"不知谁喊了一声,全车的人都惊奇地伸长脖颈望过来。有许多人过来打听:"哪里有得卖?"也有许多人愿出高价向他购买,但这位年少老成的仁兄,一概拒绝,无商量余地。我想:眼前要是有一篮红宝石和一篮红蕃薯,我看绝大多数人,会弃宝石而取红薯,正像马克•吐温笔下炎热沙漠中渴极的人群,会要水而不要黄金一样。这种心理,只有经历过在死亡边沿挣扎的人,才能体会到。

读历史的时候,曾经看到过古代一些暴君统治下,大饥荒年

头有"易子而食"的记载。我们所处小山县,是少数民族(黎族、回族、苗族)聚居的地方。虽然落后,但也是米粮之乡。由于三年持续大饥荒,饿殍遍野,一些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自己都没法活下去,所以普遍出现溺婴现象。有些人为了活下去,便发展到吃人肉捱命。

那时,我们在小山县参加球赛,住在中学教室里。有一次我与当地老乡闲谈,他们告诉我:"某某大队,一些人杀小孩来吃。"我惊奇地问:"见小孩就杀么?"他们说:"不,是自己的小孩。"我更惊奇了:"自己的小孩,吃得下口么?"他们答:"所以就互相交换煮来吃了。"据说还相当普遍。"总比大家一齐饿死好。"他们这样说。苦难的日子使很多人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即使那些没有饿死的,也有很多人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五九年春节前,总场篮球代表队在小山县得冠军后,我得到 三级运动员的资格,随后去福州市参加全海岛区选拨赛,我们又 住在"泰益隆旅店"。

有一天练完球,我出外买东西,才出店门不远,见一堆人围着议论纷纷,走近一看,见一位头很大,身穿西装看似华侨身份的人倒在血泊里抽挛着,头部已破,可见到白浆外流。跳楼的原因是什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隔了两天,路过解放戏院,突然见有人从戏院露台跳了下来,"蓬"地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也招来了不少路人。这是一位瘦长身材,五十开外,身穿黑胶绸白丝袜,一看而知是位商家人士,内地叫资本家的人。看见他下巴不断开合着,吐出鲜血,我没有胆量再前去打听始末。

那时候,饥馑遍地,最严重的时候死尸多得埋都埋不及。一次,曾在武汉某大学念书的朋友之子告诉我:他与同学**漫**步到城郊,忽闻阵阵恶臭。循风探究,来到一处水泥池旁。蝇虫满盈处,

赫然看见池中浸满不成型的几截手、脚和人类头颅。众人惊弓之 鸟般逃回校舍。恶梦缠绕数月之久。

The rest of the state of the st

后来打听到,是附近监狱,把死者丢进此肥料池中的。大概那个年代,死的人太多,老百姓都处理不了,何况这些异类!于是乎,便"废物利用",直接化为肥料了。

1960年,全国人民在死亡线上已痛苦地挣扎了两个漫长的年头。在南市地区,发生过多起上千人暴动抢仓库粮食的事件。饥饿的人群,手执锄头、扁担、钉耙等,劈开粮仓大锁,软禁守门人员,拚命把能装米的东西(衣服、裤子、竹笠、布袋之类)装得满满的。有的一面狂奔,一面把生米往嘴里塞。事后,在大搜捕中,很多人被指为带头煽动的组织者,冠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的罪名,抓去杀掉和判以重刑送去劳改。一些参加者,也以反革命罪名判刑劳改。

海叉岛利县、乐镇、通明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事件。有一个黎族的"澳雅"(酋长之类的头目)带领全村一千多户村民——上至书记、村长、下至"基干民兵"——携枪带刀、挑米带盐地集体武装暴动,上羊角山打游击,准备长期与他们周旋。很多青年组织地下军团:如"中国人民党反暴救国军独立团"、"人民党反暴救国军第一军"等。

福州市有上千个转业军人,不满饥饿的生涯,各人胸前印着"流浪者"三个大字,手握扁担、棍棒等,高唱着:"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孤苦伶仃,漂泊四方,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曲《拉兹之歌》,虽被定为黄色歌曲,但在内地很流行)他们见蕃薯挖蕃薯,见菜园摘瓜果,闯进商店拿食物,还到附近公社和华侨中学的鱼塘摸鱼吃。谁敢阻拦,就扁担相迎。这真是官逼民反,饥民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了。据说,某外国军情机关在当地空投了一批武器,不过由于缺乏组织领导,

还是没搞起来。后来北京派了一名将军下来,连拉带打地镇压下去,还抓了不少人。

第三篇 铁窗春秋

祸从天降

我有个舅舅住在纽约,曾是美军的一位文员,后来经商。搞得还不错,有公司、有楼、有车。1961年九月份,我和蓝青俊君寄了一封信给他,谈到希望能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当时很天真,以为平信一般不会检查,没想到出国的邮件,是非查不可,绝不放过的。

10 月 20 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是我永远难忘的时刻。那天似是星期日,一大早,基建队长叫我把施工图纸,带去总场的会议室研究一下工程上的问题。我到达场部的会议礼堂。礼堂是建立在小村边的沙地上,一个大型竹草结构的大棚,可容纳几百人。我进去时,室内坐着工程师、队长、科长和总场的一些干部,作饮茶看报闲谈状。有人招呼我坐下等待。一会儿,门口有人对大家点点头说:"人都来齐了,我们去开会吧!"于是大家离座起行。后来我才知道,"开会、研究"是蒙蔽我的一个花招而已,那些人都是事先安排好,到那里监视我的。我靠墙边坐在一幅准备去做裤子的布料上。对即将来临的危险茫然不知。主持会议的是全场最大的科长,这有点不寻常,因为通常都是由下手作开场白的,而今动用科座,看来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这位科座文化很低,平日开会总爱嬉皮笑脸地哗众取宠一番,今天却表情严肃。他开口了:"同志们!我现在代表场党委宣布:逮捕与海外敌人勾结,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叶少华!"

我感到热血往上涌,显然事情暴露,信件落到他们手里,出 国与亲人团聚的愿望破灭了。个人安危并未考虑到,那时的确也 生活不下去了。接着一个代表公安局的人,叫我在逮捕证上签字,又看了手表,再叫我写上时间——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然后五花大绑地让我站在台上。我昂首侧目,偶然望一眼下面的人群,见多是惊奇和难以置信的神情,因为我平常的表现不错,都很低调。当时我自己觉得非娼非盗,纯为自由之故,内心倒有一种自豪感。我以为只抓我一个,其实蓝君也同时被捕了。

礼堂门口早已有一部解放牌大卡车在等我。上车前,一个保卫科的干事,过去与我是篮球队的球友,对我作了搜身检查。他把摸出的几张粮票和三元人民币,塞回给我说:"以后要用的。"态度还好,只是声音很小,大概怕被旁人听见吧。

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五个持枪的管押人员,估计是公安局和 保卫科的人马。其中一个年纪轻点的,平日与我们有说有笑,以 为他是一般职工,谁料他竟是负有特殊任务的秘密警察。

汽车开到马村基建队部停下,很彻底地搜查了我的住处和办公桌抽屉,那干事有一把"万能匙",一下子把我所有的锁都打开了。当然查不到什么罪证,于是科技书、时事讲话、朋友信件等就成了以后审问的内容。最可惜的是一大叠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照片从此下落不明。

最后只给我一床被子和一个汤匙,就匆忙上车赶路了。车出了黄围向左拐,沿海叉岛西线公路奔驰。在敞蓬的卡车上,我仍双手反绑着,坐在靠近驾驶室背后的一条长椅中间。两边和对面则是采取小包围姿态,手持长短枪,全神贯注,监督着我的解押人员。他们好像怕我逃跑或袭击他们,神情始终很紧张。我也确曾考虑过逃跑,但苦于没有机会。车子穿镇过县,马不停蹄。道理很明显:赶时间,怕中途出事。车子一直开过小县,由于我要小解,他们也想吃东西了,才在荒无人烟的路旁停了下来。

在反绑着双手, 无人协助的情况下, 要跨过车栏杆下车, 不

摔倒,然后又爬上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只眼瞪着我,不肯来扶我一把,似乎要与我"划清敌我界线。"所以,我只好咬紧牙关去演这难度很高的"飞车特技"了。

역동 사이 이 등을 하지 않아 하셨습니까 하는 사이 사이를 가려왔습니다. 이 등 자

车子再度朝北奔驰。他们从草绿色的挎包内,取出一叠很大很烫的面饼来吃,并问我吃不吃,我摇了摇头。到达海南岛公安局的大院子里时已掌灯,足足走了一天路程。在昏黄中,听到有人问:"犯人送来了?"回答是:"送来了。"不久,换上来两个持冲锋枪的士兵,那班解押者换班去吃喝去了。车子又朝东开了不远,来到海岛附近的小城街上。

那士兵喝令我下车,我从放下栅栏的车后跳下来,并不困难; 但用反绑着的双手,把行李被袋甩上肩,却是一件难度更高的动作。我试了十多次,还是甩不上去,士兵又粗声吆喝着要走,只 好拖着走过马路。我咬紧牙关,再奋力弯腰把行李袋甩上肩膀,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已一天水粮未沾,非常虚脱,经过三年灾荒 折磨的人,真有点支持不住了。

转入一条狭窄、阴暗的石铺小巷后,便开始另一次艰苦的行程。平常并不算长的小巷,此刻似是走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双手被捆了一天,早已由刺痛、肿痛到麻木了。巷旁有几盏鬼火似的电灯,在忽明忽暗地挣扎着。只听到六只脚踏在石板上的"扑咚"声,周围静得可怕。此情此景,令人怀疑已置身在通往"奈何桥"的阴司路上。事实上,前面等着我的,也是一座鬼门关,此门冤魂济济,易入难出,九死一生。

来到一座大门口,正前方有一小堡垒,里面有一个满脸胡子,身材高大的士兵,起初我以为他是苏联兵。他们打过招呼后,让我入了大门,来到另一座大门前,我被命蹲下等待。这时围了不少小孩、妇女,我犹如动物园中被观赏的斑马、猴子,心中很觉气愤。小孩们在议论:"他是什么人?""是坏人!""我看他的

样子不像偷东西的。""那好人为什么会捉来这里?"

我抬头看了一下周围:左排房子有很多烟囱,门前堆有许多 柴草、鸡笼之类,看来是干部家属住屋。右边是办公室及单身宿 舍。高耸的厚围墙的大铁门边,挂着一块大木牌——"新生材料 工厂"。这是对外的名称,实际上就是一座监狱。

不久,出来一个瘦子,叫我跪着,然后松了绑。我痛苦地勉强摆动了几下,麻木得像不是自己的双手。他喝令我接受检查,皮带、鞋带被解下没收了,他又很内行彻底地搜查了我的身上。突然,他用脚向我的空鞋头猛踩几下,大概是看里面是否藏有利器、金条之类的东西吧。

我是早上八时被捕的,晚上八时多才到这座监狱,反绑了十二个小时的双手,一旦松绳,却已麻木得不能抬起,好像断了一样,等到血液部分流通,知觉稍复时,犹如千刀万针在刺戮,又似无数毒蛇恶蝎在啮噬。

那瘦个子干部,原来是里面的"木工车间主任"。他带着我由大铁门里的小门进去,走过一排房子,忽然见到二十多个女孩子围在灯光下读报、讨论。我想:这里也关有女人?她们是受什么委屈来此受苦的呢?那几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惨白的脸色和麻木的表情,充满忧郁痛苦的眼神,可以想象到,这里是什么环境了。

穿过那排房子,经过一片水泥广场,赫然见到十多个形同叫 化子的人,戴着烂毡帽,披着麻袋,手上撑着拐竿,一歪一颠地 走动着。其中有几个带着脚镣,走起来"叮当"作响。这究竟是 什么地方?为什么把我和这些要饭的人关在一起?难道我将来也 会变成如此模样么?

后来我才知道,像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他们进来时,还算 衣衫整齐,经过长时间的肉体、精神折磨,就要靠拐杖来支撑重 心。衣服破烂到成了百纳衣,监狱是不发衣服的,连惯常的囚服也"厉行节约"起来。为了禁寒,只好披上耐磨的破麻袋。时日久了,多数人会成此模样。

他们常爱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看来,正相反。

又过了一道大门,门旁有一座很高的碉堡。东、西、北有三座品字形排列的监仓。又弯弯曲曲地穿过一排工场,来到围墙边,靠近厨房的一排是禁闭暗室。

只能容一人的斗室内,前面放着一个便桶,散发着臭鱼般的 气味,教人恶心。前后有两个又小又高的窗户。门一锁,便几乎 伸手不见五指。现在我才知道到什么是黑牢。

禁闭室像座棺材,闷得人发慌。霉烂的臭味,成群的臭虫,烦恼的心情,使我辗转难眠。想到未来的命运,想到如何逃跑,想到如何对付他们,也想到亲人和可怜的慈母会因我的突然失踪而担忧。漫漫长夜,令我乍睡乍醒,忽浮忽沉地恶梦达旦。我深深地体会到孤单、绝望和与世隔绝的含义了。一个好心的看班,给我弄了点粥进来。忽然,我隐隐约约听见隔壁有几个妇女在说话。再一细听,她们有时说闽南话,有时讲大埠话。值此"惶恐滩前说惶恐,零汀洋里叹零汀"之际,听到人声,特别是同病相怜者的乡音,就倍感亲切。

不知翻了多少次身,醒醒睡睡,朦胧中被一阵"当当" 声吵醒。原来,那是值班人员敲击吊着的破炸弹壳,催令全厂劳改起床做工。我是禁闭号,不用马上起来,我不想白天多睡觉,便用被子、衣服叠在窗下,垫高来观看外界的奇景。还好,直起脚尖勉强看得到。后窗靠近围墙。

对面是个木工车间,有几十个衣衫烂褛、容颜憔悴的人,在做着沉重的工作。他们表情麻木,失去一般人应有的反应。上厕

所、离开工作地点,都要告诉小组长。经常有一两个"看守员"进来巡视。对他们说话要距离一公尺,立正,喊:"报告",还要自称"犯人"。

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看守员进来,有人对他说:"报告班长……"我想他大概是管十多人的班长。后来,另一个矮胖看守员进来,听到人家又叫他"班长",看来班长还不少。以后不同面孔的所有看守员都叫"班长",我才明白:"班长"原来是一尊称。

他们日常工作是做家具台椅和小修理木活。他们眼睛很管事,不时东张西望,干部或工头来了,他们会动作快些,否则就慢慢来。可怜他们只剩下一把皮包骨头,只好以磨洋工来捱日子了。

三天后,铁门开处,来了个五十开外,衣衫整齐的看班(管监仓锁匙的劳改监头),带我出大铁门外去"提堂"。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看班"大有来头,他原是福建省泉州市长,不知犯了什么罪,被关进此监狱里。给他做看班这样的清闲工作,也算是一种同行的照顾吧。

进到门侧一小审讯室,高高的柜台上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场保卫科长,另两位大概是公安局的预审员。这预审员的权力很大: 判决与否,判多少年,文字上的轻重等,基本上都由他们来决定。 我坐在墙角一块冰冷的水泥凳子上。既无群众旁听,又无律师辩护,一切也不公开,实际上是进行秘密审判。

他们三个轮番咆哮,极尽威迫、引诱之能事。那科长主要追问场里还有哪些人有份?一些平日工作上,生活上与我有过接触或稍好点的同事都成了怀疑对象,特别是一些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我知道信件落到他们手里是否定不了的,就说:"信是我们写的,不关任何人的事。"他又追问与我通信的一位外省朋友,是否知道,是否也有关连?我说:"信件都在你们手中,可以调查。根本没向他提及此秘密事件。"为了加强威慑效果,他们在我前面

放着一条很重的生锈的脚镣。

预审员则追问信件的内容、目的、企图,还有我的政治思想、海外关系等。这样提审了十几天,过堂五次,每次都换了人,有一次还出现一个女的提堂。他们迫问我:"谁是头子!"其实相互商量着写的,何来"头子"?但为了减轻蓝君的刑罚,最后我承担下来,自认是主谋。

在暗室里关了三个月,我日夜思量着如何逃跑。有一次我揭 开底下的木板,赫然发现板缝中插着一些铁锤、钢锯、绳子等东 西,看来是"前任"准备逃跑时藏的。我的计划是:一、揭开两 块长木板,用撕下的被单布捆接成长长的跳板;二、用工具凿开 屋顶瓦开出天窗;三、将跳板由屋背搭到围墙上,走过去;四、 用布条编成的绳子滑下围墙逃跑;五、选择大风雨的深夜,可掩 盖响声和狼狗跟踪。

但事情进行到一半,有一天上午,突然叫我到属于定安县看守所的麻布车间劳动,行李也搬出去。

他们先叫我去到大门外的小审讯室去。柜台上一个年轻干部,对我宣读"定安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念完交给我,并说: "我们准备很轻地处理你。"但一看起诉内容,我的耳朵嗡地响了起来,心脏急速跳动,几乎要跳出来。起诉书中指控我:一、和蓝青君联名写信到纽约,与外国的特务机关勾结联系;二、破坏工程施工,浪费人民币五十多元;三、企图暗害领导;四、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

5 月中旬,我在车间劳动,被一干部叫到大门口,同时站着 的尚有多人,据说是在等待宣判。

轮到我去那间小屋,由一名法院干部,向我宣读判决书,他 念了一遍,叫我签字,然后交给我。

主要内容如下:

海南定安县初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刑判字第 XX 号

现行反革命分子首犯叶少华,汉族,学生成分,现年二十岁,福建省宁化县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是某省市司令,被告思想极端反动,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另一则写某君的情况)1961年联名写信给纽约罪大恶极的刘唯,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制度、党的路线方针等,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破坏生产,致使基建施工浪费了五十元人民币。散播不满现实的言论。企图破坏生产后逃往外国。要求参加特务组织,接受指示与任务。查上列被告属阶级异己分子,特从严判处反革命分子叶少华有期徒刑十五年。由1961年12月25日至1976年12月25日。从严判处蓝青俊有期徒刑十年。由1961年12月至1971年12月。

判决书上没有一般的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年,意味着刑满以后 不用再管制多少年。但到时候又天晓得呢?

起诉书上所言破坏生产,其实因基建返工浪费,某主任工程师矢口否认。他曾对我作口头指示,我只言明实况,就说我推卸责任,破坏生产。领导等于干部,干部也是领导,我就这样被抹黑了。我据理力陈:一、信是写给我亲友的,他在纽约做生意,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政治背景和立场,只是想出国与家人团聚,没有任何政治意图,跟特务组织没任何关联;二、工程返工纯为地质材料不确所致,不是破坏生产,请上面调查。

但是,在宁左勿右的高压政策下,哪里会有道理可讲呢?况 且在这座监狱中,谁敢提出上诉,将受到手铐、脚镣、斗争、加 刑等残酷打击。因为,你提出上诉,等于向上级控告你的顶头上 司有错误,那还了得?

我只在小组会上谈了一点判决出入,马上批判了我几晚上, "不认罪服法","对党和政府不满","对劳改政策不满","企 图翻案"等帽子,扣得我喘不过气来。并来了一个干部威胁说: "我已经轻判了你,如敢上诉,马上加你五年刑!"

囹圄深深

少时唱"苏武牧羊",唱到"雪天又冰天,羁留十九年"一句,总觉得那是漫长、遥远到不可想象的岁月。十九个春夏秋冬,有六千九百三十五个日日夜夜,似乎是一条弯弯曲曲,通向天边,望不到尽头的人生末路。谁想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竟也有"雪地冰天二十年"的一段历程呢?

这座老式的定安监狱听说是清末民初建的,全部钢筋水泥,非常牢固,围墙约六公尺高,厚半公尺到一米。全部用当地有小孔隙的山岩砌成。由于既漏气又坚硬,一般炸药、炮弹对它的破坏力不大。高墙顶上插有破玻璃片,以防止犯人逃跑。本来只建有东、西两监仓。北仓和各车间厂房等,则是以后坐监的人多了,得的利润多了,才逐渐扩建的。

我进来的大门是旧门,以前竖的一块"改恶循善"石碑已被 打断,置于麻布车间门口作石桌,现在他们改叫"改恶从善"。靠 东边开了一座新的大铁门,打开后可让汽车进出。门口筑有小碉 堡,日夜有士兵拿着冲锋枪值班看守。

东仓主要关的是死刑或重刑犯,西仓主要关的是看守所劳改 或未决犯,北仓关的全部是厂部各车间的劳改。西南角有一列房 子,是关劳改医生和女劳改的,病房也设在那里。

北仓内,有二十多个小房间,分两排相对。每房住一组犯人,

二十多人拥挤在上下二层的"碌架床"上,每人约 40 公分宽。内置一便桶,早上轮流值班倒到后仓厕所里去,并用水冲干净放回仓内。每个房,有铁门和柱子门两层,仓门也是一层巨型柱子门。

由我们睡觉的监仓出外,要经过七道门,才能到达公路(厂内五层门,厂外两层门)。监狱外面,建有许多干部宿舍和军队营地,层层将监狱包围着。还有一些就业职工及家属的住房等。临文化公路旁,建有一个多层新办公大楼,专门对外营业赚钱。由于层层掩盖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咫尺之外深幽处,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受苦难,也无从想像,市面上的香皂肥皂、书籍报纸、家具台椅和出口的牛头刨床、高级椰绒丝等,都是身陷十九层地狱的苦难同胞用血汗凝成的。

车间下班回仓,要排队点名,进仓入房后,由组长再点一次名,然后向锁门的车间主任报告:"报告主任,某组全部齐了。"车间主任锁完房子再锁仓门。第二天早上,他再来打开仓门,锁匙交给仓内看班,一一开启房门,放这些人去各车间劳动。

这里有个规矩:和干部说话要先"报告",得到允许了要搬椅子给他坐,自己则蹲下说话。要自称犯人,不准说"我"。

南方监狱的干部采用饥饿、加刑等办法对付不服改造者。但 尚无动手动脚打人的风气,表面保持平等。但后来到了吃得饱些 的北方,有些干部粗横野蛮,打人、骂人、吊打、捆绑的情况, 令人发指。虽说"天下杨梅一样花",但花色花型有异也。

在暗室禁闭的时候,一个看班给了我一个饭碗,那是用破电油桶铁皮弯成碗状,碗状底下垫有一圆形木板的餐具。加上一个能盛开水的破瓦罐。除了被子、汤匙和几件随身衣物外,这就是我唯一的私有财产了。由于这里的饭菜定量配给执行得比外面更严格,连开水也是分配的,多一口也没有,所以破瓦罐也是很有用处的,剩下的一点,可以装在那里,留着慢慢喝。

像我这样的装备,比起那些用报纸铺地作床,用"五爪金龙"作筷子,停留在原始生活方式的难友来说,已是从陶器时代(破瓦罐),进化到青铜时代(铜汤匙),步入铁器时代(破电油桶铁皮碗)了。

监狱中,最多、最方便的餐具是椰子壳,因为新生材料厂要 用椰子油做原料,椰壳到处都是。几乎人手一个,有些人刮得很 光滑,还刻上名字,再在边上钻一个小孔,穿上绳子,像古时的 玉佩似的吊在腰上。有的一个人拿好几个,跟口盅、破碗之类穿 在一起,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每个人都必须用布制作一个"百宝箱"。有用破布百纳而成的,有用烂书包改装的,但是最现实、最常用的是用一条短裤,缝紧两条裤脚,就可以装东西,裤带一收紧,吊在身上就很安全了。 我当时就曾牺牲一条西装短裤,制成一个中古时代的"吊式百宝箱",里面装着书、笔、碗、罐、衣物等。

一到全厂开大会、大家集中起来时,一队队衣衫褴褛但款式 各异的人群,带脚铐,叮铛作响,犹如蹩脚的乐队,在演奏着一 首苦难交响曲。

监狱的卫生条件极差,人人都生虱子,监仓内臭虫成堆,蚊子成群。晚上都是在"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的围攻下朦胧入睡。有时实在太疲劳,又想到明日沉重的劳动,只好任其咬个够。其实一些"臭皮袋"已经无血可吸了。

臭虫名符其实,有股难闻的臭味,且嗅觉特别敏感,入夜闻到人的汗酸味,便会悄悄爬到你颈上吸血。它很狡猾,会在你身体与木板床接触的麻木处慢慢咬你,使你不易感觉。有的还会准确地"定点跳伞",由天花板上,张开脚掉下来,落在你脸上咬你。不像虱子那样藏在枕头、衣服、被子里,它们白天全躲在墙洞、床底、天花板上养精蓄锐,晚上才出击。所以有时还不太容易发

现它们的大本营。

这里每周有半天时间搞卫生,除了洗澡、洗衣服外,主要是抓臭虫。抓到的臭虫,用纸包好,写上名字、数量,交给小组长汇总上交劳改医生,经检验证实后,再汇报干部。这算搞卫生的成绩。

有的人抓到一百几十只,有的抓到两千多只,还有一位仁兄战绩辉煌,特别有耐心,一口气竟捉到六千五百多只臭虫,名列前茅,受到厂部表扬。其实捉到的只是小意思,绝大部分没捉到,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

臭虫太多,吸血又干扰睡眠,是非常恼人的事。但这里发明一些对付它们的方法:一、在太阳底下撞床板,掉下的臭虫就会一个个四散而逃,但逃不了几步,就被烫热的水泥地烫死;二、用开水烫杀,主要除去沾附的虫卵;三、用肥皂头堵死它们的洞口;四、在臭虫洞口,放一点点糖,引来勤劳的蚂蚁,进洞内去拖它们,一旦蚁兵驾临,虫府就会满门抄斩,连幼主、虫卵也会被吃光。

在东、西、北仓,品字型中间,有一座碉堡,下部画着一幅 漫画——一个肥头大脑,大腹便便者为剥削者,一个瘦如弯弓的 被剥削者。两人面对着,胖子凸出来的肚子顶在瘦子凹进去的肚 皮内,意思是穷人血汗给富人吸干了。

然而,每当我们看见吃得脑满肠肥,挺着大肚子的厂长,再 看看我们皮包骨头的身躯时,就会会心地一笑,那幅画不正是很 现实的佳作么。

转眼半年过去了,我总以为,今生今世,恐再难见到蓝君了。 有一天,我正在吃力地踩动布满铁钉的圆滚筒,撕着浸过的麻布, 忽然看见一个衣衫不整,手持木棍的人,边拾着碎木片,边注视 着我。我感到奇怪,但起初没理会。后见他逐渐靠近我,用眼睛 向我暗示,我便很注意地打量他。哦!原来是蓝君。一别半年,原来名叫"大只佬"的他竟苍白、瘦削到如此地步,我相信自己也是这样一付模样。只幸他眼力强,在众多褴褛之辈中认出了我。

随后,他向车间外靠近病房的围墙边走去。我便借口小解,跟了过去,由于附近还有许多人来回走动和小解,我们便装做不相识,谈话时面不相向,好似自言自语地用闽南方言交谈。从断断续续的双关语中,我知道如下情况:

一、我和他是同一天,同一地点被逮捕的,只是时间有先后而已,分两部大卡车押送;二、他关在东仓,尚有内人同仓相伴,比我强些;三、他父亲列入"黑五类"管制行列,在农村放牛,受尽欺凌,不久前已去世。弟弟又失踪了;四、我们说:"只有出去,才是办法,"暗示要逃走;五、他现在油料车间做苦工。

他说本来他已是调山西省去开煤矿了(即定期向内陆输送廉价劳动力并将危险分子押到内地集中营加强管制),到了大埠,由于血压过高,又自称有严重心脏病,才幸免入选。因早听说那里设备差,见不到天日,经常塌方,大批地死人。

第二次,我到药室取药时又见到他。坐在长靠椅上候诊时,他告诉我他曾调去仁水农场劳改,后因怀疑他与某逃跑集团有牵连,便送他们回监狱。因他们平日谈话中介绍过我的情况,揭发者也已提供了线索,差点把我涉及入内,幸亏他们抵死不认,才没我的事。事实上,我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第三次在旧戏台上见到他,谈了些相互勉励的话和上诉问题。 他旁边坐有一人,故不便多谈。

有一次开大会,一位姓张的干事说:"叶少华还准备上诉,我们可以加你几年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在恐吓我,阻拦我越级投诉。他们也可以说你"不认罪服法"、"反改造"、"表现不好"等等,而随便把你拉来"斗争"、加刑。他们是最基层的土皇帝,

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况且,判你的人是绝对不肯,也不会承认错 判的。现又在其直接管制之下,与虎谋皮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虽然不会承认他们的法律、政治和判决,但亦深知同他们是无理可讲的。除了等待时机一走了之,别无他策。所谓"笼鸡有食锅水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也。同时,我也知道,那天陪着蓝君的家伙,是个卑鄙的告密者。因谈论上诉时,只有我们三人在场。

监狱众生相

看守所莨莠混杂,人员几乎来自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上至 留洋博士,下至流氓小偷,样样齐全。 基本上分为反革命犯和刑 事犯两类。前者又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种,属"敌我矛 盾"或"对抗性矛盾"的人。

历史反革命指日满汉奸、军医、国民党军官、警、特人员、 士兵、保、甲长等。现行反革命又叫新生反革命,包括一切对社 会主义不满,或逃跑海外的个人与集团,多为年青的学生、干部。

刑事犯,属人民内部矛盾或非对抗性矛盾。如:强奸、杀人、 贪污、抢劫、盗窃、车祸、通奸等。

为了加强监督,分化瓦解,干部强令执行"三人联保制度",三至五人编成一组,出入劳动、上厕所、回仓等,都必须一齐行动,不得擅自脱离,严禁个人单独行动,否则抓到以企图逃跑罪论处。

而这些人之间又必须是互相意见不合,或有宿怨的人,好让 大家成为一盘散沙,互相监视举报,而不会串通包庇。一人出事, 全组连坐有罪。

于是,如果一个人突然"肚里闹革命"或忍无可忍一定要放

之际,联保组的人必须立即停下工作,鱼贯相随而去,到厕所后,卫兵似的散在旁边等待,然后又鱼贯相随回来。

有许多是带着脚镣,强迫劳动的,这些人来回走动时,便发 出叮铃当啷声。很多人的脚趾磨得皮破血流,化脓生蛆,虽然步 履维艰,却仍要做沉重的苦役。

逃跑、不满、对抗的犯人被称为反改造分子,他们是打入二十层地狱,比我们还苦一层的人,住黑房,做重工,随时挨骂挨打,备受欺凌。一些人,为了做小组长,积极分子,就喜欢找这些弱者的事,专横暴戾,随意动口动手,欺压他们。此所谓监头狱霸者是也。

我们小组的梁某(因强奸幼女,判死缓两年,后改无期徒刑)和一些马屁者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我实在忍无可忍,在一次半年评比会上,借提意见的机会,我巧妙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应用他们的原则、法律、劳改条例、"人道主义"等,指责梁某等人欺压病残弱者,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违反政策,破坏条例。并指责他们在建造独立小王国的"反改造集团",是典型的"监头狱霸"。

这一招果然有效。干部抓不到我话中的毛病,反使梁某威信大跌,再不敢胡作非为了。并暗中叫一个中间人王某(原轮机长,因涉嫌偷渡去香港,监禁调查,后无罪释放)来与我言和。我不属争地盘的帮派,我的原则是不应为虎作伥,欺压同胞。这些人妻离子散,生死未卜,为什么还要加重他们的痛苦呢?他们收敛了,也就算了。

我们的看守所长很残暴,而且心理有点变态。他进来巡查时, 手上总是拿着一根藤条和一串锁匙,随心所欲地左右开弓打人。 并非谁犯了什么监规监纪才挨打,而是无缘无故地乱打。他以打 人为乐,属于虐待狂。有些人,在"放风"时间,出来倒便桶, 晒几分钟太阳,他也上去胡抽一顿藤条。把新犯人打得莫明其妙。 有些人上厕所大便,他走进去打人家,还不准你穿裤子逃避,要 光着屁股蹲着任他打。打完之后,他最喜欢用藤条,挑些粪便, 涂在被打者的头发上、脸上或身上。只有当他满足地嘿嘿笑了, 才意味着事情告一段落。

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大家虽然又气又恨,但也敢怒而不敢言,无奈他何。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也。但终有一天,他竟也"上得山多,遇到虎豹",碰到一个克星。

有一个某部团长,因对现实不满,与手下一个亲信营长携带一挺轻机枪,两支短枪和一批手榴弹,准备乘摩托快艇出走,由南越转台湾,投奔外国。不幸下艇时被发现,而失手被擒。他在看守所内眼见耳闻那所长的作为,很是气愤。有一天,他估计时候差不多,端了一口盅开水站在风门口等着。不久,这所长像往常一样,左匙右藤地哼着小调,走了进来。待走近时,那团长隔着风门说:"所长,你过来一下,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讲!"那所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近来了。冷不防一盅滚烫的开水,泼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痛楚、惊慌和愤怒令他哇哇大叫,对赶来的看守兵说:"好大的狗胆!是谁?给我拉出来,狠狠地揍一顿!"那位团长竖起大姆指说:"是你祖宗我,怎么样?!"那看守兵告诉他,是那团长。他也自知碰到硬骨头,啃不下去,只好悻悻而走。不过口里还在咕噜着:"你给我小心点!"那团长还不罢休,臭骂他一顿:"你这臭小子,算老几?老子拿七斤半(步枪)时,你还在玩泥沙,神气什么?"

因这些看守兵,多是那团长的部下,对他有点照顾,时时递 香烟给他抽。那所长也听闻过他的大名,不敢奈何他。这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催命匙声"了。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一 下子传遍全看守所。这大概叫做"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用恶人磨"吧。

由于物资奇缺, 饥寒交迫, 人多手杂, 所以盗窃成风, 让人防不胜防。连以前那些文弱书生、斯文教师、敦厚老农、乃至"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团干部, 来到这里也变得身手"敏捷"起来。

成为盗窃目标的东西很多,连碗里的饭也要小心看好。刚分完饭在地上,转过脸去取筷子回来,那份饭已不翼而飞了。时常可以听到"新犯人"急得流着泪在诉说,寻找自己的那份救命粮: "我的饭呢?谁拿去了?!"大庭广众之下,亦无从追究。老练的人,端了饭在手,才去做第二件事。

由于分饭发现作弊,便发明了一些"绝对公平"的分饭方法: 一、固定秤——用一根木(或竹)杆,正中系一小绳作秤纽。 破碟弄三个孔,穿上小绳,就是秤盘。尾部随便绑一块烂砖头, 就是秤砣了。但此砣是不能也不必要移动的,反正每次各人都差 不多了;二、背脸叫号——饭分完,一人指着一份饭,问背脸者: "谁的?"若回答说: "李四。"李四便端那份。

不但囚犯之间、囚犯和干部之间这样冷酷无情,干部、军队内部倾轧、斗争也很厉害。前面提到那个酷似苏联兵的大胡子是文山人,由于饭量大,还常和劳改闲谈,不久就被赶回农村去了。干部也一样,哪个宁左勿右,六亲不认,则哪个官运亨通,反之则永远得不到信任,动辄滚蛋回老家。

高墙挡不住的饥饿

我刚入监狱,社会上的大饥荒还没有结束。外面物资奇缺, 监狱中更是枯如戈壁之水。大门旁虽也设一小供应站,但货架上 了了无几的样品,都是象征性的、不出售的东西。 每星期各车间买一次东西,由各小组长登记,内容也只限于信封纸、邮票、肥皂之类,吃的东西没有,也免谈。偶然来一点鸭什罐头、出口退回来的次品椰子酱等,也要具备四种条件才能买得到:一、重病号;二、医生证明;三、干部批准;四、簿上有钱。有次到了十多个中型搪瓷碗,要干部批准才能购买。

干部经常教导大家,要刻苦改造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不要谈吃谈喝。据说那是好吃懒做的表现,是反动的思想意识,是 犯罪的根源,对自己改造不利,吃多了吃好了会变"修正主义"等。

当然,那些"教诲"是针对我们而言的,他们自己是懂得保命和吃喝享受的。虽是贫困之年,作为特权阶层,他们也能通过私人关系,施展神通,从"后门"弄到很多东西。吃的时候,也不担心会不会"变修"、"变成资产阶级"。一言以蔽之:他们吃好与我们做苦行僧都是应该的。故事中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知府大人"合理合法"的训示,大概也是这样冠冕堂皇的罢。

我们尽管每天被迫拚命地劳动,给社会主义创造了无穷财富,但得到的报酬却是很可怜的:印书车间每人每月八角至二元伍角不等。看守所则根本没有"零用金",寄封信也要打报告批准,才能得到一枚八分邮票。这些钱,是到不了手的。由大家评定,干部批准后,通知小组长登记在各人的存款折内,买了东西再扣除。家里有寄或送钱来的,则根据供应站干事发的传票通知,由组长入帐。由于传票通知单是由组长去上帐,本人并不知道,于是发生一起一个被"减刑半年提前释放"的积极分子李兹兴,趁机贪污他人近百元人民币的事情。

那时候,社会上也正在闹饥荒,像我们这些处在人间地狱的人,真是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所内犯人,每人每天只给二两米

过日子,煮粥吃也分不到一小碗,有时连水也不给人喝,所以饿死很多人。

病房旁边,有几个大水池,里面青绿一片,似是生满藓苔一般,但据说是远方取经学做的"珠宝池"。那青绿色的东西叫"小球藻",富含蛋白质,俗称"水中猪肉",营养非常丰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新时代的新发现等等。

一些水肿病人,身体膨胀到如大肚橡皮人的危险程度时,经过医生证明,干部批准后,才能额外地得到一点照顾,不定期地在医务室,拿到几小包"水中猪肉"干粉。这些青绿色的粉末,我未有福气品尝,听说味如青草、干涩难咽。服食者每以拌饭菜,或如食苦药粉般以水送服,方能吞下。我观其效果,见他们吃下去,水肿者依然膨胀,赴黄泉者仍旧上路。看来"成效"过分夸张。

起先,每逢见到厕所边放着几具满身浮肿、肚皮鼓起、头大如斗、橡皮船般的尸体时,还觉得可怕,渐渐地天天看到,而且越来越多,有时睡觉醒来,旁边的难友已不辞而别,也就慢慢习惯了,麻木了,无所谓了。

由于监狱和看守所死人太多,厂里的木工车间只好停工改做棺材。二十多个木匠都去钉棺材,还是供不应求。而所谓"棺材",只是用参差不齐的小木条,稀稀疏疏地胡乱钉成长木条箱而已。

由于全木工车间只生产棺材,我们就干脆叫它"棺材车间" 了。

无休无止的学习与改造

白天,要做超体力的沉重劳动,晚上还要洗脑学习两小时。 每组十多人,围成一堆,由组长作开场白,读报纸,学习文件, 讨论某某长的报告等。国内国际有了大事,也定出框框叫我们澄清观点。如: 三年自然灾害、反美蒋爱国运动、四清运动、双十条文件、中印边界事件,到最后的"中苏分歧——十评"等,都只准讲好的,不准讲坏的。而且硬性规定要表态,至少要发言一次。有人将发言记录下来,不发言的以抗拒学习论处,讲错了的按有意识攻击、放毒论处。

有个当过维持会长的老中医,年过七旬,每次学习发言便说: "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两句话他已说了五年了。不过看来他 最稳当、最聪明,不怕被人揪小辫子,也不暴露观点。

我们小组有三个老头,破帽遮颜、形如乞丐,每逢学习就龟缩于暗隅,一言不发,讷讷声言自己是文盲。直到胡股长大发雷霆后,我们才知道他们三个都是留洋学生,一个留学德国、一个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一个留学美国牛津大学,两个硕士,一个博士。

在这里不参加学习,是抗拒改造的表现,可绳之以法。除生病获得准许及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准缺席。制衣车间有位女孩子,叫她参加学习时,只说了一句:"我不参加学习,你们加刑吧。"结果就加了她半年刑期。

每晚学习前,要进行小组评比。由组长顺序提名,大家根据 其人一日内的表现提出意见,比如发言是否积极,劳动工效与否, 有无事故,有无不满言论,有无违犯监规纪律,有无逃跑思想, 有无不认罪服法的表现等等。

评比分上游、中游、下游三等。每月有月评,形式差不多,只是范围更大些。每季又有季评及运动,气氛严格得多。半年来一次评审及运动,如"三查"、"四查"、"五查"运动。内容每次不同,由干部规定。诸如:查认罪服法,查改造表现,查监规纪律等。

年终评审及运动是一年中的高潮。要人人交心,个人检举揭发。气氛非常紧张,人人自危。有一些人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表扬——如甲等奖、乙等奖、丙等奖和表扬。甲乙丙三种奖甚至有二至五元的奖金。有一些人则受到记小过,记大过和警告处分。有一些人会受到斗争、批判、殴打、带手铐脚镣,关禁闭等。有一些人则受到加刑处分。个别情况下,也有提前释放、保释和保外就医的。

其实,每次学习,都是表演说假话的时候。言者既朦朦,听者也昏昏,到头来说者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听者也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印象。只是避积极分子和干部的耳目,做做样子而已,实际上人云亦云废话一堆。不过有一点是要注意的——莫让人抓住"鸡脚"。如果干部不在场,值班员随和一点,气氛会比较松驰。这时候,破帽遮颜者,借暗影梦周公者便陆续出现。有的卷烟,也有的小声闲谈文水鸡、加宁鸭、东村鱼……,有的则一言不发地"低头思故乡"。

由于学习漫长而乏味,很多人与厕所结下不解之缘,频频光顾。一来一去,差不多可以消耗掉半个小时。上厕所,一定要和三人联保小组的人同去,不能窝组、不能单独,去前也不能问:"某某某去厕所不?"避免被怀疑为相约逃跑。最好问:"有人去厕所吗?"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常常是"有求必应",总一大堆人响应。

厕所虽臭,却是个消磨时光的好地方。这里各车间、各小组的新老人员云集,往往能听到许多外面的新闻、动态、厂内的新消息,特别是厨房明早是否磨粉煮"粉仔"、或煮"菜饭"等。无便意者也定蹲到双脚发麻,有如针刺方罢。很多暗中交易,秘密商谈,也是在这里拍板成交。当两个互不相干,似不相识的人蹲在一起,目不相视,偶或自言自语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互传了

很重要的消息了。有的人使用只有他们才懂的方言、暗语,有的 人用手势来表达意思。

所以,英语、黎族方言、苗族话、潮州话、打手势、使眼色等,是作为方言暗语而受到严厉禁止的。法定的使用语言是闽南话和国语,因为干部和车间技师中有讲土话(大埠话)的,所以,我常与他人讲土话,也不算触犯监纪。

在这座古老、黑暗、潮湿的监狱里,人已失去了一切尊严与价值。由于干部不断分化瓦解的工作,很多人变得失去了理性。常会因一些生活小事而积怨,甚至终日纠缠在明争暗斗中。干部们也最喜欢大家互相争吵,互相检举揭发,而不喜欢大家你好我好,称兄道弟,互相包庇,搞江湖义气。

一年四季都有运动,一次比一次升级,一次比一次恐怖。大凡要批斗、"加刑"某人,事先由干部搜集其言论、行为上的材料,然后召集车间积极分子开会,宣布其罪状,最后召开批判会。有先由小组,然后车间,再则大车间(联合二至三车间一齐),直到全厂或全看守所大会斗争的各种形式。

大会批斗多在中间的水泥球场举行。台前坐了一些干部,被斗者低头弯腰站在灯下,接受大家的批判与揭发。不准戴帽,以示低头认罪。发言者,会装出有杀父之仇的样子,夺妻之恨的表情来博得干部的青睐。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拳打脚踢;有的还会挤出一滴疑是口水的眼泪来,有的一面骂人家反动、混蛋,一面又骂自己也是坏东西;有的像泼妇骂街,骂一句,上前在人家光头上打一下,或摁得被斗争者跌倒在地上;有的自己说不出个名堂来,但为了表示自己靠拢政府,立场坚定,便也混迹其间,骂人家一句,或上前打人家一下,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

每次学习、运动,干部都会宣称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一贯 政策。学习中的发言内容,都由小组纪录下来。如果有人向干部

报告:某某人学习会上放毒,或小组长汇报时说哪个攻击,笔记本就是"原始纪录"的罪证了。一旦有蛛丝马迹,干部会动员在场者写检举材料,够条件者放到大会批斗,够资格者运动后"增加大米"——加刑。因为有了人证、物证,到时候不由你承认与否,照样可以写上"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的字样,延长刑期。

1962 年, 抓进来许多"现行反革命", 那时正值所谓反攻大陆期间, 很多热血青年, 纷纷组织各种反抗集团, 被杀掉的也不少。

在监狱中,一些饱经风霜的老油条,因吃亏多了,都变得精明老练起来,轻易不会暴露自己的真正观点,世界观是隐而又隐的。但一些刚投入劳改的新犯人,就容易被干部的花言巧语迷惑而上钩,随便谈出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而成了斗争、批判、加刑的对象。

有一个姓陈的文水县人,曾在国军某部"豹一师"任过职,像是开汽车的。捕入狱门的第一个晚上学习,就是"讨论美蒋的反攻大陆,你的想法怎样"这样一条危险的题目。尽管干部轻松地一再表示:政府不会处分说错话的人,我们还是三缄其口,默默相视。谁知他打破沉默争先发言,轻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期望——他说:"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看一定会爆发起来;二、美蒋反攻大陆时,一定会先占领沿海和海上诸岛;三、我们便有机会出狱了。"

事情的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作为"散播反动言论"、"幻想变天复辟"、"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放毒"等的反改造分子,被残酷批斗了一段时间,挨了不少拳脚。直到两年后上调到北方某砖瓦窑厂后,这笔遗帐还在清算,更加猛烈地遭受身心的摧残。经过长年的打击,他起先被砖瓦机压断了左手,

不久,得了胃癌而去世。由 1961 年我失去自由入狱,到 1964 年上调北方期间,较大的政治运动学习计有——"三年困难的认识"、62 年的"反攻大陆"、63 年的"中印边境事件"、"中苏分歧大论战"、"四清运动"(两个双十条),"东京湾事件"(美越北部湾舰战)等。

每次运动到来都搞得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都是狱中的一场大灾难;不知谁要挨斗挨整,不知谁会受到带镣上铐的惩罚,不知谁要被关禁闭住黑房,不知谁要"加米"加刑,也不知谁会身首异处。

奴工般的劳改生涯

劳改厂分为厂部和看守所两个机构。厂部有机械车间、材料 车间、印书车间、油料车间、翻沙车间、麻布车间、制衣车间等。

麻布车间的工作是把椰子外层与内壳剥离,椰子内壳再打破,取肉晒干榨油做肥皂。外层椰衣浸水数日,然后用大木锤打烂,放到一种类似"脱谷机"的钉辊上,撕成丝和绒两种,丝可作麻绳,绒供出口。

挖椰肉的工作是有利的:很多人偷食。当一些人戴着大草帽,低头闷干,一言不发之际,就是他们借草帽掩盖,大啖椰肉的时候。有些人频频报告上厕所,其实是到僻静处,处理袋中"剩余物资"去了。有位仁兄将两条长裤缝成夹层裤,里面塞满了碎椰肉,他老兄大概准备带回去储备过冬的。但因太多太满,行动不便,终于被人发觉,挨了一顿批斗。

此外,在郊区还有三水农场,男女各一中队,约百多人。供应全厂干部、家属、军队、劳改蔬菜和外卖。

厂部有正副书记,正副厂长多人,车间有主任、干事多人。

就业有正副队长、干事多名。看守监狱的是一个连队,由于怕日 久受劳改影响,所以经常调动。他们只管"看守",不插手里面"管 教"。

我们每周劳动六天半,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只有星期天下午"搞卫生"才可以洗洗衣服。但洗仓、扫地、擦机器等已用去了几个钟头,能够休息一个小时就算是好的了。

整个监狱、看守所,劳改约八百至一千人,看守所流动性较大:杀掉的、病死的、打死的、无罪释放的,与各次"运动"新抓来的、调来的,互相平衡、时增时减。

在制衣车间女监仓南面,有一片场地,是看守所麻布车间"大槌组"劳动的地方。顾名思义,"大槌组"是使用大槌的工种: 一个几十斤重,两头平的杂木槌就是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

他们日常的任务,是把椰子外壳浸透后放在木头垫上,用大木槌打出浆渣,剩下的饼状椰丝,拿去麻布车间抽丝抽绒。这是一种笨重而劳累的工作,也是干部惩罚"反改造分子"的地方。谁要是不服管教,便会受到威胁说:"把你放去打大槌!"该组主要成员,是一些重新犯罪的人。很多人带着一至三副脚镣在打大槌,所以,劳动起来,除了重槌打击声,浆渣飞溅声外,还有脚镣叮当声。大槌击处,血红色的浆渣,射得人满头满面,乍一看犹如倍受宰割的"血人儿"。天气酷热,肚子又饿,大锤又重,任务又大,这些人脚上被铁镣磨得鲜血淋漓。

还有一队外出劳动的打石队,回来都是蓬头垢面,形如"粉 人儿"。打石的工作也是最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

南方人特别爱"冲凉",但最要命的是,全厂全看守所八百多人,只有一口古井用水。那是一口辘辘老古井,由于地层变化,四壁扭曲成S形,摇摇欲坠,甚是骇人。有一回被迫下井底捡桶,望着一圈天和如兽四壁,我以为再也爬不上去了。

大家每天干得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很多人的背上结晶析出了氯化纳,白白的一片盐花凝结在衣服上。吊水时,要七八个或十多个人,拉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绳来回走动,吊起一桶水来分配。待水的人群,都在焦急、嘈杂地争夺着"打水权"。偏偏井爷年迈不作美,每天慢吞吞地渗出一公尺多深的水来,很快就被打先锋的人掏干见底。后面的人,就是轮到了,也是无水的。洗不到澡,酸臭难闻且不说,身痒难耐,真如受刑般难受。炎夏的海岛,又是狱内,真是滴水贵如油。

制衣车间及种菜组的一些女孩子,有时部分参加打石队劳动,每天回来满面粉污,也往往顾不了文雅,加入到夺水战中去,且声势不让须眉。有几个小女孩,开口必带国骂,令人让其三分。俗话说:"好佬怕烂佬,烂佬怕泼妇",真是一点不假。不过,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大家明白,她们比我们更需要水,所以,尽管争争吵吵,男人们也往往会把水倒进她们的盆中去的。

我的工作在印书车间。狭窄的机房内,安装着三部六刀平台印刷机和五部圆盘机。开动起来,叮叮当当,劈劈啪啪,振耳欲聋。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耳膜至今仍嗡嗡作响。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加上严重缺乏营养,个个脸浮脚肿,有个煮胶的老船长陈某,全身肿得像个橡皮人。我全身也出现浮肿,脚踝处用手指一压,便呈一圆窝,好久不能复原。

印东西的时候,得全神贯注,如果碰到胶轮带脱字粒或线片、字迹模糊不清、换错字、弄错位置、数量不符、墨色不对、"针插"(前针右插是印件的规定距离)不准、不及时印完等,都将是"企图破坏生产"的大罪。

我第一次上机,是印某单位带衔头的信封纸,不知道"针插"要求的严格,一口气赶印完。结果因字体与纸边不平行,给车间主任骂得狗血淋头。他质问我有何企图?是否故意这样破坏?幸

好我是新手,未沾上过大麻烦,只在当日评比中,受小组人提了 意见,自己作了检讨了事。

有几次,我印坏了一些东西,老实地报告车间主任知道,结果一次比一次骂得狠。后来,一些熟知内情的好心人便暗示我: "你悄悄地干活,打枪的不要。"我看见他们也常印错东西,没有报告,设法毁掉后再重印。

真是"人老越精,鬼老越灵",从自行处理以来,乐得耳根清静。废次品我可以烧掉或撕碎作洗墨纸用,油墨旧了不好用,可以去掉。关键在于平日多积存些各种纸张备用。割纸者与我关系还好,遇到麻烦时,他常暗中帮助我。其实他也打了"埋伏",存积了大量纸张备用,免得割错了纸束手无策。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这样有趣:不知道撕掉了多少次品,反而因长期"未出事故差错",得到好评。

那部古老的日本印刷机,大概是日军占领沿海时留下的。自 从出了问题后,报社、车间干部罗技师、张技师等,修了几年, 毫无起色。印书车间有个职工张某,父亲是个有才华有正义感的 老教授。不知因何罪捉来监狱劳改。另一个开印刷机的人,曾是 某军的团长,与张教授是好友。他俩都判重刑。一日,那架日式 印刷机,忽然不规则地跳动,原因不明,但已不能印刷了。由于 历史上的问题和平日反改造的表现,加上这次事故,干部便认定 他们是搞破坏的反革命集团。经过许多折磨后,把他们枪毙了。

那时,我已由看守所麻布车间调来印书车间,起初学检字,后学印"圆盘"(照镜)机。主要是印外来加工的信封、信纸、表格、包装纸、粮票、布票、棉花票等。后调开六刀平台机,主印报纸、布告、书藉、中学考试卷、迁移证等,且带了几个徒弟。一天中午,我没回仓睡午觉,要求修理那部平台机,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经过观察,我用两颗螺丝上在糟上,固定住平

台,不让它来回跳动,机器就能印书印报,甚至能印四色的帐薄 了。

大家很心服。但罗技师为了挽回他"权威"的面子,在车间内说:"这不是正规的修理方法,无人想得到的。"这使我联想起一个故事——古时一位花花太岁,曾从多名拳师,有一次抢民女时,被一打抱不平的青年,打得狼狈而逃。途中他向仆人诉说:"那小子根本不会正规的拳脚功夫,当我用右拳打他时,他应该用左手挡开,谁知他飞起一脚,踢在我小肚上,他根本不懂功夫,所以才……。"不过我心中也很欣赏他那句"无人想得到的"话。

后来,在半年评比上,还因技术革新给了我一次表扬。有时, 我在想:修好了,表扬一次;弄坏了,人命两条。如果当时我在 场,也许真能用两粒螺丝,换回两条正直有为的生命。

由于劳改厂安全设备差,只追求产量,不顾人身安全,所以 常常出事故。

印书车间有个被判无期徒刑、印了上十年机的老手——吴某,右手给圆盘机的印板夹成残废。一个青年给没装保险罩的齿轮,"咬"掉了四个手指。另一文水小青年林某,摸错了无外罩的电闸,电得他哇哇大叫,其他人关掉总闸后,他的手才得脱出。有一次我换墨色时,平台滑动,将我左手卷进滚筒底下,我大声呼救,他人赶来弄脱后,中指端已肉掀骨露,血流如注了。

还有,看守所有个很会唱闽戏的小孩,用刀砍椰子外壳时,整齐地砍掉了四只手指,成了终生残废。外出劳动的打石队,时时会被石块打得头破血流,跛手跛脚。有的则死在爆炸声中。木工车间有个老木工,给没装保险罩的圆齿锯盘锯掉了三个手指。他还算镇定,看到三个断指仍在地上抽动时,赶紧拾回接到断指根上,跑到医务室找人消毒包扎好。手指是接上去了,但已失去手指的功能,不能伸合,虚有其形,但总算十指齐全吧。

油料车间,有座装"皂浆"的高塔,足有三层楼高。那高温煮过的皂浆,放出来凝固后,就是"树林牌"洗衣肥皂了。一个电工在塔顶部接线,不慎被380 伏的高压电粘住了左姆指,他情知必死,便冒死往下跳,重量使他挣断了烧焦的左姆指,高度使他跌断了腰骨和左脚,却奇迹般地保全了生命。说来也奇:地上左边是翻腾着的熟甘油池,右边是灼滚的肥皂水池,两池中间只留有半公尺宽的泥路,无论偏左或偏右,都会有煮成熟肉之险,但他"命大福大造化大",正好掉在这50公分救命的泥路上。

机械车间,有一个青年电工,上围墙接电线时,给头顶上空的超高压电线排,硬吸了上去,烧得焦黑烂臭。

运动多,被抓的人就多。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源源涌进,供其制造财富,古老的监狱也人满为患。于是他们便下令劳改、劳改技术员、劳改工程师,在围墙外、铁丝网内,就地扩建了一座大型新机械车间。

投产开工不久,大梁和楼面出现裂痕,有人报告干部,但未被重视,干部命令继续生产。后来裂痕有加大现象。又有人去报告,却被干部斥为"扰乱人心,再胡说八道,小心加你的刑!"

最后,大梁折断,楼面开始崩垮,砸伤砸死了一些人,剩下的夺门跳窗,争相逃命。正当他们庆幸死里逃生之际,干部也闻讯赶来了。车间主任、书记等首先关心和想到的是国家财产——里面的的机器未搬出来。于是他们大发雷霆,骂大家"贪生怕死,为什么丢下人民的财产不管?"并连推带骂地命令:"全部给我滚进去!把机器搬出来!"全部劳改、"就业"就滚进去了,但几十个干部却只站在外面指手画脚,一个都未曾进去显示一下抢救人民财产的精神。

谁都知道,笨重的车床、刨床之类的地脚螺丝是又大又牢的, 机床又重,不是能够轻易移动和搬运的。当他们进去还未找到工 具动手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厂房全部崩塌下来,两百多条 生命,就像意大利庞贝城毁灭时一样消失了。

这次大难不死的只有三个青年,两个钻进机床底下打断了脚, 另一个死命贴近窗口,才免被掉下的水泥块打烂头,可手脚已断, 不能行走。三个人都成了终生残废。

事故发生后,干部们严密封锁消息,不准任何人谈论。只悄悄地叫部队挖掘尸体,将不成型的肢体用大卡车拉走。

有一个姓陈的麻子,得到了点实情,便告知别人,还说: "那两百多人是被干部强迫进去才压死的。"后来他就被干部列为"攻击政府干部"、"恶毒攻击劳改政策"、"对现实不满"等罪状的"反改造分子",被斗得头破血流。

狱中见闻录

在监狱看守所里,关着一个姓邢的,是前文水县公安局局长。 在任职期间,他凶残暴戾,草菅人命。他管辖的县看守所,犯人 每人每天只得到二两大米,饿死无数,且动则打骂。后由于饿死 人太多,民愤沸然,才收入这座监狱,象征性地判了十五年徒刑。 但他来到后,一直受到特殊优待,安排他做"看班"、管管锁匙, 不用参加体力劳动,每日看书报,睡觉,或学习会上高谈阔论几 句,悠哉游哉地过日子。

和他一起进来的另一个人判的也是十五年,叫陈伟雄,是文水县某公社的大队书记,外号叫"黑脸",也是个凶暴的人,平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手里经常拿着驳壳枪巡查,一旦见到有人因饥饿所迫到公社田里摘点小菜,挖颗红薯之类,他拔枪就打,随便打死不少人。这些死者还要被扣上"偷窃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挖社会主义墙脚"等罪名。

看守所有一个小孩,顶多十五岁。据车间知情者说:有一次饿得实在受不了,便冒险爬上一颗木瓜树,想摘个木瓜回家与老母充饥。不料碰到了巡夜的书记,不由分说,拔枪就扫。幸亏那小孩命大,两枪未中,竟然死里逃生。后因"盗窃"罪被判刑七年。这两位局长、书记都因人命案判十五年劳改,但只过了一年半左右,便以有认罪悔改等良好表现提前释放回家了。而那个偷瓜未成的小孩,却要继续改造下去,遭受漫长而且死生未卜的折磨。

to the explain only a configuration of the

油料车间有一个叫叶某的中学教师,因婚姻问题,被判劳改七年。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里没有春天,这里没有阳光,有的是酷刑苦役,和那镣铐黑房,饥寒交迫的苦人儿啊,盼望着天亮……"

因这首诗歌,他被残酷地批斗——围攻、殴打、污辱了十几个晚上,带上脚镣手铐,在黑房关了几个月。由于长期迫害和营养严重不良,他得了第三期的肺病,先是咳嗽不已,后来吐血不止。直到大量吐血,抬入病室已奄奄一息之时,干部才"人道主义"地恩准他保外就医。那天,宣布他回家时,高兴得他跌跌撞撞地快步走出大铁门外,谁知才踏出大门,就大量吐血,一命呜呼。他的未婚妻从香港回来看他,未来岳父接到的是一具饱受折磨、死不瞑目的温尸。有一位"外劳"(出外劳动)回来的难友说:"早不放,迟不放,快死了才放。政府又可省去一笔棺材钱了。"

厂内有两个组织抗暴集团的反革命头子被判死缓,带着脚镣强迫劳动。他们为了逃生,便相约趁无人之机,钻进大卡车底梁上藏身。借汽车带他们越过三层大门。不幸的是,出大铁门后,给检查的哨兵发现,捉了回来,以"不堪改造"为名,立即枪毙了。

有一个叫李英文的人,名字很斯文,人也清瘦。原是军中班长,转业回乡后无法生活,便沦为盗贼,慢慢变得手艺高强起来,且擅于逃跑。关押在监狱与看守所期间,先后逃跑不下二十次,总能跑出去,只是重新作案才被捉回来,但一有机会他又逃走,没有办法"罩住他"。他是个典型的批判斗争对象,时时少不了他出场亮相,也挨尽皮肉之苦。他逃跑爬墙的办法也很特殊:只要两根长铁钉就成了。用这些五寸钉,选一阴暗墙角,脚朝上,头朝下,倒立地插钉在围墙小孔内,匍匐而上,翻墙后则头上脚下地慢慢插钉爬下地。他不会"飞墙",却有"走壁"之技。后来,他假装积极了一段时间,干部以为他有了悔改之意。当他要求改换一下环境,利于改造时,干部便把他调到三水农场劳改。结果,他又一次逃跑,被哨兵开枪打死了。

制衣车间有几十个女劳改,负责种菜、缝制衣服、洗衫等工作。种菜组有一女孩,约二十多岁,是湖南人,大概是下放到海岛某县的,人有几分姿色,脸上显得皮白肉红,但颧骨较高,否则便是一位可人儿了。她这一点姿色牵成了一个三角恋爱阵,致使两个男人火拼,先后归西。

这两个人,一个是基干民兵,另一个是民兵队长。日子久了,自然醋意眼里起,妒火心中生。为独占鰲头,那基干民兵约民兵队长上半山潭钓鱼,趁其不意,开枪把那队长打死。数天后,牧童发现浮尸,报了案。但当时却怀疑是被国民党特务杀掉的。经过长期调查,才有人指证:那天见他和那队长一起去钓鱼的。捉来软硬兼施后,他承认了一切,被判死缓两年,带着脚镣强迫劳动。女的亦判劳改。

本来,杀死一个民兵队长,又是党员,死是无疑的了。但干部却在哄他说:"只要积极改造,将功赎罪,可改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让他心存幻想,一不逃跑自杀,二可创造财富。他带

着一副重镣开椰子外壳,朝夕与外出浇菜经过的未婚人相见,不知各自内心是何感想。平常一般人最多一天才开三十个至五十个。他创造了一百多个的纪录,晚上得到表扬。于是他拚老命地创造了一天开五百多个椰子的最高纪录。开椰子壳,是用一支类似梭镖头的东西,固定在一块木板上作开壳工具,很危险,一不小心会割断手指。两年熬过去了,不知创造了多少财富,但时间一到,就拉回原藉批斗,"按时"杀掉了。

制衣车间有个姓冯的胖嫂子,原是某军队营长之妻。因老夫少妻,夫又长期外出不归,日久便红杏出墙,与部下一年青排长搭上关系,为求"长厮守床中央,不愿作野鸳鸯",便合谋待其夫由温州开会归家时,由排长暗伏其必经之小桥旁,将其夫枪杀。初时,又宣扬是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后见他俩来往频密,才生疑意,把女的弄来盘问。起先她死活不承认,最后用了一招心理恐吓战术:枪兵横列两行,军事法庭庭长,警堂木一拍:"如不承认,给我拉出去枪毙!"女的吓得面无血色,和盘托出了实情。但那排长至死矢口否认,由于已有了人证物证,故仍免不了死罪。这件事,在内部文件上通报过。消息来源是一个关进来的某军连长,他告诉我们,他阅读过此文件。

还有几位胖嫂子,都是"通奸杀夫"罪,被判无期徒刑劳改的。平日相遇,总有一股寒意从身上冒起,有点害怕。又想到"如何下得手去杀亲夫?"和"以后谁还敢娶她?"等问题。

有一个年过四十五岁,右手畸形的老嫂子,竟是左手持菜刀, 杀害病夫的"通奸杀夫"者。

有一位才十三岁的小姑娘,因顽皮被叔父责骂了几句,便怀恨在心。一日趁其叔父坐着抽竹筒烟时,用锄头从背后将其叔父 打死。因不够年龄判刑,便一直监押劳动,待满十八岁再处理。

车间有位检字的大学生王应鹏,原是大埠中华大学的学生。

父亲是某县县长,已经被枪毙,母亲被游击队轮奸致死。他因不满言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判刑十三年,投入监狱劳改。

有一次,他说: "从这里出大门,有三种人——走着出去的 (释放); 抬着出去的 (病死); 拉着出去的 (枪毙)。"这本是实事求是的一种概括,但却被列为恶毒攻击劳改政策、 对现实不满等严重反革命言论,被狠狠地批斗了上十天。

第四篇 北国风光

突然内调

1964 年 8 月,美越在北部湾发生舰战, 爆发了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当局估计美蒋会挥军北进,攻占海岛及沿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会打起来,形势非常紧张。

十月的一天,记得是周末上午,我正在车间赶印一批"记帐明细表格"。忽然,管理监仓兼传递的"看班",来车间叫我和机房的王应鹏、做校对的上海"眼镜佬",三人一起到饭堂集合。到了台凳用破旧杂木拼凑成的饭堂后,见人数还不少,还有狱内劳改医生柳某在内。究竟做什么呢?柳医生平日可以外出给干部、家属看病,接触面广,消息灵通。于是我就问他:"柳医生,你看什么事?"他笑了笑说:"明天礼拜,大概叫我们出大门口打扫卫生吧。"

人越来越多,有"落后分子"、"积极分子"、"中间分子"、 大组长等,还有几个"看班"在旁站着。不久,来了几个干部, 叫大家排好队,喊名字按序列到岗楼下照相。在狱中被叫去照相, 本是常有的事,但奇怪的是:往日各照各的,今天与我坐同一条 板凳一起照相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陌生人,且各人颈上要挂个写有 姓名的小黑板。照完相后,回到饭堂集中。

后来,我入狱时替我松绑、检查,大会上常骂我是反改造分子的瘦个子木工车间主任宣布: "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准离开这里!不准与各车间犯人接触!"

他走后不久,来了个"看班"代传指示: "各人回车间和监 仓清理自己的行李,搬到东仓去。但不准与他人接触。" 哦!明白了,一定是"内调大陆"了。

能够离开这座榨干人血汗的监狱,换换空气和环境,有一种减压的心理。但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条条马鞭臭汗酸"时,说不出是惆怅还是凄凉。展望茫茫前景和任人摆布、宰割的命运,不禁悲愤交加。

我借故回车间拿东西并到医务室取药,向相识者告别,特别是病危中帮助、挽救过我的台湾人陈医生。先是他看见我,向我摆摆手寄意"拜拜",后又过来小声祝我一路顺风。我本身无长物,但也尽量留下一些东西,给那些刚来的,比我还困难的难友。油料车间有几位青年人,却比我大方,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鞋子外,全部财产分送给别人,连棉被也不要。

下午时分,全部"上调"人员,集中在印书车间门口的小场地上,按车间排成行等待。印书、制衣两个车间的人,都不时地把头伸出窗口看我们,并窃窃私语。旁边站满了所有的"看班"。不久,来了一批干部,除了厂长、书记、车间主任、本厂干部外,还有一大群肚满肠肥、面带红云的外来干部,听口音像是讲的普通话,但非常难听,忽高忽低,辨不出是何方神圣,估计是派来领人的。

先是每人发一条毛巾和一只搪瓷碗。然后在外来干部监督下,由吴厂长向大家逐一宣布,看各人存款、保管着的贵重物资(金笔、戒指、手表、外币等)是否相符,有无出入。我无外援,袋空如洗,当时只有八分钱在帐本上。接着,由外来干部逐一看相。那情形,使我联想起在小乡墟读中学时,猪牛交易场上,买者卖者和"牛中人"看牛时的神态。外省干部们挑出了几个过老、过弱者不要后,这场交易则算合拍成交了。这意味着我们属于新奴隶主了。

晚饭后,我们便一直锁在东仓最后一间仓室内。我心情焦虑

不安,万分感触。虽无 "再折长亭柳"那种"别离人对奈何天,离堪怨,别堪怜,离心牵柳线,别泪洒花前"的情调,却也如"王昭君"曲中那样感到前路茫茫了。我极力闭目养神,强迫自己稍作休息,以对付后半夜艰辛的旅程,但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越想心静如止水,越是百感交集,正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지 않아보았다 사이 나는 사이 가장 생각한 사이 나는 사이 가지 않아보았다.

他也觉得言之有理,但抚摸着本本厚书,唉声叹气曰: "唉! 这些书如今有钱也买不到的了呀!"爱不忍释。最后七挑八拣,终 于选出了两本薄薄的高中几何、三角书来。看他那难分难舍的眼 神,我只好沉默了。

约近十二点时,我模模糊糊地睡了一会,但正要步入梦乡之时,忽然被"铛铛"锁声和"看班"大声吆喝声惊醒。随着"嘎吱"一声刺耳的噪音,生着厚锈的铁门被打开了,射进一束幽暗的电灯光来。我们便像一群易主的牛羊,被赶进中间的走廊去。

东仓出口处,已有一大群干部、枪兵守在闸门外。他们拿着本子,叫一个名字,里面的"看班"就把答应者送出闸门外。按组排好队,再到中央广场集中。

在黑暗里,首先我听到一些外县的语言,随着瞳孔放大,我 发现很多人的服装与我们有异,整个广场排得满满的,人数约有 100 两千多人。经过打听,才知道他们来自本地的光大农场、仁水农场等劳改场。当时准备一旦大战爆发,便放弃沿海,转守大陆。 所以撤消了当地的劳改场所。当然,也不能留下这些有"恋天复辟"思想和深仇大恨的危险分子去作反抗的力量,于是和我们一样,要上调内地集中营重点监管。

看来,农场来的人比监狱的人胆子大得多,什么调皮话、讽刺话、反话、暗语都敢公开讲。由于他们懂得"合法斗争",语言又说得圆滑,管理人员简直拿他们没办法。靠近西仓墙边,放有一排便桶,如厕者照例要喊"报告"才能离队前去。很多人就故意起哄和凑热闹,有也报告,无也报告。

有的明明到邻队与老乡攀谈,也大声地喊:"报告报告!我要放尿!"

有的则喊:"报告报告!尿已放了!"

有的结巴地叫: "报——告——干部拉尿。"

有的来回走动,口中不停地"报告"。

- 一时间,这捣乱交响曲奏得热闹非凡。在岗楼下,枪口前,这样骚扰一下,果然也大快人心。一些老成持重者,虽不想采用年青人的方式,但也悄悄地说:"够力(带劲)!"
- 一下很响的"当啷"声,随后大铁门在吱吱声中推开,涌入 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干部来。可能是些农村应征来的新兵,特 别爱扳动枪机,样子很神气地吆喝,但又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干部逐组点名,我们按序排队,到大铁门外广场等待。那黑粗厚重的铁门,自从四年前丧失自由后,就这样把我禁闭在世界一隅,从不能越雷池一步。

场上排满了几十部公共汽车,那是趁夜半倾全市公共汽车之 有,来载我们这些危险分子上路的。

又一次点名核对后,我们像北平填鸭似地被一个个塞进车厢,

较大件的行李抛上车顶,用粗绳绑着,但没有像通常那样盖上大油布防雨,看来路程不会太远。

每车塞满近五十人,先上车的,虽挤得喘不过气倒还能坐一下;后来者就只能打椿般地直立着了。人齐后,挤上来两个持冲锋枪的大兵,用枪托推撞门口站着的两个青年和一个老头说:"滚过去!站开点!"这三个人踩着别人的脚,拚命往里挤。

"不准说话!"一个高个子枪兵大声吆喝着,另一个胖而矮的则扳动着冲锋枪上的扳机说: "你们放老实点!告诉你们: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靠近我们!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又是"卡嚓"一声响,不过这回是两人都在扳弄"保险"。从他们说话像背台词,动作像在演戏看来,是事先经过准备的。虽然大陆士兵的装备、待遇,在世界上是落后的,但在我们这批少见天日,面黄肌瘦的骨头架子中,他俩倒显得粗壮得多。

汽车开过一道大门和一道铁丝网大门后,驶入晋江至文水县的公路上。浩浩荡荡地向着晋江市方向奔驰。大家默默无言,各怀心事。我坐在靠近车尾的一个角落,眺望漆黑一片的窗外,那象征海岛人民坚强生命力的椰子林依稀可辨。公路上烟尘滚滚,车头灯照得如同白昼;黑暗的远村,已是万家俱寂。

自己忽然又觉得无限惆怅,祖国在苦难中,我们不是"此去经年",而是"经世"。生死未卜,前途艰险,也许此一别海村,会成永决也不一定。呵!别了海村!可爱的海鸥,凉爽的海风,美丽的海珊瑚。我在海边村,生活了八个年头,对海边人民有种特别亲切的情感。

车队来到小芳码头停下。晋江市附近急流暗沙多,王小芳出资建造了一个"芳村"和"小芳码头",一直沿用至今。来到码头,只见灯火通明,我们像羊群一样被分成一堆一堆地站着等候。地102

上不知怎的, 无一干处, 尽是腥臭的牲口粪尿。大家不能坐, 行 李也只能放在粪便上。

旁边停靠着一艘轮船——"东海号"。当年生活所迫,我在厦门港附近某船厂做工时,就曾在十多艘这种轮船底舱下爬过,滚得一身油污变成一个黑鬼。想不到今天坐它,是另一种命运,它带着我们走向新的征途。稍后,来了枪兵和干部,吆喝着叫我们排队,按顺序慢慢地沿着跳板上船。两旁站满看热闹的士兵,他们一面评头论足,逐个议论我们;一面指手划脚,嘻哈大笑。一看就知道是些新上阵的杂牌军。

"喂,小黄,这些家伙怎么都这样瘦呢?"

"那么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要它干啥?"

"你们看:这两个顶多十六七岁,像学生,他们犯了什么法呢?"一个人在问。另一个说:"不是杀人放火,就是间谍特务。总之是些新生反革命。"

我行近"夹道欢迎"的兵群,踏上跳板。忽然三个大兵几乎同时指着我喊了起来: "看!那高个子倒是挺神气的样子,看样子像运动员。"算说对了,我本来就是篮球三级运动员,有证章和证书的。想到命运任人摆布,头足任人评论,厌意就油然而生。

好容易挤上甲板,原来上面已站满了捷足先登的牛群,它们一面叫着,一面毫不客气地拉粪拉尿。这时,我们才明白,码头上的杰作是谁所为。我们的命运也与牛群一样——远运他乡,任人宰割。但此时此刻,牛群的待遇,要比我们这些政治犯还好些:他们可以在甲板上吸些带咸味的新鲜海风,眺望一下四周的夜景。而我们这些同类不同种的"牛鬼蛇神",却还要更下一层楼——通通被赶到船底大统舱下去。

沿着又细又高、锈蚀得很厉害的铁梯往下爬,在背着东西, 光线又黑的情形下,真是困难。我看不清楚,踏在一个黎族老头 的脑袋上,上面的人在伸脚下爬时,也擦得我耳朵很痛。底下小小一个统舱,挤满了材料厂、看守所、光大农场、仁水农场等百多位难友。锈穿了的甲板,会不时铜壶滴漏般地掉点牛尿下来。空气混浊、闷热,全舱没有通风窗孔,百多人的汗酸味和废气就靠一平方米的舱口排逸。铁梯旁边堆着几个木便桶,加重了空气中的阿摩尼亚成分,几乎令人窒息。 舱内漆黑,只有高处小小的舱口外的天空,才是亮的,可以看到许多星星,不知是同情还是好奇地在眨着眼睛。

船身随着海浪在微微摇晃,不时感觉到船身与码头碰击的震动。根据这点,我肯定大船未开航,只在生火待命。慢慢地,瞳孔放大,才能看见点舱内的情况。

夜已深了,顶上舱口透出的星星已经西移很多,大多数人都 在沉闷中半坐半靠地打着呼噜。海风虽然在呼啸逞威,但臭气逼 人的舱内,却越来越闷得人心里发慌。

"擦!擦!"随着声音方向转头望去,只见火光一闪,照亮了几个农场来的小孩脸孔,原来他们在抽烟。这是绝对禁止的,况且在船舱内。我有点替他们担心。只见他们毫不在乎,悠然自得地在烟雾中作深呼吸,嘘嘘有声。得意的样子简直像腾云驾雾的神仙。很快,有人去上面告了密。只见下来一个满面怒气,手拿三节电筒的干部,径直向吸烟者走过去。

"好大狗胆!竟敢在船舱抽起烟来。把烟交出来!"干部大声吼叫说。全舱的人都醒了。那三人懒洋洋地装聋作哑,默不作声。

- "听见没有?烟、火柴都老老实实交出来!"干部又一吼。
- "我们哪来的烟呀?没有嘛。"三个小孩摊着双手说。
- "咦?奇怪。他们刚才抽的烟,这么快,藏到哪里去了?"
- "有人检举你们在抽烟。少来这一套,交出来!"干部说。
- "报告干事:刚才你搜过身的,哪能藏得住呢?"一个小孩

较精灵地说。

"真的没有?今后不准抽,听到没有?"口气缓和了许多。

干部才上去,这里吞云吐雾又搞起来了。随着"嘶嘶"声,三个深红色的小火点,在黑暗里时亮时暗地摇曳。干部带着怒气,闻报后又下来了。这次毫不客气,上前逐个全身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第三次下来后,搜得更仔细,最后拿走了一截香烟和一片火柴皮。那大获全胜的干部刚离开舱口,只见一个小孩从破袜底夹层处,抽出一小块火柴皮和一根火柴头来,另一个小孩从厚厚的破衣领上,抽出一根香烟来。"嚓"地一声,红中带白、神仙似的面孔,又在幽暗中出现了。

时间在黑暗中过得很慢,很多人已入睡。我和几位大学生却没有睡意,在不触犯"监规纪律"的范围内,天南地北地漫谈,借以打发漫长的黑夜。

"起来!起来!"一声吆喝自天而降。从高高的天窗口吊下了一箩筐东西。"每人一包,由各组长分发!"

一阵骚动后,我接到一纸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半市斤饼干,作为晚餐,其实大家早已饿过头了,估计时间已到夜半两点钟左右。这些东西是罕见的,我已四年未尝其味了,闻着很香,就吃了几块。但没有开水,实在无法下咽,只有积蓄起来。我们多像十八世纪用船载去贩卖的黑奴,生命、前途毫无保障,像货物一般交来换去。

忽然间,柴油机轰轰大响,天空星座慢慢位移,随着海浪冲击的阵阵颠动,海岛一八三终于起航北上。我们也被疲乏战胜, 在黑暗的摇篮中和衣卷缩着睡了。

舱内如厕声、来回走动声、谈话声,构成了一曲监仓固有的 "晨操交响曲"。昏昏一觉醒来,已是大白天。

没有水洗脸,也不能漱口。有的在学"猫洗脸"——用双手

在脸上胡乱抹一抹了事。有的则用"干洗法"——用隔夜毛巾作洗脸状,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抹个痛快。我刚入监禁黑房时,就常用此法,说也奇怪,精神往往也会为之一爽,而长吁一口气。

CT V HEYEL K TO A TO SHEEL HIT IS A

一些有能耐的人,在干啃着昨晚留下的余粮。我虽感到肚子 里已提出抗议,想吞点东西下去,缓和一下"矛盾",无奈修炼欠功,还未有臭口干吞的道行。

看来船已停了很久,时候也不早,还抛下了锚在等待。也许此乃目的地吧。为了看清楚,我大胆地爬上铁梯,探头出舱口眺望。强烈的阳光照得我头昏眼花,睁不开眼。慢慢地我终于看清楚,大船停在一个海港城市外,有许多大小船只来往,天空蓝得可爱。海边有一排很长的码头货舱伸向远方。带咸味的海风,多么清爽呵!

有此规模者,不是大埠就是湛江市,但从时间来看,从海村到大埠要八十六个小时(三日四夜),看来只能是湛江市了。一直等到下午,轮船慢慢靠岸,我们才爬到甲板上,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

码头很大,有几架桥式起重机在铁轨上移动。库房伸向远方 几乎望不到尽头,吞吐量应是惊人的;只可惜码头的外轮很少, 就使这座内陆最大,专为外国贸易的国际港,变得门可罗雀,形 同废置了。

我们背着行李,按次序被押上跳板。甲板上的牛群,则被用网吊到码头上去,有的伸出四脚,有的突出条尾,惊惶地在半空中挣扎、叫唤。我边过跳板边想:等待它们的是屠宰,吃它们的肉;等待我们的是奴役,榨我们的油。何其相似的命运哪!那些调防,顺便监押我们的连队,也另上路去了。

码头上,已有许多公共汽车在等着我们。那些巴士较漂亮,似是八十吨猪肉换一部的"匈牙利"车,开关车门都有一阵叹气 106 般的"嘘嘘"声。才坐定,车门外又钻进两个全副武装的枪兵来。 照例又是"皇军大大的威武,你们蟋蟀蟋蟀干活","三不","四 不"地威胁一番。

湛江是座美丽的城市,绿树成荫,花草争艳,楼房整齐,看来当年的外国人也有规划、建设的功劳。湛江市也是英雄的城市,当年家父为国家以身殉职于此。

车队在离霞山看守所不远就停下了,剩下的一段路程,要自己排队步行。押队的枪兵很凶,不断喝骂我们,行李不准放在地下,停下等待之时,也要顶在肩上头上,否则国骂和枪托就过来了。这二十分钟左右的行程,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简直是在变相受刑。我看见那位大箱大笼的工程师,一手提着"公事箱",一手提着皮箱,腋下夹着散开了的被子,在路上拖着,走一步,放一下,被子剩下一张,枕头也不见了,非常艰辛。我自己也爱莫能助,只怨他不听我的话了。

好容易捱到看守所,弯弯曲曲地走到里面,只有几座大铁门相向,似乎是兼有监狱、劳改场、看守所之综合结构。我看见有几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倚大门眺望我们,却不敢雷池一步,估计是劳改队的难友。

转了几个弯,我们被押到一座高耸的岗楼下,由带队干部向楼上打招呼,经盘问仍不肯拉闸。后来,本所干部来了,才拉开了铁闸。这座看守所,圆形的岗楼底,成直角二边方向,开了两座闸门,只容一人通过,锁匙、拉关铁闸,都由站在二楼窗口边的哨兵掌握。与岗楼相连的屋顶上,修有一条小水泥路,有一哨兵日夜来回巡视,监督院内动静。这种设计很巧妙,就算暴动越狱,由于每次只能通过一人,失去宝贵的时间,也是很难成功的。

院子是长方形的,左边是岗楼和巡逻路面,下面的平房有个 简单的医务室。右边是一堵高得惊人的围墙,没有五人"搭天梯", 料难翻过墙去。主结构是一座二层楼的坚固监仓,对面是厨房。

二楼的仓房,开有"风门"的铁木门紧闭着,为的是不让他们远眺市区的风光。下层因为什么都看不到,采用的是铁枝闸门,底部留有约十公分高的空格,用于让饭碗出入,但人是钻不出去的。室内有电灯彻夜通明,但无厕所洗洁处。只有两个较干净的便桶,每天放风时倒一次。我们多人挤在一起,睡在地上。

十月中旬的湛江,已是深秋时分,但为了观察一下各室和外面的情况,顺便舒展一下麻木的身脚,我每天也加入出去洗澡的队伍。

洗澡室与厕所在一起,在靠近高墙的最远处。水泥铺地倒也干净清洁,比起海村监狱的臭气熏人,要好多了。头顶有水龙头喷出凉水来淋浴。我咬着牙根试了一下,想除掉身上积存已久的的"老泥",却冻得我满身鸡皮疙瘩,毛兵立戈竖剑,牙将短兵相接。为防感冒,只好半途鸣金收兵,跑步退回室内。但有些人(多数农场来的)却能一面唱歌谈笑,一面照头照面地大冲特冲,口里还喊着:"过瘾!真过瘾!"

在回来的路上,我听到几个小孩一面去澡室,一面用闽南话向各仓室说:"朋友们!辛苦啦!"、"同志们!我们的人快要回来啦!"、"弟兄们!我们快自由啦!"

我为他们的勇气和乐观感到鼓舞。很多人都曾与国军派出的 空降地下工作队、海上潜艇等有过接触。有的还在深山中听过地 下工作人员的"时事报告"。所以他们一直非常自信、勇敢、乐观。

我们在湛江市霞山看守所停留休息了四天。同室内,除了海岛监狱的人外,还有来自仁水农场、光大农场的难友,约二十多人挤睡在水泥地上。这四天,是我们交流经验,传播新闻,漫天闲扯的快乐日子。来自农场的人,小道消息多,接触面广,有名符其实的新闻。当听到他们讲及如何见到携着"一长一短"的地

下武装人员,与之谈话并有好烟抽时,如何外出劳动抽空设陷抓山鸡、果子狸等时,真是慕煞我们。然而,当他们听我们讲述狱中的男女私情、奇闻怪事时,也同样开心地哈哈大笑。

每当到了开饭的时候,大家便将搪瓷碗由铁闸下空位推出门外排好。厨房在每间室前门外,放一笼筐大米干饭,一桶菜。然后用手抓饭抓菜,"五爪擒笼式"地分放各人碗中。每日两餐是洗过手的,但有人觉得不够卫生,提出要用筷子分菜、勺子分饭。那负责分饭的看守所难友,态度很好,立即采纳,不过速度是慢得多了,大家只好伸长脖子等待。

一些吃过旅途之苦的人,开始忍痛割爱简化自己的行李。各 监仓门外,堆了几座高高的垃圾山。其中有旧的和半旧的衣服、 毛毯、棉被等物。大家可以互济有无,也可出去挑拣。余下的破 烂,就是看守所日后发给他人的物资。

我早已成了身无长物,两袖清风的"无产阶级"了,但为了轻装前进起见,便将友人给的一只旧皮箱也清理出来,很快就被只有一只旧皮袋的临乡县难友,欢喜地要了去。有一位朋友说: 这叫做"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生活。

到了最后一天前,整天不见干部进来巡查,便桶满了也不开门放风,大家吵得不得了,有的人怪声怪气地在喊:"报告干部,便桶满了!""报告吴厂长,无地放尿了!"

晚饭时,忽然加了点肉。大家便沸腾起来了。有经验的"老油条"便断言: "快了,快调动了。"至于调到那里,则英雄所见"不同"。有的说会调去新疆,那里劳改场很大,每年都有人调去。有的说也许调去山西、青海挖煤矿,那里塌方死人很多,所以年年需要各地调人补充。意见不一,但不知怎的,大部分人愿意调得远些。

不久,发东西了。先是每人发一双用白布做成状如长方形布

袋的袜子。大家穿进去,不成形状,多出来两个布角,包来包去,不知如何处置。我笑着说: "还不如发块长布条,学老太婆缠脚算了。"大家一阵大笑。接着发无领的蓝色卡叽斜纹棉衣、棉被、棉帽,大家又沸腾起来。一位曾是福州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掌管过全海村区出国申请的林诗如说: "有了棉衣、裤、帽等,说明要出省了。"他摸摸棉衣裤又说: "棉质不厚,不会调得很远。"看来他有点经验,说得也合情理,因为他本身就曾是公安局的人马。有些不怕事又性急的人,还写"报告"给带队的吴厂长,要求公开说清楚: 究竟把我们这些人调到哪里去?

第四天早饭后,来了一大群干部,逐室逐房地察看、询问,操着听不太清楚的普通话在交谈着。像买卖双方的老板,在最后衡量他们的货物一样。其中有些外来干部,就是到海岛监狱要货的人,此刻多了一些大腹便便的首长。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劳改场的书记、总场场长、分场场长,指导员、队长之类。那一整天,无人问津,是他们在开会研究如何分配与安排。

下午,全体在小院子里集合。吴厂长按组室点了名,然后作了简单的宣布: "你们不是有人打报告,要求公布调你们到哪里去吗?现在我答复如下:一、这是改造需要;二、你们这次调去X北。"

回仓后,又一次沸腾起来。但大家都没有听清楚什么"北"。 依音推断,也在河北与湖北之间。因为闽南话"河、湖"二音很 相似,连我这"闽南通"也无从结论了。不过,总算知道,要调 我们出省了。

一路风尘

第五天(1964年10月20日),漆黑的夜幕尚在垂罩着呼呼 110 大睡的人们,忽然响起一阵吆喝声: "起来!起来开饭啦!"

这顿饭开得特别早,看来是准备出发了。大家都在**默**默地整理自己的行李。

饭后不久,进来一大群干部。经过一阵集合、点名训话的骚扰之后,我们排着队,又一个一个地通过那碉堡的铁闸口,向着茫茫的前途走去。汽车把我们运到湛江市火车站,这是内地一条战略性铁路的终点。它通过广西桂林、柳州等地,与粤汉铁路在衡阳交接。而由衡阳经柳州、南宁的一条铁路则可一直通到越南河内。无数军火物资,作战部队,通过此线与湛江市港口,源源不断地运到昔日"同志加兄弟"的北越。当然曾几何时,这位"同志加兄弟",吃饱了中国提供的粮食,用中共提供的坦克枪炮,血洗边境,那则是后话了。

大概是等调车,我们在铁路边等了很久。很多人忍无可忍, 又苦于不能擅自远离找厕所,只好到墙边去,就地解决。只见去 者匆匆,回者悠悠。正所谓"去时双脚紧,回时一身松"也。谁 知那是座办公室,一些职员和干部,从"沙沙"声和亚摩尼亚味 中惊觉起来,走到窗口大声辱骂他们。我还拉不下面皮,没有参 加那行列,在自修着"龙之忍者"的道行。诚然,随地大小便和 吐痰之类,都是不讲卫生的表现;但作为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 的一群,出于无奈,也还是情有可原的事。

终于捱到上火车了,平时运货的"铁罐厢"每厢塞满了五十人,近门处的中间还要空出一块空位来,置放四竹筐干粮(梳打饼干和圆面包)、开水和四个便桶。高高的车厢近顶的两边,有几个很小的焊着铁树枝的方形窗口,大门一上锁,里面就黑得要点电灯,才勉强在如厕时不会常常踩到别人的脑袋和手脚。大家挤得很紧,只能侧身躺下,所以也时时可听到被踩痛者的惊呼声和对方的道歉声。

最糟糕的是车厢板底,尽是牛粪牛尿,臭味熏昏人。看来是刚运过一批生牛,连扫都不扫,又来运我们这批"生牛"。大家稍作清理后,也就铺席躺下。在那种生死未卜、苦难重重的环境下,清洁卫生之类的事,似乎是可大可小、可方可圆的事。

100

由于僧多庙小,挤得实在睡不着觉,几经移就,亦无法安然,特别席下挥发出的阵阵臭味,令人恶心。旁边又偏偏遇上一个火气特大的老头子,老是说我挤痛了他。我环顾一下四周,忽然喜上心头,马上让位贤能,搬到边上堆行李处,去营造我旅程中的"空中楼阁"。我把行李堆好弄平,躺在上面果然舒畅得多。最有利的是,躺在高处,我能够望见小窗外的田野风光。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热爱大自然,四年多未出狱门一步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大饱眼福的享受。

由于是新路,火车开得特别慢。我时时把看见的事物告诉下面的难友,他们也常常问我:现在到了哪里了?我其实也未到过这些地方,只能从沿路的地貌、服饰、站牌等去估计和推测,再告诉他们。有一次,小小的窗口忽然出现了美丽的画面:高耸笔直的山峰,立在碧绿如茵的田野中,田中有山,山上有松,一些农夫在耕作,令人如置身一幅彩色的山水画之中。

我大声地喊: "喂!伙计,桂林山水甲天下,到了桂林了,快来看呀!"很多人爬到我的宝座上,贪婪地极目眺望着外面的奇峰怪石。诗云"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阳朔漓江何处是?环境所限,未能一览。但沿途壮丽的风景,使人感到祖国的可爱。

有一天早晨,火车停在一个有很多铁道线路的大站边。车站 的站牌写着**伤**阳车站,旁边有一电钟指着四点十五分。无疑此刻 已进入粤汉铁路线了。

天亮后,从射进窗口阳光的角度,知道火车是向北疾驰,这 112 时速度快得多。但冬季的北地,叶落乌啼,稍逊南国了。

当通过很长,有着很多 N 字形的梁架铁桥时,我们已置身长江之上。在武汉停留片刻,大概换了车头,我们又继续上路了。

四天四夜的"罐头"生活,使人沉闷难堪。随着车厢震动, 泼出的粪水,向四周渗延,摇晃着的便桶,使多少人不能如厕。 饮水缺乏,大家对着一日一斤干涩的咸饼干,不能下咽。四天没 吃一点菜蔬,很多人发生"结肠",屡试不通,鼓得满面青筋,"唔 唔"作声亦无济于事。大部分人都病了。

最后,睡在软席上的押送干部,只好在小站停下。趁开门倒便桶的时候,叫来一个随车女护士进来,给几颗维他命 C 或服一剂泻盐了事。

那护士年纪很轻,样子颇清秀。由于操一口湛江市"土话",与我们说的大埠"土话"虽相通,然而显得咬字带有混浊的齿音,特别说"三、四"时,有空气喷出如"丝丝"之声。

看她的态度尚温和细心,我也过去要了点药,其实是闷得发慌,想找她闲谈几句而已。但站在车厢门口负责监视的海村监狱来押送的李主任,却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生怕我们会托她带什么消息似的。

铁门"轰"地一声关上后,整个车厢又处于半黑暗中。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大家暂时是平等的。没有组长,没有积极与落后,没有三人联保。监狱或农场从前的积极分子,如今也列入反动危险分子,一样上调内地集中营,思想上的刺激是很大的。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不管干部骂你,赞你,无非是利用矛盾而已。

这些人平日得罪人多,也怕他人乘机报复,尽管大家吵闹, 也无人提出异议或打报告。我们车厢较平和,没人动手打架。但 却冷嘲热讽,指桑骂槐,甚至指名漫骂,骂得痛快淋漓,一出平 日久积的怨气。

有几个车厢,把那些平日为虎作伥的积极分子,借故打得头破血流,使他们申告无门。一来车厢铁门除了加开水、倒便桶是不开的。列车不停站,一直隆隆前进,叫喊声外面听不到也无人管你。即使里面打死了人,也要等上大半天,干部才能发觉。

那些平日受尽陷害、殴打、侮辱的人,今天便暗中串通,一致行动。一人发难,群起攻之,直打得积极分子内外俱伤。事后,一口咬定:一、他先动手打人;二、这人一贯会弄虚作假欺骗干部;三、他自己跌伤碰损的等。多数人作证,干部也不好追查下去。

这种迫不得已的报复行动是弱者的一种有效反抗,也往往令 那些做过坏事的人,日后有所收敛甚至悟改。

在那种"龙游浅水遭蝦戏,虎落平原遇犬欺"的黑暗日子里, 大家动弹不得,一旦机会来临,痛打落水狗,作正义的报复,是 何其大快人心的事啊!

离开武汉市,从日光投影上,我们感到有点不对头——没载我们直上北方,而是偏西北方向。凭地理知识的回忆,除了南北向的"平、汉、粤"铁路线外,还未有斜向西北的一条铁路。究竟把我们押到哪里呢?大家莫明其妙,议论纷纷。

那个前所长也大发其高见: "总之,过了长江就是北方,这一带我过去经常出差办事。生活不错,不会吃红薯,半年劳动,冬天下雪时,半年在屋里休息······不过,不知这条是什么铁路。"

言者滔滔,听者津津,好像大家面前,早已摆上一盆香肉, 邀请动筷受用一般。

在半天一夜的行程中,火车开得特别慢,大概是条地图上还 未有的新支线。

第二天早上蒙蒙亮,一阵刺耳的开锁声、吆喝声,把我们吵 114 醒了。大铁门一打开,刺骨的寒风示威般地扑向我们。就像一个 冬夜醒睡的人,突然被掀掉棉被一样,冰冷难受又气愤。大家赶 忙把棉衣、棉裤、棉帽、鞋袜,应有尽有穿在身上,全副武装起 来,抵挡那彻骨的晨风。

从站牌上得知,这是一个叫随县的小火车站,只因前面还在 筑路(通向襄阳)尚未通车,所以要由此改乘汽车,走一整天的 路。

车站上早已停满汽车的长龙,望不及头,前面的车已伸向不远处县城的拐弯处。我们能看到的约四十多辆。

大家按干部点名上车。上得车来,才发现一批囚服款式,口 音有异的难友与我们同车。虽都是一式蓝色囚服,但他们的帽子, 很像北伐时戴的大头帽,而我们的则是圆形,有点像坦克兵。

稍作询问,才知道他们是湛江专区来的,我们属海村专区。 这次两个专区的危险分子一起上调,是第一批。后来才知道:南 关专区,青山专区,兴化专区,同庆专区等,在十一月份和十二 月份,又分两批上调到这里的穷乡僻壤了。

每辆车上坐三十至四十人,有两个携枪的干部,站在前面监视我们。每两部车中间,插有一车全副武装的大兵。一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很多半自动步枪,如临大敌地指着我们,随时准备开枪扫射的样子。

车队长龙的前、中、后三部监督车,设有无线电,以便随时 向总部报告情况,并与沿途有关部门联络。车队之间,还有两部 臃肿的大柜车,是装干粮和饮水的。由于车队太长,开车和停车, 由车队前中后指挥监督车发射信号弹联络。那信号弹很亮,虽是 白天,也一样耀眼。烧完的信号弹,拖着白烟,沿不规则线条左 右摇晃着下落。

"卜卜卜"三声,绿光划破长空,车队终于浩浩荡荡起程了。

初时,我们以为就在离县城不远的监狱、看守所服苦役。谁知车 队一直往西北方向走个不停。

穿过县城时,我们见到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男女老少,各 行各业的人全都涌到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只见人头攒动,语 声沸腾,像是夹道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

1962年,盛传外面就要反攻大陆;1964年美越发生海战,预测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今见到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车队,内心自然好奇与期望各半了。一路上,很多脸蛋红得像苹果一样的可爱的小姑娘对我们说:"叔叔,请下来喝杯茶。"大概以为我们是转业军人。

这个小县城,依然是老式的房屋多,路边一些青砖黑瓦的屋子,附近多有一小块自留地,种着很大的葡萄和洋白菜,土质是黑色的。衣服破旧的缠脚老妇人,一面看着、议论着,一面在纳着布鞋底,还不时把锥子尖在头发上磨擦着。

这种贫困落后的生活使人感觉到,历史忽然被拉着倒退了五 六十年,回到爷辈们生活的年代去了。

车的长龙,穿过县城,向西北奔驰。天边地平线上,是一片 黯黄色的尘沙迷雾,看不到绿叶红花。道路是黄的,天空是黄的, 枯死了的草地也是黄的,脱尽落叶的树木像枯枝一般,令人有种 荒凉窒息的感觉。

怪不得当年王昭君,见到黄沙阵阵,荒烟迷惘的塞外风光时,伤感地唱: "今日去天涯……怕难似苏武还乡……一阵阵胡笳声响,一缕缕荒烟迷惘,伤心不忍回头望,惊心不敢向前往……"

这回调动,他们是下足本钱的,沿路各县,遥遥数百里,车队经过的两旁,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民兵。有的扛着日本人留下的歪把子轻机枪,趴在地上,有的拿着管子很长的鸟枪,神气地站着,有的端着"七九"或"三八盖子",有的则只有大刀长矛。我116

看见一个人,背上插着把大刀,红绸布在飘动,双手叉腰地立正站着,像个"中"字一样。这些大概是二等民兵,装备较差,只能打一些战国年代的肉搏战。

后来有一个向阳难友告诉我:他曾是土八路的干活——民兵。接上级通知连夜赶到沿路指定地点,监督我们。上级告诉他们,我们是一批海外来的美蒋特务,杀人放火,血债累累,罪大恶极,又会飞檐走壁,厉害得很。一有逃跑、暴动则格杀勿论等。

沿途极目眺望,丘陵地带种有一些棉花、麦子,看不到水稻。 几间不分东南西北方向的泥墙瓦屋,加上几棵黄叶舞秋风,枯木 也似的树枝,就算一个小村落了。新奇的是:收下的棉花,竟能 铺晒于屋瓦上,究其原因是没有沿海的大风吧。

另一个新鲜事是,除了牧羊外,竟还有牧猪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手执小鞭在赶着一群与"南猪"不同的,三长一快(眼长、嘴长、毛长、跑得快)的猪群沿途放牧。他时时要小跑,才能追上"飞毛腿"似的长脚猪群。这使我想起了北方人,有"猪倌"的称呼,即此谓也。

我们看着跑得很快的猪群,哈哈大笑,押车的干部,时时出 声制止我们,我们不理会他。

坐了整整一天车,挤得双脚麻木,最要命的是不能小便。本来每辆车上,备用两三个搪瓷痰盂,以供车上小解之用,但没有一个人解得出来,难受极了。只听见这个说:"让我再试试",那个说:"还是我来吧",结果在头上传来传去的痰盂,依然空空如也。幸亏是空的,否则在摇晃中,底下的人就要担心"黄河之水天上来"了。

有几个人实在忍得受不了,便一再要求停车,下去小便,理 由是摇晃着、坐着解不出来。好容易"恩许"了下去,周围的枪 兵也下来了。他们却因憋得太久麻木了,有个人解不出来,这可 激怒了枪兵:"他娘的,骗老子,没尿偏说要尿尿,想逃跑不成?!"接下来的,当然是吃了几下枪托,屁股上又挨了两脚,赶上车了事。

present a region of a rest of a region

下午以后,车队开到一面丘陵高坡上,能看到远处的襄阳县城。但泥路在丘坡上弯来曲去,很久很久才到达县城。这里有几个油库,有间新华书店、银行、邮局等。隔着一条秀丽的汉江,对岸就是当年关云长战新野、走樊城的樊城古市了。现在襄阳县与樊城合并,称襄樊市。

下马威

车队从一座日本人当年修筑的铁路桥底穿过,经过王集、太 古庙等集镇,在一些岔道上,不时有几部车离大队而去。原来谁 去何处何队,干部早已作了安排。有些人饱受苦楚,若干年后尚 能见上一面,有的人从此就在终生苦役下、拳脚下、饿牢里、枪 口下丧生。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次的生离即是死别。

到了目的地——沙洋农场二分场六中队,已是黄昏时候。这是一座重点苦役营,很高的围墙,很厚的大铁门,碉堡式两层的哨楼,墙顶上装有铁丝网和电网。但工程才完成大半,侧面有段未接上的缺口,架满了铁丝网,有人彻夜看守。牌子上警告说:"不准靠近,否则作逃跑论处。"言外之意,他们可以开枪射击,格杀勿论。

屋后有人在筑围墙,看来他们在夜以继日地赶工程。打夯的号子显得很单调,他们也是本地的难友,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胡编乱唱凑热闹,生怕说溜了口,祸从天降。只听领唱的喊一声:"哎……打起来哟!"大家随身附和地唱:"嗨也么胡,嗨哟嗨!"打两下停一停,自始至终就那调子。

晚饭的时候,小柴油发电机开动,亮起了暗红的灯光。大家 按组到大伙房领一碗大米干饭,约有半斤多,外加一小瓤牛肉炒 白菜,这在内地叫"加菜"了。

那位在火车上极力吹嘘这里伙食好、不会吃红薯的前所长,他的理论与预言,似乎已从米饭与牛肉中得到证实,于是到处问人家: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你们看吧,往后天天有肉。"有的饿怕了的难友,感到一点安慰,心想以后大概不会再受可怕饥饿的折磨了吧。我则是半信半疑,且看下回分解吧。因那碗饭,挑出的谷子、砂石足有三分之一多。

当晚,看了一场介绍沙洋农场情况的幻灯片,和一场"全国武术比赛"的电影。彻夜被打地基和叫号子的声音吵得难以入眠,有的老年人干脆坐在床头,抽起思乡的闷烟来。那所谓的"床",是在一间长形屋内,用土坯砌成两排床沿,中间是空的,上面搭一些树枝、木条,盖些稻草而已。这是内陆典型的工棚"通铺",两排长床,二百多人挤在一起。发的棉被又薄又短,高个子双脚无处躲藏。只好把棉衣、棉裤,应有尽有地压在上面,有的棉帽也不脱就钻进被窝去。每人实得五十公分宽,大家一条龙地挤着,仍然觉得冷风侵袭,粟然发抖。

正当大家慢慢地在寒风呼啸下入睡时,突然一阵冲锋陷阵时发出的军号声:"打哒,打打打,打哒的,的哒的……"撕人心肺地在夜空中回响。跟着听到人数众多,接二连三的叫喊声:"同志们,冲呀!杀呀!""不要让敌人跑了!杀呀!冲呀!"。

睡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孩,猛从睡梦中惊醒,倾听片刻后,小声地问我: "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的人打回来了?"我示意他要不动声色。千军万马的声势迫近时,我忽然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和吹哨子的声音。我于是断定那是一场"土八路"的军事夜演习。目的是向我们示威并观察我们的动静与反应。果然,有人开门站

着察看我们。我赶紧闭上眼皮,捅了一下那小孩,叫他别乱动。 他咕哝地骂了一声: "野仔",便又睡去。

我睡不着,脑子思前想后地翻腾着。"起来,起来!天已亮了,他妈的还不给我起床!"我们被几个推门带风而入的干部,连骂带踢地从被子里赶到黑暗冰冻的院子里。有个从未见过的分场派来的干事,特别凶恶,动不动巴掌就朝人头上打,脚向人家屁股乱踢,口里叽哩呱啦地骂人,说着蹩脚的普通话,不知是在装腔作势,还是当地土语本就如此。总之,除了"妈的"、"娘的"、"奶奶的"之外,就不知还有"谁的"。南方的干部,一般不会动口动手、骂人打人,本地的干部,是粗鲁野蛮得多了。

开始是点名,随后编成大队"报数"。这可难坏了一些不懂普通话的少数民族老兄们,也气煞了干部。报了多次,都报不好。有的在旁边提示下,也没能混过去。有一位年过花甲的黎族"奥雅"(酋长之类),快到他时,总是紧张地左右询问:"娃鬼堆呀?"(我第几呀?)不管怎样教他,他还是结结巴巴说不清楚。报到第三回时,那个分场干事便上来一顿拳脚,把他打倒在地。

整了队也"整"了人,那干事骂了一顿娘后说:"他娘的,你们里面连长营长干部学生都有,报个数都报不好。他妈的,不是故意捣乱破坏吗?娘的,你给我'过细'(小心)点就是!现在,由当地民兵营长,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没有人鼓掌。

这时候,从大铁门口走过来一个颧骨很高,瘦削身材,身穿旧军装,腰上挂了一支缠有红绸布驳壳枪的人来,耀武扬威地双手叉着腰。

一开口就是: "你们这些反革命,给老子听着:别男人的钞票,女人的大腿的乱说。不准你们谈论省外情况,不准你们乱说乱动,否则立即制裁!你们睁开狗眼看看,到处是民兵,你们不懂我们的话,环境不熟,是跑不了的。不老老实实,老子就宰了120

你们!"

这时,配合他的训话效果,大门口外,演戏般地吹着口哨"一,一二一!"地走过了一队五花八门装备的民兵队伍,长长的一列,约有数百人之多。

走在前面的,还有几支"三八盖子"、"七九"、"汉阳造"之类,中间的则是鸟枪,火铳,而到了末尾的妇女小孩,肩上扛着的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刀、长矛、梭标等,最后压阵脚的武器,大概装备不足,连锄头、扁担、木棍和猪八戒用的九齿钉耙也用上了。

这是一个宠大的劳改大队。以中队为最基层生产单位,约有 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左右。十个中队组成一个分场。七个分场三 个砖瓦厂、打石场、磷矿场、石灰厂、监所等单位,组成总场。

中队是连级编制,分场等于营级,总场是团级。军队驻守看押,也是以此为据:中队有连部,分场有营部,总场有团部。每中队设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正副队长,几名管教干部、庶务长、出纳、会计等。中队内又分成二个分队。

指导员一队之主,通管人事、生产、思想、学习等。正副队 长一般是支部副书记,主管生产,兼管人事、学习等。两名主管 干部,各分管一个分队。管钱财、仓库者,多是女的。全队劳改 约编成十多个小组,每小组十多人,设有正副值星员,分管学习 和劳动,汇报组内各人思想、言论、劳动等问题。

这些基层干部掌管着生死予夺大权力。他们做材料加了某人的刑期,除非自己愿意更改,否则分场、总场、地区、省,甚至中央都无权无法令其撤消。纵使上诉递到中央去,也只是由省到县,逐步转下,最后还是转到基层,由他们决定。

一百多人的中队,要耕种两千多亩土地,平均每人约十五亩 地,这是沉重的负担。耕种的农作物有:水稻、大麦、小麦、高 梁、玉米、马铃薯、蕃薯、黄豆、绿豆、蚕豆、棉花、果木、蔬菜等。水田多的中队,工作特别繁重,麦地多的中队,相对较为 轻松。

每年有两次大忙季节 ——"夏收夏播"和"秋收秋播"。叫做"抢黄粮"。先由湖北省劳改总队颁布动员大会令,张贴在各中队门口、厨房门口。各队便召开大小动员会,传递、讨论、表决心、订计划等,也是干部神经紧张、骂人、打人的"旺季"。一点小事,会惹来一场臭骂,稍有差错,会飞来一顿拳脚。这些自称是革命干部、平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一不顺眼,就找你的麻烦。什么事情,到了他们口里,都会变成"原则性"的罪行,真是防不胜防。一不注意,说不清楚的罪名,数不清楚的"帽子",就会像天女散花般地落到你头上。

这里流传着一句话——"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据说此地人(我相信大多数是好的,不涉及善良之辈)是较厉害的,但其中一些人那种粗鲁、自大、精明的本性,似是其现实的反映。

我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地休整了一个星期。上午在监仓内,一个小组围成一堆学习讨论,下午集合到外面捡棉花。每早吃的薯粥和杂粮,"生活好"的神话破产了。上回随车押队的干部,原来就是此队的指导员。后来又来一位指导员,因地方主义的排斥,"一山不能藏二虎"之故,不久就调开了。

起初,除了那个分场干部,爱公开打人骂娘之外,队上的干部态度还算随和,说话也较客气。有时还居然坐到我们的铺边,向这些被称为杀人放火、特务间谍的反革命分子问寒问暖,教大家盖被子。

监仓一角,摆了一些日用品和图书,让我们随便买或借阅。 因钱未转到,只需登记姓名就成,不收钱。一个海叉来的小孩笑 着打趣:"嘻嘻!这不成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了么?"另一位老 122 成的人却不以为然:"这叫做'放屁安狗心',等着瞧吧。"果然,一周后好景就不长,东西也收起来了,而各人欠的钱债,却扣得毫厘不爽。

劳改场一监狱的干部,很注意表面工作,监仓尽量要搞得干净些。他们之间,也是互相比赛、评比,以清洁来捞取"管教有方"的虚荣成绩。被子要叠起棱角,四平八正,不能大,不能小,不能高,不能低。有值班员专门负责检查,并用两块木板,修整、夹平成一条线。破袜子、脏衣服,要藏起来,不准露面。此即所谓毛巾、被子、鞋子、三条线也。由于时间紧,内心也反感,没有时间和心情慢慢去摸弄它,所以,我的被子总是胡乱揉成一团了事。

有个海叉监狱来的闽南人,姓符,是个靠笔杆子得宠的积极分子,他的外号叫"猎狗",喜欢鼻子到处闻。有一天,他汇报后,请来了干部到现场观看我那"油盐花卷"的杰作。目的在于借干部来制服我。平日我本已非常鄙视他的所为,只是持"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态度而已。今天想在我头上开刀,只好反击他了。怎么说我也当过几年"统兵"千人的干部。

当着指导员的面,我反问他: "我没叠被子?你在干部面前说假话!好坏的标准是什么?你的被子虽然叠得有线条,但霸占的位置大长,伸到人家铺位上来了。而且枕头底下有一双臭袜,算卫生、整洁吗?"干部走后,我又臭骂他一顿,他拿我没办法,虽然恨我,却无可奈何。我知道自己是有点强词夺理;然而对付狐假虎威之辈,有时也只好横来直打,挫挫他的气焰。

饥肠辘辘学耕田

每天,大清早起床、洗脸、刷牙、叠床、排队点名、吃早餐,

只半个小时,非常紧张。一个队一百多人才给几桶水,先去者有,慢到者无。常常出现先舀下去的大碗,被后下去的小碗压挤着, 无法拿出来的现象。于是有人发现:贪多贪大,是会事与愿违的, 只有"安分守己"地使用小口盅,最实用,舀起就走,谁也阻挡 不住。

only responding to the process of the second

每天出工前,由各组值星员召集,检查人数,遇有病号,要交上劳改医生证明,再由干部批准,决定是否可以留仓休息。有病拿不到休息证明的人,自然会对医生不满,但如果出病假证明多了,医生又会受干部呵斥、责难,甚至撤职放到大班劳动,所以劳改队的医生是最为难的。很多患病也持有证明的病人,一样被强拉出去劳动。

清查完人数后,由负责干部交代各组当天的任务,然后排队,按组序由各值班员分别向大门岗楼枪兵报告: "报告看守所:一组十五人出工!"一般枪兵是摆摆脑袋,或鼻内哼一声——"去",而表示允许该组出大门;但有的新兵会叫你站好,或重"报"来刁难一下。

收工回监仓,程序相似,只是由外报入。如人数不对,检查后找不到人的话,就会当作逃跑案件处理。队、场立即派人追缉,还要求附近公社派民兵,封锁路口,协助围捕。这里基本上没有大山,属丘陵地带,无边无际的起伏山岗,伸向遥远的天边。农作物都顺山势而种植。土质好点的土地,就改成棉花地或水稻田,其余瘦削的黄泥坡,就多种高粱、玉米、红薯等。

中队监仓大铁门外,是一条泥路,右方通向湖北襄樊市至河南邓县的"驿路",左方是通向各分场、中队和田间的泥泞烂路,只供人和牛车、马车、绵羊行走。 大铁门对面,是干部和驻军的宿舍、办公室、厨房、球场等。

这里的伙食很糟,待遇也差。早晚两餐稀饭或苞谷(玉米) 124 粉煮成的"糊涂",吃得肚内咣当作响。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平日说的"糊涂"、"糊里糊涂"是由此种稀浆食物演变过来的形容词。

这里把番薯粉、玉米粉、高粱粉、绿豆粉通通叫作"面"。南方人面与粉是有区别的,这里把番薯粉叫作红薯面,不知是否想叫得"高级"一些,好听一些。

煮的时候,烧一锅开水,把红苕面倒下去,搅得粘盆粘锅"糊里糊涂",吃在有胡子的嘴上,也粘得一塌糊涂。所以,把这稀巴巴的粘浆,叫做"糊涂",是有道理的。有一种玉米"面"做成的圆饼,蒸熟后,金光闪烁,咬下去,味如嚼蜡。如厕后仍然金光灿烂,一点也未消化吸收。由于天气冷,劳动繁重,没有其他营养补充,喂牲口的杂食又吃不惯,所以大多数人感到吃不饱,很多人病了。

各场各队都有很多勇敢的人,自发地起来反抗,要求改善生活,改善政治犯的待遇。有的把发霉变酸的薯片、木薯干,倒在院子里:"他妈的,这些发霉的东西,是人吃的么?"有的把"糊涂"泼在监仓地上;有的说:"喂牛的杂食,也拿来大家吃";有的磨洋工、损坏生产工具,还有的进行绝食对抗。

监仓西边,有一间茅草房,堆了几本旧书和"毛选",厚厚的灰尘,看来很少人光顾。唯一使我高兴的是,壁上挂着一张全国大地图。虽不详尽,但仍可以看出我们来时的行踪、路线和如今身处异乡何方。

有一天,我们在监仓内学习,天忽然下起大雪,漫天飞舞,遍地银装,玲珑透彻,晶莹可爱。那气势使我联想到古人所发的"纷纷鳞甲飞,疑是玉龙斗"的感慨了。一些从来未见过雪花飞的南方难友,一拥而出,双手捧着雪团,仔细欣赏。有的放到口里尝一番: "我的妈也,好冻呀!是淡的。"有的乘兴抓了一把,塞到别人脖颈后去,冻得那人直跳起来,哇哇大叫。雪,我是见

过的。那是幼年随父亲驻军无锡时的事,脚上穿着小棉鞋,和姐妹们一起堆雪娃娃,所以没有他们那样大惊小怪。

雪景也是相当美丽的,自古以来,触发了多少文人墨客、才子诗圣们的感慨。但一个人处在国破山河在,又失去一切自由的时候,哪里还有欣赏的心情呢?有的话,也只是杜甫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普济饥寒交迫,苦难百姓的期望了。

尽管"朔风骤,牵衣袖",我们还要在冰天雪地下劳动,一直 到满身披白,手脚麻木,或许会恩准收工回仓。但很多室内工作 还等着你,如剥花生、剥绿豆、剥棉桃等,还有学习、动员会、 批斗大会等,决不会让你闲着或睡大觉。

此地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三十度。太薄的棉被、衣服使我一直弱不禁风地感冒咳嗽。以前以为形容林黛玉弱不禁风,是瘦得会被风吹走;现在才知道,体质过弱,风一吹就会病的道理。可怜昔日篮球三级健将今时也与林黛玉同病相怜了。

大家的耳朵、手指、脚指都冻伤了。起初奇痒难奈,越抓越舒服,后来就红肿,慢慢又发黑、溃烂。有的还要动刀子,将腐肉挖出来。奇怪的是,哪里有过冻疮,年年都是出现在该处。大概受破坏后,容易复发吧。有的人,手脚冻伤后,会出现裂痕,流水流血,痛苦异常,很难愈合。除了涂些凡士林之类的东西,这里还发明了一种用火烧溶松香,滴在患处的方法,颇经济有效。不过,烫滚高温的松香液滴在皮肉上,是很痛的。事实上,它是烧焦患处,让其脱痂后,重新长肉而已。不过,舍此无他,长痛不如短痛,也只好咬牙将就了。

幸运的是,父母送我一双汗脚,从不会有爆裂之忧。大雪天,穿上鞋子,戴上手套,便大汗淋漓,湿得惊人。不幸的是,出汗后弄湿鞋子、手套,凛冽寒风下,倍觉冰冻难受。最要命的是没有棉鞋穿,既不发,也买不到。很多人自己动手做。我不会做棉126

鞋,只好用布和棉花,缝个半圆形脚指套,套在脚指上,再穿两 双袜和鞋子,勉强过得去,因最怕冻的地方,是十个触地的脚趾。

每次收工回来, 鞋、袜、套均已湿透, 只好在火炉上烘干, 或换上第二套。有时没有火烘, 套子未干, 只好临时撕些棉花绕 缠脚趾, 也很管用, 且可随丢随换, 不用去找火烘干它。

大雪后捡棉花,是件挨冻的苦差事,任务不重,但在寒风中,厚雪上,却冻得难受。胶鞋踏在雪上,冻得双脚痛如刀割。赤手伸出来摘花较容易,但有犹如千针猛刺,痛极钻心。带着手套摘花,虽迟笨些但暖和。不过,粘雪溶化,手套湿后,那种冰冻刺骨的滋味,就更加持久、难受。有的人自织一双只露十指在外的手套,有的把手套的十指剪去来戴。好是好点,依然冻得难受。

我是摘一摘,再放在口边呵呵气,或双手搓搓,双脚在地下顿几顿,或动几下手脚,跳几跳了事。雪花是可爱的,也是可怕的。难怪古人"欲将轻骑逐"单于时,却因"大雪满弓刀"而作罢。

棉花收摘完毕后,最后一个苦差事就是拔棉花柴了。细的如手指,粗的像锄把,半人多高的棉花杆,有如一排排小灌木丛。一百几十亩的小树林,要用人力一棵一棵地硬拔起来。虽然有一种铁钩,但常常滑脱,很不方便。很多人用双手去拔,只几棵,双手便红肿起来,再拔下去,便会起泡、割伤、流血。有的人戴着手套去拔,不到几分钟,便洞口大张,有等于无。每对手套一元多人民币,而我们每月的零用金才二元,谁舍得呢?

在那红色恐怖的环境里,完全不劳动,会吃眼前亏,也不可能。轻则挨打、挨踢、挨捆、挨斗,重则加刑,或惹来杀身之祸。做快了体力不支,也不情愿,最好的办法是磨洋工了。比如,干部来了,干快一点,干部走了,慢慢来或停止休息一下。

拔柴时,是数人一畦地,一定有快有慢,快的干部会表扬他,

慢的会受到辱骂和踢屁股。这叫做"抓两头,带中间","抓先进和落后的典型"。我想了个办法,暗中串通大家慢慢拔,拔快的停一停,或帮助拔慢的,进展差不多,分不出谁快谁慢,务求拉平。原来"绝对平均主义"有时也有掩盖作用。尽管干部嫌我们太慢,催促得声如响雷,气喘如牛,终因找不出落后典型来踢屁股,也拿我们没办法。

劳改场与人民公社一样,每逢收割季节,干部们便层层催逼,发疯似地赶着大家去抢粮。不惜动用拳脚、绳索、镣铐、刑法。那疯狂的气氛,使人想起"三光政策"中的抢光政策。人少、地多、任务大,天热、疲乏、时间长,在摄氏四十多度高温的骄阳底下,面向黄土背朝天,挥镰割麦,真是一种受罪的酷刑。真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了。收割之前,已连续干了几个月的弯腰工作,全身骨骼,特别是两条腿,早就痛得步履维艰,现在又要在滚滚泥尘、灼灼热浪下,练足十二小时的腰功,非有很高的道行,不然实在很难支持下去。

由于营养缺乏,长期劳累,温度又高,很多人中暑或虚脱, 当场晕倒,个个都弄得面肿眼浮。偶然照镜时,几乎不敢相信那 黑而浮肿的光头和尚,竟是我自己的形象。

干部们也很忙,忙着在后面催赶:"'抢黄粮'时候,你磨洋工,你给我'过点油(小心点)!'""你他妈的,给我割快点不成?!""臭婊子养的,你不想活了?"一不顺眼,就照着朝天的屁股群,扎扎实实地踢上几脚。因为那种姿势是很容易踢的,踢起来也很顺脚。

在长期的透支下,我终于病倒了,患重感冒后烧到摄氏 40 度。 流鼻涕,打喷嚏,骨节酸痛,已两餐未吃东西。难友医生给我出了一张休息的病假证明,我交给值班员,看见他转交指导员后, 便饿着肚子,在床上盖被休息。 忽然,指导员带了几个值班员,浩浩荡荡地来到监仓。他凶神恶煞地连鞋跳上我的床来,突然把我的被子一掀,伸手假装在我头上摸了一下,然后冷笑着说:"哼!好好的,一点也不热。想装病偷懒?给我起来!到外面劳动去!"

我躺着未动说:"我得了感冒,四十度,有医生出的证明, 己转交给你了。"

他停了一下,显然在想歪主意。他起初硬说我没有证明,后又改口说: "你那张证明是假的!"我说: "医生尚未死,你可以去问他。"他又大声说: "证明呢?证明在哪里?交出来!"我说: "我从窗口看见,值班员已交给了你了。我能有两张证明么?"他看说输了理,讲不出个结果来,便老羞成怒地喝我起来,我依然不动。他靠近来,朝我头上太阳穴位置,左右两拳,打得我头晕脑胀。我大声喊:"我正在发高烧,又有医生出的证明,为什么不让休息?还要打人?"他又狠狠地朝我身上踢了一脚: "谁打了你了?给我拖出去!"

那些难友迫于无奈,便上来好言相劝,叫我起身,免得吃眼前亏。为了不让他们为难,我猛一起身,大声喊: "你们走开,我自己会走!"那指导员,手拿一条竹鞭,跟在我后面,一边走一边在骂娘。到了收割地,我捡了几颗麦粒后,就躺在沟地上睡觉,不理睬他。其实已支持不住了,睡是睡不着的,在那高温下,只是闭目养神而已。那指导员在众多政治犯前,皮笑肉不笑地跟我打起哈哈来: "哈哈,你这老病号,嘿嘿,有病可以休息嘛……"好像刚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共产党的哲学是阶级斗争,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贯穿着一个"打"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打",党内整风是"打",历次运动是"打",对待争取自由人权的百姓是"打",对待劳改也是"打"。因为毛泽东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打来打去, 国贫如洗, 冤魂充斥。

一次在工地劳动,一个干部给我吐露了一点实情: "你们是 劳改,打你、骂你、杀你,又怎么样?我们是国家干部,有一年 收成不好,没完成任务,我被几个支部书记斗得头破血流。"看来 不同级别的干部之间也是"打"。

有一位入狱已七年,在监仓外搞治虫工作的老难友告诉我们:这个场开建的时候,这块荒凉的野地是茅草没顶,野兔咬死人的鬼地方。最初送来的劳改,多是年老的历史反革命,走路多已蹒跚,却要在隆冬、酷暑里,饿着肚皮去砍茅草,挖茅根、挖地。任务天天下达,而且一定要完成。倘若发现谁的草根捡得不干净,土块打得不碎,任务没完成等,晚上收工回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场残酷的殴打——斗争。拳脚交加下很多人呕血,甚至当场丧命。

可是那任务又确实难于完成——天寒地冻,地硬似铁。砍芭杆还好一点,挖茅草头可难。十字镐挖下去,飞起一些泥花,震得虎口麻木,地上才一个小白点。待到炎夏,恰如置身开水之中,热得眼花,晒得脑胀,气都喘不过来。十几个小时,能不倒下去已算不错的了。有一次,正值骄阳逞淫威,热滔似炉火之际,大家被赶出去地里劳动。那天昏倒了十多人,有三位老兄,先后趴在地上,当场死去。监工的干部还说他们想装病偷懒,上去猛踢了几脚,喝令他们站起来。唉,死了还不肯轻易放过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休息日,星期天,何时是年,何时是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流血流汗地完成那些永远也完不成的任务。

再次调动

有一天,全中队集合,分两排坐在各自的床上开大会。指导 130 员、队长、主管干事、一般干部全部参加。只见他们手拿笔、**簿** 逐个发问如下内容:

- 一、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份?
- 二、犯的是什么罪?"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
- 三、判多少年刑期有无加过刑?

所谓"现行反革命",包括一切"不满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向往自由的人。内容包括:偷越国境、写"反动"标语、组织"反革命"集团、持械暴动、参加地下组织、收听敌台(香港、台湾、美国之音、苏俄等电台广播)等。甚至收错电台、讲错话者,也被列入"反革命"之行列。青年居多。

所谓历史反革命,包括日、伪满和国民政府中之党团、军、 宪特、保甲长、乡区县长等人员。老人居多。

有个青年,小小年纪,已是自发群众组织"人民救国军独立团"的团长和参谋长了。当然那是自己封的。另一个青年,当指导员问他"反革命组织"名称时,他大声地、逐字地说:"中国人民自由党救国军第一师。师长已枪毙,我是参谋长。"很多则是没有挂招牌的民众反抗组织,少的几人,多则纠集过百人持械打游击。有的是原共党党员、团员、军队、公安局及民兵成员。大家似乎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学学毛泽东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经过详细登记后,我们被分成三种类型——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刑事犯。每个分场,有三个历史反革命中队,三个现行反革命中队和三个刑事犯中队,外加一个副业中队。当时的二分场(小山庙),一、二、七是历史反革命中队,三、四、六是现行反革命中队,五、八、九是刑事犯中队。其中六中队是分场的"重管队"。

把我们严格地分离开来的意思,是免得老一辈的向我们上历

史课, "灌输反动思想"。也不让我们年青人,向老先生们透露如火如荼的"反革命"真实状况。更阻隔我们这些"敌我矛盾"之辈,向"人民内部矛盾"的刑事犯,宣扬自由思想,反抗意识或谈论海外消息。

有一天,我们被通知留下来不出工,并叫卷铺盖。十多人跟着一名干部,前后有两支冲锋枪押送,调到几里外的四中队。同我一起调到四中队的,有一个小青年干君,以前见他磨洋工时,老练的态度、滑头的表情、善辩的口才,一下子使我产生好感。经过交谈,很是投机。我发现他的智力早超过了他的年纪,小孩子的外貌,大人的心思,而且热爱自由。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但也只限于谈天说地而已。

刚到时,下午到田地捡花生。这里的土质硬,不像南方的沙 地那样,一拔而起,而是把苗拔起后,最少有一半花生还留在土 内,要用小锄小铲,慢慢挖出来。

有一个胖胖的广州人,过来笑着与我搭讪。他是企图带银行钱款,"偷越国境"者。他好奇而友善地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也问了他一些作息时间、工作内容、生活膳食、纪律等问题。这本是人之常情,也是每个新来的人最关心的事情。但通过他的阶级斗争观点,竟可以成为日后的"冬训运动"中,"交谈案情"、"了解哨兵上下班时间表"、"谈论外面情况"、"企图逃跑"等的材料。

我们的小组长,是个几重性格的人。对干部曲意笑迎,拍尽马屁,对老弱病残,则吆吆喝喝,一天到晚听到他在嗷嗷叫着骂人。分菜时,把好点的或"加餐"的小肉丁,全倒进自己碗里,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在背地咕哝。很多人在交谈中,说出了怨言,我本身也很反感此类行为,故此也表示不满。但马上就有人为讨好组长而去告密。于是那位苏组长,便怀恨在心。当时我还132

不知道,只是有一次在小麦地劳动时,见他找指导员谈了很久的话,并见他俩不时地望望我。我心中感到有点问题,也许在讲我的坏话,但没有想到,他竟然无中生有,假造事实,诬陷我与于君,想组织逃跑。

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各小组长都到图书室开会,回来时气 氛有点不同,小组长没有传递开会内容,却见一些人在窃窃私语。 果然,全队集合在图书室,唱起语录歌: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 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 这是批判斗争前 奏曲。当时在社会上、机关团体、党校、军队、监狱等,只要唱 起了这首充满火药味的歌,就意味着有一场冤陷的大风暴到来。

我和另两位难友先被中队长叫到院子里,等待挨斗。先带进去的一位老头是无关紧要的人物,主要是有一些不满言论,挨了不少巴掌和辱骂后,写写检讨了事。然后干君被叫进去,只听到一片口号声和起哄声,听不出个名堂来。想到"煮豆"燃豆箕之时,一些人还要相煎恨不急,内心很是惆怅;但又明白"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儿"的道理,也就释然。

轮到我过堂了,我们叫做"上金銮殿"。我知道这是斗智也是斗勇的场合,决不能软弱,也不能存在幻想。否则你站着,他要你坐着。你坐着,他又要你躺下。到你躺下,他还要加上一只脚,叫你永远不得翻身。我集古今愤怒于一身,激怒得双目圆瞪,昂着头阔步上"金銮"。大不了一死了之,决不能低头受辱。哪个流氓打手敢上前动手,一个够本,两个有赚。

由于我有决死的决心,眼里充满怒气,所以发言的人都离开 我一米以外,不敢近前来。为了提高我的勇气,我尽量想到沉沦 后的惨况,嘲笑发言者的议论,想到我家庭的过去,父亲的往事, 来抵挡他们的进攻。脚下不时发出规定了的口号声:"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打倒反改造分子叶少华!"我背着双手,眼望高处, 直直地站着,抱着任由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心理,随便他们叫嚷。

有一个姓陈的钦廉人,从后面上来,拍我的双手,叫我把手 放下站好。我猛一回头转身,他吓得连忙后退。

我责问他: "你动手动脚干什么?!"他说: "我叫你站好!" 我反问他: "难道我在坐着么?"他说: "你的手没放好。" 我说: "手放在何处有什么关系?只要耳朵在听就成了。我 正'专心'听大家的发言,你为什么上来捣乱?"他是个老粗, 受不了我的抢白,只有木然。我知道对待这些人,有时是要强词 夺理的。当然台下又响起了一阵"打倒反改造"的噪音。

这时中队长上来说:"你在干什么?你还想打人?!"我说: "队长,你是看到的,我在接受大家的帮助,他上来捣乱,破坏 会场秩序,同时先动手动脚的,我也未还手。"据理力争,争取大 众同情的道理,我也是深谙其义的。

大会批判继续下去,但上来的人减少了,也离开我更远地站着发言。那个曾"友好"地与我闲谈过的"拐款越境"者,这时一反常态,雷吼般地说我向他打探过周围情况,企图逃跑。他那副带笑的面孔,坦率的言谈,原来是伪装出来套取材料的。那位克扣囚粮,又爱骂人的小组长,也说我与干君等人很好,经常用闽南话交谈,肯定在策划逃跑。

有一位上来发言的人,年近五十,穿着一件用装过大米的破麻包布自制成的大翻领西装,手上托着发言稿,在之乎者也地发言。他反复地骂我"思想反动","资产阶级意识极端严重","向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等等。我用眼角观看他那件精工制作的大翻领麻包西装,结合他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发言,觉得言行不一而感到好笑。

"你笑什么?"他忽然大声问我。我方知神情中已把笑意流 134 露了出来。

"这家伙不老实,竟然耻笑我们!"脚下吼声又起。

那时候,人们是不准穿西装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衣服, 是享乐与腐化的表现(中共前外交部长陈毅,因爱穿着西装接见 外宾,"文革"中,也成了戴高帽游斗的一条罪名)。我决定以此 反击他的批判。

我镇定地说:"你在谈论资产阶级腐化与享受的问题,如果你不是资产阶级意识更加严重的话,试问一块破麻包布,你怎样把它制成大翻领西装来穿呢?你有资格来批判我么?我又没穿西装打领带,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何在?"他受了我的挖苦与反驳,无可奈何地谈完了事,但气势大减。

一些人是被迫或被动员上来应付几句的,全是不关痛痒的事,我也只是配合着熬时间。有一个副组长,上来揭发说: "有一次下雨后,池塘里很多青蛙在叫,叶少华说:'嘿!好像人民公社社员们在开大会哪'。他故意攻击人民公社制度。"真是莫明其妙,居然凑出这种罪名来。我根本就不会,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在大会上,不轻易回答任何问题,是很重要的。有利时答一两句,不利时坚决不回答。因为回答那些多如牛毛的莫须有问题,是永远答不清的,言多必失,又会让他们钻了空子,越拖越长越复杂。只有装聋作哑,让他言者滔滔,听者昏昏最好。果然,睡意来临的听众,已没有心情去听那些东扯西拉的发言,有几位仁兄发出了鼾声,我知道自己今晚快胜利了。

第二天,没有让我出工,留在监仓写交代。我正好趁机让异常疲乏的身躯,好好地静休一下。叠起被子作台,写了点开场白后,我开始闭目养神。静思中,我觉得对付这班败类,不能过分姑息、忍让与屈服,应适当给予反击,以挫其气焰。下午,我除大书冤枉之外,对此辈常假造事实及狱霸行径,予以驳斥与指责。

同时字里行间,故意写了很多错别字和不通顺之句,让他们看出 我只是个平庸粗俗之辈,没多大能耐,"跳蚤掀不起被窝"。这样 他们就会安下心来,免得把我当成"知识分子",而虎视眈眈地注 意我。

A STATE OF THE STA

忽然,大门外闪进一个影子,细看是分场的教导员。他诡秘地凑过来,与我打哈哈: "交代得怎么样?告诉你吧,人家都已经坦白交代了,不要那么笨,就看你的态度了。哈哈……"那幼稚又狡诘的样子,像把我当小孩子来哄一样,我打心里感到好笑,根本不存在的事,谁会"交代"什么呢?晚上,还是上了一回"金銮殿",不过气氛明显缓和得多,冷清清地捱时间罢了。

不久,运动转入小组个人评比,轮到我可以发言了,我根据事实,以理以据痛斥那些诬陷者,骂得他们狗血喷头,大快人心。后来那组长丢了官,变得老实多了。有一个难友对我说:"他给你骂好了。"看来懂得合法斗争也是必要的。

四中队和其他队一样,一百五六十人,除了绝大部分白天出外劳动,晚上回来囚禁在电网高墙内之外,外面还有杂务组,包括牛房、猪房、马房、羊房、鸡房、菜园等。这些人是经过挑选的:要表现好、刑期短,最主要的是没有逃跑嫌疑。但也有趁机逃跑了的。

除了羊房是一对和气待人的就业老夫妇外,其他皆是劳改积极分子,他们吃住都在各"房"内。虽然,看起来是"自由"了一点,但繁重的杂务工作,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很多人宁愿留在有冲锋枪看押下的大班里,而不想去外面的杂务组。

农忙的晚上,我看见指导员手执竹鞭,把一个带病的积极分子兼值班员,从牛房里抽打着赶出来参加"压场"(用拖拉机着大石磙,磙压场上的稻或麦,其余的人用三齿叉翻动)。这里每天三点钟就见一轮红日滚金球了,干到晚上八点才盼到白山依山尽。

吃完饭便要去挑稻麦回来场上堆积,然后"压场"到午夜一点才收工,吃了加班粥,洗个澡已是两点钟,睡不到一个小时又准备起床,天天如此连续干几个月,真是要命。幸好太陆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有一个多小时的午睡,倒能弥补一下睡眠之不足也。

我们吃饭,是以小组为单位,在内院集合后,由小组长带到大铁门口,向岗楼哨兵报告,要等待一声带鼻音的"去",才能走出大门,到三十公尺外的大伙房,领取饭菜回来,到了大铁门外,要经同样程序,方能回到监食开始吃饭。如果没得到鼻音之恩准就出门,大兵就会用冲锋枪扫射,格杀勿论。

有一个难友,走到大门口,用闽南话说: "报告大军: 我要返屋企(我要回家)!"那可能是个新兵,大概"报告"二字是听懂了,但以为他要到外面的队部,找干部谈话或有紧要之事,便神气地哼了一声: "去!"那老兄便赶紧开步走。由于初到贵境,人生地不熟,转来转去,闯到分场去了,而被押回。批斗会上,他坚决宣称: 报告干部: 我不是逃跑,我回家是经过看守员批准的,他说过"去"的!一时传为笑料。

有一个晚上,开大会批斗一位老难友,主要是他对判刑不满 "不认罪服法",私说了一些牢骚怪话: "散播反动言论"。一些 积极分子上去边打他的后脑袋,边叫他低头弯腰。事后一些难友 告诉我——他原是某市一富豪,内陆变色前,与共党有来往,并 出钱资助他们,他的大宅还是逃捕的避难所。共党对他许下天地 愿,保证日后不动他的财产,还会给他官当。当"土改"来了的 时候,不但照样没收他的家财,划为大恶霸地主,还枪毙了他的 父亲,他本人亦被抓来劳改。

正所谓, 散尽家财千万, 换来囚徒生涯。一张空头支票, 与 贪婪心理, 毁了他的一生。

这里的青蛙(南方人叫田鸡)特别多。早春耙田的时候,堆

满了水田、田埂。一群群一堆堆,蛙上叠蛙,叫声振耳。大概由于当地人不敢吃青蛙之故,它们对人没有丝毫警觉与害怕。每当不忍让其成为脚底酱,而用脚拨开它们时,它们总是莫明其妙地呆呆地望着你。后来,外乡人来了,由于饥饿,有人捉来偷偷地煮了吃,慢慢地它们也开始逃避开了。

监仓旁边有几个废置的红薯窖,周围尽是野草,坑底积满了水。有一次,我好奇地走近张望:哇!好多青蛙。直径两公尺,高一公尺,叠成圆椎形,尽是又肥又大的青蛙,总不少于一百斤。若按五个坑计,则共有五百多斤鲜肉在其间。这简直是上帝的恩赐,让丰富的蛋白质浪费,实在是罪过。

我与几位难友商量,过两天星期日,我们借故出来洗澡,把它们弄些起来晒干或煮粥食。当然得与外劳人员"挂钩",二一添作五,大家加加餐是了。很可惜,猪房一位老兄,随后也发现了,由于他在外面,很方便地捉个彻底,斩碎喂了小猪们。那晚指导员还表扬他:积极想办法养好小猪,抓到青蛙,自己不吃等等。(哪有猫不吃鱼的呢?)只可怜我们到嘴的烤鸭又飞走了。

难友们打趣说: "好家伙,小猪的运气比我们还好。" 我笑了 笑说: "看来老天有意,令我们少杀生,多积阴德而已。"

有一位临川县人,是牛房的,我们素昧生平。他只听人说我爱吃青蛙,便每晚进来上夜学习之时,带几只油煎"全青蛙"给我,连续月余不断。在那困难岁月里,有几只下足油盐酱醋的"全蛙"下肚,真是要谢谢他了。

中队有位难友,劳动时,捡到一条小鱼和几只蚌壳,回来用水煮了准备下饭。但被干部看见了,过来把美汤一脚踢翻在地,并把他臭骂了一顿:老是想吃好穿好,怎样改造思想?鱼肉吃多了,会影响世界观改造,会"变修变资"的,那是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意识反映。只可惜,在他严肃地教训那仁兄时,干部小伙

房却飘来阵阵煎蛋与榨菜炒肉丝的香味。令他的高论,大打折扣。

这里另一惊人现象就是天鹅(野雁)特别多,可以用漫天漫地,铺天盖地来形容。飞起来,可以遮住整个天空。扑翅声,叫喊声,令人振耳欲聋。又使人想起千军万马的军队,和汹涌澎湃的巨浪。计数要以万为单位才成。每只约七八斤重。比家鹅小,略带灰褚色的野雁,是飞翔的季鸟。每年冬季十一月左右,由西伯利亚南迁到此过冬。靠吃麦苗、野草为生。天气转暖后,又结队飞回老家产卵生育,周而复始地世代繁衍下去。

当地的小麦苗,也很奇怪,让野雁们吃个稀稀拉拉后,次年长出的苗杆才会粗壮,结的粒颗反而又大又多。否则,太密了,苗又小又弱,像牛毛一样,结不到几颗粒子。所以没有人认为野雁会危害庄稼,反觉得有利于庄稼成长。他们停下来"吃饭"或睡觉时,都留有伸长脖子张望的孤雁哨兵。我们多次想靠近它们,都未成功,一旦进入它们的安全圈以内,哨兵"嘎嘎"几声惊叫,全体便"噗蓬噗蓬"地,如乌云升天地。它们起飞很笨重,几乎可追得到手,一旦升天,就快速灵活得惊人。

当地百姓,也有用很长枪管的鸟枪——"铳"来猎取。入夜时,藏身事先挖好的小坑内,盖上麦草之类,伪装埋伏到天亮,要不动声色地耐心等待。

天亮时,看清楚目标便开枪打,有时一枪能打五、六只之多。 有的闻枪倒下,有的负伤低飞。他们便突然起身与狗一齐追赶。 每只才卖五角钱人民币,但我们是不准买的,据说吃了会变"修 正主义",只有干部们才能炖来下酒,驱寒补身。

重回老虎队

有一次在麦地劳动,一位姓单的干事,对我诸多挑剔,故意

找麻烦,还说我偷懒。我忍无可忍,与他吵了几句。回队后,他向指导员告了我一状,说我调皮捣蛋、磨洋工,并有一批闽南帮的反改造小集团。

공연하였습니다. 그들 보다 한 상 사람들이 그리들 하는 한 중 사람들이다.

过了两天,我与干君等一行七人,挑着几套破旧衣物,由干部和两名持冲锋枪的监兵狱卒,监押着调回分场重点监管队——六中队。这个中队监禁的全是监狱、看守所、农场集中的重型"新生的政治犯",即危险分子。那里环境恶劣,干部又极尽分化、瓦解、胁迫,利用欺骗、利诱、拉拢、打击之能事,所以情况特别复杂。两极分化也明显得多。"猎狗"、"鹰爪"、"软脚蟹"和断了脊梁的"癞皮狗",相对来说就较多。干部怂恿大家互相检举揭发。

比如:谈及女人,就是"宣扬色情, 掀动他人怀念妻儿子女,不安心改造"、"下流意识"、"腐蚀青年一代"、"毒素"等等;谈到吃喝,那是"宣扬资产阶级腐化堕落和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连谈一下今晚吃什么菜,也是"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在脑子里的反映"。认一下同乡,叫一声老兄,三两个人多点接触,也是"拉拢组织反改造小集团"的行为。穿了没印劳改字样的衣裤,或衣服整齐一点,马上会有人汇报说你企图逃跑。

有了问题,小则批判,重则加刑。

这次我们调回六队,也不过是一般的"改造需要"式的调动而已。但四队的干部,却以此事大作威胁文章,扬言我们七人因反改造,已禁闭起来了。不久,分场开冬训动员大会,四队的难友又见到我们大家,便奇怪地问我: "怎么?你们没关起来呀?他们尽会说假话骗人。"六队干部也一样。有一个曾任过厦门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的难友,被调走后,干部便大事渲染说: 他已提前释放回闽南,安排工作了,你们要积极改造,争取政府宽大。半年后,我因反改造,调到五分场四队时,又见到那位前所长仁140

兄。我问: "干部说你早已提前释放,回家团圆去了,怎么还在这里陪我们啃红薯哪?"他气愤地说: "回他妈个屁!尽说好听的。"

六队的蕃薯地很大,约八十多亩,收的蕃薯堆积如山。但吝啬的干部,舍不得把大点的蕃薯(当地叫红苕)给我们吃,下令把一二尺长、长有根瘤块的薯根统统收起来,说是"不能浪费国家粮食"云云。

吃晚饭时,我们照例按小组整队后,到大铁门前报告岗楼哨兵,出外领饭。今晚厨房的老兄,似很慷慨大方,大把大把地往我们饭盆(这里没人用斯文的小碗,全是大的汤盆、脸盆之类作为饭碗,以防漏掉、扣掉)里抓。我第一次听见有人问我"够不够?还要吗?"真是难得的开恩哪!但我也第一次赶忙谢绝把这些树根、枯枝似的东西,再堆上我的大搪瓷碗里去。

领饭回来的人,两种态度很明显:敢怒不敢言者,道路以目。 有胆色而风趣者,则指桑骂槐。

"好消息!今天随便吃(薯根)!人道主义来了。"

"这叫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

"我们今天过的是共产主义式的好生活(牛马一样的工作, 猪狗一样的待遇)。"

有一位仁兄比较细心,边吃边数: "······十条······二十条··· 三十条·····哈哈! 我今餐吃下五十三条蕃薯! 从未有的奇迹!"

这一提醒,很多人也跟着数。有报六十多条的,有报七八十条的,有一老头笑着说:"我整整一百条哪!"我也默默地数着。 当我突然大声宣布我的成绩是:"梁山泊好汉,一百零八条"时, 大家都大笑起来。我的天!一顿一百零八条蕃薯,真是从未有过的事。当然,那不过是一堆难以入口的薯根罢了,我们只能啃中间突起的小薯茎充饥而已。 一到红薯季节,伙食就糟透了:早餐是红薯,午餐是红薯,晚餐是红薯。昨天吃红薯,今天吃红薯,明天吃红薯。上月吃,这月吃,下月还要吃。吃足几个月,冬天藏在窑里,还有吃的,真是要命。

尽管他们宣传红薯是宝中之宝,营养丰富,但我们是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疲乏无力了。其实烤红薯、红薯糖水乃儿时最爱,但吃成红薯人了,确也十分害怕。天天蕃薯,吃得大家头胀肚也胀。但可以在工地劳动时,多报告两次"上厕所",休息一下。也可在晚学习时,到厕所去闲谈,交换一些新闻,听听"路边社"消息。

这里种植一种朝鲜移植来的白色玉米,又长又大,直径足有几十公分,长则四十公分多,名符其实的玉米棒棒,可以打死狗。

很久很久,未曾尝过玉米的滋味了。有一天每人领到几根大棒棒时,感到很惊奇:干部又开恩了?大家满以为这回可以饱啃一餐,还却肚皮债,祭祭五脏庙了。谁知啃起来才知道,那谷粒坚硬如石,抗压强度之高,咬得牙齿又酸又痛,仍无法成咽。

我硬啃了半小时多,仍没有什么进展和收益。我想:与其"费心机,挨眼睡",劳而无获,还不如跟着周公去梦游列国。便把一笔可观的"财产",送给那些铜牙钢齿者去了。尽管饥肠辘辘,疲乏的双脚最后还是把我带到狗窝一样的床上。玉米又叫"珍珠米",其实应叫"钻石米"才对。

有几位仁兄不死心,自认"牙将"道行高,收集了一大面盆,移位到院子角的屋檐下,缓嚼慢咽去了。一直到下午开工,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看见他们也只硬啃蛮吞下两根左右。一位农民出身的难友,站起来,边摔边走地说:"也好,总算咬番渠二啖(咬回他两口)!"当然他所指咬的是干事。

"菠萝密(他妈的)! 这是给人吃的么?"一位闽南某县的难 142 友暗骂起来。

"为什么会移植这些玉米?换些软点的来,不就咬得动了么?"一位小孩天真地说。

"换了软点的,好吃的,蛋糕似的来,你我又吃不到了!"我 笑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报以一个会意的苦笑。

敲骨吸髓似的"夏收夏播"和"秋收秋播",弄得大家精疲力尽、腰酸骨痛后,总算熬过去了。一些人累病了,一些人病死了,一些人则在莫须有的反改造罪名下杀掉了。大家消瘦而苍老了。各中队的人数逐渐下降,任务依旧,我们负担的压力也逐渐加码,但他们的粮食却堆积如山。如果说,那些农作物是劳改们的血汗浇出的,那么,那些大量廉价出口的白米,也掺有劳改白骨的成分在里面。

以前,听老人说当地的习惯是半年劳动,半年休息。深秋寒冬之际,百姓大都躲在屋子里聊天、喝酒、话家常。妇女们纳纳鞋底,缝缝衣服。或是赶亲戚,赶集(趁墟),准备节菜年货,生活也过得优哉游哉。

自从"太阳升"之后,一切就变了,"农家乐"再也看不到, 代替它的是永无休止的奴役和苦工。老百姓虽然被称为当家作主 的人民,但实际上是被控制于公社、没有人身自由、仅保留一个 小家庭的农奴。而我们则是一群十八层地狱下一无所有、牛马不 如的奴隶。

天冷了,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赶狗不出门的时节, 干部就忙着赶大家冒雪去挖泥、拉土、移山填坝, 兴修水利。这是一件非常沉重的苦役。我们要筑的水库, 是在两个山岗之间填建一道高耸的堤坝, 而土的来源, 则是把两边山顶挖平, 用胶轮板车拉到山脚下, 逐渐堆高夯实成坝。由于山坡高, 路又崎岖不平, 拉着上千斤重的板车, 一泻而下往前冲, 只要开了步就煞不住车,

真是险象环生,提心吊胆。很多人因车轴折断而摔倒跌伤,有的 撞断筋骨,有的压断手脚。有位仁兄被一车泥压在底下,大声呼 救,动用十人,才将他从泥堆中解救出来。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但这里的我们,却是"下岗不易, 上山更难"。当拉着一部几百斤重的空车,沿着四十五度角的斜坡, 挣扎到山顶时,直弄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湿透的衣裳在凛烈 的寒风中,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非常辛苦。通常,我们每天就 这样来回奔跑着干十二小时。得到"伟大劳改政策"、"人道主义" 的待遇是一天分一勺稀饭、两碗干饭和一点儿发霉的腌菜,没有 一滴油,外加辱骂、拳脚和殴打。

拉车时,重车下山,大家要身穿棉衣裤戴棉帽,抵挡迎面而来的刺骨寒风,空车上山时,反而要脱剩单衣,棉衣裤则放在板车上,到了山顶又穿上,否则凛烈的北风,会吹得你浑身发抖,着凉生病,特别是满身大汗,穿着湿衣的时候。渗透汗水的棉衣,不时散发出汗酸臭味。

我虽未曾出过事——大概当年为国家篮球三级运动员时,练就了一点长跑和闪避的能耐吧——但早已累得头昏眼花,两条腿肿痛难忍,好像不属于自己一样。每天只是麻木地、机械地迈着双腿,去走那永无止境的痛苦历程。

有一次,我拉的板车掉了一些滚珠,行起来"格格"作响,按规纪是可以到临时修理点去修理一下的。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休息的机会。修理点的那位难友,烧了一堆火御寒。尽管北风呼呼,坐近火堆时,也很温暖,特别那早已麻木了的双手。这倒是真正"雪中送炭"了。搞修理的难友,我并不认识他,但他显然知道我这个"一贯反改造的顽固反动分子"。对我很客气,叫我"烤烤火、抽抽烟,休息休息,不要着急"。别人的车子后到,他却先修好叫他们走,我的车子,一直放了约一小时,才慢慢给我修,我144

知道他是用"照顾"来表达他的同情心。

我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息,又能烘衣烤手,心里自是非常感谢这位好人。虽然我由于衣衫太单薄,给北风吹病了,感冒发高烧,但我一点也无埋怨之意,而永世未忘这无名难友的恩典。我得了重感冒,体温升到四十度,干部还要我出工。幸得一位正直心肠的难友医生,力排众议,出具一张证明,才使我有机会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我刚退了烧,尚未痊愈,又给干部赶出去参加"愚公移山"了。唉,太行呀,王屋呀,何时搬得完呢?

我们这个太行山头,全部是六中队的新生政治犯。占据对面 黄屋山头的,则是七中队的年老历史政治犯。两边拉土下山筑坝。 我们辛苦,他们比我们更痛苦。他们大部分都过了知命之年,仍 要在"朔风骤,牵衣袖,向晚寒风人怎受"的酷寒里拉着重车颠 跑,弄得老骨头"格吱格吱"地响。他们原都是有地位、有声望 的"长字辈",在大陆的历次运动、清算、斗争中,捉来劳改了。

由于我们离队较远,干部不想"浪费"来回走路的时间,好让我们每人多干两个小时,加速改造我们"资产阶级世界观",以便早日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所以决定午饭在七队吃。经难友的介绍和偶然闲谈,我认识了很多同乡的亲戚、家父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这些老难友,老前辈,非常尊重我,对我很友好,每次见到我都必起身迎接。我亦很尊敬和同情他们。我们也只限于询问一下近况和家乡风貌之类,没有谈什么。

完全基于同情,我把积存的三十多元代用券(劳改场不准用现钞,以防逃跑,故各分场都自制一种同价值的粗糙代用纸钞)全部分送给他们,意在让他们设法买点东西吃(其实劳改场也不准买吃的东西,"设法"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他们着实太可怜了,花甲、古稀之年,还要在异乡寒风下服苦役,做牛做马,挨打受骂。生命朝不保夕,无任何保障。往往说错一句

话,干部心血来潮,"运动"框框套上头,就会惹来刑罚或杀身之祸。动辄得咎,没有丝毫申辩的权利。他们的亲人,要是能想像出一点集中营的情景,真会哭断肝肠呢。

"干事"素描

中队负责伙食的庶务长,不喜欢人家叫他庶务长,要说:"报告干事",他才高兴。大概觉得庶务长只是管油盐酱醋米菜的,而"干事"才是政治干部吧。他老婆娘家住在不远的和魏集,回娘家时,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搬。有一次搞清洁卫生时,在他们窗外地下,挖出了一大堆倒掉的绿豆黄豆。而这些东西,我们是轻易吃不到的。

这庶务长,人倒不怎么样,毕竟是管帐先生,没有一般政法 干部的精明和严肃。但有个非常讨厌的毛病——喜欢讲话。或者 美其名曰"爱作长篇报告","爱作指示"吧。十多小时的沉重劳 役,加上晚上两小时的学习,已够要命的了,而他老先生又偏爱 在"不妨碍正常学习时间"外,即学习后开始演讲。一讲没完没 了,天南地北国内国际,生产学习,油盐柴米的,一发不能收。 每当他来"掌握学习",我们就怕了一半,一旦他清清嗓子:"唔, 我简单讲几句话……"时,我们就知道:完了,又要少睡几个小 时了。因为他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人,他那很少变化的开场白, 翻译起来其真意就是: "唔,我复杂地讲几万句话"了。我真佩 服他口若悬河的胡扯,与一气呵成的堆砌,更有道行者,是讲数 小时不需喝一口水。只是苦坏了我们。不过,他有个好处,他讲 他的,你睡你的(当然只能坐着打瞌睡,不准入被窝)。他会旁若 无人, 视而不见地踱他的方步。言者只管滔滔, 听者可以昏昏, 从不叫醒任何人。一直到夜半,电灯眨眼,警告快要熄灯了,他 146

才余兴未尽地勉强收场。这固是干部们的通病,却实在是一种精神折磨。

有一天,他在大会上宣布:不久,每人发一双新皮鞋。发皮鞋,还是新的?一些人很高兴,因为脚指已冻烂了,有双皮鞋穿穿,该多暖和哪!另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则不无怀疑:会发新皮鞋给这些"反革命"穿?这种高级享受,不是又会变成资产阶级了吗?第二天,真的发鞋了。但却是草绿色、质地很差、内部称为"解放鞋"的胶鞋。哪里有皮鞋的影子?

过了一天,我不无讽刺地问庶务长: "你不是郑重宣布过,每人发一双新皮鞋的么?怎么没有哪?"他惊奇地问我: "怎么,没发吗?你没有?每人都有一双呀!"我说: "哪有什么皮鞋,全是胶鞋。"他说: "对啦!那就是皮鞋呀!胶皮鞋嘛!"呵,我现在明白了: 胶鞋他们叫胶皮鞋或橡皮鞋,简称"皮鞋"。我们说的皮鞋,他们另有名称——叫"牛皮鞋"。

有一次,中秋节到来,庶务长又哗众取宠地宣布一件大喜事一一每人两个中秋月饼。从伙食费里扣除,不用掏钱。哗!两个。我们一听,粗略计算了一下:每小组十五至十八人,则每组有三十多个月饼。于是各组长都选了一个最大的面盆,洗刷干净后,排队出外领饼去了。其余的人眼光光地在院子内,跷足而待,幻想着如何品尝此异乡月饼。盆是空的,见不到几十个中秋月饼堆叠起来的引人景象,大家以为又变卦了。但远远询问有无时,回答却是肯定的"有"。走近时,才恍然大悟。三十多个形如铜钱大小,略厚三分的小薄饼,仅能覆盖盆底,那就是湖北中秋月饼了。怪不得回来时看不见。有的说:"我的天哪!多么大的月饼!"有的说:"哗!'铜钱牌'中秋饼,真是大开眼界!"

有个曾是老师的吴难友说:"老弟,月亮不一定是外国的圆, 月饼却是劳改场的小。一口一个,干净利落。生平第一次吃这么 '斯文'的月饼,有幸有幸!"他摇头晃脑,自娱自乐之际,我呆望着月亮沉思出神。我忽然问他: "吴老师,相信嫦娥的待遇要好得多,此时正受用着'火腿月肉'或'双黄莲蓉'月饼吧?"

他也抬头望着那耀眼的银盘,若有所思: "……偶过广寒宫未闭……"我接过来说: "便把月饼抱回来!"他哈哈大笑: "对了!把月饼抱回来。" (广州状元论文叙诗中,应是"便把月亮抱回来"。)

中队有个小个子干事,南方人,爱贪小便宜兼欺善怕恶。但他老婆心地较善良。一家五口,靠每月三十多元人民币为活,捉襟见肘。由于带班时爱摸鱼摸虾,常被指导员责骂,他便把怨气泼向我们身上,老是找我的岔子和毛病。隆冬腊月下雪天,他老婆还穿着一双塑胶凉鞋,冻得与他吵架,嚷着要回广西去。当他骂她时,她也不示弱: "怎样?你想欺负我?你这个乞丐(劳改)头,你吓那些乞丐还差不多!"干部是"乞丐头"?多新鲜又有趣的名词!我们听后都竞相传语,捧腹而笑。也为自己沦为"乞儿仔"自嘲。

他老先生难得到一次武汉,带队参观长江大桥,回来后,什么都未买,只带回来一截竹筒,值两毛钱,为的是戒烟,改抽廉价的大竹筒烟。他老婆知道庶务长克扣我们一千多斤粮食"上缴"后,跑到总场去投诉,结果当然是官官相护,不了了之。在宁左勿右的政策下,哪里有道理可讲呢?

有一次,我们小组在靠近水塘边的地里摘棉花。忽然,一位 难友发现水塘边的草里,浮浮沉沉地游过来一条草鱼。那鱼可能 有些不妥,下去捉它时,鱼并不反抗。那难友可高兴啦!在那种 饥寒交迫,难见腥荤的困苦日子里,得到一条二斤重的大肥鱼, 真如外面的人中了彩票般高兴。

有的说: "清蒸最是原汁原味,放些姜丝在上就行。"

有的说: "红烧也不错,用蒜头起锅,然后打个圈。" 另一个说: "不,用盐腌后晒干,再用油炸,既香又脆。"

干事大概提前闻到了油炸草鱼的香味,老远就快步走了过来。他问: "七野事甘欢喜呀(什么事那么高兴呀)?"他看到了大草鱼。"哗!甘大条鱼呀(那么大一条鱼呀)!"然后毫不客气地左手拿过来,右手捏捏鱼肚说:"嘿,还很新鲜,不错不错……"边说边已开步走。既无人说给他,他也未问人家要,拿了就走,好像本来就属于他的一样。

那几位发表过宏论,准备下厨大显身手的伙计,此时此刻,被突然而来的"形势"变化弄糊涂了,忘记了摘棉花。六眼相对,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好像动着的画面突然停住了。但有一点,大家内心却是清楚的:手中的草鱼,实实在在地给抢走了,消失了。

我望着他们呆呆的样子,深觉可笑: "喂!大公鸡(绰号)呀!怎么样?清蒸、红烧,或是油炸?放姜丝呢还是放蒜头?"大家从凝固中化解开来,终于哈哈大笑,笑得眼泪也流了出来。南方人有句俗话:"乞丐碗里抢饭吃",不知是不是指这样的情形。

劳改队轶闻

这里的编制是一个中队分成两个分队,每个分队约有五、六个小组。但在我们使用的工具上、监仓墙壁上,却留有某某排、某某班的字样。老劳改告诉我们:那是在我们到达之前,才调到青海去的难友过去的编制名称,"排"等于现时的"分队","班"等于现时的"组"。

这个叫沙洋农场的劳改队,自成立以来,约每隔两年,配合社会上人为制造的"运动",接收和转移大批的劳动改造者。

如初期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波兹南事件",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三年灾害",1962年的"爱国运动",直至调我们北上的"东京湾事件"。

- X 12 2 2 2 1

每次都由社会上抓到一大批人。监狱人满为患后,就把一批"危险分子"上调集中内地"安全地带"。过去还叫"苏联老大哥"时,多调去黑龙江,现在"反修"后,多调山西、湖北。原来的老劳改,多调往更加荒凉的青海省去。这样,不断地循环,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到劳役营,去补充那些被杀死、被饿死、被禁死、被打死和病死、逃跑、刑满、离队的空缺。真是货如轮转,无本万利。

每个小组,留有一个本地难友作带班,因为他们较熟悉耕作情况。我们初来时锄草分不出野草、野麦、小麦等,也不会用鹅形锄上下地啄土,亦是他们教我们,如何扎马、下按、后拉、前行的。待我们熟悉后,常常把小麦锄去,留下野麦和回头青(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草),每当此时,心里似乎舒服一点。

有一位难友对我们说:"你们来前,我们已听说要来一批'南人'了('南人'即是蛮子)。我们想:我的妈呀,听说蛮子是长着尾巴的,所以,你们一下车,我们都围在窗外看尾巴来了。左瞄右瞄,却看不出什么来,大概收藏在棉裤里吧?后来见你们洗澡时,脱光了竟与我们一样。哈哈……"

我们一听也哈哈大笑起来。我笑着骂他说: "你们胡扯些什么呀?沿海文化发达,大、中学生非常普遍,你们这里一个初小毕业生,就稀如秀才了,绝大多数是文盲,你们才是野人呢。是的,我们吃狗肉、青蛙,猫、蛇也有人吃。因为文化发达到一定程度,认识就会提高到一定水平,就懂得利用大自然丰富的物资。'不懂是草,懂是宝'是也。只能说你们仍处于愚昧时代,还不150

知道蛙、蛇、狗肉丰富的营养罢了。此所谓'不吃狗肉,不知天下之大味也'。"他们笑着,也不断地点头称是。

我略为思索,告诉他们一件事:不过,至今仍然有所谓长着尾巴的人。当年我在海村区细毛山附近,搞采购和游玩时见过。但并非如猴子般生毛,只是尾骨退化未尽,留有约一寸长而已。他们坐的多是窄长板凳,坐时一半屁股要放在板凳后面,若坐圆而大的椅子,中间要开一个小洞,好让尾巴处于悬空最佳状态,免遭骨折之殃也。这些人,是海村区细毛山中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苗族。苗又分生苗、熟苗。生苗较野性,几乎与世隔绝,据说还吃人。熟苗较开化,与汉族有密切来往。由于海村区属于福建省,外地人往往以为南人都长着一条又长又多毛的怪尾巴了。

起初,当地百姓不懂得吃鱼。副队长的老婆是广西人,常到溪里、沟边,漏干了水,抓些小鱼油煎了来吃。并给了本地人的庶务长老婆一些吃。她吃后,惊为天味,也去抓了点小鱼回来,既未清除内藏,就原汁原味地,放在锅里炒起来。结果只剩下一堆又苦又黑的焦炭。到了后来,不光干部吃狗肉,枪兵吃青蛙,连当地老百姓,也懂得利用这些大自然的财富了,这大概是开化的影响吧。

一个周末,晚学习后,大家各择其所地分散在小院里,乘凉、 闲谈。一位平时埋头苦干,不太谈话的难友,向我讲述了一个鲜 为人知的往事。

他原是天津市某警备司令官警卫营里的一名亲兵。辽沈战役后,老先生组成了北平一天津大防线。由于北平的傅作义弃三十万兵投降,天津成了孤军作战的孤城,但司令官们宁战不降,战争打得相当激烈。对方 24 小时分三班(民兵、共兵、苏军)不停地攻城。

"什么?苏联兵?"我瞪大眼睛问他。"是的,红须蓝眼的

苏联兵。"他眯着双眼像在回味。

由于久攻不下,死伤惨重,对方采用了地道战。但非李向阳在里面钻来钻去,四通八达的那种。而是偷偷挖到城墙下方,用超量炸药,半夜里把墙炸破,然后发起人海战术,蜂拥进城。经过非常壮烈的巷战后,天津终于不保。他且战且退,本可跟随司令官上飞机撤走,因协助两个战友逃生,跑到离飞机 50 米处,屁股上挨了一枪,结果被俘了。由于死人太多,城门无法打开,只好被押上城墙顶,他们是从那里踏着死尸走下城外的。一路上,他惊奇地看到很多穿中共军装的苏联和东欧兵尸体。"怪不得,战这样难打,又输了。"他想,"原来有共产国际的支援!"那次激战,三位司令级长官,据说一死、一停、一逃脱。直到如今,知道苏军直接协助打赢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人不多。其实后来的朝鲜、越南战争,除中国外,也有苏联和东欧士兵参加。

· "我们就说,我们们是我们的,我们就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也不是一种就是是这

有一个海村区的青年,神秘地告诉我一件绝密:他放羊时, 把羊群拔出的洋葱头,送给了沟边割草的一位姑娘。小姑娘约十 六岁,感激之余,便山盟海誓地私托终身,一定要等到他刑满出 来,跟他回老家。有一次他还特地指给我看,看来人还清秀、斯 文。他千嘱万叮地叫我决不能泄露机密,否则他会受到斗争,加 刑的。

我想,在虎口下,这段姻缘注定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半筐洋葱,感激到以身相许,少女痴心,不想非议;然而也可知道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内陆百姓贫穷到何等的程度了。但为了不致过分伤他的心,我只姑妄听之,笑笑而已。

表面上,大陆奉行严厉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似乎大家都在过着清教徒般的禁欲生活,但有"不告不理"的执行法则,所以漏洞很大。一些老劳改常常说:只要花五角钱,就会有女人跟你上床;你肯做两套花衣服给她,她会答应

嫁给你。有两位住在外面的老兄艳福不浅。一位是出于同情,给 了捡柴的姑娘约九斤棉花柴,值人民币二角七分钱,那姑娘竟感 动得月下盟誓,以身相送。另一位借了几元给一村姑,村姑因贫 困无法偿还,这仁兄大方地不作追究。那村姑便主动上门,夜夜 相伴。

从沿海来的几千名"政治犯"中,很多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 虽然刮了光头,但年轻英俊者,不乏其人。致使一些从未试过闽 南菜色者,想入非非。有一个庶务长的老婆,与厨房一位劳改暗 渡陈仓。有一个女会计,主动找磨房一位劳改,共作枕上鸳鸯。 她经常用大口盅盛肉,慰劳那位精力逐渐欠佳的难友。有个队长 老婆,主动挑逗威胁一位外住的劳改,要与其花好月圆。男女干 部之间,实行"共妻"的桃色事件,也时有所闻。

有一位贵为厂长者,竟用手枪迫奸属下的一位女会计。劳改队里的男女关系问题,是不敢公布的,生怕泄露后,有人步其后尘,政治影响不好,不可收拾。他们一般只将当事人调走了之。后来,出现得多了,干部们才采取高压手段,用加刑来杀一儆百。但妙在宣布罪状之时,绝口不提桃色事件内情,而是挑出一点"反改造言论",或"破坏生产",或"学习中放毒,攻击领导"之类作为罪名。

监仓小院子里的泥土上,可以见到很多森森白骨。据说这里以前是块乱葬岗,建场时,胡乱地夷为平地,筑起这座碉堡式的监仓,来禁囚这些反抗危险分子。也许是处在特定的恐怖环境中,谁也不知道,何朝生何夕死,生死只隔一层纸,加上问心无愧吧,我们丝毫未觉得害怕。因为一事不慎,也许会马上过了奈何桥,到丰都城与他们为伍。我甚至还在想:假如冥冥中也有灵魂的话,它们也定会庇护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苦人儿"的。

这里的人百年鹤驾后, 是不准就地入土的, 要弄到很远很远

的,一块指定的乱墓堆内下葬。离监仓不远,是一条可通湖北襄阳和河南邓县的支线公路。路旁是一片水田,水田外是一座堤岸很高的小水库,用来蓄水灌溉。老劳改告诉我们:这是几年前,隆冬大雪之际,强迫劳改们脱光上衣,拼命筑起来的"万里长城"。据说,如果劳动时不脱光上身赤膊上阵,就证明你偷懒,没出力,不努力去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云云。回仓后要挨斗挨打。又由于脱光上身,寒风凛雪之下,不做到冒汗就非冻僵不可,所以只有拚命地拉着车子跑。

CONTRACTOR OF THE STATE OF THE

这里有一个水塘,其中一个角落处,水特别深、特别冷。就 算酷夏炎旱,火风光顾之际,它那里总也不会干涸。收工后去洗 澡没有人敢游近那边,当时只觉得它深不可测,有种阴森的感觉。 后来一次闲谈中,知道了一件可怕的往事。原来那角落,是活埋 生人的"万人坑"。这一带过去是陕西、河南、湖北"三不管地区", 是"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但也是有名的土匪区,这地区过 了三十多岁的人,不论男女,全都当过土匪,不肯加入者,格杀 勿论。他们往往白天是拿锄头的农民老乡,晚上却是拿枪携刀的 土匪。他们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诱杀等手段,来取得给养。

有一队上百人的武装经商马帮,大热天路过此地,被路旁的 美少妇的媚眼香巾诱骗至村中食宿,待大家兴高采烈,喝了有迷 药的酒后,土匪们便抢了他们的枪械、货物和钱财。一夜之间, 将百多个生人,抬到那过去的洼地,今天的水溏角落,活活地埋 掉。这只是一次,究竟埋过多少次,埋了多少人,则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冤魂不散吧,水色黑而阴森,每当路过此处,联想到可怕 可悲的场面时,会令人倒抽冷气,毛骨悚然。

有位曾当过小军官的难友告诉我们:当年他带一排人,走路由魏集赴襄阳,热旱难耐之余,路旁闪出几个经过打扮的美女,热情邀请大家入村歇脚,有茶饭招待。弟兄们大喜过望,但他力154

排众议,坚决行军到目的地,受到大家的埋怨。事后大家知道免却一场灾难时,无不庆幸之至。

离水库不远,有一个菜园水塘,是中队菜蔬灌溉的来源。塘里的鲩鱼、红尾鳃鱼,大多每条有十七、八斤重,有的竟达二十多斤。我们用围网捞鱼的时候,竟捞起很多骷髅骨头和手脚骨。水塘边有一条排水渠,下暴雨挖土排水,修整渠边底时,我赫然发现很多又长又粗的脚手骨头,和不完整的头盖骨。看来死者生前是很高大的人。还发现几块花纹精致的花瓶碎片,在此荒野地区的从前,决不是一般人家,能摆设得起的。

水渠边上,有一块棉花地,棉花树特别青绿、高大,人站其间,几可没头。所以,每当在此摘棉花时,我们常常坐着或躺下一会,休息休息,因监工的枪兵、干部看不见我们。地上全是烂砖头、废瓦块,及烧鱼的木片黑泥、瓷碗瓷瓶人骨碎片等。显然,这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小村庄,但后来如何烧毁了的呢?有一次,我故意好奇地问干部说:"这里过去是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多砖头瓦片和骨头?"那干部说:"这是土匪干的。"接着他谈出了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惨剧。

以前,这里原是有几十户人家的美丽小村庄,人们比较正直,村里有几户小康人家。但附近的土匪多次强迫他们加入土匪集团。遭到拒绝与反抗后,土匪们涌进村内奸淫掳掠,然后杀死所有的村人,不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更有甚者,下令各村寨知照:凡是此村嫁出去的女人,不论年青少妇、老太婆,一律送回来受死,否则祸及该村。很多年青少妇上吊自杀,回去的则被奸杀。一些老婆婆,为免连累村人,哭哭啼啼地回到村里受死。想不到生她养她的故村,竟成了埋她葬她的坟墓。

最后,一把烈火把一切化为乌有。但森森白骨留作见证,时时向路人控诉着土匪们灭绝人性的暴行。

穷困的内陆百姓

这里离南阳诸葛亮的故居卧龙岗并不太远。西北角方向,约几十里远处,就是武当派的圣地——武当山。三国时代,刘备栓过马的一棵大树,就在邻近的枣阳县内;张飞喝断了桥的长板坡,也在附近。而我们田边一条改建的公路,就是当年关云长"弃新野走樊城"时,马蹄踏过的驿路。

我们经常要到附近的小村庄——赵泥岗、大山庄、长王庄等去挑塘泥。先派人抽干水,然后大家赤脚下到烂泥巴里,用铲铲起装在竹筐里,爬坡挑上岸,倒在塘边晒干,日后用马车拉回队去。那些稀泥巴,往往深过膝头,有的齐腰,里面尽是碎玻璃,烂瓦片、砖头树枝、铁线之类。脚上被割得鲜血直流,那是平常的事。

粪筐要是竹编的那种还好,较轻也好脱泥。最要命的是用杨树枝编织成的土筐。空担约有三十多斤,加上泥巴,足有一百五十斤重。那些烂泥会粘住不掉,越粘越重,到头来就要挑着二百多斤的担子,在烂泥巴中爬上岸。直压得头昏眼花,腰酸腿痛。

村子里面又脏又乱,臭味熏天。一、二十间,不分东南西北方向的泥瓦墙和草房,加上几棵落了叶的枯树,使人觉得如置身在几千年前社会中。落后贫困的形象,一点也未改变。每间屋都只有一个前门,像小庙一样简单。门旁角落安个小锅,但难得天天见炊,主要是无经济收入,又缺乏柴火的原因。有一次,我们送来了两担米浆水(煮米饭时,沸后倒出的汤水),竟有五十多个在附近劳动的村民,一个不落地全部放下工具,围来抢着喝个净光。

屋内正堂,常有一条油漆斑驳的长台,摆着几件用铜钉、铁片,补了又补的缺口瓷碗,那年代与形状,一定会令古董家感兴 156 趣。地下多放着一个木盆,一家人洗脸洗脚全靠它。用参差的高粱杆,略为隔着的,就是房室了,不过里面的动静,彼此都能看得清楚。

一般年青姑娘只有一两套花衣裳,逢年过节,看亲戚时,才舍得穿。平日穿的是脏黑的百纳衣。但不知什么原因,每当见到我们这些长尾巴"蛮子"在附近劳动时,她们有意无意都会穿得整洁一点,甚至有的还穿上心爱的花衣服。不敢恭维的是,迎风飘送的不是清香,而是一股难闻的异味,擦身而过,见到的不是玉颈粉手,而是长年累积的"黑金"。洗澡的次数,似乎一生中能屈指算出。

我们劳动的时候,几乎全村老少都围在塘边看热闹。该不会听了谣传,赶来看"蛮子的尾巴"的吧?有一次,我在爬满蛆虫,用几块石头瓦片,加一块半截破麻包布围成的厕所如厕时,被三、四个伸进来的小光头吓得跑了出来。据说,他们还未见过"劳改"大便,想一睹为快。

中午我们就满身烂泥巴,围在树旁吃饭,饭是马车从中队运来的,很多人来看劳改们吃饭。我看见很多村民,一手拿着大蒜头,或一根大葱,一手托着碗稀"糊涂",蹲在很高很大的牛粪堆上吃。那牛粪掺稻草的堆子,正冒着热的臭气。我问其故,答曰:"这里可暖和呢!"大概久闻了会不知其臭。

塘边有几棵槐树,开着花,很多小孩、妇女,爬上去采摘花和叶子,拿回去掺着"糊涂"煮来吃。有的一面摘,一面往口里吃,还不时发生争吵。我在想:倘若非洲靠吃树叶为生的长颈鹿到此,也必定会饿瘦,因还有争食树叶的人类。

有一次,我们在地里"拉耩子"(三人用三根绳子拉一部木耧),手和肩都磨破了,休息时还要去割草。我们与附近劳动休息的老乡闲扯,其中两个分别是生产队长和会计,属小干部人物,

但也是权力很大的基层干部。问他生活情况和收入,答曰: "很难呀!强劳动力每天十个工分,弱劳动力每天才八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一分多钱,十个工分也只一角钱。"

HERE IN THE REPORT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ROPERTY OF THE

人民公社是用计工分来累计劳动情况的,十个工分是最高的,还有六个工分的。到时候,总工分有多少,折算后收入就是多少了。亦即是说:每天十多小时的劳动报酬,约值人民币一角多钱左右,可买到五粒水果糖。我问他们:"每年可分红多少?"答曰:"每年分两次'红',即半年分一次钱,每次一般二十多元钱,一年约有四十多块钱。"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儿,我们还在赵马岗村子劳动,把晒干了的塘泥,铲装到马车上,拉回队去作肥料。休息时,看到家家户户屋前都放有一束韭菜。我们与一位抱着小孩的少妇闲谈,她说:"这是发给社员包饺子的。"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节里,优越的人民公社只能发给每户半斤韭菜。肉是没有的,只好包素水饺。看到她警觉的眼睛不时向门外瞟,为了不累她被扣上与"阶级敌人勾结"的帽子,我们客气地退了出来。第二天再来,看见村里的老百姓也和我们一样牛马似地在劳动,把塘泥挑上岸边,个个被泥巴溅得泥猴子一样。

在这穷乡僻壤的荒野,人烟稀少,多见黄泥少见人。尽管附近几个小镇,都有三日一次或两日一次的"墟日",但我们在公路边上劳动时,往往一整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走过。有时,偶然有几个路人赶集,也是空篮子去空篮子回。当地百姓,探望亲戚,手里拿一小包贴有红纸的黄沙糖之类,就已经是很"排场"的礼物了。有一次,我在路旁看见一个七十上下的老人,手里拿着油瓶到太山庙买油。我与他闲谈,他说,活这么大的年纪从来没吃过花生油,平日吃的是棉籽油。劳改场亦全部食此种油。这里本盛产花生,但都出口去了,人民很难吃到粮棉油糖专卖公司控制158

下的花生或花生油。

由于当地的百姓生活贫困,一不依山,二不傍水,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所以偷鸡摸狗的事已是司空见惯,大概是"贫穷起盗心"罢。比如: 田里的麦子、棉花、菜豆等,会忽然少了一大片。晒好的麦杆、棉柴、稻草等,一夜之间,会缺了一个大角。一棵大树刚砍下来,第二天早上,整个树头已经被人挖走。锄头、铁铲忘在外面,就不用期望会找回来啦。

有一次,我们小组带了两袋黄豆到地里去拉耩。这些黄豆,种下去是不收的,待到结豆时,连豆带苗一起犁翻作绿肥,也不肯拿出给劳改吃。当我们中午回队吃饭后返回原地,却只见那副耩子,一袋半黄豆已不**翼**而飞了。

这里的老百姓以及劳改队,多用人力拉的胶轮板车作运输工具,两只新胶轮要近百元人民币。老百姓偷劳改场的车,也偷得很巧妙,不要车峰,只取胶轮。把自己又旧又破的车轮,去换取劳改队较新的车轮。车子多的时候,很难及时发现,只以为用旧了漏气而已。后来发现多了,便用铁链串锁起来,但他们也有办法对调取换。

三队有一次杀了一条大肥猪,供干部、大兵过年。等劳改把肥猪弄得一干二净,回厨房喝口水,抽根烟出来,准备开膛取脏时,却见"肥猪不知何处去,床板依旧笑春风"了。

每年夏秋两季收割时期,从湖北襄阳到河南邓县,沿途的黄集、大山庙、魏集、新野等地的公路上布满了来自山东、安徽、河南等省的逃荒人群。一家一辆板车(二轮拖车),上盖防雨胶布,下铺被褥。水壶、锅头、面盆、柴等东西,堆叠其间,由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父母、姑嫂或母子拖着全家大小,像吉卜赛人一样,为活命到处流浪奔波。有的人多睡不下,便搭成两层,有的则在车底下铺了塑胶布 "打地铺",组成一间三层楼的临时居所。这

些鹑衣百结,衣衫褴褛到不能再补的逃荒队伍,浩浩荡荡,成千上万,叫人见了心酸难受。吾土吾民的黄炎子孙,时至今日,竟过着乞丐不如的生活。

我在路上,看到他们衣不蔽体,面容枯瘦。很多年青的大姑娘,显出了本应珍藏不露的胴体。虽然不见得会如"吹弹得破"般娇嫩,但也应是洁白或如凝脂的肤体,却呈现出长期积存的黑色"点、线、面"来。很多年青人,头上戴着一顶只剩下框框或两片竹叶的竹笠帽,使我想起家乡路边小便处,倒放在尿缸上,用来过滤的烂竹笠来。我没有嘲笑的意思,只是凄楚的感触,感叹他们困苦到如此田地。

他们是靠捡拾已收割过、剩在田里的麦粒、谷穗和挖些野菜度日。全家大小总动员,弯了一整天的腰后,就在"车楼"旁点火为炊。把麦粒、谷粒,用手揉搓,用口吹去末稍后,马马虎虎地倒进开水锅内煮来吃。运气好的,或可吃上顿野菜粥,倒霉的时候,就只好闭着眼睛,去咽又苦又辣的"忆苦思甜"野菜餐了。

这些队伍,是一群可怜的人群,劳改场、人民公社、大队小队,都不同情,更不欢迎他们光临来"抢吃"。所以经常出现驱赶他们,抢回他们捡到的麦穗谷粒,以及殴打的现象。

特别是劳改场的干部,平日"为人民服务"老是挂在嘴边,但见到逃荒的人民百姓,却如仇敌,视作蝗虫异类,动不动口出粗言恶语辱骂,甚至推人倒地。在这里,人类正常的同情心、人性都消失了,有的只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残暴。

有一次,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排着大队到地里割麦,后面有枪兵拿轻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押送,干部与枪兵闲谈着。路边已收割过的麦地里,有两个老人,约六、七十岁,似是兄弟俩,在毛毛雨下辛勤地捡拾着"剩余物资",头上布满白茫茫的水珠,衣衫已湿了。后面还有几个妇女孩子。他们手上拿着一小把捡来

的连杆麦穗,被仔细的指导员发现了,便上前揪住那老头,硬要抢回来:"他妈的!偷起国家的粮食来了。给我拿回来!放手!老家伙。"

老人死抱着不放,战战兢兢地哀求: "同志,不是偷的,是 俺全家在地里捡的。求求你,行行好吧,放过我们吧。"那指导员 不为所动,强拉着硬要夺过来。那边的妇女孩子闻声也赶过来求 情,老人急得双膝跪了下去(写到这里,我回想起当时的场面和 那二老可怜的神情,我的眼睛开始被涌出的泪水模糊了)。

老人又是流泪,又是叩头哀求: "大哥,叔叔、大伯伯行行好,救救我们全家吧,俺已几天没吃东西了。好叔叔,好爷爷。"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痛哭着跪下叩头求情,叫一个年青的人为"叔叔、爷爷",听了叫人心酸。但那干部的决心很大,坚持要抢回来。只是怕百多人的"反革命分子"都停下围观,"政治影响"不好,所以才改变办法:自己脱身,叫一个当过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的老难友去"拿"回来。

那老头左右为难,只好细声规劝他们,放弃这份利益,免找 更大麻烦。但那俩可怜的老人,跪着不起,一味"叔叔,爷爷" 地叩头不已。也难怪,那点麦穗是全家一天的粮食,是他们的命 哪。我实在看不过眼,过去把那老难友骂了一顿:"你有无一点 同情心哪?想让人家全家饿死呀?他们在地上捡到的,合理合法, 又不是偷的抢的,你拿他们的干什么?"他为难地说:"可是指 导员他叫我……"我说:"你真笨!人家说,'人老越精,鬼老 越灵',你却是越老越糊涂。干部走了,你不会诈诈地(假意地) 松手,让他们脱身。然后去报告说:给他们跑掉了吗?"他毕竟 是远征军的人马,富有同情心,经我指点便欣然采纳,拉扯两下 便乘势松手,让他们走了。

湖北是个内陆气候地区, 日夜温差与季度温差都很大。隆冬

腊月,冷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夏天最热时,达到摄氏四十五度。草蓆都会烫手。极目远眺,村落模糊地晃动,真的是:"万国如在烘炉中"了。午休时,全身湿透,尽管拚命摇着大蒲扇,亦无济于事。全队一百多条汉子,个个赤膊上阵,只穿一条内裤,那内裤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蒸发出阵阵酸臭。那盖着沥青油毛毯的监仓,像一个大蒸笼,我们则似一个个肉包子,在蒸熬着。

高墙电网外,时而有微风徐来,但却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围墙挡住了。外面也有阴深的树荫,然而失去自由的我们,是不准越过雷池半步的。忽然想起,童年时与村中牧童晌午躺在大树上,吹口哨,唱土家山歌,享受着南风的抚摸,昏昏欲睡的情景,更知自由生活是多么的可贵。有一次,我们就在那样的酷暑下,在牛栏边上挑肥,把一堆堆的牛、羊、马粪加稻草的肥料,用双肩挑运到很远的麦地里去作"基肥"。那么高的温度下,叫人站着或空手走一天,都感难受,别说是还要做苦工了。我们尽量放慢脚步,不断放下小歇,左肩换右肩,直担变横担。由于时间长,肩上早已磨压得由红肿到破损,直至皮破血流了。

远处有一队逃荒的车队经过。我看见有一群逃荒人家的小流 浪者,来到我们附近,六七个小萝卜头,全部赤条条,一丝不挂。 那由汗水和鼻涕形成的污染区,遍及全身,看来至少半年未洗过 澡了。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生就一副美丽大方的小圆脸(此 地谓之"苹果脸"),虽然被饥荒折磨得面带病容,而且衣不蔽体, 但仍然显得非常秀气。我在想,这么的青春年华,一般人家的女 儿,应在学校里度过天真烂漫的黄金时代,而她却如漂泊的小鸟, 在风雨中,为寻求剩麦碎谷而奔波彷徨。我身旁的几位难友,对 我说:"唉!看到他们,就想起家乡自己的孩子。父亲劳改了, '五害分子'孩子的遭遇,必定惨过他们……"

由于经常会遇到逃荒的人群,我常把一些馍馍带在身边,那 162 是用家里偶然寄来的粮票向厨房难友暗中加餐买来的。适当之时,自己不吃,悄悄地给他们充饥。那小姑娘经过身旁时,我悄悄地问她:"小姑娘,你吃了饭没有?"她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说:"没有。"我问她:"你吃不吃馒头?"她的大眼呈现出希望的光芒,很快地说:"吃呀!"

我伸手掏出了一个圆馍馍。那几个赤身小童,这时也已闻声凑了过来。我把那馍馍给她时,忽然给一双黑手指夺了过去,那小家伙,抢到就跑,边跑边吃,狼吞虎咽的样子,说明他肚内是多么需要这些救命的东西。那小姑娘先是一怔,但未与他争。只是望着其大口咬嚼的样子,暗暗吞着口水。 "不要紧,我这里还有一个。"这回我是要亲手交到她手上了。她感激地望着我,接过去,背过脸就拚命地啃起来,呛得真咳嗽。我不忍去细察她当时的表情,这只会勾起我更大的伤感。况且,我亦不能耽误过久,否则,每担发一颗苞米(用以计数,监督工效之用)的粒数,又会下降而挨骂了。

附近的大王庄、长王庄、赵泥岗等村,有一些小孩常到外面"捡柴火"、挖"半夏"。我们在地里劳动时,他们喜欢过来听我们唱歌,问南方的新鲜事,与我们闲扯。我和难友常将节约下来的馍馍,悄悄地放进他们的筐底去,然后上面盖些杂草,嘱咐他们小心,带回家后才吃,莫让人见到了。唉!我们是够苦的了,想不到有人和我们一样苦。有一次上麦地劳动,干部与枪兵在后面押队。一路上,见到很多"拖车家"和"板车村"。大概收获有限吧,个个显得面黄肌瘦,疲乏不堪。我和干君、陈君等人先后趁干部不注意时,抛了几块馍馍给他们。一些有同情心又较大胆的难友,也相继把省下的红薯、苞米、馍馍头之类,丢给那些与我们相似命运,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

抛和接也要眼明手快, 抛物者事先回头, 观察干部是否注意,

趁其不意,迅速将食物抛给荒民,并打手势叫他们藏好。接物者, 也很精灵,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处境,所以一旦拿到东西,就近迅 速收藏起来,若无其事地望着大队走过,然后才去分享那难得的 食物。

the rest of the contract of the section of the contract of the

诚然,我们知道,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的家乡,嗷嗷待哺者何止千万,我们这样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仅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和同情而已。有一位难友,就是曾感叹月饼之小,和我幻想过到广寒宫,把嫦娥受用的双黄椰蓉月饼抱回来的那位教师仁兄,善意地规劝过我们:"一旦被干部发现,就要受批评,重则挨斗争。况且,我们粮食标准已很低,万一他们找藉口,克扣我们的粮食,岂不……"我说:"有此可能,你说的也有道理。但你能看着这些可怜的父老,啼饥泣饿而无动于衷么?他们也是炎黄子孙,也是人哪……此时此境,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幸好,并没有出过什么岔子。

有一次,我们小组在麦地松土(是用一种鹅颈形状的锄,前弓后箭地扎马,双手硬压下去后拖,地硬处非常吃力)。一块松完移到另一块的途中,遇到了拖着一辆破板车逃荒的五口之家。父母身材高大,其中一个小姑娘约五六岁,生得眉清目秀,非常可爱,记得她的眼白是蓝色的。看来也许是过去的有钱人家。我们和他们一路走一路闲扯。他们向我们诉说:家在山东,连年旱涝,支持不住,便逃了出来。我问他们:"天灾人祸,人民公社不管么?"

他们说: "唉!那么多地方天旱水涝,管得了么?发了一把救济粮,只够全家吃一顿稀的。那份粮,当时我是用裤袋装回家的呢。唉,不逃就要饿死哪……可是逃荒出来,也是'天下杨梅一样花'呀,只好听天由命了。"

他不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表示他很精明。在文字狱、思想 164 罪盛行的日子里,隐晦一点是经验教训。虽二者意思差不多,但若用"乌鸦"和"黑"之词,获上"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谩骂干部"、"对现实不满"的罪名,可能性就大些。由此也看出,此人必乃书香之辈。

我问他们每天的收获如何?他们紧锁双眉对我说:"惨呀!地里掉的少,捡的人又多,还要挨骂受气。经常几天才能吃上一顿稀的!"我不知怎的,想起叫他们跑到沿海去的主意,大概感到南方条件好一点吧。其实,刚才他不是说过:"天下杨梅一样花"么?我便在身上摸索着,找到了珍藏在衣领上,准备积存作逃跑费用的全副身家财产——三角五分钱人民币,加上陈君的一角钱,共四角五分,一并送给他们:"老乡,这是我们仅有的,请收下买点盐吃吧。"

接过去的时候,我见他双手发抖,眼睛闪着泪光说:"谢谢!谢水哥。世上还有好人哪,还有好人哪!"

而我的心却像针刺般痛苦:黎民于火之中,却无能为力,自己也是前途茫茫。

第五篇 炼狱炽火

第一次越狱

1966年,正是毛泽东搞阳谋发动宫廷政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目的在于铲除刘少奇为首的温和改革派的势力。在襄阳市通往河南邓县、新野县的公路上,每天都有打着各式旗号的红卫兵、红小兵、"造反兵团"等的串联队伍经过。有北平、天津南下的大军,也有南京、上海东进的队伍,北上长征者,更不乏其人。从报纸上,我分析出一个结论:毛虽在玩"以乱治乱"的权术,但毕竟已弄得天下大乱了。我知道机会来了,争取自由的目的,很可能会得到实现。

我在考虑:欲成此事,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基本条件。一片混乱的形势是天赐良时。若打着红卫兵、造反派的旗号,免费食宿、坐车搭船,虽是偏僻遥远的路程,亦可走大江南北,可谓"地利"也。至于人和,则是最关键、最困难的一环。其中要计划周详,组织成员要坚定,事前之接触商量要秘密,不能引起他人怀疑。要守口如瓶,不能走露半点风声。我与王君多次接触,密谋脱逃计划。大家基本上看法一致,投奔自由出走的决心也很大。我们知道:虽然逃出监狱大门,也并不等于有了自由,因为大陆本身就是一座大监狱。只有逃出铁幕,到外国去,才算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的看法是:在混乱中,到达福州后,由水或陆路设法偷渡去香港,再转国外,由于我们装扮成红卫兵、造反派、毛宣队,是无人敢阻拦的,可以顺利地接近边境,入夜后再设法越境。因为那一带是自己熟悉的沿海区域。他却认为:很多人都从那条路166

线逃跑,封锁一定很严,不易越境,倒不如神不知鬼不觉地由其 它国界越境。因我们是南方人,逃跑后,干部一定会通缉到沿海。

后来,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提出:一、由云南边境越境,找寻留在那里的三不管部队;二、或继续南下,设法到达南越,找到自由国家驻西贡大使馆,协助我们去自由国家。我嘱咐他:"此事实非儿戏,初战成败,会影响全局。千万不要向任何人,包括你的老朋友、老同学、同案人透露!此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万一被怀疑、盘问、逼供时,要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干部也是不能定论的。切记!"

我以后便专心观察形势,研究报纸,等待时机。并思考妥善解决作为红卫兵的红袖章、红旗、介绍信、证明书、绿色军帽、军衣军裤等物资的来源或代用品的制作。正当我在继续策谋,如何打通自由之门时,这次重见天日的越狱计划却败在泄露风声上,致使整个计划胎死腹中。王君不遵吾嘱,将此事秘密告知李君,邀他共谋大事。李君又秘密地告知并发展余君同行。余君又泄露给一个马来西亚归侨胡君。而我却一点不知情,蒙在危险的鼓里,继续经营二人世界的计划。事情是败在软骨头的胡君身上,他向干部交代了与余君的关系。于是被干部顺藤摸瓜地扯出了一伙"投敌叛国逃跑集团"来。

一天早上,我们又在冲锋枪看押下,排队走向几里外的七队,继续做那"愚公移山"的苦工。出了大铁门不远,指导员就把我单独叫下来。一坐下来,指导员突然问我: "你的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现在坦白交代吧!"我的心一怔:可能出了岔子。但我镇定地反问: "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大胡子连长早已按奈不住,一拍桌子,吼叫起来: "你给我老实点!放聪明点! 抗拒到底是没好处的! 坚持反动立场只有死路一条!"随着站起的身体,手指已点点划划地向我逼过来。

我知道,他们已在怀疑我们,或已掌握了一点线索,但目下只是威胁、讹诈、求证而已。我与王君的事,他们不会完全知道,胜败未定,还有时间周旋,决不能让他们在我身上打开缺口。至少,也要摸清他们手上有什么牌。

regression and the

于是,我大声说: "你不要来这一套!拍桌子干什么?有什么事实根据?怀疑不等于事实,更非法律的依据!"

那连长原以为一轮冲锋炮轰就可把我打倒,占领阵地,插上胜利的红旗,想不到作为劳改的我会那么胆大、强硬,竟敢大声顶撞他,进行"反冲锋"。但他确实又拿不出证据来,一时呆住了,他狠狠地咬着牙关,好一会才从牙缝里吐出了一句话: "我们知道你有一套……"

那胖得不合比例的杨干事接着阴阴地说:"我们知道你的头 是不容易剃的,但我们有办法剃。回去收拾东西。"

这意味着他们估计没办法对付我,只好将矛盾上交,交给上级处理。一般是先关进总场的监所黑牢,由总场派政法干部(预审员)来专案处理。他们握有生杀大权。我挑着全部财产——两包可怜的破旧衣物,由两个手持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卫兵押送,大概还属怀疑吧,所以没有捆绑我的手足。走到监所门口,见有很多青工(劳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子女)在做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见到我后,忙示意别的女孩子注意。当我们走近她们时,她们念了一段"毛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关心,互广爱护……"我明白:她们反其意而用的意思是表示对我的同情与鼓励。我感到有一股温暖,流遍全身。多可爱又聪明的孩子!我微笑地向她们点了点头,暗祈她们有美好的将来。

走进铁丝网的大门后,穿过很多房子,看见大烟囱下,有一 168 排烧砖瓦的轮窑和一排排工棚,这就是监所的窑厂了。

枪兵把我交给胖胖的佘指导员。又进了一道大铁门,指导员 把我交给看班。看班详细检查了我身上和行李,收走了皮带,丢 给我几件换洗衣服后,"当啷"一声,就把我关在牢中牢的八号 监仓。

铁窗里的友谊

潮湿、黑暗,充满霉味臭气的小监房里,早已关了两位难友。一见我进来,靠墙角的一位,大概三十多岁,坐了起来。瘦峭的脸上胡子很长,炯炯的目光,流露出智慧的光芒。但血的经验教训不可忘,素昧生平者,未识何方神圣,绝不可貌相而轻易深交。说不定是面善心狠者,或者想套我口供的内奸?又或者是干部派来的探子?我于是保持慎重的沉默,况且也正为此次的意外失败而心烦意乱。

- "请问你贵姓?"由墙角那边飘了过来,是不大标准的普通话。
 - "小姓叶, 你贵姓?"我只好礼貌地回答。
- "我姓罗。叶生好像是闽南人,而且学生出身,如果我未猜错的话。"他很有兴趣地说。
- "不错,我是土家人,读过几年书。"我说,并望望风门。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小心点为好。
 - "太巧了,我家在福州,我们还是邻居呢。"他风趣地说。
 - "叶先生这次是为了什么关进来的?"他试探地问。
- "我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把我抓到这鬼地方来。你呢?" 我小心地回答,并反问他。
 - "我也一样,是别人冤枉我。"他委屈地说。

看这人说话很诚恳,语气很友好,不像歹徒,我的戒心打消了一半。他穿着一套黑色的囚服棉衣裤,左胸口和右屁股上都印有白色的劳改字样,双手老插在被里,不时用背磨擦墙壁,像山猪磨松树那样。后来见他双手夹着一根筷子,从后颈插进衣领去抓痒,他的双手是不自由的,带有刑具,一种劳改队自制的"土铐子"。很清楚,这是他"不肯交代问题、态度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被干部迫供的结果。一种同遭遇、共命运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便过去帮助他。首先替他掀起棉衣,在背上着着实实地替他抓了一阵痒,舒服得他连连扭动身躯,并吁吁有声。

他里面有一件改制的棉背心,一件白色的囚服,已发黄变黑, 裂成数截了。我干脆把它撕下来,送了一套我自己带来的衣服给 他。那又咸又湿的棉背心,他嫌热,希望脱下来轻松一下。但双 手被铐,怎样脱呢?除非撕烂它。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把两边 肩上的线挑断,像裤子那样,由腿脚处退下来。以后要穿,再缝 回去是了,一点也不会浪费那自制的"珍品"。由于土铐子卡得很 紧,他的双手腕已经红肿瘀黑,伤及骨头了。为了减轻痛苦,不 让锈铁磨破皮肤,我撕下一点布条,替他小心地把铁铐包住。由 于孔隙有限,痛得他头冒冷汗,连嘱"慢些慢些!"

吃晚饭了,每人一个拳头大小,又硬又黑的"馍馍"(黑**馒**头),外加一勺枯黄无油腥的菜叶子。"这是有名的'打死狗'。" 我拿着硬馒头用闽南话对罗君说。

"这是家乡喂猪的'猪馊'。"罗君也用温州话对我说。

罗君双手被锁,动作不便,心绪也欠佳,只吃了两口就停下了。我是一贯的以吃苦为荣的乐天派,监狱的生活尚能克服。

"你似乎吃得很香。"罗君看着我,慢慢地说。

"不!他们的目的是想彻底消灭我们,包括精神与肉体。我们都死了,他们便少了两个反抗者。如果我偏不死,顽强地活下170

去,保持贞节,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不是更好么?目前,倘若挨不了这许多苦,就只有从狗洞里爬出去了。此乃干部采用饿刑的目的也!"我半坦率半含蓄地回答他。但我没有提及几度准备自行了断的事。

我们会心地笑了笑。此后,他的胃口似乎好了许多,对我的态度也亲近了许多。我们中间隔了个疯子,交谈不太方便,因为过分提高声音是危险的,必然"隔墙有耳"也。于是我提议搬近他处,他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罗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一家进步报社 工作。受中共新华社同行记者极力怂恿与欺骗,回大陆观察、采 访。他们给他一张双程来回火车票,保证他采访自由、来去自由。 可是就在温州市内车站,甫一下车,就被扣留。

初时,不让他睡觉,几个人一班围着,轮流着推他、摇他、打他、叫他坦白交代问题。企图在他支持不住、或昏昏欲睡的情况下,得到点"材料"。这种连续几十个小时的精神折磨,是非常痛苦的。但他顽强地挺过去了。

他被关到温州的监狱。据他说,里面结构很复杂,有的通道,只容一人爬着进出,有"一夫当关,千夫莫开"之势。里面是一间间独立的的"棺材仓",又黑又狭。只容一人躺下或坐着,不能站起来,"床"尾的摆设,是一个臭极欲昏的马桶。

"说是棺材仓,其实比棺材还糟!棺材里面也没有一个臭便桶呀?"我望了望墙角的臭便桶,愤愤地插口说。

"就是嘛。哎! 叶先生, 你看我们现在坐的监仓, 又像什么?" 他转脸笑着问我。

我观察了一下那狭窄、黑暗、潮湿、砖砌的半圆形薄壳拱式屋顶,说:"像他妈的一座古墓!秦始皇或王莽盖的古墓。"

我们又不约而同地说:"也是一座棺材!"

他又继续慢慢地说:起先干部对他还算客气,饮食也过得去。 干部交给他二百页"材料纸"给他三个月时限,要他思考交代问题。他天天哼着温州小调,或做高度宽度可以容许的自创体操。 诸如扭颈、转头、甩手、摇腕、曲腿之类。三个月过去了,干部 笑着来收交代材料时,见第一页上,只写了姓名、年龄、民族、 性别、藉贯、职业等几行字,其余全部空白,便暴跳如雷地对他 说:"你抗拒交代,顽固到底,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都爱这样恐吓人的。真的要杀你,反而会对你笑呢! 况且你没交代出任何问题,没有亲笔供词呀。"我说。

"是的。不过他们也做得出来的。"

后来,干部给他带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恶狠狠地威胁他,再不交代就枪毙他。一年零八个月,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寂寞岁月,他是在与蚂蚁、蛆虫、臭虫、跳蚤为伍中度过的。

"万籁俱寂,静得使人忍不住要发狂。整个头脑,整个身躯都像静止了,血液像要凝固,心脏像要停止跳动,整个世界似乎也停止了生活,地球也像停止了转动。"罗君感慨着说。

"他们不放你出来晒晒太阳,洗洗澡么?不放风么?"我说。

"一年后才准。晒过几次太阳,洗过几回澡。那管水池的老监趸很刻薄我们,给得少又爱骂人,对老弱者,不时还动手动脚。真是不知他'老豆'(父亲)姓什么!大家气愤之余,商量好后,一次便借故争执,将那监趸推下水池,狼狈得像个斗败了的落汤鸡。大家则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干部来后,大家一口咬定,是他自己失足掉下去的。并力陈他刻薄我们,骂人、打人、偷懒的罪状。这场官司打赢后,洗澡的水就多了许多。"罗君侃侃而谈后就结束了他的话题。

"世界上本有一种'棉花型'的人,不弹不松!"我说。 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也简介了自己的案情,家庭背景之类。 172 为了打发那寂寞无聊、空虚漫长的岁月,我们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漫无边际地闲谈,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社会风尚都成了我们 津津乐道的内容,彼此吸收了不少精神营养。

我发现他智慧过人,知识深博,待人诚恳,为人正义。所以, 我们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一天早上,罗君突被叫去提审,中午才回来,心情看来不 佳。他告诉我:"那老所长是个中老手,他说了不少旁人的检举 材料,并说,如我不坦白交代问题,马上可以枪毙我。你不要管 我,看来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有机会你走吧。"

虽然,我知道牢中看管特严,要逃得出去谈何容易,但总不能等死呀!经过观察与思考,我已想出了一个如何撬开铁窗、爬越围墙,继而爬车到达南方,设法越境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的初步计划。

这段时间,干部继续把他提出"过堂"。有一次回来时,我发现他的手铐开了。我知道,这是软的一套。不过,由于双手自由了,睡觉、吃饭、做事情都方便得多,罗君显得很轻松、风趣。过了几日平静的日子后,有一次过堂回来,我见他的手铐又带上了,而且手铐卡得更紧,已到皮烂肉肿的程度。我知道这是硬的一套,他们是惯用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手段的。

后来,轮到我的头上。每天早上,都有两个姓李和姓张的总场干部来提我过堂,连续十天不让我喘息。大声呵斥,气势汹汹,拍桌打凳,百般威胁。我据理力争,一口咬定事实上绝无此事。

姓李的干事一次过堂时,逼我交代问题,把一副四十多斤重的生锈铁镣,丢在我面前,说:"如不交代,马上给你带上!"我冷眼相对,抱着你要怎办就怎办的态度,把李干事气得吼叫如雷。在他发脾气之际,我尽量回忆、背诵中外名人的一些诗词和家父的往事,来抵挡他的"毛语录"攻心战。看着他那吹胡子瞪眼睛

的疯狂样子,我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便即兴在心头吟了一首"顺口溜": "日夜迫供总如斯,每逢一问三不知,干部暴跳声如雷,我自心吟自由诗。"

回来说给罗君听,他很高兴地笑了起来。余兴未了,我又"心写"(为了不留下加刑的罪证)成了一首不正规的七言诗:

铁窗中秋月倍清, 怀志未遂国未平, 夜半犹闻饥女泣, 空对明月听镣声。 狂风折梅梅愈盛, 野火燎原原更青,

他日展翅云游去,三江五岳笑盈盈。

过了一天,那姓张的干事,又来提审我。但不在审讯室而改在能睡一百多人的劳改大仓内。看来想制造一个松驰点的审问环境,消除我的敌意,利于诱供。但当目的达不到时,他又开始拍桌子了。

后来,又换了一位宋干事,这是个较老练的预审员,他不像前两个那样,遮遮掩掩,咋咋呼呼,也不拍桌打凳,尽量拿出一些旁人交代的事实来,再企图说服你交代问题。他不时拿起桌上一大叠交代材料扬一扬,装成关心我的前途并已有充分证据的样子,迫我就范。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在跟我们捉迷藏,我知道。你还准备和政府打持久战,是吗?"

我奇怪他为何会把毛的《论持久战》与此次案件联在一起?他解释说: "经过调查,你在六队时曾向图书室借一本《论持久战》来看。所以我们了解你的思想近况。"我的天!真厉害。平时鼓励大家借"红宝书"来看,却为的是日后掌握你思想活动的依据。我当然不会承认有什么动机。只反问他: "看'红书',总不会犯错误吧?"宋干事连说: "呵,不会!不过我们知道你在想的什么罢了。"

一天,铁窗外刮着呼呼北风,异常寒冷。两个疯子难友在抱 174 头大睡,发出高低音的"鼾声二重奏"。我和罗君闲谈。他说:"在九龙上水,我有一次大雨驾车,帮助了一位腿部受伤的老伯,后来我们成了至交。这老伯姓温,在上水开有一间"梅园",主要饲养鸡鸭。他的独女叫温小梅,今年芳龄十八,高中毕业,能歌善舞,非常温存漂亮。如果我们有机会出去,我会介绍她作你的妻子。"

我说:"多谢先生关照!但身陷囹圄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想儿女私情呢?"

他听了哈哈大笑: "你真傻!难道你没听说过'自古英雄爱美人'和'从来美人慕英雄'吗?我们并非'英雄难过美人关'而误大事,更非'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庸徒。我们是:自由要,美人也要!"

我也笑了: "言之有理。我亦非薄情之辈,只是值此逆境,唯日夜沉思者,乃如何逃出牢笼,投奔怒海,争取自由,与家人团聚,从未想过美女娇妻。"

罗君继续讲了些细节给我听:温老伯喜吃红烧猪肉,一餐吃三斤,面不改容。小梅怕痒,每当搔她腰侧,她会笑得流着眼泪在地上打滚求饶。她平时一边喂鸡,一边唱歌,给很多鸡都起有名字。他家有一种风俗,客人来了,以糖水鸡蛋招待。起初,我把碗中的两个鸡蛋悉数吃光,但发现有点不对头:她们在抿嘴偷笑。第二回,我一口不吃,原封退回,但又觉察出那神秘的笑容,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说:"这是中山的风俗,取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之意。端出来是两只鸡蛋,你吃一只后,用筷子把另一只,从中间划开,不又是一双了么?"

我们谈得很多,风花雪月,唐诗宋词,南洋的风俗,香港的生活,朋友的趣事,他妻子的笑窝等等。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罗君有一次问我: "你平时喜欢唱什么歌?将来笔下好交代。"我说: "一切自由、正义、优美旋律的歌,我都喜欢唱。最讨厌的是抽筋一样的'红歌'、'语录歌'。"

"经常唱的呢?比较喜爱的呢?"罗君很有兴趣地问。

我略一思索,便答道:"我经常偷偷唱岳飞的'满江红',宋 丹平唱的'夜半歌声',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和 '丽达之歌',还有修改过的'铁蹄下的歌女'。"

"修改过的?什么时候,这支歌经过修改?我怎么不晓得?" 罗君有点奇怪地说。

"是的,我自己改的。我经常改着歌来唱,比如将'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笞得遍体鳞伤',改成'可怜是铁蹄下的劳改,被鞭笞得遍体鳞伤'。又将'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歌女?'改作'谁不知道我要自由,为什么被人当作奴隶?'然后,暗中教其他知己难友唱。被迫唱'红歌'时,就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成'中国少了个毛泽东',还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句子改进去。"我解释道。

"嘘!小声点!这句话是要加粮的。"罗君警惕地环顾四周, 并警告我说。

我笑了笑。小声唱起岳飞的"满江红"来。(懂这首歌的人在内地是不多的,当时尚未公开列为禁歌)"怒发冲冠凭栏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了旧山河,朝天阙!"最后一段,是在罗君与我合唱下结束的。

"我们的遭遇,可写部小说,将来有成,我送本书给你。"罗 君说。

"谢谢!这是最好的礼物。"我笑着揖手道谢。

有时候大家没有什么话说了。我便四周围观察墙壁。由于长 176 年累月的潮湿和渍水渗透,上面的薄壳弯拱形屋顶,早已斑驳陆离,形成很多图案。有的像狗、猫、狮、虎等,有的像窈窕淑女,沉思村姑,有的像山水画、大瀑布、原始森林,有三个人头形象,非常逼真,最令人心寒,它们就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一下床或起床,都必定见到它们那可怕的样子。最怪的是还有深有浅,像出自名家之手。一个像受着酷刑时,痛苦挣扎的样子,嘴巴张得很大,像在喊:"我的妈呀!"一个像枉死城中居民,披头散发,目露凶光。一个则像吸血僵尸,青面獠牙,张着血盆大口。

罗君也注意到了,时常指着对我说: "那几个像鬼的样子。" "也许是被人无辜杀害后,不散的冤魂显象罢。不要紧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有灵,必会保佑我们。"我说。

在四周墙壁底层,我发现了一些以前关押在此的难友和烈士刻画下的诗词笔迹。由于全是用铁钉、铁片、铁线刻的,没有颜色,只有注意寻找,或在某一角度,利用光线照射的深浅度,才能发现。尚能回忆的有如下一些:

有一个难友刻了"寂寞痛苦"四个字,字样刚劲灵活,看笔迹,似是深有根基者所刻。有一首诗,前两句已记不起了,后两句是这样的:"英雄志统一,后笑是谁人!"另一无名氏诗:"酷刑饿牢不流泪,只懈故园山河碎,残生若能一报国,跃马横戈起惊雷。"还有"杀头风吹帽"、"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运动=凶残+愚昧"、"社会主义=奴役+毁灭"、"还我山河"、"打倒专制"、"自由万岁!"

最令我兴奋与佩服的是:一位难友在壁上刻了: "中国要自由,公理必胜!人民要平等,人权万岁!"

有一天,突然走廊里传来几声与众不同、娇滴滴的声音,我 凑到风门的孔隙,突然发现有穿白底蓝点花衣裳的女人来到跟前。 她是巡视对面重病女难友的干部护士。 "罗生,快来看!有个女的!"我把这近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惊人消息告诉他。罗君没起身,只是告诉我: "那次我被关了一年八个月,放出来后,一位朋友也是这样,惊奇地叫我看女人。"

网络乳头科 网络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长年累月的隔离,迫你做个清心寡欲的清教徒,在那牢中牢的黑房内,是见不到阳光,也见不到异性的。一旦闻其声,见其人,就觉得是件新鲜而重大的新闻。虽然不是貌若天仙,更无沉鱼落雁之风采,只是具备了女性应该有的线条,该高的高,该低的低而已,但就已令人觉得女人与男人,毕竟是不同的。

一次,罗君说:"唉!漫漫长夜不成眠,鸡啼尤教我心酸。" 我知他在思念新婚的妻子,忧虑自己的前途。

刑讯逼供

几位经过挑选,较为精明的预审干部,几月来在我身上软硬兼施,结果大失所望。于是又换了那个詹姓干部来对付我。他们认为,我所以坚持反动立场、抗拒交代问题,背后一定有人在影响我。除了两个疯子外,自然就怀疑到罗君了。其实,在整个审讯期间,关于我被关的真正原因,我们的"案情"自始至终,对任何人,我都守口如瓶,预防节外生枝。这不是信任与否的事,而是原则性与纪律性的问题。

有一天大清早,铁门开处,外面阴暗的走廊,站着一个高瘦的干事,手上拿着一串钥匙,他示意看班叫我出外。来到审讯室,他例行公事般念了几段"最高指示"后,不像以往那几个那样,旁敲侧击,故弄玄虚,穷凶极恶;而是故意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材料纸,摆在桌上,然后一份份、远远地张扬指点,给我看那上面交代者的签名和红色油墨指模。并逐一说明:这是王君、李君、

余君、胡君等人的坦白交代材料。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是可以强 迫任何人,写交代或盖指模的。关键是里面的内容是否有"实质 性"的东西。但,这是不会让我看的。

听其提示,看来他们多少都已交代了一些问题。不过,我还 是少说话,不说话,矢口否认,想摸摸他们的底,迫他们最后摊 牌。第三天,他继续挑了一些,涉及到与我有关的段落,念给我 听。一阵凉意渗透我的全身,知道朋友们的防线给他们攻破了, 现在他们正全力对付我,以便尽快结案。我保持冷静,继续沉默。 "你除了会说'没有'、'不是的'和摇头外,还会说点什么?'不 记得了',是么?老实告诉你!你不要再顽固下去了。起先,我们 也考虑过会否冤枉你,所以转向农场。如今早已水落石出,你的 几个死党已经交代了问题,你也保不住,应该投降了。否则,人 证物证旁证都在,我们一样可以结案,从严惩处你!后果严重哪! 要争取时间哪!我们没时间与你'磨菇',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办。" 詹干事滔滔不绝地说。看来,他懂得一些心理战。忽然,围墙外 传来阵阵凄惨哭喊声。那是一位同案难友余君,在酷刑中发出的 撕人心肺的叫声。从声音里可听出:竭力强忍又忍不住的干嚎与 声嘶力竭的叫痛声交织在一起。估计在坐老虎凳、或坐飞机罢。 阴森的监狱, 听来倍觉凄厉与心寒。

从故意打开的窗户和配合的时间看,这是他们安排好的一场 皮肉恐吓戏。但却暴露了他们并非完全掌握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否则就不用刑讯迫供了。我为他们残酷的手段所激怒,思想上也 作了受刑的准备,于是一言不发。

"你与别人不一样。有的人爱吃'软'的一套,有的人则爱吃'硬'的一套。你却软硬都不吃。你不要以为余既已交代了问题,为何还要'触及灵魂'?那是'整'他的态度。"看来,他的确较精明,感觉得出效果不佳,马上自圆其说。

这次,回监仓后,再没让我与罗君在一起。而是把我单独关在斜对面的十二号监仓内。为了让罗君知道我的下落,我故意大声叫看班,将我的行李拿过来,并趁机向罗君招手示意。罗君向我摇手,叫我保持沉静。

grander in the company of the compan

又连续折磨了我几天,有一天我病了,患上重感冒,烧到四十度。但只休息了两天,热度未退,又把我叫去过堂。詹干事开门见山对我说: "你们集团五、六个人都已彻底坦白交代了,你夹在中间,推脱得了么?你至今还在负隅顽抗,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黑社会的骨气,与我们硬碰,想对抗到底。老实说,根据我们充分掌握的材料,你一人不交代,无关紧要,我们照样可以结案,照样可以处理你!到时,至少加你五年刑!如果交代态度好,我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

他说的有一部分是真的:他们照样可以了结案件,呈报襄阳 地区,批准加刑年限。

我的思想上很痛苦,不是个人刑期之长短,而是一个本可到达自由彼岸的计划,就这样夭折了。我有点埋怨王君不守约,将计划泄露他人,并牵连出那么多人。否则,只两人,即使王君承认交代,我如矢口否认,他们也结不了案。有一日,我听见对面传来呻吟声,窥见是李君过堂后回来,满身血污。由于双腿不能走路,被人架着走回来。他痛得很厉害,一面跛着足,一面发出凄惨的哭声。李于事怕他人听到,造成"影响",便死命打他,最后还用双手卡住他的喉咙,不让他出声。李君面色铁青,鼻血、牙血在"唔唔"声中流出。

事后我才得知,干部为了"结案",要找一个"首犯",便迫李君承认自己是头子。其实发起人是我,我才是"头头"。他们的政法就这样糊涂、儿戏、冤枉人。既要酷刑迫供,又怕人知道。待他们走后,我趁发开水时,在风门口向李君伸出右拳,表示团180

结、坚强、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报以微笑,也伸出右拳向我示意。

审讯后,我被调到 9 号仓关押。这里从前关过一个疯子,据说是北京大学学生,为何判刑劳改,何时迫成神经错乱则不得而知。小窗户给砸烂了,一到傍晚,蚊虫成群涌进,咬得人招架不住。天气一天天炎热起来,号子里腥臭异常,闷热难耐。太阳刚刚下山,从高高的窗口可以看见"回光返照"的彩霞。蚊子就从那里涌来,屋顶、墙洞深藏的臭虫也列队而出。有的臭虫嗅到人体的气味后,会伞兵似的从天而降,准确地掉在人的胸口、脖子上吸血。它们共同发起"陆空联合作战",让人防不胜防。

为了抵抗蚊子的进攻,我把棉被的被面退了出来,被絮则叠高,置于头前。当把被面盖过头顶时,面部就留有空位,可供呼吸,这是狱中的"盖头式蚊帐"。但只要有空位或气味,那些小东西也会跟踪而入。况且薄薄的被单,也难抵挡那锋利的针刺。清早起来,脸上、身上、手脚上,到处是红点点,痒痛难受之至,不过,总比露头袒腹,任它叮咬强一点。

我也考虑到,万一自己戴上刑具,该如何应付吸血鬼们的"联合攻势"。我把被面的一长边撕开,折下高粱杆编成的床垫上的小绳子,把被面绑起四个角,绳子尽头是长短适宜的"死结"。然后用捡来的细如火柴棒的小竹钉,在墙上耐心地钻出不易被人发现、受力角度最佳的四个小孔作支点。晚上要用时,竹钉一插,绳结一挂,就扯起了一个长方形的蚊帐来。这种帐篷式蚊帐能隔嗡嗡机群于咫尺之外,比起盖头蚊帐来,已是一大进步了。

由于白天干部要查房,墙上不准有钉子之类出现,所以"蚊帐"必须是活动的。能挂能拆,快捷便利。帐子必须叠好,绳子必须藏好,小竹钉则要收藏在破窗户的裂缝里。多年来,已学会在衣领、棉被内藏点小现钞,在孔隙内藏铁钉、铁线、断钢锯片、玻璃之类必需品。切莫小看这些小玩意儿,在那与世隔绝又被严

格监管着的黑暗天地里,它们就是"自力更生"的先进生产工具了。

一寸多长的断锯片,只要把角在水泥地上来回磨刮,很快就变成锋利的刀片。刮胡子、削指甲、裁纸、割布、改衣服等,全靠它。甚至有人耐心地锯断窗口的铁条条,成功越狱潜逃。我曾用一根生锈的铁钉,磨尖后在一根寸余的小铁丝之端,耐心地用小石头打出一个小凹陷,然后在水泥地上小心地磨穿成一个小洞,做成一根对付鹑衣百结的绣花针。玻璃片,除了能裁衣物外,还有一大用处:用深色纸或布粘在背面,利用反光作用,在风门口的黑走廊里,能非常清晰地看见走廊内值班人员和干部的行踪。一位梁姓难友,就是以此"土雷达",发现值班人员的偷食行为。

牢房内什么东西都是有用的。大兵、干部、值班人员等,除了每年四大节日(元旦、五一、十一、春节)大搜查外,时常会突击检查,非常严格。查到危险品,当事人就会受到盘问、殴打、戴刑具。所以,必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学会天衣无缝的隐藏技巧。这些物资的来源,不外有三:一、出外放风、劳动时,捡回来的;二、前任难友留下,藏在孔隙里的;三、利用自己衣物上的金属等制造出来的(铜扣、铁扣、皮带扣、毛像章、钢笔套、墨水瓶、竹笔杆等等)。

有位劳动教养难友,就曾把一条皮带扣磨成锋利的"刀"给我看。那"刀"子,平时是普通皮带一条,看不出什么,要用时,拉出来就是利刃一柄。

有一天,我被干部叫出去提审。经过十多个回合的较量,干部极力迫我交代罪行,我则极力据理力争。僵持之下,干部恼恨地给我锁上反铐。那自制的土铐子很窄很小,卡得很紧,只一会,已感骨痛肉肿了。

我忍着刺心的疼痛,回到监仓。一时感觉到失去双手后,做 182 事是多么困难。我坐在叠起的被子上想:在这铁幕中,阶级森严, 失夫自由的程度有很多等级。比如:社会上的老百姓——他们有 家庭,但没有言论、工作、居住、迁移、出国的自由。此为第一 级。受管制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 派,此为第二级。"强劳"——把一些问题青少年抓到外地强迫 劳动,没有硬性日期规定,如表现不好,则升级送去劳动教养。 此为第三级。"劳动教养"——虽称"属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少 许工资,但对其管制之严,已几近劳改。此为第四级。"劳动改 造"——劳改场、监狱中,一切判了刑的"阶级敌人",这是人间 地狱中的一群,失却任何基本自由。此为第五级。劳改队中,又 分出劳动和监禁两类,后者是"坐禁闭"于监狱、监所的重点"危 险"囚徒。此为第六级。戴刑具者——戴手铐、脚镣、捆绑等。 但尚有一部分机体,可以"自由"活动。此为第七级。手铐与脚 镣,连锁在一起者——移动时,形同四脚爬行的狗;睡觉时,则 只能"豆腐炒虾"(破絮盖着卷曲之身体),"金针蒸鲤鱼"(烂 席覆干僵直骨架上)。手铐脚镣连锁,再挂以重锤者——必须搬一 下,移一下。此为第九级。手铐脚镣连锁,并以铁链钉死在牢房 中央三铁环者——行动只能像放牧的牛那样,当然没那么长的绳 子,绕着尺余半径转动。 大小便时要报告干部开锁,才能移向便 桶。并且,为防止撞墙,四面都钉上棉被。这多是行将被杀害的 难友在弥留期间的待遇。这是失去自由最高的一级,也是最后的 第十级。此铁环,乃是通向鬼门关的一环也。

看来,我失却自由的级数,达到第七级之高,是否继续升级,则不得而知,听天由命了。

我的双手被铁铐反锁,独自无援地关在九号监仓内。卡肿后的疼痛使我头昏眼花。心脏每跳动一下,那伤口就似小刀割肉刮骨般地痛一下。我只能尽量减少双手的活动,免得加速伤口的糜

烂。那双肩由于长时间扣得紧紧地,不能活动,早已麻木了。不能刷牙洗脸,倒不要紧,反正早已不成人样了。最麻烦的是,双手锁在背后,动弹不得,无法解裤带,所以不能大小便。他们用饿牢、肉刑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我的"反改造嚣张气焰"和"反革命骨气",继而迫我就范,"交代自己的罪恶",亦即出卖自己也出卖朋友。

"绝不能向他们屈服! 更不能暴露其他朋友!" 我暗暗给自己 打气。"死就死自己一个,咬紧牙关!"

为了解决如厕问题,我要作适当的合法斗争。我站在风窗门口大声地、反复地喊叫:"报告,我要小便!报告!我要大便!"不管值班的如何制止,我就是大声吵嚷。后来他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想避开我。

"你们讲不讲道理?尿都不让人家撒!你们是改造我思想,还是改造我肉体?"气愤之余,我开始"开硬弓"(持强硬态度)了。我听见值班员向干部报告的窃窃细语声,看来干部早已来了。我就是要他们来,喊给他们听的。

铁门开处值班员进来,把我的裤子一脱,让我光着下身,就 关上铁门。

我气愤地问他:"喂!就这样?"

他平和地答我:"嗯,就这样。"这是干部授意的。

"上面蒸松糕,下边卖凉粉"(上热下冷)的结果,造成我腹泻。虚弱的身体又多了一种折磨。要命的是,肚痛时不能以手按抚,只能弯腰坐着,卷缩于一隅。吃饭,又是个问题。既不能用手,更不能用汤匙(吃惯"大锅饭"的大陆人们,几乎都有一个汤匙,很少人用筷子)。

我也多次浮起"人生不过如此,与其受苦受难,不如一死了之"的念头。但每每想到自由的风光和受煎熬的同胞、难友,又 184 激起我为自由而生存下去的决心: "我一定要克服最大的困难, 一定要战胜他们!"

这里开饭,早晚两次,中午只给一盅开水充饥。有时是一小个又黑又酸的馍馍,外加一勺有盐无油的黄菜叶子,有时是一小碗砂谷与米糁参半的"大米干饭"。每逢周末,外面的劳动犯可加一次餐,大概每人可以分到几片薄如蝉翼的肉片。我们属禁闭号子,只有嗅肉香的份儿。有个笑话说:闻到香味也要收钱。还好无人来收钱。

每年只有四大节日才能托"人道主义"政策之福,尝到几粒 久违的肉丁之类。肉中氨基酸的味儿确实与苦菜叶子不同,有一 股诱人的香味。仅仅是嗅到肉香,看到肉样,消化系统就马上处 于兴奋状态,内分泌也大大增加了。在配给制的大陆,特别是劳 改,每年吃了多少次肉,一共有多少,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算得出 来。我自己就是二十多年,没吃过鸡肉。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想了些办法。由于我个子高,发开水时,可以忍痛背着双手,拿口盅到风门口去接。拿饭拿菜,则全靠口来帮助。

监狱中的劳改,每人都有一大一小两个饭盆,大者盛饭,小者装菜。我用口把饭菜倒在一起,放在棉被叠成的"桌子"上,蹲着把头埋进盆子里,也能解决一些问题。剩下的困难是睡觉。休息不好,就会患病,就无法抵抗各种折磨,最后也许会垮台、失败。所以一定要睡足精神,才能与他们周旋到底。

为了睡觉,我用口去插竹钉,拔竹钉、藏竹钉、挂绳子、衔绳子。叠被、叠衣、移动一些物件,则依靠双脚来完成任务。我想,根据用进废退的道理,时间一久,我的嘴巴会变长,变成尖嘴巴,双脚将会巧如双手,双手则会退化萎缩,甚至残废掉。因为从前有一难友,戴了半年多反铐,开锁后,双肩后反,双手再

不能拿东西,整天丝瓜般地垂于腰后,从此残废了。

戴着反铐的双手,坐着、站着、睡下,疼痛会轻些。要想躺下睡觉,真是痛苦万分。趴着睡,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双手拉紧后,伤口很痛。侧身躺着,会压得手臂麻木酸痛,且转身不易。于是,我用脚把棉被叠好,作叠头部之用,再把棉衣棉裤叠好,作叠屁股之用。这样,当我慢慢躺下去时,由于两头叠高了,腰际间就有一段离地的空间,带锁的双手,正好松挂其间,不受体重压迫,所以倒也能时醒时睡地勉强得到一阵休息。深入骨肉的伤痛,如刀割般阵阵侵脑,若不转移一下注意力,根本无法入睡。我便采取"自欺欺人"的心理战办法,去麻痹自己的神经。在迷朦中,我不断对自己说:"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这一点刑,算小儿科啦,有什么了不起?最痛有多痛?只不过如此罢了,根本就不痛嘛!只不过是神经在作怪。对了,这是小梅紧握我双手时的感觉而已。"说也奇怪,往往还很有效,痛感消失后,我竟能入睡。

这点灵感,来自罗君当年在棺材式监仓中,把腥臭作呕的便桶气味,硬当作"梅香咸鱼"味道的经验。

最大困难是晚上如何钻进帐篷式蚊帐,去逃避那恼人的蚊群袭击。如果双手锁在前面,平躺后就很容易掀起帐边,慢慢钻将进去:但双手锁在背后,就有天壤之别了。我用侧入、跪入、俯入等方法都无法钻进去。一不小心,拉脱绳子,前功尽弃,又得爬起来,从头开始。有时奋斗几个小时,才能躲进去"称孤道寡"地喘息一番;有时持续作战,几近破晓,仍然无法"入宫为王"。

外面蚊子真多,痒痛之余,苦不能用手挥赶拍打。在前面的侵略军,我会用"吹气法",把他们暂时驱散;后面来的敌人,就只有连人带蚊地,撞向墙壁,或如山猪磨痒那样,令蚊尸与血渍,擦在墙上,令其血肉模糊、碎尸万段了。

有几次,我发现窗口有人偷偷窥视,还听见窃窃私语。敏锐的知觉告知我:那是值班员和干部,他们在偷看我与蚊群大战的情形和制造"篷式王国"的杰作。

受了一星期多的折磨,也与蚊群战斗了一周多。大概共干觉得无法令我屈服,又不够条件处死,有一天说了声: "我们不准备再搞你了,但你的问题还未交代清楚。当然,死是死不了,但刑一定要加的!"便给我开了铐子,调到八号仓 "等待处理"。险哉!若非坚决抵抗,命就归西矣。骤然间除却反铐,双手感到无比轻松与自由,但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双手并未完全属于自己。

气候一天热过一天。监仓内尤觉沉闷,像遇溺之人,吸不到氧气,几近窒息。终日终夜,汗流如注,我赤膊光身,只能穿一遮羞的内裤。那内裤湿了又蒸干,干了又湿透,恶性循环,越来越酸臭。监仓内又缺水洗涤,每天给的一点点水,都珍惜着用来抹身、搓毛巾,舍不得洗裤子。

晚上睡觉时,我依然挂起那土蚊帐,入内称孤。但挂与拆就方便多了。由于蚊帐位移至门边,门底一隙吹来的丝丝凉风,使我多了一副"土风扇"。为了加强对流,我在帐尾处撕一小洞,插入用旧报纸、毛纸卷糊成的长圆筒,直伸铁窗外。果然凉风送爽,优哉悠哉地得到"安息"。但这艘带尾巴的怪轮,却惊动了值班人员与干部。只几天,就叫我收拾行李滚蛋了。

我原以为会留在监所,因自己属于"有逃跑思想"、"重新犯罪"的待处理分子。其实我希望与罗君一起,共图大计,携手合作,争取早日到达自由之岸。然而,他们给了我一根扁担,两条绳子,派了两个各持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大兵押送,就叫我挑着行李上路。目的地不肯说,只含糊地答:"不很远。"

我在暗室里关押了大半年,不见天日,又受过刑具折磨,甫出监仓,两眼被强烈的阳光照射得满天星斗,欲睁不能地流出泪

水来。走路都成了问题,怎能挑担子呢?一大兵曾建议,给我一部板车,让我慢慢拉着上路;但干部怕车子遗失,坚持要我挑着担子走。我只好跌跌撞撞地挑着东西,穿过总场,邓襄公路(河南邓县至湖北襄阳),向新野县的三分场走去。极目眺望,三分场部高高的岗楼,隐现在新野群山附近,黄沙弥漫,估计在数十里之外。顿时我手软脚乏。看来,大兵之徒是不会说真话的,连路程也瞒我。

THE MEDICAL PROPERTY OF THE RESERVE OF THE

我时时回首张望: "不知罗君现在何处?"

沉重的担子,压得我头昏眼花,胸闷欲吐。扁担中央,有颗半露的钉子,磨得我衣破肉烂,鲜血染红了白色的囚衣。我要求把行李丢掉不要(反正是一些不值钱的破旧之物),但大兵不准。一路上,我只能蜗牛爬行般慢慢地走。走约五十公尺(两根电线杆之距)便要求坐下来休息一会。到最后,拚命挣扎,也只能十步一停了。太阳快下山了,两大兵不约而同地望望落日。那黄昏里的"红太阳",似风烛残年的耆老,气喘着、颤栗着为群山所吞没。

大概他们也累了,又担心摸黑出麻烦,商量了一下,便截停了一部到总场运砖的卡车,大家坐了上去。车上坐着几个搭顺风车的干部家属。她们与兵哥们是认识的,一边招呼,一边闲谈。谈及我的情况: "现行政治犯,企图组织逃跑集团,准备'叛国投敌'。"

到三分场干部的三中队门口,大铁门外,漆黑一片。淡黄的灯光下,厂房的难友端来了一碗稀饭给我喝。我饿渴交加,一口气,已喝得精光。换了两名新兵,到跟前问我:"休息好了?上路罢!"(后才知,原来李君在此队,他们怕我们在一起。)

"还要上路?到哪儿?有多远?"我实在走不动了,焦急地问。

"走罢走罢!就在前面不远!"大兵没好气地说。

摸黑踏暗地走走停停,我觉得全身骨架已散,好像随时都会 垮下来一样。

- "你是哪里人?犯了什么罪?"大兵在休息时,好奇地问我。
- "南方人,学生出身。他们说我企图'偷越国境'。"我说。
- "偷,你会偷?这不好。"那大兵摇头说。我见他如此低能, 缺乏应有政治常识,就不再接腔。

千辛万苦,总算捱到了三里外的二中队。队里劳改正在进行政治学习。很多人围上来观看,一来看看是否熟人;二来探听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有一难友,见我虚乏的样子,好心地想帮我解开行李上的绳子。

"滚开!你在干什么?让他自己解!"一个粗矮、口操湛江粤语的干事,突然一掌,把那老兄推出数尺之外。看来此队的政治气氛很浓,监管得很严厉。到医务室取药时,发现由海叉监狱同来的一位难友,在此当"犯医"。这位年近五十的老兄,在海叉监狱看守所时曾因奸淫女病人和写情书,受过大会批判。我询问他:"这是什么队?"他却骗我说是四队。大概不想与我这反改造分子沾上关系,影响他的美差罢。

第二天,就迫我下田割稻谷。那不要了我的命!我坚持身体有病,不吃饭,不出工。那矮个子干事,暴跳如雷,气势汹汹,但看见我坚决而顽固的态度,也拿我没办法。便大骂我"装病偷懒"、"对抗改造"、"坚持反动立场"、"死路一条"等等。我抱定"予取予求,我行我素"。况且,我真的有病。

最后他只好请示指导员,叫我卷起铺盖滚蛋。我吃力地挑着 行李时,他又骂开了:"装模作样!劳改了那么久,连担子都不 会挑?"

那回程的三里路, 足足走了两个钟头, 来到三分场场部, 经

过一番研究,决定又换了两名新兵,把我这名危险分子,押送到中队去。

No. of the second second

在五中队门口,我听见指导员打电话给分场和总场管教科: "这名犯人,在监所关了一年多,身体很弱,无法参加劳动,又 有肺病(这点是我骗他们的),还有逃跑思想,会影响他人安心改 造。……要求调到其他队或监所去。"其实我也希望调回监所与罗 君在一起。但总场不准,他们只好收我入监仓。

白天,叫我与一些病人在监仓内搓麻绳,有一次组长带我们到铁门外劳动,指导员见了,大惊失色,骂了组长一顿:"谁叫你带他出来的!"便叫我们滚回监仓去。晚上则与四个大组长睡在一起,目的是隔离我、监视我。

我每天都喝很多水,并把一小包留了很久舍不得吃的黄糖,冲了一大口盅开水喝了下去,但几天来竟没有一滴小便。我全身发烧,四肢不适,像得了重病一样难受。有一天,总算火辣辣地来了点小便,却是赤红色的血尿,痛得我眼冒金星。看来膀胱炎的程度还不轻。

有一晚,我看到了原福州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所长林诗如。 我说:"喂!所长,在二分场六队,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说你改造表现好,已放回海叉,并安排了工作,叫大家积极接受改造, 向你学习。你怎么还舍不得走哪?"

他放下报纸, 忿忿地用闽南方言说: "对么蓝巴! 菠萝蜜!" ("回个屁, 他妈的"之意。) 干部也真有一手, 每当一个人调走, 不是说"关起来了", 就是说"提前释放了"。往往大加渲染, 叫 大家积极接受改造, "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五天后,指导员又叫我收拾行李滚蛋。不过这次有牛车坐,还不错。科学越来越发达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第三次来到三分场场部。我坚决要求留下行李,空手上路。这次是分场场长与190

两个大兵一起押送我到附近的四中队去。到达后,已是掌灯时分。

我独自坐在大铁门外的一座仓库旁边等待。看到收工回来的 难友们,排着队一个一个把下午捡回来的棉花过秤。昏暗中,让 我独处,竟不怕我拔脚而逃?

但仔细思量:环境陌生,准备不足,成功率不高。忍耐一下,等待时机。漫漫长路上,我需要一位盟友。一旦脱缰而去,不单要逃离劳改场,最重要的是逃出湖北后,最终还要"偷越国境"。不结交一位有雄心、有智谋,决心与己相当,或胜己一筹者,理想的蓝图,会再一次被现实撕毁。一定要"伏似僵虫、起如飞箭",否则不足以战胜对手。

大概首长亲临说明,碍于上司脸子,终于把我这名顽固分子 收了下来,结束了互相推托的"玩排球"游戏。

在干部带领下,我进入一座泥泞不堪、散满砖石污泥的监仓。 昏暗中,有几个人与我攀谈。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我吓了一跳: 昨晚柔声细语和我闲谈的人,全是满脸皱纹的老头,再一巡视, 全监仓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将",当时我才二十七岁,成了全队年 纪最轻的"细佬"。他们全属"历史政治犯"。

大家对我很友善,当我摘棉花时,有人热情教授"猴子摘仙桃"、"青龙出海"、"双龙夺珠"、"左龙右虎"等单或双手摘棉花的技巧给我。有位难友每天下午都坚持代我把摘好放入麻包的棉花义务挑回几里外的监仓。有的替我改装棉鞋,有的善意告诫有关纪律,免我吃亏。有的请我吃一点不知何处弄到的猪肉。

据了解,左边睡的老头,年轻时是共党的东江游击队员,时时谈他打游击时的艰苦生活和被国军围剿的险况。他说,当时没有粮食,也不敢生火,偶然弄到点米,就生噬生咽。饿得受不了,就找寻一种植物,折茎后吸它的糖浆,只要不停止,就可以吸到饱。一旦停止,再吸就没有糖浆了。至于这位立过汗马功劳的老

游击队员,为何变作囚徒在外省的监狱内苟延残喘,我没有问他。

右边睡的老难友,年过七旬,属于"历史反革命"。看其相貌、骨骼、举止、言谈,甚有儒将风度。看来此翁职位当年不会低。他对我很友好,并时时谈到福州。他说起以前有个好友,是"做大生意"(当官)的,也姓叶。看意思是想试探我是谁的儿子。

为了安全起见, 我守口如瓶, 只含蓄地说: "我父亲是个做 五金生意的。"

他又友善地告诫我:那游击队员很坏,专门"画鬼脚"(写检举),全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经常用打小报告来换取装病偷懒在家休息的待遇。他只有一个铁匠朋友讨好他。叫我不要与他们接近。

于部安排我睡在四组,劳动则在二组,这是很特殊的做法。 目的是既隔离又加强监督我。睡在左边的东江游击队员,实际上 就是安排好的窃听器、雷达、或是定时炸弹之类。

同组一位琦君,身型微胖,人很风趣、友善,与我谈得很投机。一次下大雨,挖沟排水时,抓到很多青蛙,我们一起在监仓内的澡堂边,架起砖头灶,用他弄到的一点油煎了下饭。我从小爱吃田鸡,想不到监仓内,能吃到油煎田鸡的大菜,此时此际倍觉鲜美。不过我们是由头到脚全部吃掉的,几乎骨头都不剩。

琦君原是澳门人,给一外国情报官开过车,上司对他很好,他英语不错。解放后他回大陆探亲,被扣上"间谍"、"特务"等罪名,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入狱劳改。每次劳改场的运动,都拿他开刀:用墨汁圈眼画面,头戴臭粪筐,颈挂便桶弯腰九十度,用粪便涂滴于头发上,挂"反革命"牌子游街示众。

有位粗矮个子的难友,每天捡回的棉花重量一定是四十斤(按规定要交六十斤,个别人一天能捡百多斤),雷打不动,斤两不差。任干部组织批斗、惩罚、殴打,他依然故我四十斤,多一两也不192

肯再摘。最后,只好听其自然,从此得了个"老虎骨"的雅号, 意为"狗嗅到都害怕,食之无味,咬之又硬"。

有一天午饭时,一阵喧扰,便见数人拳脚相向,对那被数人抱着的人大打出手。我身旁两位正吃着饭的瘦弱老头,忽然起身,快步向前,各揍了那被抱着的几拳后,又快步回到铺前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看来,那被抱者平日一定得罪了不少人,做了"阴功(亏心)"事,故此机会来了,弱者也回咬一口,趁机报复。所谓"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一会儿,指导员闻讯赶来,看样子非常气愤,讲话时结巴得很厉害。他拿出一张刚造反上台夺了印把子的沙洋农场最高层领导——"新公安红旗"出的一张"安民告示",大声告诫以后不准出现类似情况,不准动手打架,否则依法严惩。

高墙里的文革

当时的大陆,分为华北、华东、华南、中南、西北等几个大军区。每个大军区统辖六、七个省的海陆空军大权。其中驻在湖北武汉市的中南军区司令员,叫陈再道,为共军中将,长征干部。他手下有支八二〇一部队,师长姓牛。由于和造反派的"三新三钢"(三个头带"新"字和三个头带"钢"字的造反派组织,如"新华工"、"钢二师"、"钢工总"等)发生冲突,酿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造反派冲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抢夺并焚烧文件、书籍,包围军区司令部。双方大打出手,互相火拼。

中共中央曾派当时核心领导"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和谢富治二人到武汉调解。但遭到八二〇一部队的包围、殴打和禁闭。

造反派当时夺了大权,其喉舌《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大

骂八二〇一和陈再道,是"殴打中央首长的匪徒"。后来,"革命群众"在冲突混乱中,把王力、谢富治二人抢救出重围,用汽车偷偷送到机场,飞回北京告状。

陈再道成了打击"新生力量"、"禁锢首长"、"镇压造反派"的"铁杆保皇派",于是停职查办。但由于他是仅存不多的长征元老之一,老毛也惧他三分。反告状的结果,王力最后不但退出了"文革小组",而且还成了"叛徒"、"汉奸"。陈大麻子后来调到另外一个大军区去任职。

沙洋农场驻有一个团,分派到各分场、中队去执行看守监管工作。由于"七•二〇"事件的波及,本场掌权的"造反派"(新公安红旗)属"三新三钢"体系,所以,部队的团长、政委、教导员、营长、指导员、连长等,都被造反派拉出去游行示众,他们戴着高帽子,自己打锣叫喊着:"我是陈再道分子!我对不起毛主席!我向革命小将请罪!"

那时候,整个劳改场,干部、工人之间分成两大派别:"新公安红旗"属"造反派"、人数较多,约一千多人;"赤旗山"属"保皇派",人数较少,约一百多人。"新公安红旗"与"三新三钢"结成一体;"赤旗山"与驻军、农村的"农民赤卫队"等,串联在一起。两者是对立的。

在"造反派"掌权的时候,属"赤旗山"派的总场袁书记、李场长等被说成是日伪时期派来的汉奸,国民党派来潜伏了四十多年的"特务"。除遭殴打外,还贬在干部厨房扫地洗菜,形同打入冷宫。后来,林彪实行"军管"与军队对立的"造反派"垮台,红卫兵纷纷作了"替罪羊",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判刑劳改,有的上山下乡,很多则沦为盗贼。毛用红卫兵的狂热搞垮对手,后又置这些无知的青少年于万劫不复的死地。

沙洋农场的一号司令是总场的李副场长,二号司令是拖拉机194

工人孟某,三号司令也是开拖拉机的工人,姓张,樊城人。一号司令被长期禁闭、批斗,形同疯子,整天胡言乱语。二号司令由于出身地主,属阶级敌人、"篡党篡权"、"实行阶级报复",给判了七年徒刑,先劳改于沙洋农场,后不知调到江北农场还是别的什么农场去了。三号司令出身在要饭家庭,本人学生,是出身好的工人,但抓住他殴打领导干部、偷汽油烧坏一辆汽车等罪名,判了三年徒刑,投入劳改。

这三位当年冲锋陷阵的司令都先后与我一齐监禁、劳改。不过,那是后事了。风云变幻,世事无常,正所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情似纸张张薄,世界如棋局局新"。

我在三分场四队,劳动改造了约月余。有一天,大家在地里劳动,把堆积在广场的牛、马粪,肩挑或车拉到田里。忽然指导员来通知数人到总场开大会,其中有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我这种反改造分子,三种类型。其他人互相猜测着:究竟开什么大会?而我则是"哑巴吃汤丸,心中有数",我知道"加刑宣判大会"来了。起先,心跳有点加速,后来,把心一横,就不觉得有什么紧张了。

我们坐汽车被押送到总场。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早已插满了红旗、彩旗、竖起的木板上贴满了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接受改造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等等彩色标语。会场上充满了火药味。作为宣判台的一方,照例放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上面的横幅写着"宣判大会"四个大字。

草地上,早已坐满了各分场和厂矿来的近万名劳改和就业人员。我看到了王君、李君、胡君等人。在总场被服厂劳改的女孩子,坐在最前排。随着开会程序,我们一行十多人,被逐一叫到前面,排成一行站着。除了我们这个集团的首犯、主犯外,其余

是偷鸡摸狗的刑事犯。他们都是微低着头,等待判决,我则高昂着头,双手背在后面,东张西望,微含笑意。

一个穿军服的干部,上来按低我的头。他的手一松,我的头又抬了起来。又先后过来几个干部,极力按低我的头。并喝令: "低头!"、"放老实点!"但只要他的手一离开,我依然微笑昂首,把他们气得七窍生烟。一时场下骚动起来,人语啧啧。这时负责审判我们案件的刘科员,满以为他的出现会收到"扭转局势"的效果;他一面打着官腔,一面按低我的头。但我极力反抗,无论如何不肯向这些家伙低头。他老羞成怒地用拳、掌在我头上和颈背上猛捶乱打,企图逼我低头弯腰。但我坚持挺胸抬头站着。

这时涌上来四、五名年青干部,一顿拳脚后,硬踢我跪下。 他们取来一根粗大的绳子,合几人之力,把我捆了起来,踩着我 的背,双手猛然抽紧颈后绳子,由于用力过猛,那黄麻绳子"嘭" 地一声断了,那干部向后跌了个脸朝天。

我任由他们捆绑、殴打,既不求饶,也不叫痛,咬破嘴唇,也绝不向他们屈服。这时刘科员取来一副土铐子,准备给我带上。另一些干部则取来一根非常结实的黄麻绳子,浇透水后,便扎扎实实地像五月端阳的"裹蒸粽"那样,把我捆成一团。

我听到前面的女孩子口里啧啧有声。有的说: "唉,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该多痛苦!"我明白她们的同情;但她们毕竟不明白我不愿做顺民,不向恶势力低头,藐视他们的法律的意志和争取自由的决心。

等宣判我们"反革命逃跑集团"的名单时,我站了起来,不肯跪下,他们见我强硬的态度,便不再来啰嗦我。我被加判了两年徒刑,合共十七年。胡君也两年,李君则加了四年。在他们的统治下,承认越多,罪名越大,这是血的教训。但很多时候,他们草菅人命,会糊涂乱判刑的。其实,我才是这次逃跑越狱的主196

谋,但我誓死不承认,他们便把李君充作首犯来结案。倘若大家都不交代,也许能混过此关。

从开场白,到逐一宣布罪状,到后来的首长训话,真如女人的缠脚布,又臭又长,足足花了整个下午。我的双手被捆绑得由酸痛到麻木,头上渗出了豆大汗粒。由于一部份血液困在双臂,缺血缺氧,使我心虚头昏,眼冒金星,呼吸渐渐困难。双唇已被我的牙齿咬得流血。我微睁着双目,在摇晃下极力支撑着,不让自己的身体在大家面前倒下去。

"绝不能在大会上倒下去,让他们耻笑。小叶呀,老叶呀, 支持下去!士可杀不可辱,如果倒下去,就应了他们那句'凡是 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话;我要做个打不倒的人, 正义的人,绝不能在他们面前倒下去!"我忍着袭向全身的痛苦, 极力鼓励自己。

我终于支持到散会。大会决定将我这个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宣判的人,收入监所,禁闭反省。一些干部小孩向我抛小石子,我怒目相向,张所长喝住了他们。并向我说:"你为何那样顽固?不肯低头认罪?"我只淡淡地说:"我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意即不承认他们的法律。

被押送到沙洋监所,松绑后,双手呈紫黑色的浮肿,吊垂在两侧,完全不能活动。深沉的麻木慢慢变作刺痛,随着神经的苏醒,如刀割般地阵阵袭向心头。

我一脸豆大的汗珠,心虚头昏,走向2号仓时,途中几次差点昏倒。我极力忍耐着,不倒下去,绝不!铁门关后,我见里面已关着一位年青貌俊的难友。他见我双手黑紫,还带着麻花型的绳印,早已猜到是怎么回事。非常同情地替我按摩,并帮我将双手上下左右地活动了一会。

我口干得很厉害,双手里的冷血回流到心脏,感到全身颤抖,

像虐疾发冷时那样难受。他把仅有的一点凉开水倒给我喝,并将他的一张毯子借给我盖。在昏昏沉沉下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

regramment to the companies of the contract of

早饭时,我无饿意,分了一大半黑馒头给他。通过简短闲谈,察言观色,证实此人乃君子辈,心地善良,思想感情也较接近。对他好意的帮忙,我表示由衷的谢意。我把身上带的"场内流通粮票"(劳改场内发行的代用粮票)给了他一些。在那穷困饥荒的黑狱里,这相当于外面的人赠送一部彩色电视机那么贵重。

他叫小华,广东潮汕人氏,音乐专科学校毕业,丧失自由前是中学音乐教师。三年饥荒时,与一班师生乘船"投奔怒海",不幸被捕。为首的两位老师以叛国投敌反革命首犯罪名枪杀于原乡,他属胁从分子,但也判了七年徒期,调到此地的苦役营劳改。他的歌唱得很好,音质优美,有极准的视唱能力。据说,他还会弹钢琴,拉小提琴。

我们时常交流彼此感兴趣的一些歌曲,吸取音乐营养。我介绍了很多三十年代流行的,现在已经禁唱的歌曲。如"花样的年华"、"黄叶舞秋风"、"街头月"、"月圆花好"、"天边一颗星"、"夜上海"等。他似乎对"铁蹄下的歌女"、"紫色的丁香"等曲,也很有兴趣。他也介绍了许多电影插曲,外国名歌给我。如印尼的"星星索"、"哎哟妈妈"。

有一次,他用学来的印度语,教我唱"流浪者"电影中的"拉兹之歌"前两句: "阿马拿贺·····耶格伊吉斯尼·····" 他抱歉地说:本来他能用印度语唱整首歌的,劳改非人的际遇,弄得他记忆衰退,其余全忘了。我也即兴用泰国语唱了"彭尼其山"(命运之舟),用日语唱了"惜别"给他听。 这些歌是一位泰国华侨翁君和一位日本医生教我的,他很有兴趣地学会了它们。

待到狱卒离开(我们用玻璃"雷达"侦察,再凭听觉,可以准确地判断他们的出入),我们便小声地开"音乐派对"。一学会

马上把草稿撕毁,以免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歌曲落到干部手中。到时,"证据确凿",欲辩不能了。

他这次是别人"组织逃跑集团"事败后,涉嫌到他,已关了 一年多,目前还在审讯中。

有一次,他非常痛苦地谈到,他新婚才数月的妻子来信,并拿给我看。其中有这么一段:"……七年呀七年,两千五百天,我独守空闺,情意绵绵,盼郎归来啊,襟前湿透泪涟涟。尽管望穿双眼,秋风依然。一个青春少女,一生有多少个七年?"是啊!人生有多少青春?青春又有多少个七年?一个在歧视下受尽欺凌,一个在苦役中备受折磨。相思何时了?聚会在何方?虽然得团圆,但山河尚缺,铁蹄依旧,怎不教他黯然神伤呢?

触景生情,也令我回忆起一件事:"投奔怒海"前,我已作了破斧沉舟的打算,为保守机密,不连累别人,毅然婉转谢绝了一位温柔、苗条、漂亮的马来西亚华侨女护士的求婚。现在看来是善意而明智的抉择,没有连累她作了反革命家属而抱辱终生;至少,我们之间今天不会出现"七年呀七年"的惆怅。(她后来嫁给一位医生,好像全家去了马来西亚。)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照狱中规定:外面劳动的难友,可以将强迫存放在保管室内的行李取出来晒太阳,或取点衣物替换,到了下午再依组别放回原处。在众多的脚步声中,我听得出有鞋声、木屐声、胶拖鞋声、赤脚沙沙声。有轻身的、有负重的,也有一重一轻的跛子脚步声。长期幽禁,听觉出奇地发达、敏感。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踢哒踢哒"的脚步声,那是一种用旧轮胎自制的凉鞋,俗称"水陆坦克",既可作鞋,又可下水。在未知塑胶凉鞋为何物的监狱内,它是一种普遍而实用的东西。那急速行走的脚步声,经过我的号子门外时,突然重重地在地上顿了一脚,回来时,也是这样顿了一下。那是一种信息,尽在不言中的

信息。唯一的可能,此人是罗君。他的意思很明显:一、他硬抗过去了,没事;二、现在监所劳动;三、问候我好。于是,我期待放出监所劳动时,与罗君见面,再筹划一切。

一个月后,我被叫了出去。这次还好,我是空手来,空手去,乐得轻松。但却不是留在监所,而是押送到不知何处的劳改场去改造。这使我很失望:未能与罗君共图大计。也勾起我悲凉的心绪:我们像一群古罗马的奴隶,为奴隶主积累财富,自己失却一切人身自由。

押送我的两个大兵,非常凶恶,蛮不讲理。看来是故意演戏般地在恐吓我,企图打击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一路上,忽叫左,忽叫右,一会儿赶我快步跑,一会儿又喝令我站着,蹲下。一不如意,马上扣动扳机,弄出"格格"声,口口声声说:"老子今天毙了你!"国骂、乡骂不绝于口。我估计他不见得真会开枪,意在"整人",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已;然而,大权在握,他们随时可以"企图逃跑"、或"夺枪反抗"、或"企图谋害我解放军战士"等罪名,开始扫射,把我杀掉而不需负任何责任。或许还会得到上级与"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的嘉奖呢。

这次倒幸运,到了总场就有汽车坐,不用走路,换了两个新大兵,也没有再啰嗦我。车子开到离襄樊市约十多里一处叫"后山"的地方,我们下车来到沙洋农场的"第七新生砖瓦厂"。这是农场赚钱最多,镇压最厉害的有名的"老虎厂"。里面关满了广东梅县监狱、广州黄华监狱、英德劳改场、福建海叉监狱等处来的近千名"顽固、危险分子"。越是偏僻、墙高网严之处,干部对劳改越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反正任打任杀,外人也看不见。反而对从事农业的劳改,政策与手段上会比较缓和一点,唯恐压力大了,会逼得他们逃向荒野。

我一入厂,就被很多人认出是"反抗宣判大会尊严"的人。

他们相互传述,并借种种机会与我接近、交谈,表达善意与敬重。有一小孩,远远地向我伸出一个大拇指,我只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为了大家和自己的安全,对一切陌生人,不知深浅,未识何方神圣时,我照例保持沉默与观察。必须听其言,察其行。至少要经过一两场监狱内大"运动"(半年或年终的"三查"、"五查"之类政治运动),才能略知各人"庐山真面目"。"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逢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说法,我体会甚深。

第七新生砖瓦厂内,关押有八百多名劳改和一百多名就业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另有"有公民权利"的工人十多名,分作四个中队。一队为"装窑"、"出窑"队,二队为"制砖坯"队,三队为"制瓦坯"队,四队为就业队。就业队与家属,住在铁网内、围墙外的"宿舍"里。劳改们则挤在电网内,围墙里狭窄的监仓中。该处驻有一连大兵看守,设有营部,相当于一个"分场"。

烧制红砖的"轮窑",是个长椭圆形的结构。顾名思义: "轮窑"者, "轮流不停", "货如轮转"、"财源不断滚滚而来"是也。上层设有"火眼"投放煤粉,下层则是拱形的长巷般的"窑室"。难友们分"出窑"、"装窑"两组。一组把滚烫的红砖瓦取出,堆在外面,另一组把砖瓦坯按规格架成格形。你追我赶,长年累月在高温下煎熬。烧砖瓦的温度达到摄氏八百多度之高,干部为了多榨取利润,用各种办法强迫大家拚命多干活。一般是两个"火头(两个燃烧点),有时加到三个或四个"火头",八组人分在四个燃烧点"出窑"和"装窑"。"火头"越多,越接近火源,温度越高。出砖瓦时,因砖瓦还是暗红色的高温之物,根本不能用手去碰它,只好撕下自己的破棉衣缠手,用双手把砖瓦抱上小车。"蓬"地一声,那棉布马上着火。只好找来一桶水,放在侧边,把缠手棉布浸湿了再去抱。只见湿棉布烫得"吱吱"直响,

冒着烟,很快就又干了。就这样,一边浸水,一边抱砖,不停地 去完成永远也完不成的任务。

化氯甲磺基基苯甲基苯甲基基甲磺基基苯甲基苯甲基基基苯

在窑室内,前面可以清楚地看见燃烧着的熊熊烈火,感到阵阵令人窒息的热浪。"窑室"内气温至少在摄氏七十度以上,圆拱形的窑壁呈火红色,一不小心碰到,皮肤马上灼伤起泡。置身其间,有"万国如在烘炉中"的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那红砖一样,被无情的烈火焚烧着、吞噬着,慢慢溶化掉。由于窑内温度太高,死过不少人。为了降低温度,后在门口装了一部电扇,直吹得里里外外,天昏地黑,沙尘滚滚,不能张目。戴上三个口罩(十多层棉纱布),依然是满口满鼻的污涕黑痰,每天不知要吸进多少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灰沙。很多难友,便渐渐得了肺病而死亡。在那环境下,犹如在酷热难当的撒哈拉非洲大沙漠中碰到飞沙走石的龙卷风一样,既恐怖又难受,随时都会被"报销"。

"装窑"虽在出窑后面,温度稍低,灰沙稍少,然而,人站上砖架毛发就会"吱吱"作响、烤焦卷曲,且工作量大得惊人: 六个人每天不停地弯腰取砖瓦,举手递砖瓦,要把数十吨重的砖瓦坯胎,举过头顶,架成各种规格。每天都有硬性规定的任务,完不成者除强迫"加班加点"到深夜外,还要受各种批判、斗争、加刑、捆绑、禁闭、带镣、上铐等处罚。

一位从香港回来探亲,被冠以"特务"罪名,判了十多年徒刑的潮州难友告诉我:刚调到这里时,干部叫他们拖砖比赛,看谁拖得多,跑得快,拖得车数最多者,得到大会表扬。他不知深浅又不甘落后,也拚命地拉,结果列入了"强壮劳力名单",分配到此,干这最苦最重的工作。而今弄到身残体弱,仍不得脱身。那些明智而不肯出力者,反而好些。干部这一套"引蛇出洞"的手法,与"反右"时,毛采用"让毒草冒头"、"枪打出头鸟"的阴谋,如出一辙。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秉承有术矣。

做砖瓦的黄土是用简便铁轨从不远处一山岗运来的。那满是 残垣断壁的山岗,据说是昔日盛极一时的寺庙,"火烧红莲寺" 后,就剩得烂砖碎瓦一堆。有的又说"红莲寺"在全国有很多座, 这被烧的只是其中一座。

有的难友回来说,挖土时,发现数具坐化了的老和尚的干尸全身。还不时能捡到一些年代久远的铜钱、瓷片。有一位难友捡到一枚用青铜铸成的古代箭头,奇怪的是箭头呈圆形,两边"角"也呈圆形,边刃锋利依然,而非一般概念和实物中的尖角形。大概当初应是圆形的,后来才发展成更加锐利的三角形。

就这样,小火车不断地把黄土拖来,不断地制成砖瓦,不断 地用车载走卖钱,不断地"黄土变成金"。骨瘦如柴的劳改死得越 多,他们的财富就积累得越多。

每当看到那红色的砖瓦,我就觉得,除了掺有我们的汗水外,还掺有死难同胞的血在里面。那是些用我们劳改的血汗、尸骨凝结成的东西。

我被编到第一中队装窑一组劳改。一个狭窄的斗室,挤着难工组和装窑组十八个人,每人只得五十公分宽的一个铺位。盛夏之夜,满身臭汗的身子转都转不过来。早上醒来,时时由于缺氧而觉得头痛心闷,那门窗上,凝结了着十八条大汉一夜间吐出来的水珠雾气。

组内有几个闽南老乡。一个是国民党某部成员,"投诚"后, 又被他们捉来坐监,此人表现得比较投机。不过,投来投去还是 落得坐牢命运。另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英勇保卫宁化城的胡连 部队、谢海寿的侄孙,其父是国军师长,被共党枪杀。还有一个 姓张的梅县人,学生出身,外表斯文白净,喜欢唱歌拉小提琴。 妒忌心强,平时不轻易表态,一旦某人犯错误上台挨批斗,他马 上翻脸不认人,与你划清界线,口诛笔伐,拳脚齐至。他永远是 "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

有两个五华水寨人,是 "明哲保身"的老好人。其余全是潮州、汕头、普宁一带的"嘎己能"(自己人)。其中有五六个所谓"特务分子",其实是由泰国、香港回来的学生。除我外,他们全由"广东省梅县监狱"调来的。

有个普宁人,姓王,家庭划为地主,本质极坏,平日专爱弄笔杆子打"小报告",常常无中生有,假造事实去冤陷别人,且假列时间、地点、证人之类作佐证。运动来了,更是他发威逞奸的大好良机。其实他除挂了个"学习组长"的空衔,多干活外,从未得过干部扔过来的一根骨头;反而同样被干部派人暗中监视。但他却喜欢那样:企图"挖他人几代人的肉,补自己的疮",以难友尸骨为垫爬出"狗洞"。

我初到该地,体质又弱,劳动不熟悉,得到不少人的帮忙。特别是那位姓谢的小孩和一位泰国归侨对我非常友好。那归侨全家居住泰国曼谷,他由香港回温州华侨中学读书,后被冤作"特务",判了十三年徒刑。他和我之间,有时谈吃、谈女人,也谈香港泰国,并互送过一些食物。

那位小谢,做了一件好心的蠢事:他暗中到处向人介绍我父亲的情况和我一贯"反改造"的表现等。据说,他想改善我的处境,树立我的"威信"。待我察觉制止已来不及了,几乎人人都晓得我是"某某司令的儿子",这在赤色恐怖的监狱中,目标太大,是非常危险的事。果然,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王如然、马贵文等人,假造事实,检举为"企图谋杀干部,抢夺枪支,领导监狱大暴动,叛国投敌"的三位"司令"。刚上台掌权的"新公安红旗"造反派的干部,竟也会相信这类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此"案件"轰动全场和沙洋地区,几乎把我们送上了断头台。

当时,虽然想当武则天女皇的江青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各地早已拉出去了机枪大炮,大家"拉山头"、结帮派、招兵买马,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团体,打出各式各样的旗号,占山为王,排斥异已。各派之间,水火不相容,为毛泽东所利用,莫名其妙地彼此对立、戮斩、屠杀,杀到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吊尸盈树,腐骨遍野。

农场两大派,"新公安红旗"和"赤旗山",也打得天翻地覆,如火如荼。他们互相揪斗对方成员,饱以拳脚,打得头崩额裂,鼻青脸肿。并用机枪、手榴弹等互相攻击。襄樊市派别林立,"司令"多如牛毛,大家隔着襄江进行枪炮大会战,直打得船翻人亡,血染襄江,死了不少无辜百姓。白天黑夜,只听到铁网围墙外,枪声嗒嗒,炮声隆隆,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那样紧张。

我那时和很多人的心理一样:对这些内乱和"鬼打鬼"的局势感到莫名奇妙,但并不寄望任何一派的胜利,只祈望有人抢救我们这些久陷地狱的奴隶们,能够早日恢复自由,早日与家人团聚一起,。

一想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情景,我往往彻夜难眠。但我又深知形势的本性,倘若战端一启,"王师北定中原日"之前,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些危险分子先送到阎王爷那里。但又想到:只要能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全国同胞,个人得失与生命,何足惜哉!从面前滚滚的浓烟中,我嗅到了一场浩劫的火药味。

在剧烈的武斗中,第七新生基建厂四个多月停止了生产,干部忙于枪战,对内镇压。对我们来说:左也压右也压,总之压压压。

当时掌权的是"新公安红旗"造反派,主宰整个农场的一切。 处于下野和被批斗的"赤旗山"和驻军,则联络农村的"农民赤 卫队",不时反击和偷袭。有一晚夜半之时,墙外忽然枪声、手榴 弹声齐作,夹有奔跑的脚步声。只听到有人高声呼喝:"什么人?" "站住!老子开枪了!"等叫嚷声。

第二天,一名外出替干部治伤的劳改医生,回来后悄悄地告诉我们:原来昨夜"赤旗山"派,出动四十多人,携枪袭击造反派干部宿舍和监仓值班大楼,打烂了所有门窗,企图夺权,占据全厂。彼此驳火近半小时,不胜而退。次日,我们见到一些干部、工人、家属的头上、手腕、脚上等,缠有纱布和贴着十字型的胶布,显然是夜袭的结果。

为了对付"保皇派"的攻袭,"造反派"采取了一些战时措施:大兴土木,在厂中央,用砖砌了一个能控制周围的六层大楼,四面架有十几万伏的超高压电网,里面堆满粮食、水和弹药等。楼顶架有一挺重型机关枪,层层有枪手守卫,不时向外扫射,发出"哒哒"的死亡信号,摆出决一死战的姿态。

在监仓大铁门外,挖了一条能通值班大楼、干部办公室、岗楼、大门外的地道,长约千公尺。那地道并非一般人想象那样直的;而是由很多很多的 S 型结构,连接起来的,弯弯曲曲,大概利于掩护和防守。看来他们是学到了电影地道战中的技巧。值班大楼是座两层高的砖瓦结构,他们将延伸的骑楼(平台)部分,用砖砌成城墙状的带枪孔的堡垒。配备有长短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等,日夜有人守卫。厂内各工场、车间、砖房、瓦房等处,入夜布满高压电线,以对待农民赤卫军或"赤旗山"派的偷袭。人是没有电倒、却电倒了一条寻找温饱的倒霉野狗。

当然,这一切繁重的劳动,照例由我们劳改犯去完成。

有一天,全厂八百多人,集中在监仓广场上,听"新公安红旗"负责人作报告。这位高瘦个子的李副(总)场长,是造反派的"一号司令"。他老先生一上台,照例大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从"第一,国际形势"、"第二,国内形势",讲到"第三,

场内形势",都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形势越来越好。他趾高气扬地威胁说:"最近,你们听到了一些枪声,有些人蠢蠢欲动,暗中传说'快了!快了!'什么'快了'?是你们加刑快了!掉脑袋快了!有点枪声,是我们在追剿反革命'百万雄师'匪帮(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支持的一个派别)。他们已经穷途末路,到处挨打,要靠抢东西过日子了。我们的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在北京得到中央首长的亲自接见和表态。支持我们这股新生革命力量。保皇派'赤旗山'的反扑是徒劳的!他们冲击监狱,就是现行反革命!"

想不到"世事如棋局局新",曾几何时,这位至尊的负责人,不久也成了阶下囚,与我这个"现行政治犯"同关在沙洋监所的小监狱里。

在马列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干部内部 火拼得刀枪见血,你死我活;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各 帮派,没有停止过对我们这些人的严酷镇压,以示立场坚定。我 们只有左右逢"霉"地忍受皮肉之苦了。除了有时轮番出铁门, 修筑"战略工事"外,四个多月来,夜以继日,一刻不停地对我 们进行折磨,整个监狱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起初,是小组的"批判"、"斗争",受害者站立其中,低头弯腰,接受积极分子漫无天际的责骂、污蔑,还要回答强加于人、根本无法应对的许许多多质问。一不如意或稍露不耐烦,巴掌、拳头、大脚等,就很容易落在已成最佳角度的后脑勺和朝天的屁股上。

干部则巡视或在旁边坐镇, 听取小组长们的汇报, 然后作下一步的最新指示。

后来变成联组、中队、联队和全厂的大批判、大斗争、大镇 压。每升一级,受害的人数激增,打击面不断扩大,所受的刑罚 也变得五花八门,惨无人道。情况混乱到极点,没有法纪更没有 公理。只要有人在大会上叫一句:某某人"反改造",那倒霉的老兄,便会在吆喝声和拳打脚踢下,被拖上批判台,加进"反动派"的行列,顷刻间头破血流。原先批判过别人的很多乡长、值班员、积极分子等,最后也被拉上台,成为打击的对象。

其实,干部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人,唱的只是"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四部曲而已。可怜一些私心重、杂念多的幼稚之辈,往往被其利用,成了帮凶,到头来兔死狗烹,悔之晚矣。我们小组,首当其冲的,是位泰国华侨翁和平,起因只是与学习组长吵了一架,便被诬为"暴动集团司令",受尽污辱、殴打、折磨。直打得他满脸红肿,体无完肤。长时间的弯腰低头,使他面肿眼红、头大如斗,不似人形。而那些吓人的政治罪名,又铺天盖地向他压来。

肉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绝望的前景,令他顿生自杀之念头。有一天,他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便猛然用头撞在门边的墙角上,只听隆地一声,鲜血四溅,他立即昏死在血泊之中,脑袋顶上裂开了一条两寸多长的血口,森然露出白骨。

干部说他:"企图自杀,是反革命到底的行为!"打手们骂他: "态度顽固,抗拒改造!"只让他止了血,休息一天,第二天便把 头上缠满白纱布、渗着血水的他,又拉出来批斗。我看见他那包 满纱布的头脸,瘀肿变了形,像尚未火化却已腐肿的死人一样可 怕。

另一位姓谢的小孩,则天天拉到外面去殴打,小小年纪,被 打得死去活来。天天靠小聪明编谎言度过难关。

组内一个生产组长,是土家人,被扭断了右手。另一个生产组长陈某,只因与翁某较好,又是由香港回来的,便被诬成"集团骨干",打得痛不欲生,从监仓二楼跳下自杀,幸被电线拦住,才大难不死。另一个从香港归来的潮州人蔡某,也被殴打侮辱得208

受不了,从楼上跳下自杀未遂,脑部受了严重震荡,一条腿跌断 后,成了终生残废。

拖坯组一个老好人,上六府人氏,乞丐出身,照理应是无产阶级一员,也无缘无故地扭断了手臂。更多人被吊断了双手,打断了腰骨、筋骨。

一到晚上,小小的土台便是行刑的地方。受害者排列在台上,个个低头弯腰,双手由背后举起,状如跳水前的姿势,每一边有一、两名积极分子侍候,只让上扭,不准下落。稍一松驰,便会受到一顿拳脚。呻吟声、叫痛声、哭爹叫娘声此起彼伏,闻者心痛,见者心寒。这是内地流行的一种酷刑,叫架飞机。

队上一名老中医,叫李中庸,梅县人,很正直,只因我腋下生疮发高烧时出过证明让我休息,并借我几元"代用券"去买东西,便被诬为反改造,拉上台去殴打、扭手、"架飞机",可怜年近七十、一世行医的他,被折磨得老泪纵横。

出窑组一位潮汕难友,受不了斗争折磨,借去厕所小便之机, 狂奔到垃圾堆,拣起一块砖头,对着脑袋猛烈拍击,希望了此苦 痛余生,后为积极分子所阻未遂,抓回后,饱受一顿拳脚。一个 烧窑组的打手上前,对着他弯垂近地的头脸部分,拼命用脚踢, 左右开弓,记记着力,直踢得他鼻青脸肿,满脸是血。

在那红色恐怖中,人人自危,不知下一个批斗对象是谁。人 类的自私、残忍、奸诈、兽性等弱点,得到最大的鼓励。人性没 有了,暴力统治了一切。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还令身居澳洲的 我,心有余悸,悲愤盈胸。

干部们则并着二郎腿,坐在一偶,一边抽烟,一边闲谈,像 当年古罗马的奴隶主,欣赏人兽相斗,奴隶厮杀时那样悠闲自得。

隔着高墙,住在外面的就业队(刑满强迫留场人员)批斗的气氛也与我们差不多,夜以继日地展开斗争大会,呼喝声、喊冤

声、叫痛声、响成一片。

有个本地就业人员,只因他父亲是反对派别——农民赤卫队的队长,他便被造反派疑为内奸,被打得鬼哭狼嚎,最后死于乱棍之下。

积极分子向干部报告:"报告干部,他死了。"回答是:"死了就算了,给我拖出去!"

在充满火药味、血腥味的批斗大会上,喊打喊杀声、哭爹叫 娘声,响彻夜空。

被打者,不知自己犯了何罪而受折磨;打人者,不知为何目的而折磨别人。只能形容为"兽性发作,人性全无"。被害者只准不断地"交代罪行"才能表示"态度老实"、"有悔过表现"、"有诚意"。否则,就表示你"抗拒交代"、"坚持反动立场",拳脚便雨点般落在身上。

一些受不了酷刑又有点机灵的人,便苦想冥思地虚构出一些 "千真万确"的所谓犯罪事实来,以求少受殴打,也可稍许放下 那麻木、肿痛的"飞机翼"。至于严重后果则"管他娘"了。一时 间,被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上台受殴打的人也越来越多。

干部为了表示他们才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派,和"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立场",时常邀请"反对派"来现场观看。 其实,很多莫明其妙的所谓"罪行",简直是胡说八道,但造反派 干部,却视若珍宝,不调查、不证实,只凭一面之词,就当作法 律依据。

例如:有个小孩交代问题时说:他"准备用砖头,把大铁门悄悄打开,然后逃到深山老林去"。但铁锁在外,外面值班室睡有持枪干部,右方墙角岗楼上有携冲锋枪的当值哨兵;不知那区区神奇的砖头,在夜深人静中,如何能悄悄地把铁锁重重的大铁门打开?他又说:"逃到深山老林后,立即发报给台湾,要求寄钱210

给他作路费,再逃到国外去。"暂勿论其发报机怎会忽然出现及是 否学习过发报技术,只是不知钱能寄到原始森林的何处街巷?

有的人受不了殴打,便信口开河说: "要把干部、解放军、积极分子等,全部杀光。"一个人能全部杀光这么多人么?要知道,沙洋农场驻有一团大兵和上千名干部。

另一难友交代罪行时说:他要打破搪瓷口盅,用里面的薄铁片,挖开围墙逃跑出外。但晚上彻夜有人值班巡房,岗楼上有枪兵,探照灯彻夜通明;不知薄薄铁片何月何年才能在众目睽睽下,挖穿厚达半公尺的围墙?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监仓,小谢急急走过来,对我说了一句:"防线攻破了!"就赶快离开了。当时虽觉莫明其妙,但心在沉沉下降,预感有些问题涉及到我,自己被卷进那可怕的红色旋涡中去了。但我自觉并无"越轨行为",所以不动声,保持镇定和沉默。有一晚斗争大会上,指导员说:"运动到现在,早已真相大白,但有个别人,态度非常顽固,雷打不动,稳如泰山,至今一言不发,企图抗拒到底,蒙混过关。"我知道他的矛头所指谁人,也听得出弦外之音,更嗅到了火药味,我的心再度下沉到最低点。不久,我调到三中队(瓦队)。暗自庆幸脱离了是非之地,却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待着我。

到处柳絮一样花,三中队也在大张旗鼓地展开大批斗。当时被整的主要"反改造分子"是:黄加炎,黄威汉、黄某某(此人己死去)和叶春菊。号称"三黄一叶"。

他们晚上锁着手铐睡觉,白天劳动时由组长取下,干了一天 重活回来,晚饭后便要承受污辱和殴打。大家像防瘟疫般疏远他 们,因为如被发现有人与他们讲话,或对那倒霉的老兄略表同情, 便会飞来横祸,一跌而成为"反改造分子",受到"批判"、"斗 争",享受拳脚免费大餐。 干部授予"积极分子"很大权力,他们可以随时就地捆绑别人,殴打无辜,并且各人随身带有一副手铐,动不动就给人带上手铐。这是干部"以夷制夷"的手法之一。一中队的干部,甚欣赏拳打脚踢和驾飞机时发出的哀嚎交响曲。三中队的领导,则偏爱观看"挂砖头"和"吊谷上棚"(或称空中飞人)的杂耍。

the contract of

被斗争者,低头弯腰到九十度角,如未能满意回答"积极分子"打手们的追问,后颈上挂着的砖头,便由一块逐渐增加到十二块不等。每块红砖重约六市斤,最重就有七十多斤了。

如果没有交代出新罪行、新问题,便会升级扮演"空中飞人"。 受难者,被过梁麻绳反绑双手,连人带砖地扯上半空,高吊起来。 直痛得他们呼天抢地,口喊爹娘,积极分子们仍继续殴打和威胁: "不准哭叫!否则再加砖头!"撕心的痛楚变作强忍的"唔啊"声, 从扭曲的身形和面目,可知他们承受酷刑的身心是如何之痛苦。

运动中,猪房有一本地就业人员,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 干部却硬说是在猪房帮工的一位潮州难友所为。这位潮州难友被 反手吊起后,颈上挂了十二块砖头,随着斗争气温的加剧,脚上 又缚了十二块砖头,共二十四块,重一百四十多斤。加上自身重 约一百多斤,他反吊的双手要承受二百五十斤左右的强大地心引 力。他起初是痛苦的呻吟,继而是死命的干嚎,最后双手抱着双 脚,被悬空一扯,只听得"咔嚓"一声,"哎哟"一叫,那位难 友便手骨折断,昏死过去。

我因工作繁重,窑室内温度过高,双腋窝内生了许多毒疮,由"犯医"给我开刀动了手术后,留在大监仓休息。不幸又并发了"打摆子"(虐疾)和腹泻,忽冷忽热,非常痛苦,有时温度达四十一度。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也。谁知还有大灾难等在后头。

留在大监仓的,还有"三黄一叶"。他们四个人分别被吊在梁 212 上,干部授权一个曾当过共党海军后又成了"反革命偷渡犯"的潮州人张某,去完成逼供任务。被吊者如说"有新问题交待",便会被允许暂时放下来一会儿;一旦发现是重复老问题或不是重大罪恶,随即又会被凌空高吊。为了求得那短暂的休息,他们只有运用一切说谎的本领,编故事的才能,力求新奇惊人,耸人听闻,目的只是想拯救一下麻木肿痛的双手而已。

同是劳改的张某,心也够硬,对于同类哀嚎声,竟充耳不闻, 无动于衷,并大声夹恶气地喝斥:"不准哭叫,否则休想放下来!" 他当然是秉承干部的旨意去做,但本质也是个投机分子。重病中 的我,得不到静休,反受剧烈折磨。

- "求求你……我受不了啦……"吊者呻吟。
- "受不了就交代新问题!"答者声色俱厉。
- "报告……我要求上厕所……"吊者哀求。
- "拉在裤子里好了!" 答者迈着方步踱出门外。
- "求求你······做点好事······我的大便已拉在裤档里了······放了我吧·······求你······"吊者泣告。
- "没有新罪恶交待,就别想下来!"答者口叼香烟,倚在门边说。一片此起彼伏、痛极哀嚎之声,令人心如刀割。
- 一天早上,当我在高烧迷糊,辗转难眠之际,忽然被几条大 汉推醒,押我到一中队的监仓去,那里早已坐着厂教导员。我的 面前,摆着两条长型的四脚板凳和一捆麻绳,坐着五个积极分子, 一个负责纪录,四个负责逼供行刑。
- 一开始,教导员就迫我交代罪恶。我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他由经济往来,到人际关系,一一逼我就范,但我如实逐点申辩、反驳他。

他老羞成怒,一拍床板对那几名打手叫道: "不给他一点厉害,他是不肯交待的!给我上!"那两条长型板凳,原来是作刑具

使用的,叫新式老虎凳。四个打手如狼似虎地向我扑来,用粗麻绳捆紧我的双脚,把我的头硬按进两条板凳之间,两旁各有四人"侍候"我的双手。他们捉着我的手臂,由后向前,按压下去,直齐耳根处。撕心的痛楚使我自然缩起双脚,他们却拼命地把我弯曲的"线条"拉直。我在剧痛中,感到锁骨紧紧地卡住了喉咙,呼吸非常困难,几成窒息。我痛不欲生,几乎昏死过去。

only was a region of playing a region of playing

我一再申述:自己身患重病,现在仍在发热发冷拉肚子。但他们无动于衷。其实,他们正是想趁我病重之时,攻陷我这座"顽固堡垒"。我口吐鲜血,但尚能保持理智,不肯入其阴谋圈套。我一再告诫和鼓励自己:"小叶呀,老叶呀,绝不能向他们屈服!更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不能害人害己,要杀要剁任由他。但决不能死在自己软弱的口上。"我知道,只要肯"招",全案便可成立,死罪也便成立。

就这样,上午搞了下午搞,今天压完明天继续压,弄得我金睛火眼,行若浮尸,双手吊垂两侧,失去知觉,失去功能。晚上还要带着手铐睡觉,本来患重病的身体,就剩下皮包骨,之后越来越虚弱了。为加强攻心战,教导员有几次叫我出外,单独谈话,指明利害关系,言中之意是:如不彻底交待罪恶,只有死路一条。随之而来的是"逼供"的升级、力量的加大、时间的延长。

他们折磨了我近半个月,天天如法泡制,力求打开我的铁口。 我自知难承受"老虎凳"的折磨,预感到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死 在受刑的"老虎凳"上。当时我已作了决死的准备,等待上帝的 宠召。

最后一次(当时我只觉得这次定死无疑了)过堂提审前,我暗中换了一套藏在枕头内,没有打上劳改字样的自己的衣服穿上,静静等待死神的来临。我把唯一的"金星"钢笔,借给一位五华难友,他说过几天还我。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只是心想:

"几天? 几天后我已不在人间了!"那位难友,若干年后,用棉被、枕头、报纸等,点燃监仓自焚,烧得一干二净,他自己也在火化中,超脱苦难的现实。

奇怪的是,这天竟没有捉我去受刑迫供。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根据屈打成招、胡编乱凑的所谓"犯罪事实"、"交待材料", 硬诬我们"企图组织反革命暴动集团,抢夺枪械,杀害干部和解 放军,叛国投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有一天早上,全队在院子里排队吃早餐,我领到一个馍馍, 刚啃了一口,便被干部叫到监仓去收拾行李。捡起一些破旧衣物, 出了大铁门,早有一部"解放牌"大卡车在等着我们,车上除了 两名荷枪实弹的大兵和一名干部外,还有翁兄、小谢等几名难友, 大家饱受折磨,不似人形。

开车前,教导员恶狠狠地说:"这回,看你们之中,哪个将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引用毛语录的意思很明显:看谁成为枪下鬼。因为大凡重大政治性案件,他们照例要挑出为头的一两名"首犯"、"主犯"来干掉的。

来到监所值班室,收押的佘指导员看看我说: "啊哈!老资格了!"便拿锁匙带我入监所禁闭室。"看班"打开十二号监仓,我见里面早已关着三位难友。我的到来,增加了热闹,也增加了拥挤,有位小难友必须移近便桶。他们都出奇地憔悴和苍白,但对我很友善。

掌灯时分,我被一位难友叫醒:"喂,伙计!起来!'人道主义'来了。"(吃饭时候到了。)铁窗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大队外面劳动的难友相继归来,约有二百人。他们多是因"重新犯罪犯错"而等待处理的人马。绝大部分曾有"逃跑思想"和"变天复辟思想"。

那位叫醒我的湖北枣阳难友,忽然说:"我们的饭来了,嗯,

今晚的饭菜多了一点。开水也来了,准备'缸子'(口盅)。"深闭其间,他又看不到,如何知道得那么清楚?而我只听到一片杂乱声,所以内心在奇怪。原来,长期的关禁,他的视力衰弱,但耳朵变得特别灵,能够根据脚步声判断出是干部抑或劳改犯;并根据桶子放下的响声,估计到饭菜的份量。他说:"当桶子放下,发出'重重'之声时,表示里面很重,菜饭必多;反之,当你听到桶子放下时,发出'空空'之声时,则糟了,虽未空空如也,也一定少得可怜。"确是言之有理的经验之谈。

"那么,你怎样听出,来者是劳改或干部呢?"我好奇地问。 "干部多穿胶鞋或皮鞋,步伐较有规律,踱着方步打开风门望 里面动静,较轻和鬼祟。偶尔能听到成串的锁匙声。劳改就不同 了,他们多穿'水陆坦克'(一种旧轮胎制成的粗劣凉鞋)或赤 脚,来去匆匆,不敢停留,脚步声较重。"回答的是位广东人高医 生。看来,他们在八卦烘炉中,都已"道行"很高,炼就了一副 穿墙透壁的"顺风耳"。

我们监禁期间,外面的劳动难友,每天晚上都在进行着残酷 的斗争批判大会。

我把被子叠高后,从铁窗望出去,能看到很多由新生材料厂转来的难友,有的跛着脚,有的吊着膀子,有的用纱布包着头。白天要干繁重的苦役,晚上则要饱受拳脚,接受批斗,交待问题。入夜后的两小时是学习时间。嘈杂的吃喝声、叫痛声、哭爹喊娘声,响彻夜空,令人寒心。

有一次,我把自己的委屈和准备上诉的打算,与高医生谈了一下。他深明大义,很有胆色,坚决主张我上诉。他鼓励我说: "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坚决上诉!"我深知上诉——也叫翻案控告——的困难和风险,但有了他的支持,我就更坚决了。我寄了十多页的上诉书,利用他们的政策、法律、劳改条例,"最高指216 示"、"中央高干"的报告等,列举出事实与冤屈,严词控诉与驳 斥强加在我身上的"莫须有"罪名。我知道,除了坚决反抗外, 有时采用合法斗争,也是必要的。

我抓到他们几个致命弱点,如:一、在监仓宿舍内施用肉刑,造成严重伤亡。采用刑讯逼供办法,套取口供;二、教导员利用五名劳改积极分子作打手,由他们来审问、纪录、拷打其他难友;三、屈打成招的其他劳改供词的虚假性。这都是铁打的事实,经得起上级的调查。

"我是被五个打手,打成'反革命'的。吊打捆绑、刑讯逼供、'劳改'当预审员,'劳改'当司法官,符合党的政策与法律吗?屈打成招、捕风捉影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难道可以当作法律依据吗?"我如此写道。想不到短短的一封上诉,不但使自己和其他难友死里逃生,并且彻底弄垮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沙洋农场新公安红旗造反派。我只是钻了他们"派性斗争"的空子,才成功的。

不过,回想当时的处境,确实是危险之极。那一次"过堂",气氛非常紧张。有两名身材魁梧的干部,前后夹着我,押送到墙外的审讯室,室内早已坐着两名预审员,桌前一张藤椅上坐着总场的石场长(师级长征干部),后面坐着监所张所长、佘指导员,门口还站着一名干部,像怕我冲出去逃跑一样。通常他们提审,一般只用一名干部,如今的布置,显然把我当作"暴动司令"来对待。

- "你的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一预审员打着例行公事的官腔问我。
 - "报告领导,我根本没犯什么错误!"我申辩说。
 - "没有?那你怎会来到监所呢?"另一预审员问。
 - "我才不想来呢,是他们捆绑着把我抓来的。"我答。

沉默了一会,场长便打破寂静,作了一段"交代党的政策" 的训话,态度还算冷静,没有杀气腾腾的气味。

"你可以把事情的真相如实地说出来,不夸大也不缩小,我们允许你申辩。"先前那个预审员说。

"我是被别人冤枉的。三四个月来,第七新生厂天天在打人吊人,有当场打死的、有被迫撞墙自杀的、有跳楼自杀的、有打断筋骨手脚的。他们被逼着天天交代'新问题'、'大问题'、'大罪恶'、越新越大越惊人越好,否则要挨打挨吊。谁说谎能力强,就可免去很多拳脚。于是,信口开河,瞎说一通的人很多。但新生厂干部,却不加证实就如获至宝地当作"亲笔代词"的"犯罪材料"来作根据。我本人就曾受到两星期左右的'新式老虎凳'的刑讯逼供。厂内八百多人,搞了几个月,你们可以去调查,是否属实。"我申诉着。

这时候,我发现气氛明显缓和下来,门岗也撤了下来,坐在后面床上,也不担心我跑了。

"那么,你回去把事实写一下。"一预审员交给我一叠材料纸。

"我早已写好了!"说罢,我从裤袋中抽出一份上诉书递了上去。

"早已写好了?"他们一阵惊奇,并迅速翻到最后一页,看 我是何时写的。我明白:写得越早,表示委屈越大。一进监所就 写,证明怒气冲天,确实冤枉。

那次审讯归来,晚上外面即停止了批斗大会,转为一般"时事政治"学习,只听到干部讲话声和各小组劳改学习发言声。

几天后,一名干部叫我写了一份"正式材料",交差了事。关了我一年多,但不再来啰嗦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审讯是非常关键的,是决定我和其他难友,生死存亡的一刻,是一次"鬼门关"前的审讯。外面,干部已对积极分子宣称过"择日行刑"

(枪杀)我们了。如果我当时软弱一点或方法不对,默认下来,就不知会与谁一起抛骨荒山野岭了。

监所见闻录

一次,正当我和罗君在铁窗谈话,铛锒一声,铁门大开,推进一个少年来,看打扮像个工人模样,满身不易洗净的机油,也许是个车工、钳工之类。他的眼睛很机灵,但始终一言不发,有时比划些似懂非懂的手语,原来他是哑巴。我和罗君对他很友善,让他坐到到我们床上,伸腿进被窝来温暖温暖,他比比划划地打出表示感谢的手势。大家很快成了朋友。忽然,他"呀呀"地打着手势:用手掌作空中滑翔盘旋状(飞机),又握两拳在耳边,微弯着双腿(跳伞),又伸出拇指和食指,别在腰际(枪),询问我俩是不是空投的武装间谍。因为内地曾宣传我们是一批会飞檐走壁的间谍。

接着他打手势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只可惜我们不懂哑语,未能全部"听"懂他所说的,但可猜测到一些意思——他在某地下兵工厂做工(他似乎写过"六〇六"字样)那里全部是聋哑男女青年。上面是挂牌的修理工厂,地底下却是生产大炮、坦克、机枪、甚至飞机零件的兵工厂。山后有一条晚上使用的秘密出入通道。据我们所知:内地确实建有大量地下城、山洞仓库、地下兵工厂等设施,叫"第三线建设",是扩军备战的产物。本多在四川山区,"文革"武斗中暴露后,改迁湖北襄阳、新野、丹江、枣阳一带山区或地下。可见他说的是实话。

那天中午,寒风夹着大雪,纷纷的鳞甲满天飞舞,疑是仙女 散花,猛烈冲击着破烂的铁窗。嗖嗖冷风与雪花,撒满被面,钻 入衣领,冷得大家直发抖。忽然,铁门打开了,干部把那哑巴揪 了出去,在走廊上拳打脚踢。并叫看班把他衣服全部剥光,然后 用麻绳捆绑起来,丢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挨冻,逼他说话,要他交 代问题。可怜那天生的哑巴,又怎能说话呢?如今唯一能说话的 双手,也失去了自由,真教他欲辩不能。痛和冷的苦楚,使他直 着喉咙干嚎。那凄惨的叫声,渐渐变作深沉的痛苦呻吟。我的神 经,像被逐条挑断那样难受。

足足折磨了他两个小时,待他已冻僵到昏死过去,不再呻吟为止。铁门开处,抬进木头似的一个人来,赤条条一丝不挂,没冻死是大幸。我们帮他穿好衣服,让他在被窝里暖了很久,他才苏醒过来,对我们露出感激的笑容。

同号子里,有一个难友,叫王为瑶,广东湛江地区人。据了解,他在解放后生活无着落,与朋友一起走江湖、卖膏药,会点少林拳术。不知讲了些什么不满社会主义的言论,便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为首的一个朋友,作为首犯枪毙了,他则判了五年徒刑。来湖北沙洋监所后,逃跑不遂。批斗后又加判两年徒刑。他常常用头猛撞墙壁,铿锵有声,像个铁头。

作为疯子的人,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属于重新犯罪的反改造分子,监督得很严。劳动重,吃不饱,每天都要受到干部的辱骂、推踢和积极分子的殴打、侮辱。年复一年,他在令人闷得喘不过气来的死水潭里挣扎。有一次,他不知胡言乱语了些什么,被人告发。看守班长不由分说把他打了一顿。他情急想走开,那班长又说他"企图踢我的下身",和几个看守兵把他痛殴一顿。被惊动了的佘指导员来后,把王的颈扼住,卡得他几乎气绝,王某情急咬破了佘指导员的大拇指,佘与班长和看守兵则一致指证他"企图谋杀干部"。

王某被捆绑后,吊在值班室梁上,十多名大兵各执碗粗的木棍轮番殴打,直至打断了所有木棍,他也昏死过去,这场"对敌 220 斗争"方才罢休。

有一天,我见他起床后把小便就近撒在自己的大口盅内,我正感奇怪,怨其"不讲卫生",谁知一眨眼,他端起来喝个精光。喝罢,满意地抹了抹嘴角,露出少有的笑容,那神情好像刚才在广州大三元酒家与女朋友痛饮一番似的。据说,上次他正是以饮"童子尿"的办法"消肿化瘀"之后,保全了痛苦的残生。

我和罗君对他很友好,时时逗他讲话。他清醒点时,会即兴 要两套少林拳,或大谈他过去的女友,上海妹妹、广州妹妹如何 可爱等。有一次,还讲了包公审大石的故事,不过不是"抛铜钱 入水,浮油者为贼",而是"心惧退墙,手上有黑烟灰者为贼"。

他是真正无产者,除了一套由黄变黑的囚服,一张又黑又臭,长满黑斑的棉被和一个烂口盅外,就别无长物了。一无所有的他,隆冬腊月,就只好躲在烂被窝内,瑟瑟发抖,在充满幻景与恐惧下苟延残喘。

一次早餐后,外面人声嘈杂,突然铁门开处,连踢带打地推进来一位手带铁铐的难友。只见他骂不绝口: "丢那妈!看你第二世变狗都唔生毛!"这是大名鼎鼎的疯子张元俊。据了解,他是广东合浦人氏,属客家人,但亦会讲"广州白话"。父亲是中医,开了一间药材铺。解放后,他家成了大地主,财产被没收,父兄均被枪杀。一家生活无着,受尽欺凌。他因口出不满,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多年徒刑,充军到异乡寒土。至于何时、何因被逼成疯子,就不得而知。他似乎对神的出现,时时产生幻觉,经常都会与铁窗外显灵的神仙谈话,现出会心的微笑。

他虽年方二十五,但已口无存牙,一张开口,就只见牙肉不 见牙。据说,是不断被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打掉了的。

罗君对我说: "神明宗教的力量真是伟大。尽管身受折磨, 他也会像印度苦行僧那样自得其乐。不过,落入虎口的他,迟早 会被整死于监狱。"这张老兄除了自言自语外,很少与人搭腔。他有一股顽固劲,白天睡足一天,雷惊不醒,入夜就踱着方步,唱着单调、同一的歌词:"一衣呀,一食呀,都系(是)父母汗血(做)来的!南无阿弥陀佛!"而且越唱越大,一直唱到天亮,面不改容,声不改音。那宏亮、圆润的男中音,时时引起墙壁的共鸣。他似乎具有唱歌的才能;只可惜夜复一夜,连续唱三个多月,吵得我们不能入睡。连那王疯子,有一次也跳了起来,大叫:"我们打他!吵到命都丢了!"

我们试过很多让他白天不要睡觉的办法,如故意找他谈话, 弄出声响,摇醒他等,他老兄依然鼾声如雷。罗君说:"长期不 能睡觉,简直成了精神折磨,像受刑一样,真比打一顿还难受。" 这也是事实。除非跟他一样,日睡夜醒,否则根本得不到休息。 但那是不成的。怎办呢?我知道那是干部故意安排来干扰我们的。 为了睡觉,我以浸水的棉花塞耳,果然"两耳不闻窗内事",能起 到隔音作用,变得万籁无声。尽管第二天,耳朵会发痒,但总算 解决了这老大难问题。

一直到来了国外后的今天,每当汽车或隔壁建房子干扰我的 睡眠时,我仍然用此创举来安睡。不过浸棉花的不再是水,而是 质地较好的面脂手油之类,其效甚佳,也不会耳痒了。

同仓有位高医生,广东广宁人,相貌堂堂,为人非常诚恳,我与他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他一世为医,济世益民,解放后,因一宗反革命案件被冤枉入狱,为首的两名医生作为首犯、重犯,被枪杀于原乡,他则被判了十多年徒刑,投入劳改。我和他很快成了志气相投,推心置腹的至交。另两位难友,与我们相处也很融洽。我把一小碗带来的油拌砂糖,拿出来与众人分享,并把一小瓶家里寄来的鱼肝油精丸与高医生 "二一添作五"地每天一人一粒"延长生命"。那"就业"的老头,也慷慨地把一小布袋大蒜222

头,每天剥一点给大家吃,他说可以防治水肿。

有一回,我们照例在床边仅有的一点空位,作绕圈式的散步, 高医生说:"自吃了油肝丸,散步觉得脚力充沛得多。"他又告诉 我:在劳改场当犯医是难受的差事,一来病者多,药物奇缺,二 来干部卡得很紧。因此,得不到药物者,病势加重;得不到"病 假单"者,带病出工。批的"病单"多了,干部骂人。每天都要 和"利害关系"与"良心责备"打交道。

入夜,常是我们睡前闲谈的好时光。大家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痛苦寂寞的日子,养成日说夜谈的习惯。古今中外事,喜怒哀乐情,彼此畅所欲言,淋漓痛快,甚至恋爱、偷情、夫妻私事,洞房花烛夜等等也都肯拿出来公开,搏得大家一乐。

高医生很精通"看相术",讲得头头是道,颇有高见。并教了 我不少经验。诸如:尖下巴、鹰钩鼻、反耳突目、高颧骨、头尖 额窄等,多非善类;眼镜蛇(黑眼圈)、曲发、眼白多、颧骨高、 邪目视人者等,则多属性欲极强的人。

一天下午,铁锁铛锒处,推进了一个矮小身材的湖北老乡来。 为了验证相术灵否,我悄悄地叫高医生看来者之"相"如何。他 很用神地由头到脚看了一遍,对我说:"三寸钉,矮仔多计,脚 步轻浮,下巴尖削、面无肉,此人不可靠。"

不过此位王姓难友社会经验丰富,故事多,笑话也多,与我们还算讲得来,但我和高医生始终防备着他。总之,笑话可讲,政治莫谈。

过了两天,原睡在便桶边的小孩,释放了出去劳动,不久又 关进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来。他是本场沈科长的儿子,哥哥关在 斜对面的"号子"里,父亲则关在外边的特别"号子"里,父子 三人同囚。他父亲天天被押出去批斗,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回来。 他们属"新公安红旗"造反派,自林彪宣布"军事管制"后,他 们就失了势, 一跌由革命派变为反革命了。

对干部子弟,我有一种防备心理,我又悄悄叫高医生看这小沈的"相"。他仔细观察后说:"这小孩生得圆圆脸孔,有对酒窝,言谈幼稚天真。不要紧,没什么的。"我半信半疑,因为与一个曾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生活在一起,我不会投"信任票"的,故一直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约一个多月后, "三寸钉"与"红卫兵小将"都先后放出去了。果如高医生所测: "三寸钉"出外后,为了讨好干部、看班,为了"检举别人,减轻罪行",说了我们不少坏话,致使看班刁难、刻薄了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那小孩却没说什么。

有一天我和高医生在闲谈,忽然听见一阵沙沙的脚步声,铁门开处,"看班"送进来一个约八九岁大的武汉小孩来。他浑身脏臭,长满疥疮,有的己糜烂流出脓水,看来最少也有数月未洗澡。

"这么小的孩子,也关进监所,真是莫明其妙!"高医生感慨 地摇头说。

"不知犯了毛家哪一条王法?"我愤愤地说。

后来,我俩向看班提出要求,好容易弄到一盆凉水,就在毛桶边用肥皂扎扎实实地替他洗了一个澡,弄得他直喊:"呀!真过瘾!好舒服!"

"哎呀!好多虱子!而且是人虱哪!"替他穿衣服时,我发现情况不对,那衣缝处,布满吸血的白色"坦克"群。除了换衣服外,别无良方。幸好他留存仓库的行李中,还能找到一套干净衣服。就这样,我们也染上了虱子,身上老是痒痒的,找又找不到,与我同睡的难友往往会嚷叫被虱子咬了。

小风门突然打开了,至少来了五六个好奇的看守兵脑袋。 "喂!小家伙,你过来!"一看守兵喊道。小孩便立在小风门前。

- "你犯了什么错误,被关进监所来了?"为首者问他。
- "逃跑和强奸妇女。"小孩安祥地答道。
- "什么?强奸妇女?你几岁了?你怎样强奸她们的?几次?"看守兵一阵哗然,争相把头钻过来看这强奸犯。我们也感到惊奇。

"是的,三次,我今年十三岁了。一次搞的是十二岁的小女孩,一次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一次是二十五岁的嫂子。我会偷,偷钱和粮票,年纪大的女人用钱和粮票、食物让她们就范,小女孩则用食物和拳头对付。"他如数家珍地述说着。

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父亲是武汉一工厂的工程师,母亲是个教师。文化大革命中,他结交一班坏孩子,起初把家里的碎铜烂铁拿到街上卖,换钱买零食,后来发展到把家里的瓷器、书画,把厂里的有色金属等,都偷出来换钱花。越用手头越宽,最后沦为心灵手巧的职业扒手。父母亲都是"臭老九",日夜挨批斗,无暇顾及他堕变。他可以说是文革后遗症中直接的受害者。

他曾多次被送去"白求恩医校"、"少年儿童罪犯管理所"、 "看守所"接受洗脑改造。这回因作案多了,被升级为"劳动教养",调沙洋农场后,不堪劳役之苦,星夜爬墙潜逃,攀上南下的运材料火车,流浪到广东韶关、乐昌一带作案。有一次被人穷追,情急跳进毛坑里,才躲过大难。韶关山区一户无儿女人家,曾收养他作义子,但每天要爬十多座高山野岭去种地,过着啃蕃薯的生活,后来他不辞而别,一走了之。

"那时候,我偷到很多钱,买了皮帽子、皮外衣、小皮鞋、'蛮洋'的呢,不是现在这个鬼样子的。"他有点惭愧地顾影自怜道。

"有一次,我被关在看守所,由于我体形小,晚上就钻出铁栅门,溜到厨房去饱餐一顿,再钻回被窝。神不知,鬼不觉,经

常'加餐'。"说到这里,监所的"人道主义"来了,这顿晚饭是:每人两个拳头大小的红苕和一勺枯黄无油的萝卜叶。

刚送进来的人,大概肚内还存了一点"油水",没有像关久了的人那样感到饥饿。那小孩只啃了一个蕃薯,便送过来一个给我,我转送给高医生。在营养严重缺乏的非常环境里,老实说,我是吃得下的。但长期的饥饿已使我的肠胃缩小和麻木,既习惯了挨饿,也很能挨饿;同时我觉得高医生年纪比我大,多吃点可增加抵抗力。

过了三天,铁门打开,又送进来一个中年男子,高高瘦瘦,一身工人老大哥打扮,观其脸相,眉低压睛,显得充满疑虑和有点杀气的样子,人很精灵,巧舌如簧。经过闲谈知道:他父母亲从河南一路逃荒到襄樊。他是本场的一位拖拉机手,又是襄樊农场造反派"新公安红旗"的三号司令。(一号司令是总场的李副场长,二号司令是工人孟某,都先后关押和判刑劳改。)

"造反司令?很威风的,你怎么也跟我们关在一起呢?"我 奇怪地问他。

"唉!一言难尽哪!"他说了半截话后,以手半掩着嘴,凑近我身边,神秘地低声说:"老保上台啦!他们和军队、农民赤卫队有亲密的关系。现在林彪宣布军管,他们便得势啦!他们是'陈再道分子'和'铁杆保皇派'。"

陈再道原是共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统管数省海陆空军大权。 "文革"中,他支持的"百万雄师"组织与属下八二〇一部队和造反派"三新三钢"起冲突,大打出手,爆发了惊动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场内驻军的团、营、连级干部(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等)曾被"造反派"当作"陈再道人马"揪去批斗、戴高帽打锣自骂地游街示众过。"保皇"即保守、守旧、反对"造反派"的组织。加上"铁杆"二字,表示顽固、 死硬之意。

这些人,造反时"响叮当,硬梆梆",一旦失势,关进监牢,就成了泄气的皮球,毫无毅力,缺乏适者生存的坚强意志。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地嚷着肚子饿,盼望早日判刑出外劳动,吃得饱些。反比不上我们这些政治犯来得沉着、耐磨。

有一次,这位当日的司令对着铁窗说: "谁在这时给我一个馒头,我要喊他'万寿无疆'!"当时,只准喊毛"万寿无疆",连"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也只准喊"身体健康"。切身利益的衡量,此时此际的他,显然明白馒头较毛选更重要,更实际,更实用。另一次,他对着铁窗喊: "大米干饭万岁!"当年东北的高岗、饶漱石,因有人喊了"高岗万岁!",就被毛打成"反党联盟"而永世不得翻身。可见"万岁"实为毛之专用贺词。他敢于用"大米饭"来代替"伟大领袖",一是现实利害的关系,二是信心危机的表露。

"我为何要造反?因为老保很坏。若干年前强加给我一个罪名,批判斗争后,准备把我判刑劳改。后来趁一中央首长来场视察,我哭着拦路告状,由于我出身好才没被劳改。这仇恨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我恨他们!"他愤愤地说道。

本来,我多少有点同情他的身世与遭遇,尽管我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深知,文革中很多纯朴的青少年,被毛愚弄,最后又成了替罪羊。所谓的保守派,掌权以后,压起百姓和劳改来,也毫不手软。我们这次的冤案,是造反派搞成的,他们吊打捆绑,花样百出,苦透了劳改们;但他们允许劳改买吃的东西,掌权期间,也没有枪杀一个劳改。保守派上台,他们规定一般不准打人,但对食物卡得很紧,且动辄批斗、捆绑、加刑、枪毙,更苦透了劳改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枪毙了十多名劳改。

谈不上谁好谁坏, 这是这种外来新宗教制度的两种手法, 两

个蛇头,同样会咬人的。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使我原来的一点同情与侧隐之心,也灰飞烟灭了。

"司令"的饭量大,竟直接威胁、引诱那小孩,天天要把吃不完的饭菜,交给他处理。而那小孩偏不就范,有一次还说:"我倒在便桶里,也不会给你吃!"可能他恨红卫兵、造反派吧,他一定吃过苦头才会这样。只听一声狮吼,夹着骂声,那"司令"扑了过去,像当年造反时冲锋陷阵那样,把那小孩打得哭爹叫娘。我上前死命才把他拉开。

第二天,我们叫那小孩把剩饭菜,送过去孝敬那位"司令"。 "司令"大悦,变得眉开眼笑,判若两人,又是对小孩拍肩头, 又是搂腰,还替他补衣服,其亲切的样子,俨如父子。真是"大 米干饭万岁",也"万能"。

有一回,我意外地收到一封母亲由遥远的澳大利亚寄来的信, 真是"家书值万金",非常高兴,读了又读。那"司令"再三要求 说,从未见过外国的信,希望能让他一睹为快。我考虑到干部已 经检查过,属合法信件,看也无妨,于是给他看了一下。这种小 事,过后也就忘了。谁知若干年后,我们同调到林场劳改,我与 罗君逃跑失败,受到捆绑带镣批斗,在大会上,那"司令"首先 发难,恶毒地侮辱谩骂我"坚持反革命立场"、"反动到底"、"反 改造"等等,还信口雌黄地指证我: "在狱中极力宣扬香港的资 本主义生活方式,并叫我看外国来信,企图腐化、拉拢我"。看来 惯于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是他们这类人的本性,但 到头来又如何呢?依然落得囚徒一名而已。

和我关在一起的枣阳难友、武汉小偷、造反司令和至友高医生,都先后出去了。高医生这次关了一年四个多月,总算挨过去了。临出去前,把仅有的十多粒印度白胡椒留给我备用。"这些留给你,后会有期!祝你好运!"他情重地握着我的手,眼盈泪光

地对我说。

"后会有期!一帆风顺!"我避开他的目光,装作冷静地答道。 其实,我内心翻腾如波涛。正所谓: "相见时难别亦难",在"人 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险恶日子里, "重逢"谈何容易!很 多人"生离"成"死别",也许今后永远也难相见了。

此期间,还和一个姓林的广东温泉人关在一起。他"解放"后,当过土改队队长,后任乡长。因厌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只身偷渡到香港未遂,捉到看守所时在墙上写了几句牢骚话,马上就成了"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判刑八年,投入劳改。他一直悲观厌世,又常受批斗、关押、侮辱,多次自杀未成。

他目前的处境,我是很同情的,他应该认清楚了,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吹出来的。当年他为人所利用,开"斗争大会"时,一定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但曾几何时,亦沦作阶下囚。闲谈时,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桃色事件。如在"土改"时,与一女土改队员长期私通的经过。在劳改场时,一女干部主动勾引他,长期通奸,晚晚送鸡蛋、猪肉给他"进补"的详细情节。半年后,我与他同调去宜城的某农场,当时她正迎面而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平凡妇女,谈不上姿色。林有打招呼的意思,但她却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擦身昂首而过。

林出去后,换进来老牌"疯子"王为瑶。他除了以头撞墙和饮尿、胡言乱语外,还有一戏:每当"开饭"接到一个馒头时,必死命地往地上摔打,并喃喃自语:"打大点,吃饱些!"

不久,我终于出去了,留在监所瓦房劳动。见到罗君后,彼此都有"大难不死喜相逢"的感慨。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四百多天,该是一千多秋了。有一天,我和他在院子里假装打篮球,他悄悄告诉我:"干部曾告诉我们,这次真的准备杀你们的。"他顿了一下又说:"但后来又改变了决定,不知何故。"我的心一沉,

两耳"嗡"了一下,心想:真是"险过剃头",几成冤死鬼。我知道他们改变计划的始末和原因,但我没有向罗君详谈。不管怎样,这次他们倒尊重事实,没成冤案。

监所的劳动,主要是用较原始的机器做砖坯、瓦坯,然后装进轮窑烧砖瓦。我们属"反省号",住在东边一列反省监仓里,每一小组十多人住一间房,各组隔离开,也与"劳动号"隔离开。"劳动号"一百多人住在南边的一列大监仓内。我们每日的劳动是挖泥、装车、拖车等。路不平,风又大,加上车重人饥,每天回来,饥肠辘辘,腰酸骨散。

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黎明先生,曾任国军高职,官衔少将。此兄生得浓眉阔口,气字非凡,且为人忠直、刚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对我非常器重,我亦非常尊敬他,我们志同道合,很快成了至交密友。

年近七十的他成为每次运动"斗争"的对象,他左边的肋骨,给人打断了三根,右脚也打跛了。有一次斗争大会上,四条彪形大汉打他、踢他、按他,也无法叫他低下那高贵的头来。

组内还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广东钦廉人氏,叫陈榆德,五十多岁。也是仇恨现实,坚持反抗立场,饱受刑罚与斗争折磨,却从不低头认输的一个。有几次,把他吊打捆绑得大便也拉在裤裆里,昏死过去。醒来的第一句话必定是: "你们当家的姓毛,我们的主席叫自由,我们谈不到一块的。"

当时盛行"个人迷信",毛称孤道寡,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发号施令,"朕即天下"、"朕即圣言"。全国都印他的语录,执行"最高最新指示",一派顺者昌,逆者亡之势,无人敢不读他的书,不念他的"最高指示"。但陈老兄却敢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说:"毛公公是我的敌人,我也是毛公公的敌人;敌人的书,我是不读的!"坚决不看"毛选",不念"最高指示",不发言。他曾夜观230

星斗,说:"最近东方有颗亮星出现,光芒耀眼,那是光明之星,自由快要回来了。回到家乡之日,我要打七七四十九日的醮来庆祝!"

小组长是温汉周,广东人,曾是当年"东江游击队"成员,因"解放"后不满现实,组织反共集团而判刑。他是个吃饱挑重担的粗汉,虽然爱动手动脚,欺负一些老弱或"神经病"难友,但只要学习会上发言时,说他"改造好、劳动好",或以小物相送,就能相安无事。这是罗君提醒我的。我深明"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也只好应付一下。

有一天,组内新来一位海边区难友,由于一言不发,我们无 从知道他的底细。学习会上也不出一声,或坚持看书报,后为小 组长毒打,无人敢护救他。

为免再吃"眼前亏",我用闽南话对他说:"这里是监所,管得特别严,动辄吊打捆绑,有的吊出屎,有的打断筋骨,有的打掉门牙,搞不好会拉出去枪毙,你要注意呢,不要乱来!"说明个中利害关系,目的只是想提醒他而已。当他去医务室取药时,又受劳改医生马锦的奚落与为难,不肯给他。想不到他是个烈性子,一气之下,顿生厌世之念,夜半在厕所用长裤扭成条,挂在矮梁角上吊自尽了。

说来奇怪: 那晚小组学习结束后, 大家疲乏得要命, 倒头就睡着了。但我的肚子无缘无故忽然痛了起来。根据以往经验, 那"咕噜"声, 是必须到厕所才能解决的"紧急信号"。然而, 那黑森森的毛厕, 白天进去也觉寒气森然, 何况夜半只身呢? 所以我极力忍耐, 用各种办法分散注意力, 希望能睡着, 捱到天亮再说。不过, 任我左翻右转, 依然"战鼓频催", 无法入眠。数数绵羊五百只一头不漏, 算算数字由一直到一千, 依然"眼光光, 照地堂"。

忽然,眼前浮起那海叉难友被毒打后的痛苦表情,便很担心

起他的安全。于是睁眼抬头望望他睡的铺位,果然空空如也,预感大事不妙。多年的非人遭遇炼就了的敏感直觉告诉我:有问题。赶忙披件棉衣出外寻找,那时近深秋,寒风瑟瑟,树摇影动,倍觉惊心。每棵树上、围墙角,球架等,我都仔细看过了,没有发现踪迹。

顺路寻到墙角的毛厕, 甫一入内, 就见疯子张元俊在那里"拉夜屎"。我略一放心, 因为有人大便, 他不会至此自杀的。于是退出门外, 准备到别处再找。

"不对!厕所是分两格的,里面还有一间。"我赶紧回身到里面寻找。刚刚伸头探望,就赫然发现一个身穿白衫白裤的人,吊在墙角上。这一吓非同小可,马上去叫醒医生,组长、值班人员。大家七手八脚,顾不得他身上洒满屎尿的脏臭,抬到马锦医生室内(一个斗室,睡、食、看病、三位一体)。那马锦身为劳改医生,却没有一点医德和同情心,慢吞吞地不肯将死者放上病床急救,只准放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死者初时浑身是暖和的,关节也柔软,舌头没有吓人地伸在外面,看来死去不久。如果急救得法、及时,应该可以得救。

我和一个叫寇家福的难友,坐在死者肚皮上,轮流给他施行人工呼吸近一小时。马医生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支强心针,就坐在旁边等候。不久,他翻看死者的眼皮说:"瞳孔放大,完了!"慢慢死者身上出现点点"死斑",证明机体真正死亡,返魂无术了。

事后罗君对我说: "第一,不应放在冷水泥地上;第二,应把他的舌头从口中挖出来,进行口对口的急救。"我想是很有道理的。可惜马医生一点不协助、提醒我们,只袖手旁观,等待宣布他的"死刑"。为了处理善后工作,我走到墙角,向岗楼的哨兵报告: "报告看守员,这里有人上吊自杀了,请你报告干部进来处理!"但多次响彻夜空的"报告"声,却未见反应。半晌才传来一

个声音: "什么?死了一个?死掉一千个反革命,又有什么了不起!死得越多,麻烦越少!"相信那是刚由农村参军不久,不懂政治影响的兵大哥。

我大声喊: "不管你怎样说都好,这里出了人命,我已再三向你报告了,要求干部进来处理,叫不叫是你的事了,不过,你是负有责任的!"他自知理亏,最后还是去叫了佘指导员进来。当晚,为了救上吊自杀的海叉难友,骑在他肚皮上行人工呼吸急救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心里只有一个祈望:希望能把他救活。我也有点内疚:是否那天我话说得太重害了他。

第二天早上,望见放在监仓墙角的死者,内心有点发毛,偏偏进来处理善后的一名新干部,却指名要我抬尸入棺,好不容易,费尽唇舌才推诿掉。在赤色洪流中,各种各样的死人,我见得多了,有的就死在我身边;但抬尸入棺却从未试过,内心还是害怕的。

那所谓的棺材只是用几条木板钉成,可以看到里面的长形木架子,由于棺材太短,死者僵硬的脚放不进去,那些抬棺者,便把他的膝盖打断,硬塞进去,钉上木盖了事。观者侧目,死者泉下有知,将何其悲也!

为此人命案件,温汉周撤了组长之职。新任组长叫王高云,是本场劳改队王队长的儿子,曾在总场任机要通讯员。后携带秘密资料,只身北上,泅过鸭绿江,投靠北韩。被引渡本地后,因"叛国投敌"罪,判刑十五年,投入劳改。他只有一只眼睛。这独眼龙为人奸狡、阴险,喜欢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无限上纲",动辙冠以政治罪名。他与一名新来的曾当过兵的流氓诈骗犯勾结,狼狈为奸,拨云弄雨轰大雷,搞得组内人心惶惶。

全监所关有十多名疯子,干部称他们"装疯卖傻"。有十多年 不讲一句话的,有狂笑的,有自言自语的,有忽喜忽怒忽哭的, 有指桑骂槐的……全是受非人的迫害后变成神经错乱的。但干部并未放过赚钱的机会,仍然强迫他们拉车子、运泥土、做砖瓦。拉土的车子全在深深的土坑下,要用铁钩挂着"卷扬机"上的钢丝绳拉上坡去。常常因脱钩失灵,或因操作差错,很多人被直接卷进滚筒,断了手脚。所以暗地里,大家都叫它为"卷肠机"。有一个曾是工程师,现已变得昏昏沉沉,又经受挨打的难友张生,被卷进滚筒,直喊救命。虽伤及阴部,幸好命大,尚未彻底摧毁了他的"祖宗祠堂"。

为难友安全计,我设计了一个脚踏和电动"刹车"后,从此太平无事。我又设计了一个操作简便的半自动翻板,方便"疯子"们和体弱者倒土。这是他们以前弄了多年却无法解决的问题。为减轻做砖难友抬砖坯上车的劳动,我收集废铜烂铁、旧滚球轴承等,自制了一台"自动抬板机",经试验基本成功。

有位搞机械的广东难友,叫陈水,人还好。有一天他向我诉苦:他完全是冤枉的。1960年,他饿得受不了,与人合伙偷了公社一头小牛,上山宰来吃,快活了几天。后被发现抓回,挨了不少打。关进县看守所后,干部利用里面的狱头狱霸,天天往致命处打他,直打得他吐红吐白,几乎气绝身亡,目的在于假犯人之手,逼他"交代罪行"。为求免去一死,他只得胡编乱凑:说偷牛上山是"有政治企图"的,目的在于"贮粮打游击",搞"反革命集团","配合国军反攻大陆","谋求一官半职"云云。从此,不再挨打了,但因"反革命罪行证据确凿",被重判十五年徒刑,投入劳改,至今含冤莫白。现妻子又向他提出离婚,所以心情很痛苦,要求我代他写一封信给他妻子,希望能令她回心转意。

不久,组内新来了一个湖北难友,叫高兴,本是刑满就业人员。因有一次农场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来劳改队偷摘棉花、割麦子时,他老兄"响应"干部号召,想"维护农场利益"、"保护国234

家财产"、与"群众"发生争执,被人围殴辱骂,气愤之余,他还了一拳"黑虎掏心",不料竟打中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的胸口。在那赤色恐怖时期,骂一声老毛,或打干部、党员、大兵等,都属阶级报复,可以定作死罪,何况是"劳改打党员",更何况,两天后那老党员竟死去了。这真是惹大祸上身。

在大队干部率领下,浩浩荡荡开来了一百多名愤怒的群众,长矛大刀,驳壳步枪,涌进高所属的就业中队捉人,抓到后准备"就地正法"。由于他平日表现较好,就业中队长闻风后,把他藏在马房墙角的饲料堆中,后连夜送进总场监所才救了他一命。后查出那老头身患肝炎,重病在身,早已奄奄一息,才"轻判"他十五年徒刑,重新投入劳改。

有一天,我笑着对高说: "你想维护劳改场的利益,差点糊 里糊涂送了命,今后应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老兄。"他 连称"是的,是的,我他妈真是'二球'(笨蛋)!"

那时候,全国都在搞神化毛的"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班前,睡觉前,都要排队肃立,高呼: "我们向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示!我们向林副统帅请示!"还要祝毛"万寿无疆"、林"永远健康"。晚上,宗教仪式依旧,只是呼完了老毛自封的"四伟大"后,把"请示"改为"汇报"。

我们因为是"阶级敌人",没有"请示、汇报"的资格,便规定作"早请罪、晚检讨"的特别仪式。天天要喊"请罪、检讨"。

基建厂一中队有个红得发紫、道貌岸然的劳改保管员,本是武汉马列学院的讲师,文革中判刑劳改。平日行必言"积极改造",坐必谈马列主义、批斗他人时"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因而深得干部信任,还减过半年刑。他经常欺负一些老弱病残和正义人士。后来,一福建组长发现可疑线索,召来队长,捉奸在床地揭发出一件惊人的大丑闻:那马列道士,原来是个伪君子,长期

利用当保管购物之便,以牙膏、肥皂、内裤、毛巾之类、甚至残羹剩饭等,引诱、收卖队上几个小青年,经常在夜半人静之际,往往在用激昂之词批判他人之后,上演断袖、分桃的帐中把戏。揪出了这老狐狸,全厂轰然,大快人心。但队上干事宣称:今后不准再谈论此事,否则作违反纪律处理。偏袒之意,溢于言表。

上回见到的因唱土家山歌,被大兵、值班人员毒打的疯子杨某,也调来这里拉坯。有一晚,由于雨夜遭同组的"肺痨鬼"罗开心的谩骂,并赶出仓外淋雨,顿起报复之心,趁罗熟睡之际,用十字镐把罗的脑袋挖开了两个洞,浆血喷在墙上,罗当场一命呜呼。不久,杨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福建来的反革命名单中,又勾去了两个,用大兵哥的话来说:又少了两个麻烦。

组内有个苏联乌克兰人(父为苏俄人,母亲为中国人),想返回"祖国"与兄弟团聚,反被划作"修正主义"受到批判,后来被抓到一些文革中的反动言行,便剃了光头成了劳改。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文笔也不错,除了眉骨有异,睛色不同外,不太容易一眼看出是外国人。一吵起架来,别人受污辱骂他"杂种",他常常幽幽地反击: "你是杂种的儿子!"

有一次,各地掀起一个"打击反革命运动"。据说双十节前夜,有人在沿长江(重庆至上海)和沿京广铁路(北平至广州)十字形几百个市、县间,一夜之内,同时散发同一内容的"反动传单"。有铅印体、有钢笔刻印、还有木刻体。证明地下组织非常宠大、组织严密。

厂内不断换新血,陆续关进来不少新劳改。很多虽也是反抗现实暴政的人士,但多属于"人民党"、"幸福党"和"梅花党"等第三势力的成员。为首的早成了刀下鬼,劫后余生者判"死缓"、"无期"的也不少。很多是红旗下成长提拔的干部,喝共党奶水长大的学生、共兵、民兵等。

有一个共军东北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也因不满共产政权,向 往自由世界,携带机密文件、枪支等,投靠海外未遂,判刑在此 劳改。我们成了好友。他准备把我弄到东北去,给我找个好工作, 再给我介绍个女朋友。

在我们拉砖坯场地附近,有一低洼竹树小丛林,有人平日爱到那里去"风流如厕",大概借灌木遮掩,可以蹲得久些。有一天,一老头去如厕,赫然发现有一难友吊死树上,吓得他提着裤子,大叫大喊地跑了出来。这吊死的青年,平日不太说话,常作自言自语和冷笑状。据知他原是乡中一教师,新婚不久,不知为何判刑八年劳改,上诉无门,苦役难挨,失望之余,只有一死了之。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造反派,大搞"打、砸、抢",彼此糊里糊涂地火拼,也殃及池鱼,令无数百姓成了冤死鬼。待到毛借他们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当权派",达到霸党目的后,红卫兵就变成了"替罪羊",新当权派运用铁腕手段,对他们进行清洗、镇压。杀的杀,关的关,很多人被拉去枪杀了,还不明白一切都是由当年戴着 "红卫兵"袖章的"毛司令"一手制造的。

混乱、恐怖的形势也祸及作为"阶级敌人"的劳改们。监仓的墙上,贴满了一些县、市、地区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名字被大红毛笔"勾"了的死者姓名。他们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强奸杀人、抢劫杀人、或"武斗"中杀人的严重刑事犯。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杀掉。

有一次,襄樊地区中级法院出的布告上,密密麻麻地、印满了被处决者的名单,共有八十多名。他们真是所谓"生不同时, 死却同日"的一群。

所长有一晚听到组长"独眼龙"王某的汇报后,把"老牌反 改造分子"陈榆德叫去"谈话"。可能不欢而散,回来即喝令陈榆 德收拾行李,并带去"监禁反省"。同时被关进去的,还有黎光先生和一个叫陈水仁的青年。他们三人平日较谈得来,又属"一贯反改造"的"小集团",这次运动来了,就找他们开刀。

关于陈水仁,我只知道他曾在中央所属的某勘测队工作过,被冤枉成反革命投入劳改后,一直不停地上诉,但经常为此挨打,受批判,弄得精神恍惚,疯疯癫癫。不过他是一名非常"顽固"的硬汉子,斗争大会上,不管如何拳打脚踢、吊打捆绑、从不叫痛求饶,也从不弯腰低头。为此,干部们恨透了他。宣称他们是一小撮"不堪改造的死硬派"。一次全所学习大会上,干部宣称:此次如不悔改,态度不好的话,准备干掉他们几人。我真替他们,特别是黎光老先生担忧。在当时的形势下,干部是干得出来的。

三天后,全监所召开批斗大会,斗争陈榆德。目的是假"群众揭发检举"之手,收拾所谓"反改造言行",整理成"犯罪材料"后,上报处理他。一些人虽然批判揭发了他的一些言行,但全是多少年前批来批去的陈年老帐,毫无新意。

陈榆德与我同组,睡我侧边,他有"发开口梦(说梦话)"的习惯,但全是白日劳动、生活的一些片断而已,如:"喂!借条扁担用好吗?"、"不要装太满,我挑不动"等等,毫无连贯意义。想不到,他这很多人都有的毛病,竟然要了他的命。在"检举发言"中,一个湖北姓赵的麻子(多次逃跑被抓回在监所监押)却信口开河地说:"这家伙很反动,每天晚上都狂呼反动口号!"所长马上指示纪录人员说:"注意!把这句话纪录下来!"

在监所监禁的还有一位广东就业人员,不知何罪。

又过了四天,全监所集合在大铁门外,准备参加总场的大会。一位姓梁的难友,望望天空对我说:"老叶你看,天上的乌鸦老围着监所盘旋。这回,又不知轮到谁去见阎王了。"我仰望上空,果见一群乌鸦,约有千多只,"呀呀"悲鸣,忽高忽低,在屋顶238

盘旋不散。似乎知道有人要死,又似乎准备扑下去争食死人之躯。 自小听老人言: 乌鸦叫是不详之音,看来一旦乌鸦绕头飞翔,才 是大难临头之征兆呢。

我的心在不断下沉,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也是个"一贯反动"、"仇视社会主义事业"、"多次逃跑"、"暴动越狱集团头子"的反改造分子,可放也可杀的。

在总场大会上,陈榆德与那广东就业人员被五花大绑拉去处决了。当天,布告就贴了出来,这次被处决的共有一百八十多人。由于人太多,字太密,篇幅有限,被杀者的"罪行",每人一行,姓名也无法用大红毛笔打上大勾,只在各人姓名上,横划了一条红线。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广东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自言自语和陈榆德的开口梦相似,却都当成了"呼喊反动口号、格杀勿论"之流,糊里糊涂地拉去杀掉了。

这次,黎老先生未死,我也侥幸平安,但都是从刀尖上滚过去的。回忆之余,手心还常冒汗,局外人是无法体会出当时复杂的心境。

我很痛恨那赵麻子,不久调到宜东的邓林农场,我借故痛打 了他一顿。

由于"形势需要",沙洋农场整块地盘,除少部分就业人员、农工所居场队外,大部分要交给中央"五七干校"管理。其余全体劳改、部分就业人员,统统调到百里以外宜城东边的邓林农场去"继续改造"。有一团最近才调回来的大兵,参加过越南战争,也下放到此"干校"劳动。

据说:中共采取不断换人的办法,大力支援北越南侵。他们在与南越交界的沿海地区,组成三层防空封锁火线,中共炮兵打头阵,北越炮兵居中间,苏联导弹部队押后,一旦发出空袭警报,

三层火线一齐盲目放炮, 乱射导弹, 企图阻止美国 B52 型轰炸机入境作"地毯式"轰炸。

有一个来拉砖的前大兵告诉我们: "那 B52 型可厉害呐! 划出地区,不管有人无人,轰!轰!轰!一律夷为平地。有一次,我用无线电话与另一营兄弟部队联系,只听对方喊了声'不好! B52 来了!'就再也没了声息。整营的部队,就这样消失了。那时候,只要警报一响,就是不穿裤子、鞋子也得拚命跑向山林或防空洞,管不了那么多。"

在来拉砖头的大兵中,我们发现一种怪现象:装砖的士兵,全套军装,却无红星帽徽,也无红旗领章,精神麻木,萎靡不振,旁边还有带星挂旗的真正大兵,手持冲锋枪看管着。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军队中的劳改人员,他们同样失去自由,要受到"斗争"、"批判"、"殴打"的待遇。回乡后,表面上参过军,但属复员军人(没有军籍),有别于"转业军人"(保留有军籍),且档案入"黑五类",指定不准担任民兵、生产队长等职。

有一次拖砖坯,闲中与一驾驶汽车的老头闲谈,得知他是北京某大学的校长,如今也到此"锻炼"开汽车。

共军原东北某兵团一个中将也曾下放于此场劳动过。他的儿子,曾是军队机要保管员,因不满共产党倒行逆施,带着极为机密的文件、枪支等,准备投靠国外,他公开说: "国军要比共军还好。"又说: "老蒋是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听信了收音机上什么玛丽小姐之类的呼叫,写了一封信到香港去联络,结果信件落在共党手里。所谓"玛丽小姐"的呼叫,我也曾多次收听到过。她往往爱说: "某某,你寄来的东西收到了,非常有价值,上峰准备嘉奖你。如有来信,可寄香港某道某号玛丽小姐收"等等。其实,这是共党设的一个诱人犯罪的圈套而已,因为一切进出口的信件,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有一回,我们支援二分场六队摘棉花,见到很多年青的"五七干校"成员也在劳动。闲谈中得知:他们原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其中有歌唱家、大小提琴手、舞蹈演员等。我们要求他们唱支歌,一青年苦笑着,用沙哑的声音说:"听听我的声音,看看我们的处境,哪里唱得起来!"另一位显然是小提琴手的青年则说:"自从经风雨,干粗活后,手指变得又肥又粗,已不再是拉西班牙小夜曲的材料了!"一些属"反对派"的干部,如场长、教导员、队长之类,也"下放"在农场劳动,与劳改们在一起。他们感慨地对我们说:"唉!莫喊我队长了,现在我们也是劳改,彼此彼此,大家差不多了。"

有一队"干校"成员来窑厂劳动,和我们一起挖土、推车、出窑等。但他们的待遇显然比我们好得多。肉包子、白馒头、绿豆糖水、豆浆等,放在旁边随便吃喝;而我们旁边只摆着两桶白开水和一个很脏的公用小竹筒勺子。他们把剩余的全部倒掉,也不肯施舍给饥饿的另一群。出窑时(从轮窑内把烧好的红砖,装在原始的小车上拉出来),窑门外有三个男女医生和几个护士以及领导等在关照着。摆满了急救的器具、过滤水箱、绿豆糖水、肉包子等。每人进去工作十分钟,便出来换班。甫一出窑门外,马上如凯旋归来的勇士般受到热烈欢迎:"同志们辛苦了!"这是领导的问候;"小李子真行!"这是"同志"的赞扬;"快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这是女护士的关怀。又是擦汗拭背,又是递糖水豆浆。原来他们是高干和高干子弟。

相形之下,劳改们在高温下要连续工作十个小时,得到的是 白开水、无油菜、夹砂饭和喝斥、谩骂与拳脚。"干校"、"牛棚" 等,都是老毛折磨人思想的法西斯集中营;但人间地狱般的劳改, 惨苦状况,却真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诚然,在牛棚里,他们吃得比我们饱些;然而,所受精神和

肉体的摧残,也十分深重,并不亚于我们。干校的老头们,多在 五六十岁以上,走路都显得蹒跚,干部却强迫他们拉车。很多人 压得直不起腰来,寸步难行。有的跌到,有的扶着车柄在咳嗽、 喘气。要知道,那车泥土足有八百余斤,他们真的是拉不动的。

此时此刻,我们也忘记了他们曾是"中央干部"和"阶级有别",只知道大家都在"牛棚"、"马房"中受苦,他们也是受到打击、陷害、折磨的一群。恻隐之心驱使我们暗中违抗干部的命令,擅自接过他们手中的泥车,换他们去做较轻的铲土工作。

有个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显然是他们的负责人,来到现场,一再向我们请求:"他们年老多病,请同志们多多照顾!谢谢!"哈,我们成了"同志"了。

第二次越狱

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年十月份, 开始了撤厂前的大调动。

新生窑厂连砖机、瓦机及场地,以二十万人民币左右价钱, 卖给附近的人民公社。因为社员群众不能像劳改那样,在高温下 连续十八小时不停地干活。要求的"待遇"也高些,所以只能将 过去劳改们弄得黄金滚滚的轮窑,变成一座废墟。

宣布的名单中,罗君是去宜城新生农场,我却要调回第七新生基建厂去。我很想与罗君在一起,有机会共图雄心大计,一旦分开,将会永无相见之日。我用闽南话向指导员提出要求:一、调换一下环境,对我的"思想改造"有利;二、希望能在他领导下"劳动改造"。

那干部诧异地问我: "你怎会说闽南话?你是闽南人?哪个县的?"我说: "到过闽南的漳州市、定安县、汀江、厦门、福州、闽东、南安等地。以前曾在基建队工作过,是三级技术员。" 242 于是在最后修改的名单中,我终于被列到第五基建厂的名单中去了。满载劳改的车队,穿行在南边的襄樊市热闹的街区,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路边的羊群,街上的自行车流和人流,商店里的货物,自由市场的鸡蛋,女孩子的花衣裳、发红的脸蛋,男孩子夹杂"国骂"的谈吐等等,都深深吸引着我们这一群恍如隔世的奴隶。

来到襄江边的清河口码头等船,只见对面的一座化工厂,排出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料等)——黑灰与黄烟齐飞,弄得周围乌烟瘴气,清河成了浊河。码头(其实是水退后的河岸斜坡)上,有很多小孩在搬运东西,有男有女,大者"二八佳人",小者"十岁神童"。他们从岸上把一包包化肥搬到船上,或由船上将一包包货物,搬到岸上。像蚂蚁般缓慢地,不停地干着。他们搬物的姿势与方法很特别,既不像南方人那样肩挑臂扛,也不像北方人那样采用箩筐装运,更不像高丽人、印度人那样用头顶;而是将身体扭曲成5字型,把货物放在腰、股之间,一手搂着,用屁股顶着,一步一步艰辛地向上爬行。很多女孩子的屁股特别丰满,不知是否与此动作有关?

足足等了几个小时,才坐上一条用小轮船推的"驳船"。押队的所长腰里插着手枪,和两个持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的大兵,以及指导员、女干部等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们,不时喝令我们不准谈话、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东张西望。襄江水很大,但河道长年失修,淤塞成很多长的沙滩和短的急弯。行程于九曲十八弯的河道中,慢如蜗爬蚁行,但却有机会谈话,欣赏两岸的风光。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细心观察,发现沿江东岸悬崖边、半山腰和平原河岸、弯曲着一条羊肠小道,有很多人挑着、背着东西在往来行走。显然,这两个城市之间,有近而不易迷路的最优"逃跑路线"。我仔细地观察周围老百姓的穿戴打扮,手携何物等等。

这是日后"回到社会的怀抱"时,做合宜打扮的参考。当时的心情很高兴,似乎在绝望中等到一线生机,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

V 42.76

老树林农场废置在河边的烟囱,数十里外已经可以望见,但要达此行之末,还要爬上一段非常陡峭、必须用牵引机拉引才能上去的"望天路"。

罗君分配去"机械厂",我要去"第五新生基建厂",两地相隔不远,但不属同一体系。罗君爬到半山时,与我打了一个"后会有期"、意义深长的手势。我既有离别的惆怅,又有渺茫的感觉。分手了,能有机会再相逢吗?能共成大计吗?

第五新生基建厂,是座可容上千人的监狱,里面还有一座用于禁闭、反省、等待加刑、处决等作用的监所。那里工作繁重,饮食最坏,干部又爱骂人、打人。那些饥饿的同犯们,跑过来扫清我们无法下咽、又咸又苦的梅菜渣或臭得发呕的酸菜。这简直是"向乞丐要饭","与和尚借梳",可见此间生活的贫苦,足证该"厂"施政成绩的低劣。

我分配在瓦队扛泥巴,每天十个小时,用肩、手、颈、甚至 头,把一块块八十到一百多斤的黄泥巴扛到瓦机"泥缸口"丢下 去,喂饱它。可是,每组几人来回跑,也永远喂不饱那张开的血 盆大口。每天收工回队,整个人像散了骨架的软泥,摊在铺上不 想转动。我觉得自己快死了。但我咬紧牙关,痛苦地挨下去,当 然不是甘心做"顺民",而是在寻找机会,等待时机。

我接受了血的教训,得出结论:要想脱离虎口,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能硬拼硬干,必须"开动脑筋",与他们既斗勇又斗智,要学会"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事前不动声色,出其不意发难。而且,要打破常规,另谋对手估计不到的办法,才有脱险的希望。如何麻痹他们对我的监督、创造逃跑的机会呢?只有含辛茹苦,作出"安心改造"的积极姿态,才能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从此244

后,我不再公开骂他们。学习会上,也不再木佛似地闭目养神,不时人云亦云地敷衍几句。与干部的鹰犬、耳目——"积极分子"、小组长的关系也尽量搞得好些,时常塞点香烟之类,劳动上尽力而为等等。

果然,"香烟加空话"行之有效,组长们向管教干部汇报时,把我列为"有转变"的对象。看管明显地松驰下来。我暗自庆幸时机来了。勾践用数十年忍辱才成大业,我算快的了。但是,一个剃光了头,身穿劳改大字囚服,全场都熟知的"老牌反改造分子",如何能在几百人监视下,穿出重围,找到自己的同伴(他在另一场)一起潜逃呢?若晚上在监狱逃跑,时间很充分,换衣服也方便。但墙高又有电网、岗哨,绝非单枪匹马能为,且黑夜难找到罗君。白天嘛,人又多,不易脱身。怎么办?

起初,我在幻想:一个人能飞就好了,展翅腾空,直趋东海,飞向自由世界的怀抱。所以常常沉思一些关于"人造翅膀"的可能性。然而,既无理想的材料,又无起码的试验场地,谈何容易!

后来,又想到,一个人要是能够"改头换面"就好了,别人 认不出来,定可通行无阻。很多人逃到社会上,皆因后来被人认 出而失败,而我们却又多是目标很大的"花头鸭"。

最后,想起有一个苏俄人,叫克伦斯基的孟什维克头子,在 危难时扮成女人,瞒过布尔什维克的耳目,登上了美舰逃生。这 个故事触发了我的灵感:我为什么不效仿一下?"须眉忽现红颜 身",扮成女郎逃之夭夭呢?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比"飞天翅膀" 来得实际,也有"历史根据"。这一着棋,干部料不到,即使对面 擦肩而过,也不会想到巾帼竟是大丈夫。

如何乔装打扮呢?我每天很注意观察过往的本地妇女,当然不是欣赏她们的姿色,而想研究她们身上的打扮而已。我注意到: 天冷风大的时候,女人喜欢包个大花头巾,也有戴个大口罩防风 沙的。她们多是上身穿件花棉袄,挽个布包之类,下身则与男人所穿差不多——各色"青年裤"、"解放鞋"、布鞋之类。只有个别的干部子女才穿小皮鞋。

看来问题不大。头巾可包住光脑袋,口罩能遮住口鼻,花上衣则表明是"货真价实"的姑娘或少妇。手里挽个花布包,谁说我不是在"赶集"或回娘家呢?

口罩、裤子、鞋子是现成的。我特地从印有"鸳鸯戏红莲" 图案的粉红色带蓝格的床单上,撕下两块方巾来。有鲜艳图案的一块作头巾用,余下一块则做包袱用。又从衣物中,找到一件带有花朵图案的睡衣,准备作上衣。

至此,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有一天,我扛着每块百多斤的泥巴,吃力地丢进泥缸口去做瓦坯。时近深秋,身穿单衣仍汗流浃背。与其说流下的是汗水,倒不如说是泥浆。但为了我们的"雄图大计",只好咬着牙死顶下去。

忽然,我看见了罗君,他一面与师傅们(劳改几乎都称师傅) 搭讪,一面朝我递眼色,我装着要喝开水走了过去。我们简单地 用只有我俩才懂的"暗语"交谈了一下,决定了逃跑路线、时间 和地点。

我又详细地考虑了几天,觉得事情已基本解决,只是如何脱身的问题了。有一天起床时,我趁天黑未亮,光线不足,把花睡衣、青年裤,解放鞋穿在身上,两块花巾则缚在裤腰上,再加穿印有劳改大字烂棉袄,烂棉裤,一副平日出工劳动的样子。到了工场,我还得卖力地干大半天,想到很快就要逃出这禁锢了我们十多年的囚笼时,精神为之一振。

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时钟固然步履艰辛,太阳也像钉在空中,舍不得下去。总觉得有好多只眼睛在偷窥着我,又好像一246

些人的窃窃细语,是在议论着我。但仔细观察,又不太像。我唯有理头苦干,不动声色,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好容易捱到太阳下山,于是我开始做最后一个工作——把香烟掏出来,"遍地开花"地散了一通。在疲劳之极,能抽上一根好烟,顿使大家兴高采烈起来:"够朋友!伙计!"、"是个好'条子'(香烟)呢!"、"个八妈(武汉一带骂人口头禅),多舒服呵伙计!"一时把我当作"老大"了。半小时后,我大喊肚痛时,果然搏得大家的同情,都建议我"休息一下"、"最好的地方还是瓦坯草房"等等。

为避免被狼狗跟踪,我走过洒有废柴油的地上,油便踩满了鞋底。一到瓦坯工棚,看到四周无人注意、跟踪我时,便赶紧脱下囚服,用花布巾包住光头,带上大口罩,然后把一件替换衣服包成小包袱,最后把换下的东西藏好,目的是延长被人发现的时间,好走得远些。

一路上穿过很多劳改工作和乡人路经的工场,碰到不少贪婪的眼光,我只好尽量不侧头望他们。但心中在发笑:原来男人看女孩子时的表情,是这样的。

来到罗君的住地,我隔着窗口观看,糟了!看不到他的人。 我焦急地徘徊了几分钟,知道自己是不能够直接进内问人的,我 的嗓音有异。只能找到他,然后静静地靠近。时间在一秒一秒地 溜走,心跳在一秒一秒中加快。时间有限而宝贵,那边随时都可 能发现追过来,一旦封锁了工场,事情就麻烦了,很可能"胎死 腹中"。且逗留久了,也会引人起疑。

怎么办?我迅速地思考了一下:他会在哪儿?也许尚未下工。对,到工场找找看。那工场在后面不远的小山岗上,有路相通。路上,碰到队长的老婆,我赶紧低着头,装作揉眼睛的样子,匆匆走了过去。忽然听到鼓风机和"叮当叮当"的打铁声,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是他,那是打铁匠罗君,因全厂只他一人会打铁。

此谓:看戏是人,演戏也是人,锣鼓一敲人看人;铁锤是铁,铁 垫也是铁,风箱一拉铁打铁。

于是,我由侧门走到他跟前,他以为干部家属来了,只望了一眼,就举锤打铁。当我说了一声"Hello, nice to see you!(哈罗,很高兴看到你!)"时,他确实惊疑了一阵子,满脸莫名其妙的表情。因我"乔装打扮"之计,并未告诉过他。"喂,我是阿华呀!"我笑着说。他恍然惊醒,并赞许地笑了,便嘱我先行一步,他随后赶来。出得门来,我朝山后江边走去。我以为他马上就会溜出来与我"会师",所以在不远一座小山岗上等他。深秋,夕阳、寒风、枯草,倍觉凄惶。茫茫前路,何处是家。

突然,旁边悉悉有声,冒出一个大汉的头来,我吓了一跳, 拔脚就想跑。我以为被人发现,捉我来了。回眸一看,原来是罗 君。因他望见我尚等待在山头未走,才抄小路上来叫我马上离开: "沿着江边,我换过衣服随后就到,快走!"

这时,血红的夕阳,已被朔风吹落。大地昏茫,群鸦悲鸣, 一片北国荒凉景象。

我只好沿江北上,边走边回头,希望见到他的身影。并在一片矮树林边,守望了很久,但仍不见罗君的踪迹,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怎么办? 万一茫茫夜色、人地生疏之下,两人失散怎么办? 看来唯一的挽救办法是,天亮前如还遇不到他,只好原路折回去找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正当我心焦神虑,紧张地茫然向前时,忽然发现身后有个神秘的黑影,时隐时现,时快时慢地向我迫近。我赶忙加快了脚步,几近小跑起来,希望趁夜色迷漫之际,摆脱跟踪与追捕。"站住!不要跑!"一听这命令,我拿出当年打篮球的冲劲,跑得更快了。虽然,我估计那人未追上我,但我已迅速作了决定:跑着跑着,突然下跳,藏身在248

岸边凹陷处,让过他,然后绕道甩掉他。万一被发现就奋力袭击他。我是"亡命之徒","不自由毋宁死",我也顾不得许多了。

在我猛回头估计追赶者的距离时,忽然听到几句闽南话: "喂!我系罗呀,再跑我顶唔(支持不住)啦大佬(大哥)!"原 来是罗君,真吓死人了。

一场虚惊,我从翻腾的江底又回升到平静的水面上来。不单露沾满头,全身早已大汗淋漓了。但正当我们庆幸之际,真正的危险已向我们扑来,我们被发现了。

骑兵马队、摩托枪手、各公社、大队民兵一齐出动,包抄、 封锁、围捕我们。人声、狗声、鼓声、锣声,真是惊心动魄。

我俩时而匍匐,时而奔跑,时而隐藏,利用高高的河岸和黑 夜的掩护,沿着野菊怒放的汉水,奔向自由。

水寒、风冷、夜茫茫。我和罗君拚命往前跑,力求尽快摆脱马队、狼犬的追踪。这时候,速度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来到一条岔路口,忽然发现有条人影守在路边。糟了,舍此道无路可走。蹲伏一会,罗君以石掷之,一下、两下毫无反应。再爬近一看,原来是一截木桩。

到一渡口,值夜的茅屋内有灯光和人声,罗君嘱我小心,便一前一后分开越过关口。我们沿着陡峭的襄江岸爬行,有时用手摸索、有时以屁股滑磨,匍匐躬身,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常常被裸露的树根、石头拌倒,弄得一身泥水,双手流血,衣裤都给撕破了,我的脸上还划上一道深深的伤口。

"捉特务呀!"、"抓逃跑犯呀!"、"抓反革命逃跑犯呀!"、 "抓住他!"突然,头顶上的一个村子,传来一阵破锣声,夹杂着 一群人的喧嚣,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莫非我们被发现了?便赶紧 伏在冰冷的岸边泥土上不敢动弹。

看来,追捕的电话已打到附近各村落,"土八路"正配合着

在捉我们归案。

"怎么办?"罗君焦急地问我。

"他们已封锁了所有路口,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危险的地方。 再不走,头上的炸弹就会扔下来。"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们总算看到那个村落的灯火渐渐远去。路上,我对他说: "现在,东岸的所有土八路都已动员起来,封锁了所有通道。劳 改场的骑兵、狼犬、摩托车也分头追踪。但西岸广阔的平野,相 对来说会比较松驰,因有一江之隔。如果我们能游过去,很快就 可到达县城,天亮后再沿公路上樊城市。那里人多,往人群中一 钻,谁也找不到我们。衣裤可顶在头上慢慢游过去。"

rest of the entropy respond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不!现在是深秋季节,河水很冷,人会冻僵在河里的,"他 极不同意地说。

"对!正因为河水冻,河面宽,他们估计不到我们会冒险走这条路线,所以才会放松对江岸和江面的封锁,而我们偏偏走这水路,迅速冲破追捕圈,这是胜券在握的唯一办法。我们一定不要采用普通的、常规的方法,要令他们摸不着我们的意图。"我极力说服他,无奈他坚决不同意。我明知这方法是通向自由之道的"方案",但难兄难弟,总不能分道扬镳。

黑暗中,我们来到一片乱葬岗,模糊中可分辨出有的是充满泥土味的新坟,有的是用泥块压着纸钱的旧墓。行走其间,倍觉阴森恐怖。当地的人死后,都不准葬在村边,而要抬到遥远的一两处地方集中埋葬,想来这是其中的一处了。

不知是心慌还是真有邪气,在岔路上,差点走向山坳下的停 尸屋去,幸好罗君退回来,决定走左边小道,才又回到江边来。 这附近的岔路、水渠、小沟特别多,走了许多冤枉路,时时掉在 冰冷的水里,冻得我俩直发抖。

来到一处山岗与平地分界的岔道上,我们想在碎石坡上滑下 250 去走近路,不想绊落了一些石头,在夜深人静中发出可怕的响声。 而滑下去的菜地,偏偏又是水沟包围的半岛,所以,当我们涉水 上路时,被人发现,但我也发现了他们。

在茫茫夜色中,我回首张望,发现两个白点,不远不近、不快不慢地紧跟着我们,并常常闪向两旁,用更黑的树荫掩藏行踪。"糟糕!我们被人跟踪了,趁黑夜赶快摆脱他们,还来得及,快走!"我焦急地拉他快点跑。他转头看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神经过敏,老弟!"我向前急跑了十多公尺,希望带动他。谁知他老兄反而越走越慢,几近踱起方步来表示他的镇定。

我又一次不忍心独自脱逃,只好听天由命与他生死与共了。 我们第二次丧失了脱逃的良机。果然,天微亮后,在一座木桥前, 我们被跟踪的两年青民兵拦住盘问。我们拿不出"路条",而且, 衣服、口音、形象等足以令他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我们被押到小 队部,又转押到大队部,再送到镇上的公社武装部。他们早有"一 高一矮,一瘦一肥,俩福建人"的电话通缉资料在手。

我们双手被反缚,强迫低头跪在沙石上一个多小时,痛得几 乎晕倒在地。

"你们要向群众多宣传:这是两个劳改逃跑犯,罪大恶极, 南方来的特务、间谍、反革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临押解前, 那显然是公社书记的老头,向俩民兵说。

我俩像猪一样缚着,塞进小船的角落里。旁边,就躺着几条装在竹猪笼里待宰的大白猪,发出"唔唔"的叫声。"猪大哥,我们同一命运了。"我在想。船上挤满了挑担的农妇、赶集的少女、卖薯的壮汉和涕流衣破的小孩。过了江继续前行,一民兵见我们实在走不动,便同意放松绳索,也答应我们的要求,买了点水果糖充饥。但好景不长。"过襄江大桥了,要绑紧些,这是规矩。"那青年民兵边解释边抽紧我们的绳索。途中,路人好奇地看我们。

"劳改逃跑犯!"他们不屑地说,像遇瘟病般地远离。

我看见前面几个小青年,手执长竹鞭,摆出要狠抽我们的架势,迎面走来。我知道在此形势下,决不能懦弱畏惧。我充满血丝的眼愤怒地瞪着他们,作出随时报复的表情。他们终于畏缩着放低竹鞭,默默看着我们走过。若我稍有惧意,怕早被抽得满面鲜血了。

到了某看守所,又故意让我们在沙石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示众"。旁边围了一大堆干部和小毛孩,对我们百般戏弄、侮辱。诸如撕耳朵、掷果皮、往头发上倒脏水、脖子里放沙石、用草棍儿捣弄耳朵、鼻孔等。苦在我们无法躲开,也不能还击。

- "你们是干什么的?是坏人吗?"一小孩摆出法官的样子问。
- "想回家。"我随便说。
- "为什么想回家?"又一小孩问。
- "因为想念家中的老妈妈,她无人照顾。"我略作心理攻势。
- "嗯,这家伙还算老实,不要弄他。"孩子王一声令下,免去不少麻烦。

看守所内,森罗殿般可怖,又寂静得可怕。走廊尽头铁门开处,我被推进一间阴湿霉臭的"号子"里去。那里面早已关了七个瘦削、苍白、眼睛特大、不似人形的本地难友。我宁愿坐在冰冷的地上,也不分占他们的床位。"唔,这人看来很讲义气。"一难友对大家说。

晚餐时,我心情不好,只吃了一点黄菜叶掺面粉熬成的稀糊涂,把大部分给了组长和他人。这样一来,大家明显对我友好起来。当我把剩下的几颗水果糖,分给他们吃时,大家都几乎感激涕零地谢起我来。

"多香的糖呀!五年了,才第一次吃到水果糖!"一位难友百嗅不厌地玩弄着那颗糖说。

"好人哪,祝你万寿无疆!"另一老兄风趣地说。那时老毛未死,这句话只准他自己受用,接受这句话大有"想龙袍加身"之嫌,有一定程度的危险。不过,这也反映出那难友的不满和勇气。

松绑后,冷血归心,感到浑身发抖,组长便代我报告,弄来 一张薄毯,并经请示批准我可以睡觉,不必坐着等待学习时间结 束,这是很大的优待。

这里的大兵爱来找麻烦,叫人背几百条监规中的第几条第几段,背不出就罚站。喊"报告"时也很有趣,要说"报告上级"。看守员是"上级",干部是"上级",连送饭菜倒开水的杂役也是"上级"。

"你们有什么事,要报告我这个上级,我还要报告我的上级。" 一次,那送囚饭的"上级",声色俱厉地作出简要训话。

这使我想起大名鼎鼎的"李灯筒"军长的笑话来:他向下属训话时说:"你们这些混蛋,要服从我这个混蛋,我,还要服从背后那个混蛋!"他不知道已骂了背后的孙中山。

"十三号, 你为啥关进来的?"几位难友悄悄地问我。

"做点小买卖,走错了路,被抓到了。"交谈案情是违犯监规 的,我随口编了个谎。

"呵,搞'投机倒把'赚大钱,跟我一样。那三五年是关定了。"另一难友说,"唉!你怎会走错路?你走哪里?"

"宜城、襄阳、邓县、新野。"我随便说几个县名。

"你错了老弟!应该走大路,由襄阳市到武汉市,全坐火车! 人山人海谁管着你。"他热情地教我。他说的是对的,可惜我们半 途出事,未坐上南下的火车。

大清早,铁门打开,来了几个上级,叫道:"十三号,出来!" 我默默地环视着惊愕的难友并和那位预言家告别。走到仓外 广场,见罗君已跪在那里。除卫兵和看守外,还有沙洋农场政法 组长、管教科长、劳教干部等。

一声吆喝,跟着一脚,我被踢倒在地,跪着,带上了手铐。

a intradgration and grass, king tind place.

他们捆人很有一套:麻绳中部打一留有空洞的死结,把它套在被捆者的后颈背处,一边绳子捆一边手臂,由上缠下,状如麻花,到腕处打一死结,再将两捆着的双手交叉缚紧。最后,把绳的两端,穿过头后死结小洞,拚命地将双腕往上抽紧,力求贴近颈后。有时为了将两手抽上去,干部便一脚踩在被捆者的背上,死命往后拉。干部称"不打不骂",实属屁话;此种捆绑法,其实比拳打脚踢更加痛苦,更加持久。一次长时间的捆绑后,至少数月,甚至半年,坏死的神经才能恢复感觉。有的则成了终生残废。

解押我们的苏式吉普车上,两个干部都配有手枪,两边坐着持冲锋枪的大兵,车前有一部摩托车开路。他们怕我们跳车逃跑,便把我们的双手吊绑在车顶铁杆上。本已痛得汗流夹背的我们,在劣质泥路上摇晃颠簸,倍加痛苦。一百零八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大半天。

押回沙洋农场第一新生机械厂监仓,便把我们分开监禁。我虽然早已饥肠辘辘,但松绑后的双手,根本拿不起饭勺,只能像衣袖般地吊垂在两旁。第二天上午,来了一批大兵和干部,又把我们捆紧,推向监仓的广场。那里贴满了政治标语,台上摆了桌子椅子,坐满了场队干部。台下是全厂的劳改和就业人员。横空的一条红布上,写着:"批斗反革命逃跑犯叶少华大会"字样。他们重看我了,把大名搬上横幅,倒是少有的事。

照例上来一批经过干部挑选、授意过的打手,闹哄哄地把我们臭骂一顿。有个素不认识的老头,硬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对他说了很多"反动话"。有位数年前同牢的原某农场造反派司令,现已判刑三年劳改的张某,也上来凑热闹,拿出当年的声量和手势激昂一番。同"号子"坐禁闭时,经不住他再三要求,确曾让

他看过从国外寄来的家信。但现在他却说成我主动向他宣扬资本 主义生活好,主动把外国信给他看,企图腐蚀、拉拢他。

批斗大会又长又臭,拖了大半天才结束。跟着把我们押上拖拉机,在滚滚灰尘中,押送到原属"青林农场"(新青林农场的前身)的"青林监狱"黑牢里,监禁起来。

这里的暗房真黑。检查行李后,各人只准留毛巾和饭匙,不准刷牙。每天早晨,有一盆温水,先由两位劳改组长洗脸、抹身,有时还洗脚,然后按顺序端到每个号子的风门口,让大家洗脸,并不断地催促: "快点快点!"每个人只准揉两次。要多说好话,并且动作敏捷,才能揉上第三次。

各地规矩不同,有些监狱、看守所,白天不准睡觉,要端正地坐着,名符其实的"坐牢"。这里却任由君便,夜以继日地睡也无妨,但不准讲话。所以,每天只能对着霉臭的便桶发呆,又黑又静又臭,死寂得可怕,几乎令人发疯。世界又一次凝固了,宇宙又一次消失了。我坚持白天不睡觉,免受漫漫长夜失眠之苦。当然,生死未卜,升天的可能性很大,只要罪名成立。所以也睡不着,睡不好。

心情非常沉重,惋惜事情的失败,惋惜罗君没听我的两次建议。但事到如今,怨天尤人于事无补,只怪计划不周,运气不佳。为了抵抗心理上的压力,我每天回忆往事,从幸福的童年到苦难的青年,从父亲的荣光到家庭的温暖,从自由中国幸福的生活,到沉沦后的悲惨遭遇。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主义是愚民幻想出来的天堂。我依然认为为得到自由而冒险,是值得的。

忆甜思苦的结果,使我是非更加分明,勇气倍增,毫无畏惧。 并准备蒙主召唤前,一定要快速喊出:"自由万岁!民主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因为若口齿不快,从抽颈绳到打枪托之间就喊不 出来这么多了。 尽管我把背心、内裤都撕下来当厕纸用,但难应付长时间必需之急。于是求助于一位矮胖的王组长。他到外面院子里抓了一把树叶塞给我:"唔!足够你用几个星期了!"

"组长,这树叶子光溜溜滑油油的,能用么?"我疑惑地问。 "怎的!老子从来就用这些!"他没好气地说。我吓了一跳, 不是因为那近乎吼叫的粗声;而是想起那盆被他抹过下身,乌黑 的洗脸水来,怪不得味道不一般。

由于道行不够,学不会此种技巧,只好求助另一位组长。他 给我塞进几个装鞋用的小纸盒来。有了这较好的待遇,我不敢再 有苛求,生怕树叶子又塞进来。毕竟它是纸糊的,可以层层撕薄, 节约着应付。

隔壁有时可以听见逼成疯子的杨菊开在唱客家山歌或胡言乱语。每次都招来值班或大兵,用短棒毒打一顿。他是闽东惠华人,因"解放后"生活无着,口露不满,被打成反革命判重刑劳改。长期的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使他精神终于崩溃,成了废人一个。但干部仍然叫他拉土运砖,绝不放过从他的劳动中榨出最后的油水。

对面关着本场李副总场长。他原是本场造反派"新公安红旗"的头号司令,造反派垮台后,他连斗带关的进进出出监所、监狱,已是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了。他每天爬在风门口,等待两位组长把剩菜残饭倒给他。他常把高梁叶子搓成碎块,当卷烟抽。想当年他威风八面,移山倒海,显赫一时,名闻四方。他掌权时,总场的书记、场长等成了"日伪潜伏四十多年的特务",被赶到厨房扫地洗碗;两人再上台,他老兄成了"反革命打砸抢头子"。这种窝里自相残杀的情形真是荒诞不经。

有一天早上,组长叫我出来倒便桶。半月来,我还是第一回 见到阳光,所以初时睁不开眼睛。也第一次闻到稍为新鲜的、没 256 有霉烂酸臭味的空气。后来组长又叫我代一难友倒桶。进得那号子,赫然发现原二分场六中队的难友老符,在对着我傻笑。他已经疯了,从麻木的眼神和转头不转睛的神态,令我的心一沉,唉!又一个人变成了鬼。

那时我与他同过组,他还是组长呢。他家在海边某一小县。 他的判刑劳改,是最大的笑话。1962年,正值爱国运动高潮,他 梦见美蒋反攻回来,自己做了团长,便告诉他的朋友。后来那朋 友揭发他,于是得来一顶"幻想变天复辟,企图勾结美蒋,推翻 社会主义"的帽子,判了八年徒刑,调来此地劳改。好好的一个 人,据说原来还是普师毕业的一名模范教师。

审讯中,我始终坚持:一、这里工作太重吃不消,我想跑回老地方去,不是逃走;二、半路遇到罗君的,并未串谋;三、我的一切与他人无关。三个月后,通知开大会的一天到来了。我知道自己差不多了,便跪着默默向亲人、罗君、朋友告别,略略整理了一下衣服,便静候死神的召唤,心中万分沉痛。忽然,脑子闪过一念——若全部犯人放出去参加开大会,还有一线希望;倘若只留下自己押后,则必死无疑了。我紧张地听着开了多少个号子门。

果然,只留下我一人的锁未开。这表明:判官老爹的生死簿 上,已勾去了叶某的名字了。

"集合!报数!"传来指导员很响的嗓音: "怎么少了一个?谁还未出来?"跟着,我听见两个组长急速回跑的脚步声和逐个查看号子门的响声。待他们来到我的号子门外时,我已说完"谢天谢地"站在那里等待了。我已知道自己死不了,判官司老爷还不想召我去,一场虚惊而已。我长嘘一口气,镇定地步出监仓铁门。

第三次越狱

在院子里,我见到了罗君,彼此用黯然神伤,但又侥幸生还的眼神相视片刻,算是打个招呼。开大会时,我尽量坐到他前面。我找到一根火柴杆般的小枯枝,在右手背上写了"平安无事"四个字,然后作右手撑地状,放近他的面前,让他看到。因为那场合我们是不能、也不准讲话的,否则,案情便会向坏的方面急转直下地变化。听到他"唔"的一声,我心头的大石也放下了地。

不久,放我们出来劳动,任务是把一小山丘的土挖出打碎后,用板车拉到不远处填平夯实,以作盖仓库的地基。约有几十名难友在劳动,其中有疯疯癫癫的人,也有带着大镣的惯逃重犯。两旁有两名看守员,持冲锋枪在监视着我们,大概两小时换一次班。这些杂牌军倒很会享受: 值班时,要劳改搬椅子放在水田埂上,让他们坐着"站岗"。

一星期后,有一天,我和罗君刚好都在山丘顶上铲碎土装车。 他突然问我: "还有胆走么?"

我说: "不自由勿宁死,我一定要逃出去的。"

"那好。等会太阳快下山时,我们走!怎样?"他说。

我深感突然,思想上、物质上都毫无准备,心中把握不大, 几近是冒险。于是说:"过两天吧,我要准备准备。"他最后同意 推到后天下午四点钟。这样,入黑前我们可以赶一程路,不致迷 失方向。待他们发现追来,夜幕又已低垂,可以摆脱追兵。临走 那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外罩劳改衣裤。

两天后我们依计行事。但当我们一起报告到后山丘如厕时, 发现多了一名带着脚镣,绰号叫"响马"的同伙。

到了山丘上有些低洼处,我们假装如厕的样子,我探头观察守兵的动静,甫一回首,令我吃惊的是:前后不到半分钟时间,

那"响马"早已弄脱脚镣,与罗君向前飞逃去了。我赶紧脱掉劳改囚衣,抽紧未扣好的裤带,拼命追赶上去。

我们很顺利地摆脱了令人心寒的劳改场。但有个现象令我深感不安:很远的西边层层起伏的丘陵,在落日映照下变成天红地黑的图案,但山顶上,多了两条直立的、时常改变位置的线条,那可能是追踪者的身影。此时幸得有落日昏色的掩护,他们追赶不上,但也许可以推断出我们的去向。

我们摸黑来到"响马"的亲戚家,准备弄点吃的,睡上一觉,避过锋芒,第二天再赶路。但一踏进那间破烂的泥墙瓦屋内,我见到墙上挂满了"优秀民兵奖状",再留神那当民兵的家伙("响马"的表弟)那副神情、口气,已知道情况有异,错入狼窝了。便悄悄耳语于罗君:"此人可疑,此地莫久留,赶快离开这里!"罗君马上同意我的观察,于是找个托辞,赶紧离开这座陷阱。大概英雄所见略同,也许上次的教训令他比较信我的话。

一出村口,我们拔脚就跑。我不时警惕地回首观望。忽然,发现闪划着的电筒光柱在黑夜中向我们逼迫。"糟!他们追来了!"罗君轻嘱:"快跑!"我们便跌跌撞撞地拼命向前飞奔。我本意伏躲,但这次他对了,绝对不能停留。

寒冬、烈风、腹饥、身疲。走到半夜时分,已觉举步维艰。 我们决定在路边一山岗的茅草丛中躺下稍作休息,待天亮再作打 算。我们像野兔般钻进山草中去。但那无情的刺骨朔风很快就把 我们赶下山坡,再留恋那草窝,整个人非冻僵不可。

走到天亮,小路通向一公社大队部,我们犹豫了一下,决定哼着"红歌",昂首阔步地闯了过去。门口扫地的老头疑惑地望了一下,又低头舒了一口气。沿着公社走,就不会迷失方向了(但后来证明我们是错的,不该上大路)。

罗君问我: "你看现在有几成?"

我答: "顶多五成,前程未卜。喂,为安全计,不如我们找些竹笠、锄头、背筐之类,化装成农夫模样,可以掩人耳目。" 他大摇其头: "我们的身份已改变了! 你怎么老是顾虑那么多呢? 老弟,镇定些!"

平心而论, 当时如能采纳吾策, 也许能够逃过劫数。

我们在路旁厕所小解出来,忽然惊见追捕的摩托车,已在不远拐弯处冲来。由于未有改变外形,可谓"单眼佬看老婆———眼望尽",虽说我们飞跑上路边小山,躲伏在树丛中,但已迟了,终于在干部的手枪下,被捉了出来,扎扎实实地捆了个五花大绑,踢着屁股上路。

紧捆着双手,要走完几十里路,真不容易,这时的我们,早已寒意全去,变得满头大汗,汗流浃背了。稍微慢了点,那皮鞋、巴掌、枪托,就会无情地落在后脑勺、腰部和屁股上。那"响马"因痛极解不出小便,被大兵狠打了一顿,说他谎报要如厕,企图趁机脱逃。

最"人道主义"的一次,是到了某镇,准许路旁小店的老百姓给我们喝足凉水。当然是像牛那样,喝盆里的水。干部对围观的群众宣传说: "这两个是福建人,海外间谍、特务,派回来搞破坏的。那个是惯偷,出名的土匪,专搞偷盗破坏。" 老百姓对我们这两个政治犯没有恶意,但有人上前把"响马"打了几下,边打边骂: "老子 X 你妈! 偷老子们的东西。"

不久,接运我们的车辆到达,又像猪般把我们塞进囚车厢内, 便风驰电掣地向场部奔驰而去。

那司机惊讶地对我说:"呀?又是你呀!跑了多少次啦,还不死心?"一干事幽幽地说:"他呀,大概到了阎王爷那里才会死心。"

往后的日子是:罚跪、示众、监禁,戴着大脚镣,捆绑着到 260 各分场去"巡回宣判",七捆七松,直捆得我们几乎晕死过去。罗 君的双脚踝,被不断转动的铁镣磨得鲜血直流。我事先在短袜子 内靠近脚踝处,缚上一层棉花,抵消了铁镣的重量与磨擦,倒也 无损。可惜,事先我无法教他,让他吃此苦头。

五花大绑,外加一副四十多斤重的大铁镣,想上卡车厢,也 是很难的,我尚能踏着椅子跨上去,罗君镣短,脚痛,百试不能 如愿。两个不耐烦的大兵,便把他拾起,掷进铁皮底的车厢内去, 痛得他重重地"哼"了两声。

我们低头跪着,脖子上照例挂着"反革命逃跑集团主犯叶少华"的牌子(罗君是首犯,略重于我)。双膝在有沙砾的铁板上抛上抛下,左磨右擦,个个裤穿血流。一大兵说我企图抬头张望,一脚踢破了我的口唇。

这次,我加了两年,合原判及第一次加判,共十九年整。他加了五年,合共二十多年。"响马"因他"出身好",倒没有被加刑。

这次被抓回大大地宣扬了"缉拿神速"、"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心",热闹了一周多后,这场"杀鸡儆猴"的把戏才结束。

被加刑后,罗君调到樊城市附近的第六新生基建厂劳改,我则留在宜城东岸的第七新生基建厂继续改造。两厂同属沙洋农场。在内陆,凡挂有"新生"衔头的,全是劳改单位。

他们用沉重的苦役,来折磨我的肉体,用反科学的马列毛理论,来摧残我的意志。每天要在高温、浓灰的窑洞中,集六人之力,把数十吨重的砖瓦坭坯子,举起架好待烧。很多人走出窑洞,躺在地上,一面浇冷水一面喘气,有的晕倒在烫脚的火灰里,要送去急救。我觉得自己真地快支持不住,就要死了,已被烤成皮红肉干的北京烤鸭了。

有一天, 我终于愤怒地反抗了。我坐在窑洞外, 坚决不干活,

并对惊奇的组长说: "我不干了!你去报告干部,要批要斗、加刑、枪毙,任由他们!"在劳改场,"抗拒改造",上述几种刑罚是最普遍的,也可加上一些莫须有的"材料",把人消灭掉。我作了最坏的打算。

一脚微跛的刘队长,把我叫去臭骂了一顿,扬言要批斗我。但第二天却调我到室外操作的"什工组"去劳动。拖砖坯也是沉重的工作:每天要工作十多小时,将排成七条,重一千多斤的砖坯车,拉到窑室门口供装窑用。车重、路滑,腹中空,烈日、寒冬,风雨行。一场暴雨后,揭帘装坯的十指痛入心房;工场积水,车轮沉陷及半,要集六至八人之力才能把车推(差不多是抬了)到较硬的大路上,还要在几处危险岗坡,上上下下,每一车拉到窑门口,人都已是七窍生烟。就这样不断地拉呀拉,从太阳升起拉到太阳落山。

很多人滑倒,跌断了车柄,埋在碎砖里面喊救命。有的下坡时,失去控制冲向一旁,人仰车翻,终生残废。我自己就曾被一位难友的车把撞裂左边一条肋骨,痛得我眼冒金星。他是"梅花党"的成员,本是中学教师,几个"首犯"已被枪毙,他被判"十六字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俗称"死缓"。已被"未来的枪毙"折磨得精神恍惚。想到他的处境,我没有骂他,手掩着伤痛处,自叹倒霉而已。由于用力过度,我得了脱肛症,走路维辛,还要咬着牙根拉车子。

在我极端困苦的日子里,有很多已刑满留场就业的难友,千 方百计探望我并送食物给我。患难之交,情同手足,令我没齿难 忘。特别是同过仓的高医生和一位表亲。这段时间,正值每天高 举"最高指示",紧跟"舵手"的时候,人心惶惶,干部们如临大 敌,偏蒙住劳改们。我从就业人员口中,探听到这样一则消息: 莫斯科电台称: "全市人民热烈欢迎林副统帅一行安全到达莫斯 262 科。"(但一般传说,他们已死去。)为了告诉人们,也为了扰乱 他们的秩序,我把此则新闻反刻在砖上,准备广为印发。至于真 死假死倒也无所谓。

不料尚未完成,就被一个当过红卫兵,品行极劣的家伙看见抢走了。队长把我软禁在监仓内。我知道问题很严重:泄露机密,在枪杆子底下印发反动传单。但我仍能冷静地、极力思考好了对策。

当指导员问我时,我一口咬定:一、不是我的字迹,字体(刻画时已做了不用真迹的预防);二、林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知道有此事发生,干部从未宣布过;三、我只是好奇捡起来,想看清楚而已,不知谁刻的。指导员没吭声,看来被我的"理由"所干扰,不便作结论。当然,"死罪可免,生罪难逃"。

接着,开全厂大会,批斗了我两个晚上,组织一帮打手、积极分子,臭骂了我一顿了事。但秉承主子之意,发言中故意回避"林彪事件",绝口不提,只添油加醋地骂我家庭、骂资本主义、骂我反动透顶、越狱逃跑、叛国投敌等等,尽是些胡说八道的陈芝麻烂谷子。

事后一个深得干事信任的武汉"积极分子",洗碗时,悄悄对 我说:"跌倒了不要紧,只要跑出了这个地区,就有成功的希望。"

经我戳穿这"老林事件"后,干部只好在一次晚学习会上宣称:一、不准记录;二、不准交头接耳;三、散会后永不准谈论。"三大纪律"后,才郑重而简单地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修正主义分子、阴谋家,已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散会。"和刘少奇相似,又是四顶帽子。一些在"早请示、晚汇报"中,虔诚地天天呼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人,不知今天作何感想。当然,他们又会跟着高喊:"林彪是不学无术,目不识丁的军氓!"

大难不死

有一次在监所外拉土,中间休息时,我独坐一隅沉思。忽然 传来了一句问话:"你叫叶少华,是么?"

我瞧着坐在对面车旁的陌生难友,奇怪地反问:"你怎么知 道我的名字?"

"嗨! 顶顶大名的叶少华,整个农场谁不认识?"他轻松地说。

我愧然一笑,自觉虚有其名,一次还未逃出去呢。我问他: "你是哪里人?听口音像武汉人,汉阳?汉口?"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父亲任过武汉市司令,母亲是中国人,我自小在孤儿院长大。"他的一席简介,方才令我好奇地去观察他的体形。粗肥短矮的身材,走路左右摇晃的姿态,确是"日本矮仔罗卜头"的模样。

我们成了好朋友,因为都有颗争取自由之心。他有一次与武汉两名难友一起逃跑,不幸失败,还差点被干事开枪击中。抓回后受尽吊打捆绑、手铐脚镣的折磨,结果加了一年徒刑。一次上厕所途中,他告诉我:"曾想与'响马'逃跑,现他出卖了我。并会涉及到你,怎办?"

我吓了一跳。怎么又牵连上我了?马上叮嘱他:"事关三人,只要我俩矢口否认,他们是不能下结论的!记住:死不承认!"

时间在彷徨中一天天慢慢过去。一到干事进来,或晚上学习、 开大会时,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幸好正如我所料,干 部定不了"案",不便来啰嗦我。如果"日本仔"的防线破了的话, 我就要在黑牢里,再一次欣赏镣铐交响曲了。

一个周末下午,我看见平日紧锁的大铁门,在刺耳的响声中打开,推进来一个我认识的"就业人员",他手上带着洋铐子,脸 264

上有伤痕,后面紧跟着所长,狠狠地推了他两把,当下我的心便 下沉。陆续关进来几个福建的就业人员后,更觉得事情一定很严 重。但绝对未料到会无缘无故扯及我,白吃一顿皮肉苦。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重调查研究、重事实,不轻信口供"。定起案来,往往凭"出身、阶级本质、印象",靠"片面口供、臆测"等,大行"文字狱",大搞"思想罪"。

不出一周,就莫名其妙地把我和队上几人关进隔离黑牢,受尽了刑具和拳打脚踢之苦。口口声声迫我交代所谓的企图暴动、杀害干部和解放军、逃跑越境、叛国投敌等"罪恶"。我坚决不承认。

他们把我弄到墙外的审讯室,关紧门窗,以防叫喊声传到外面。中队的张干事,用带有铁钉的大皮鞋向我猛踢,记记着力,使我浑身瘀肿,移步维艰。又用巴掌左右连续开弓,打得我唇破口裂,衣襟上满是鲜血,差点没把下巴打掉。

总场来的专案负责人之一的张干事,软硬兼施不成后,也露出凶恶面目,故意反复叫我回答一些很难记住的日期、数目等,抓着一次答错了,便硬说我"态度不老实",冲过来用拳头向我的头顶、后脑勺、腰部、胸部等,拼命打击。并用蔑视一切的神气说:"老子今天就打了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分场的胡干事,把我弄到他宿舍去"改变一下环境气氛",意图用软的一套引我上钩。碰得一鼻子灰后,也老羞成怒起来。他一面"哼哼"地冷笑,一面用双手死命卡紧那本已紧得使我双腕皮开肉绽的铐子,使劲地左右扭旋拉扯,痛得我冷汗直流。起先,我咬破口唇,一声不吭。但他越卡越紧,得寸进尺,毫无退意。我想这样下去要吃"闷亏",心念一转,便突然"哎哟!我的妈呀!"大叫大喊起来。这老狐狸吓了一跳,生怕"刑讯迫供"给人口实,才住了手。

"回监仓敢叫喊一声,揍他狗日的王八蛋!"那总场干事恶狠狠地吼叫着。

- HON 2 - K

就这样白天黑夜,夜以继日的拳脚"车轮战",打得我遍体鳞伤。一个月下来的成绩是:左尾指、右拇指折断,左边两根肋骨折断,右手腕骨处一根手骨折断,满脚黑色伤疤。

双手给有牙的洋铐子锁得肉溃骨肿,夜不能寝,痛苦异常。 幸好不久,关进来一位武汉小难友,教我用小竹片、小铁丝、甚 至筷子,松脱铐子的技术,才可以得赴周公宴,养足精神,明日 与干事周旋。

受尽刑讯迫供、人身侮辱约一个半月后,他们渐渐丧失了原有的信心,于是使出最后一招:"死关"(无限期地关下去,关到你死或投降)。

我读过《天方夜谭》,亦叫《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所以也感到两千三百夜的时间,是多么寂寞、痛苦和漫长。在中国广阔天地中的某一处仅有几平方尺的黑牢里,我默默地在酷暑寒冬中,度过了三年半与虫蚁、镣铐、绳索为伴的凄苦时光。日对阴森四壁,夜闻凄楚呻吟。

看到过多少回北雁南飞,月缺月圆;默送过多少次东魂西归,鬼哭狼嚎。虫鸣鸦噪夜继夜,叶落枝枯年复年。隆冬承受着刺骨的严寒,盛夏感受那晕眩的酷热。我在刺刀上翻滚,也在与死神搏斗。有时夜半冻醒,念一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便真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心境和那"国破山河在"的感慨。

这里,白天是不准睡觉的,要叠好被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不准抽烟,不准讲话(只可说悄悄话)。每天我都坚持过有规律的生活,坚持活动。

从武汉来的小偷、流氓,多半是有钱人的后代。解放后,父 266 母亲斗死的斗死,坐牢的坐牢,处决的处决,他们家里一贫如洗,生活无着。随后又来了"上山下乡"运动,优先被赶到穷乡僻壤,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种赶尽杀绝的手段,令他们苦不堪言,后来只好流落城镇。没有"居民证"等于没有饭吃,最后沦为职业惯偷,到处流浪。

他们人小但都很聪明,所谓"贼仔计,状元才"是也。诸如: 他们会在木屐底下,钉些铁钉,趁放风,外出倒便桶之机,不用 弯腰,看班也未发觉,便能"穿刺"到一些烟屁股,回仓大过其 "快乐过神仙"之瘾,摇头晃脑地飘飘然起来。

他们取火也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人站在便桶上,把 仓内电灯的正负极(火线、地线)胶布弄开,在葵扇把的顶端放 一截小铁丝,铁丝中间穿有一团棉花。只要轻轻把小铁丝两端搭 在正负线上,"啪"的一声,小铁丝通电,也点燃了中间的棉花。 这是他们抽烟的重要火源。完事后,包回胶布,神不知鬼不觉, 简直天衣无缝。

自制反射小镜子:把"放风"途中捡到的普通透明小玻璃片,用饭浆与一块深色纸和布粘合,接一段小铁丝作伸延用(伸手出去很容易被发现),便制成了能窥视值班、大兵、干部行踪的工具,他们叫"小雷达"。本人也制过不少,在黑暗中看光亮的门口、走廊非常清晰。总之,查到了收去,收去了再做。但要咬定"不知谁留下来的",否则要挨打或戴手铐的。

打开"风门":他们把捡到的小钢丝(切坯子的断钢丝,到处都有),从孔隙中轻轻撩起风门的铁扣,打开风门与难友聊天,一面以"土雷达"监视干部值班员的行踪。一旦有情况,他们关上风门后,还能用钢丝托着,轻轻放回小铁扣,像没有开过一样。

传递东西:他们用旧报纸卷成细长的纸筒,把字条、歌曲、 香烟、火柴之类的轻物,插牢在顶端,从风门口伸出去,加上双 方的手臂长度,可以轻易地对传东西。

他们在衣领、衫袖、鞋底、腰带、裤脚、被子里,都能巧妙 地收藏一些"急需物品":香烟、火柴、粮票、现金等。有的能小 心地用刀片把一根火柴分削成三、五根小火柴,节约能源和开支。

大概历尽人间辛酸吧,正如他们自编又流行的"小妹"歌曲中有一句是这样的:"……尝尽了辛酸,受尽了人间的气!"所以,个个都爱唱苦难、情爱之类的歌。他们"听唱"的能力很强,一首新歌,你哼一两次,他们马上就会唱了,令你惊奇不已。

最初,半年多都不放我们出去倒便桶,更不准我们放风。经大家合法斗争后,所长才佯作不知情,终于准我们每天放风一次,约可晒几分钟阳光。但我们的"同案人"是隔离着出来的,防止我们说话。

监所里关着一位福建莆田县难友,姓钟,他曾在内地当过警长,在香港也当了几天皇家警察,解放后回大陆,因历史问题成了"反革命分子",判了十多年劳改。由于经常挨打、禁闭、加刑,人已弄得精神失常。这次关进来的原因,不得而知。看他身上那套百纳衣,破得不能再破了,着实令人可怜。

有一天,突然把大家赶到东仓关起来,西仓嘈嘈杂杂,并听到钉墙的声音(把棉被钉在四面墙上,防止撞墙自杀)这是行刑的预兆,但不知遭殃者是谁,个个精神都很紧张。第二天下午,忽然传来了生死攸关的一串钥匙声,在恐怖气氛中,"叮呤叮呤"地慢慢接近一个铁门,只要听到"当啷"一声,等于宣告了某人的死刑。没来开我的铁门,我松了口气,但下次轮到谁就不知道了。带出去的,经"土雷达"侦察,证实是提审老钟。一直审到半夜,才听到他艰难地拖着大铁镣回仓。夜半镣声,倍觉惊魂,令人不寒而栗。想到好好一个人,迫成疯子,现在尚能走动,不久就成荒野枯骨一堆。多少无辜善良的福建乡亲,死在莫须有的

恐怖屠刀下。

斜对面关着一个湖北枣阳青年,叫王建基,原是县豫剧团的小生,嗓子不错。曾是共青团员,裁员失业后,生活无着,沦为小偷,流窜洛阳、西安、北平、上海、武汉一带。判刑劳改后,一逃再逃,是个有名的"逃跑大王"。有一次,带着脚镣过围墙,途中弄断,逃到西安。抓回来的押解途中,又脱逃到了西安。外貌可看出曾是个漂亮小伙子,非常清秀。

由于经常遭到拳打脚踢、吊打捆绑、污辱、加刑、监禁等,结果精神崩溃,整天疯疯癫癫。白雪飘飘,他光身披着一张又臭又脏的被单,在凛冽的寒风中发抖。酷热盛暑,他又穿戴上裤衣棉帽,"全副武装"地站在烈日下发呆。看那瘦削枯干的身躯,只能相信他是会动的木乃伊。

有一天中午,他突然狂叫:"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惊慌失措的两个值班,闻声赶来,用拳头、木棍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几个大兵也来凑热闹,进去踢打他一番。

后来值班来调查,说:"谁听到他'狂呼反动口号',都要写 检举'立功赎罪'。"

不久,他判了无期徒刑,送到樊城第五监狱禁闭。隔了月余,一次我在厕所墙上看到一张成批处决的布告上,有用红笔勾了的他的大名,才知他再次"狂呼反动口号",已被枪毙。共青团员反对自己的党,又死在自己人的刀枪下,实是一大讽刺,也证明人们不再是沉默的顺民了。

那时候, "四人帮"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矛头指向邓小平。有一次在监仓墙上,看到被行刑的各县、市、专区布告单中,有两父子是为邓小平呼冤,要求为邓小平"平反"而一齐被杀掉的。

不久,北京"天安门事件"的消息,陆续见登于《人民日报》、

《湖北日报》上,也有很多小道消息传到我们耳中。这本是他们内部反毛保邓之争,但反抗者敢喊出: "秦始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百姓不是愚不可及了"的口号,则令人拍手称快,反映出极权的不得人心和人心思变。

化相类 化环二烯 化二烯二烯二烯基氯甲酚 化二烯二烯基甲基氯甲基甲基

一天上午,对门送来一位带脚镣的福建难友,他在"第六新生基建厂"报复检举者,一怒之下以铁锤击毙对方。死者潮汕人,姓黄,曾在六新生三中队与我同过队。文革时受尽吊打捆绑,是出了名的"三黄"之一(黄威汉、黄加炎和他),似乎出身官僚家庭,为何会写检举信?他俩之间存何怨恨?不得而知。但总觉得为一点事,丢了两条人命不值得。所以闲谈中,约略流露出替他们惋惜的口气。看着他整天带着铁镣,坐以待毙,亦觉心酸。

他以前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的,此后似乎明白互相残杀, 无济于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一反变得精神恍惚起来。 经常捶胸顿足,哭哭啼啼,骂自己笨蛋,哭求老母原谅。我心里 也很难过,怪自己直言,摧毁了他意志和心理防线,倒不如像医 生对病人那样,不道真情,让他少受精神折磨,坚强地赴难。

我极力说服他把地址、遗言告诉我,我或有一线生机,有朝一日,也许可代传一些口信。他答应了,但若干年后,我到了福州,却找不到"东山原道路"这条街。数月后,他便在一次公审大会上,拉出去枪毙了。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何处(宣判死刑后,都用汽车拉到秘密的荒野行刑),更没有人晓得他埋骨何方。

与我相处最久的一位难友叫阚某(劳改场他用"关某")他原是国军某部伞兵部队少校。他告诉我:他曾受命于总统经国先生。大陆沉沦混乱期间,他本随军撤退到了广东,后又只身跑回武汉,想带他年轻的妻子一起南下,不料当时湖南叛乱,封锁了一切通路,无奈只好返回武汉市居住下来。他文笔很好,见识也广。初在《长江日报》当记者,后又任某文工团副团长。因得罪270

了老干部的正团长,不久便因"男女关系"被陷害重判十二年,投入樊城市第五监狱劳改。

刑满就业后,结识一个不满现实的职业扒手,一起越狱潜逃。 准备由湖北到贵州,再由云南越境。谁知到了贵阳,那同伙半途 却步,并偷了他的所有资财,包括一皮箱衣物及钞票、粮票等, 害得他几乎流落街头。

在一个旅店里,他与一军官同室,他想从那人身上弄点盘缠, 又看中了那只手枪,混乱纠缠中,被人抓回归案。这次被定为"历 史反革命"、"反革命逃跑首犯"、"企图杀害我人民解放军"、"企 图叛国投敌"等,看来凶多吉少。

他暗中教会了我不少流行歌曲和唐诗、宋词等。我们还着手研究一种传递消息的秘密方法。

关了两年多后,忽然叫他出外劳动,为新监所设计安装下水管。他很高兴,我也替他高兴。因此举往往意味着两个意思:一、案情就快结束;二、还死不了。我们估计,最重判个"死缓",希望判个"无期"。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只要死不了,前途无量。

我衷心感谢他极力支持我、鼓励我,写密信给海外家人,为 我上诉。我有今日,与他都有很大关系。在赤贫加赤贫的环境里, 人人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我穷,他比我更穷。放风时,我偷 偷地把一条破羊毛线裤和一件旧棉背心塞给他。希望在漫长的岁 月里,派上用场。

然而,我们对现实的真正手段、处理办法,估计还不足。原 来干部事实上已经定下杀他的时日,但死前还要利用他的技能, 并故意麻痹他。

那一天,终于在他关了三年后来临。

照例把人赶到另一边关起来。趁阚某出外提审(其实是去接

受死刑宣判)之空,派人来往墙上钉棉被。那沉闷的铁锤,记记敲击在我的心头,一个难友,一位有才干的朋友,就这样要去了。阚某回来时,是手铐脚镣连锁在一起的,弯着腰慢慢地几近爬着回仓。在死囚室的中央,钉有一圆铁环,当脚镣锁在铁环上时,可真谓寸步难行了。这就是大陆人民,失却自由最多、最后的一级(第十级)。除了眼睛脖子可以转动一下外,他是连嘴巴也不准活动了。

grand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这时候,他的仓门是打开的,正对仓门的走廊上,坐着一个 大兵、一个干部,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垂死的他,约一小时换一次 班。

按理,要杀就杀,拉出去好了;但他们却别出心裁地,喜欢宣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并不立即执行,让死者承受恐怖的折磨和痛苦的回忆,一连二十多天,让人变得死去活来后,才拉出去枪毙,很多人到时路都不会走,被大兵捆绑好,拖着掷上车的。

有一天,一个当过大军排长的干事,气势汹汹地把我叫到值班室,惊堂木乱拍,叫我交代"罪恶"。这家伙平日暴躁成性,有虐待狂心理,专爱找人毛病来殴打、污辱人家。他打人、捆绑时,如果听不到哭喊、求饶的声音,一定加倍用力,直到血流肉破、哇哇哭叫方休。最拿手的好戏是一边打、一边扭手指、扯耳朵,务必听见:"哎哟!我的娘啊!"才感满足。

我觉得莫明其妙,一再申辩:并未违犯监纪。他拿出一副洋 铐子,卡在我手腕上,恶狠狠地威胁说:"不交代,小心你的脑 袋!"

那铐子卡得很紧,无法用竹片松开。一星期后,双手瘀肿溃烂,痛得钻心入骨,日夜不能安寝。耳朵也渐渐听不清楚,似因锁住腕上某一穴位所致。

审问时,我坚决否认犯罪,大喊冤枉。有一天放风,倒完马桶后晒太阳,见张所长远远在窥察我们,我故意伸出铐子,让他看到。过了两天,我的铐子就下掉了。平白戴了十多天铐子,真是又气又恨又冤。

后来,我才知道:有个与我同过号子的武汉小孩,出外劳动后逃跑了,走前感情用事地留下张告别纸条,托人转交给我。不料那纸条在节日大搜查中落在干部手中。于是硬说我怂恿他人逃跑,是搞阴谋的"幕后指挥官"。其实我一点不知情。

临枪毙阚某前几天,把我和十多个难友放了出来监督劳动, 等候处理。

这时的我,历经了三年半的黑牢、刑具、饥饿的折磨,早已骨瘦如柴,形如干尸,口青唇白,举步维艰了。眼睛特别害怕阳光,常常流泪,并从此得了皮肤敏感症,稍遇寒冷,皮上便起红斑,又痒又痛,非常难受。我庆幸自己能又一次逃过鬼门关;也为不久的重判和苦难的前程感到担忧、茫然。

有一天吃午饭后,我的双脚竟然站不起来了。"双脚瘫痪"的可怕念头,闪过我的脑际,令我吃了一惊。这才糟糕,若成终生残废,活着何益!不!不能让它瘫!一定要站起来!我咬紧牙关,用双手撑着两旁,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站起来,弄得满头大汗,双脚却毫无反应。我继续努力,直咬得口唇流血,最后终于站起来了。我高兴地拿着饭盆到室外去。途中我自嘲地笑了笑:"你要是瘫了,哪个姑娘肯嫁你呀?"这同一天,全厂竟有五十多人同时得了瘫痪症。

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通知到总场开大会。会场设在修配厂的山坡上。这天是阚某遇难的日子。只见他被五花大绑地推下车,神情很镇定,与一干人等被踢跪在地上听宣判。行刑前,他意味深长地环视大家一眼,然后挺着胸,从容地走上囚车,与他同时

判处死刑的杨菊开(打死罗开心的疯子),不知被拉到哪儿的山坡 枪毙了。

后来在附近拉土时,我捡到几页烧剩的纪录纸片,大概记着: "几时几分沉思不语", "几时几分,要求小便,量不多", "要求喝水", "没有动作"等。看来,整个监视期间,都作有详细纪录。

一个月后,轮到我上"金銮殿"了。又是一场粽子式的捆绑后,连推带踢地被赶到总场。我们几人排成一行。第一个拉出去的是个就业人员,不知犯何大罪,一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给我拉出去!"就给报销了。

第二个叫的是我和几个"同案"。我想:这回死定了,将难逃劫数。内心很沉痛,痛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农场"人民法庭"庭长宣读的罪状,大意是: "出身反动官僚家庭,思想极端反动,仇恨新社会。判刑劳改后屡次逃跑。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叛国投敌。"某年某月与某人等,阴谋策划逃跑国外,态度顽固,实属屡教不改的阶级异已分子,应从重从严处理。接着提高嗓音宣布: "现在宣判,判处叶少华……"说到这里,故意作短暂的停顿,让我们焦虑地等听下文。

场上气氛很紧张,鸦雀无声。我的心不断下沉、凝固。完了,生死攸关的一句话,就可要我的脑袋。也许是"立即执行"?两秒多钟漫长的等待,终于在恐怖气氛中,慢慢过去。接着听到下面一段话:"加判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原判,共二十九年。刑期执行由 1961 年 12 月 25 日至 1990 年 12 月 25 日止。"年数比苏武还多了十年。

我松了口气,又一次从刺刀口上滚了过来。死是死不了,但 半死不活的生涯和那二十九年长夜**漫漫**的崎岖前路,让我不寒而 栗。但我坚信:自由之神会带我走出黑暗的。

后 记

加粮添餐以后,我被调到百里外的某新生机械厂,继续创造财富。过了一年多,乘"平反冤假错案"之风,我那封上诉中央和地方原判单位的信得值,为我平反、赔偿、加职。这次,倒是尊重了客观事实。

两年后获准出国与家人团聚。一次随旅行团回去观光时,在香港与绝路逢生的日本仔、泰国仔等相聚时,谈到往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峥嵘岁月,不胜稀嘘,恍如隔世。后日本仔随剧团来澳,我们夫妇与他在歌剧院、皇家花园、西餐室、卡拉 OK 欢度数日, 欢迎他合家来此相聚。他眉中带忧说:"老婆拉后腿!"奈何,香港又回归,奈何!

另一次参加"大江北游",由北京长城、故宫、颐和园到南京中山陵,再到黄山,爬上了莲花峰。在屯溪大酒店唱卡拉 OK,正热闹时,忽然有人过来相认,起先茫然,后来一言惊醒梦中人:原来是东北某司令的儿子。"你怎知是我?"我问。"歌声!"他答。那晚我们唱了很多歌。他的朋友中,有位特别俏丽的女士,时时偷眼望我。小司令告诉我: "当年如果到了东北,我会安排你做教师,这位表妹小惠,是准备介绍给你的。"我笑着说:谢了,心领过了。我们都有了家了。我衷心祝福她!话虽如此,我暗中一边望着她秀丽的体形,一边想:"当年真的去了那里,个人的历史将改写了。"我唱了"拉兹之歌"用"命啊……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和"魂断蓝桥"中"恨今朝相逢已太晚,今宵又别离,水流悠悠花落如絮,无恨惜别意"来抒发我的衷情。当然,我们并无"白石为凭,明月作证",也非生死相别,要"天上人间长相忆",只有点到为止。我和小惠合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晚会是在合唱"再见亦是朋友"后结束的。我们游了无锡、苏杭、 宜兴等地,最后在上海分手。临别时,依依不舍。

"欢迎你们到国外一游,必尽地主之谊。"我说。小惠含笑点了点头。

"你们,什么的干活?"我学小司令当年模仿日本人的腔调,忽然问他们近来的生活、工作,也为打破沉闷气氛。

"父亲早退休了。他亦不能在军中发展,因有一定背景,在 商业上混得还不错。"他的一位叫小强的朋友代答。天下无不散之 席,最后只好挥手再见。

"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

红尘白浪两茫茫。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真是"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别了,小惠,别了,故乡。

1998年8月10日 最后完稿于澳洲

红尘白浪

黑色文库 第九集

作者/ 叶少华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廖天琪

责任编辑/ 杨莉藜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4年10月第1版

© 作者 叶少华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和转载文字和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Red Dust and White Waves

By Ye Shaohua

Black Series Volume 9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99-9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15.00

红祸红尘的洪荒岁月

红尘白浪

叶少华 著

作者简介

叶少华1941年出生于福建东华山下朴实而美丽的宁化县。外祖父母为新加坡华侨,父亲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大陆易于之时举家迁至香港。旋即因父亲在内陆以公殉职,一家人又搬回故乡。作者亲历了上改、镇反、肃反的血腥场面和反石时的惨烈批斗。大饥荒的饥饿岁月之后,1961年他前发去国之心,写信给美国的亲戚,提出了想出国与家人团聚的愿望,这就成为他同海外敌人勾结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五年。他沦为海南岛定安县劳改营中的奴工,后被调至湖北的沙洋农场。高墙里的严刑拷打,非人待遇和种种超乎常人想象的疯狂和残酷,让叶少华坚定了追求自由的信念。1969年开始,他和狱友先后三次越狱逃跑。每次被抓回来都遭受了更为严酷的拷打,最后又被加刑14年,从1961年至1990年,共29年的刑期,比苏武还多了十年。七十年代末他终于得到平反。离开炼狱。作者现居澳大利亚。

黑色文库 第九集 劳改基金会

Red Dust and White Waves

By Ye Shaohua Black Series, Volume 9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www.faogai.org

> ISBN 1-931550-99-9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5.00

